

绝版晚清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in Overseas Records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制作者



绝版

恭親王

「澳大利亚」雪珥 著

文匯出版社

絕版晚清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in Overseas Records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LIBRARY  
308 ST ALBANS ST  
MELBOURNE VIC 3010  
AUSTRALIA

# 绝版恭亲王

〔澳大利亚〕雪珥 著

 文匯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LIBRARY  
308 ST ALBANS ST  
MELBOURNE VIC 3010  
AUSTRALIA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版恭亲王 / (澳) 雪珥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496-0008-3

I. ①绝… II. ①雪… III. ①奕訢 (1832~1898) —人物研究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78058号

## 绝版恭亲王

策 划 / 么志龙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特约编辑 / 王占景

装帧设计 / 翁 涌

制 版 / 九章文化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 200041)

出 版 人 / 桂国强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20×1000 1/16

字 数 / 120千字 250幅图

印 张 / 18.5

书 号 / ISBN 978-7-5496-0008-3

定 价 / 39.80元

## 代序 难以复制的大清王爷

150年前的1860年9月，英法联军的隆隆炮声将大清王朝的咸丰皇帝赶到热河“狩猎”，而咸丰则将京城的烂摊子丢给了自己的弟弟——时年27岁的恭亲王奕訢。几天后，攻入北京的侵略者悍然将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付之一炬。临危受命的奕訢亲历了种种耻辱，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以割地赔款的代价使内忧外患的帝国有了难得的平静。

可能恭亲王本人也没有想到，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将会在大清王朝扮演一个极为特殊的角色。在历史浪潮的颠簸中，恭亲王站到了舵手的岗位上，极力维持着大清帝国这艘破败的巨轮缓慢前行，直至心力交瘁。

回顾起来，恭亲王奕訢的一生确实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先是在与咸丰的储君之争中功亏一篑，被封为恭亲王后不久便受到咸丰的猜忌和排挤。经过与外国交涉的历练，勇于任事的奕訢开始奠定自己在政坛的地位。咸丰死后，他抓住机遇，同慈禧共同发动辛酉政变，控制了中枢机关，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成为权势显赫的铁帽子王。作为满亲贵族中难得的有才识者，恭亲王奕訢几乎一手导演了随后三十年间的王朝改革，可谓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从总理衙门到洋务运动，从近代海军到近代教育，使本已痼疾缠身的王朝居然出现了颇具声势的“同光中兴”，可谓厥功至伟。

遗憾的是，在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奕訢始终无法摆脱慈禧太后的阴影，不得不一次次在宦海沉浮中挣扎，最终抱憾辞世。但是历史不会忘记奕訢，他的时代抱负和政治智慧至今仍值得后人思考。

19世纪后半叶，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都处于急剧发展时期，中华帝国却裹足不前。清朝军队虽然屡屡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蒙羞，但多数士大夫仍然顽固地沉浸在天朝大国的旧梦中，无事则空谈气节，有事则颀颀畏缩。即使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恭亲王，也是在极为艰难地实施满腔抱负。事实证明，在其一生的改革努力中，奕訢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到保守势力的牵掣。他首先必须在权力斗争的夹缝中谋生存，然后才能小心翼翼地为王朝谋发展，其代价便是个人命运的几番沉浮以及朝野舆论的毁誉参半。正如本书作者曾经感慨的：“尽管恭亲王早已获得了‘鬼子六’的雅号，被人们贴上了自由派的标签，但是，除了蔡寿祺之类投机钻营的举报者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人品及政治品格有过怀疑。这种稳健的政治手法，使恭亲王在关键时刻，既能推动改革不断前进，也能掩护激进的改革者从反对的声浪中逃生。”

岁月如烟，那位曾经书写了一段传奇的恭亲王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过他的府第倒是在历经沧海之后得以保存。如今，在风景秀丽的北京什刹海西南角，有一条静谧悠长、绿柳荫荫的街巷，当年门前车水马龙的恭王府就座落在这里。作为现存清代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建筑，恭王府已成为中外闻名的旅游景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近些年来这里游人如织，但绝大多数看客都是为着恭王府曾经的主人——著名权臣和珅而来的。现代的人们往往会对虚构的电视剧趋之若鹜，却对真实的历史漠然置之，这恐怕要算恭亲王奕訢的又一重悲哀了吧。

著名学者侯仁之先生曾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在浮躁喧嚣的今天，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体味这其中的含义呢？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现今恭王府的管理者，我由衷钦佩雪珥先生非凡的历史见地。虽然雪珥自称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但他多年来始终以独特的视角致力于中国近代改革史的研究，成果斐然，其已出版的《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及《国运1909》等作品均引起了热烈反响即是明证。在雪珥看来，恭王府曾经的主人——恭亲王奕訢堪称是中国近代改革的源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本人曾多次前来恭王府实地搜寻资料，凭吊历史，最终写成《绝版恭亲王》一书，为我们展现了一代亲王在那个云谲波诡的年代中

的飒爽英姿和痛苦无奈……

毫无疑问，恭亲王的传奇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绝版，但我希望像雪珥先生这样的杰出研究永远不会绝版。

2010年8月于恭王府  
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 孙旭光

## 自序 栏杆猛拍春梦惊

体制内的改革者，一面要和光同尘，一面要负重前进，艰难而孤独。掌声难得，嘘声易起，本想“左右逢源”，却往往是“左右为难”，上下不讨好，里外不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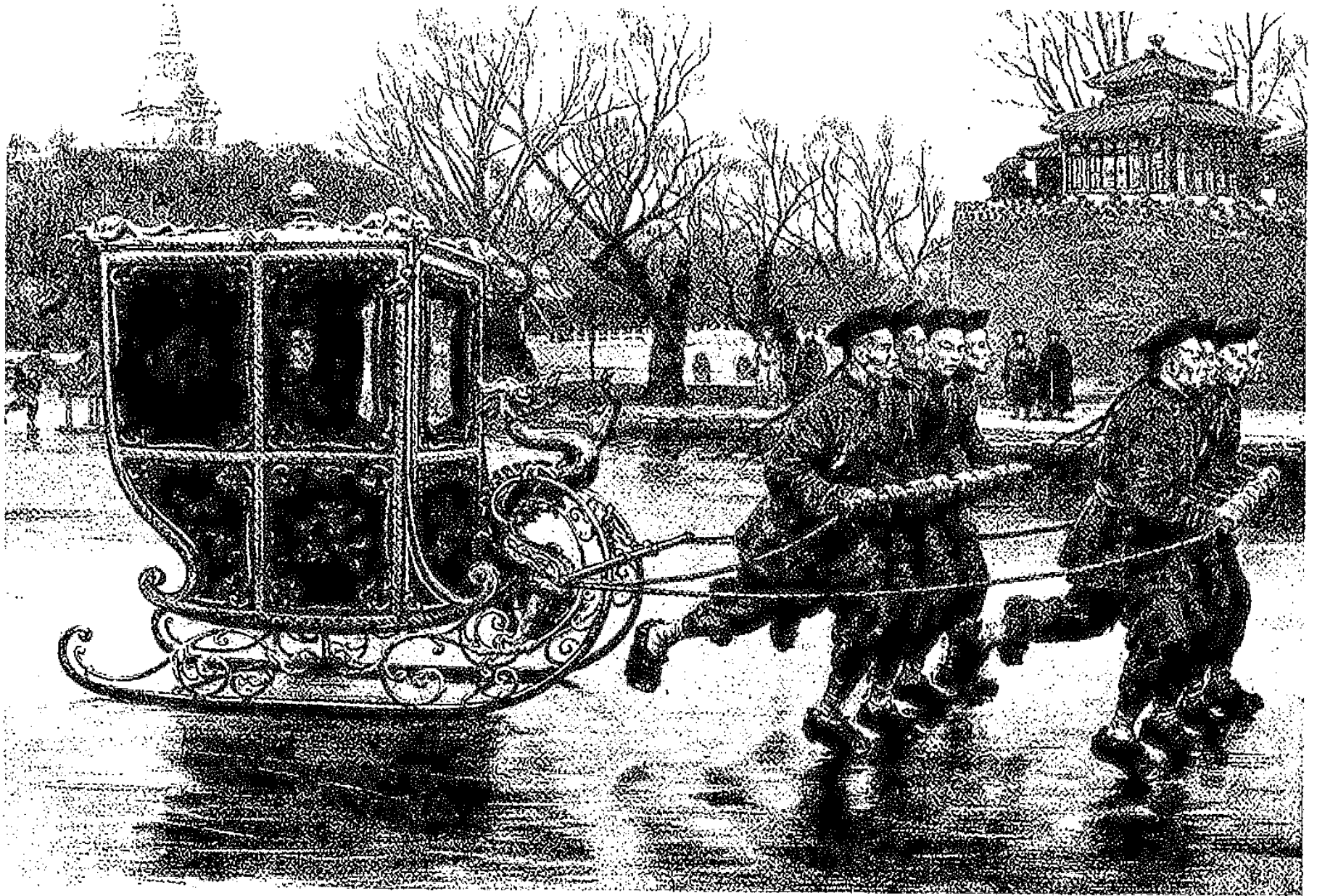
### 1

七月的鹅毛大雪，飞飞扬扬地飘落在澳大利亚的阿尔卑斯山（Alps）上。套在厚厚的雪橇鞋里，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行路难。只有踏上雪橇板，才能从滑行的轻快中，体会到减少摩擦所带来的快感。

这种快感，应该是大家都喜欢的，至少光绪皇帝也喜欢。

这张发表于英国《图片报》（The Graphic）的版画，描绘的是光绪皇帝在北海冰冻的湖面上，乘坐着奥地利赠送的雪橇。拉雪橇的，是极具大清特色的“驯鹿”——八名太监，他们熟练地踩着同样是舶来品的冰刀鞋，带着帝国的最高元首，在冰面上滑行。

夜晚，守着熊熊燃烧的壁炉，孩子们熟睡的呼吸在屋子里轻轻回荡。看着手中发黄的老报纸，1895年1月19日的出版日期清晰地标注在报头边上。百年的历史，与窗外那银妆素裹的无尽山河相比，无非是弹指一挥间。一个帝国，就如同雪橇急速而过留下的雪痕，随即被时光的严寒封上，镜也似的光亮得几乎不留痕迹，岁月



光绪皇帝乘坐着奥地利赠送的雪橇，八名踩着冰刀的太监如同北极犬一般，带着他在北海冰面上滑行。这或许不只是一幅皇家行乐图：老大帝国被一群毫无阳刚之气的太监牵引着，在冰面上滑溜而过，这似乎与摸着石头过河同样不靠谱……

无情。

雪峰上的天空无比澄澈，南十字星闪烁，北斗星已无处可循。即便斗转星移，却总是有颗星在指引着暗夜的方向，令你无法质疑造物主的神奇。

半年前，我也是在漫天的风雪中，第一次走进了后海边的恭王府。

游人如织，都是来参观“和珅他家”的。中国人实在太渴望成功了，对于成功的路径并不在意，走正途也好，捞偏门也罢，只要能成功，哪怕如同流星般地划过长空，也能成为万人仰慕的榜样。

在一道道流星的灿烂光芒下，那些恒星倒是显得晦暗、无趣。

恭亲王就是这样的一颗恒星。



作为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划圈者，他不仅将那个被后世描绘为“腐朽、没落、反动”的大清王朝延长了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并且在历经千年的自大后，第一次将中央帝国请下了神龛，主动平视——而非俯视，亦非被人打翻在地后被迫仰视——整个世界。

作为一个被革命者痛斥为“鞑虏”的少数民族政权，清帝国以自己近三百年的历史，打破了“胡人无百年运”的宿命咒语，也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拷问着无数后人：走了那么久，我们究竟离起点有多远？离终点又有多远呢？无数的大王旗换了又换，无数的海誓山盟说了又说，仿佛戏台上的斑斓戏袍和假声念白，曲终人散，如果失去了戏台，我们还能找到自己真正的角色吗？

这是一个吊诡的现象：在主流话语体系对清王朝的普遍贬低和诅咒中，清王朝留下来的各种遗产，尤其是前三十年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和后十年政治改革（“清末新政”）的经验教训，却成为后世自觉不自觉的效仿对象。历史的传承，其实并不是人力所能切断的。

#### 四

作为大国的“总理”、血统最为高贵的皇族、同时代人中难得的清醒者，恭亲王实在是太低调了，他的光芒被掩盖在太后们那巨大的宝座阴影下和那些充满八股陈词的公文之中。

后人刻薄地说他“一生为奴”，却不知这并非个性的选择，而是中国特色的权力运作的定位结果。作为接近最高权力的“老二”，如果不甘寂寞，就只有两种结局：成为老大，或者成为零，all or nothing。这种胜者通吃的零和游戏，注定了中国的舞台上只能上演独角戏，梁启超称之为“一人为刚万夫柔”。于是，恭亲王便只能“柔”，在政治精神层面上自我阉割，以便在权力这一强效的春药面前，令人放心。

恭亲王故后，这座豪宅很少有人关注，除了后世那位赢得万千民心的周恩来。不知未来的史家们，该如何解读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何以会无数次地、低调地来到这里，并将尽早开放恭王府作为其政治遗嘱之一？

恭亲王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悬念。

他曾经写过一首七律，怀念他曾经的助手宝鋆：

只将茶笋代云觥，竹坞无尘水槛清。  
金紫满身皆外物，文章千古亦虚名。  
因逢淑景开佳宴，自趁新年贺太平。  
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

这本是一杯盛满了牢骚的女儿红，却在“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句中，露出了烧刀子般的峥嵘烈度。

“拍栏杆”这种方式，最早是一位名叫刘孟节的宋人记录的，刘诗人常感怀才不遇，写下了“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杆拍”。到了辛弃疾那里，就不仅“栏杆拍遍”，还要“把吴钩看了”，一手拿着刀剑，一手猛拍栏杆，这就不只是抑郁，而且十分愤懑了。



福字碑是恭王府的镇府之宝，为清圣祖康熙皇帝的御笔。除了景色雅致外，祈福是恭王府一个鲜明的主题。除了福字碑外，像多福轩、蝠厅、蝠池、抄手游廊等无一不以祈福求福为主题，但和珅被赐死；固伦和孝公主 35 岁守寡；庆亲王永璘长相粗笨，被父皇乾隆皇帝、亲哥哥嘉庆皇帝所厌恶；恭亲王奕訢少年丧父，青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恭王府的主人们似乎离幸福太遥远了。（照片来自陈鸿舜收藏，1940 年前）

恭亲王为何而抑郁呢？又为何而愤懑呢？

更为吊诡的是，他后来又把“猛拍栏杆思往事”一句删除，改成了“吟寄短篇追往事”，拿刀子改成了拿笔杆子，拍栏杆改成了写作文，硬生生地将一盘重辣重麻的川菜，改成了温润甜腻的苏点。

或许，逝者如斯，恭亲王想不豁达都难，牢骚太盛防肠断呀……

马

《绝版恭亲王》这个系列在报纸上连载时，一些读者悄然而热烈地反馈：这是一本中国官场的教科书。

我不禁愕然。

在我想来，这本该是中国改革史的另类记录和解读。我曾经认真地回头检查，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有心所栽的花成了无意所插的柳，却随即释然。原来，中国式的花、柳竟是如此难分难解，权谋几乎无时无刻不是生活中的主旋律。无怪乎我的上本改革史小书《国运 1909》，被一些朋友当做了“官场导读”，相互推荐，居然多次登上排行榜。

这种特殊的市场“被定位”，导致我的读者大多是沉默的一群。他们在看，他们也在思考，但他们不说。不说，不是因为不会说，而是因为不便说，也不想说。我曾经的师长、红墙内的一位显宦，据说看了我的专栏彻夜难眠，长叹一声后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难啊！

我似乎恍然大悟：他们并非喜欢我的文字，而是与文中的主人公产生了共鸣。体制内的改革者，一面要和光同尘，一面要负重前进，艰难而孤独。掌声难得，嘘声易起，本想“左右逢源”，却往往是“左右为难”，上下不讨好，里外不是人。这种“势禁形格”下的痛楚，但凡是想有所作为的当家人，都能感同身受。

如果这本小书果能令“当家人”们产生小小共鸣，就算被人称作“官场教科书”，又如何呢？

现今恭王府的管理者们，的确很是让我大吃了一惊。

最初我是纯粹从一个游客和商人的角度，惊叹于这么一家文化部直属的文保机构，居然能把一个没落了百年的王府，经营得有声有色，再度验证了体制中本就有不少能人，只是如何发挥而已。

而当我有幸参观了他们的资料库，并向他们的研究人员讨教切磋后，那种只在象牙塔内弥漫的书卷气，充分地令我陶醉。作为中国王府文化的研究中心，他们在这个喧嚣的年代里，依然默默地守着古卷青灯，保存和琢磨着民族记忆中最可宝贵的一部分。

我必须向他们表达我的谢意，并在澳洲的星空下为他们祷告祈福：

——孙旭光博士，如今恭王府的“总管”，一位年轻的学者型官员，他的史学修为、开明态度及经营能力，令我折服；

——刘霞大姐，恭王府管理中心副主任，她的热情及对恭王府一草一木的极度熟悉和热爱，帮助我在最短时间内领略了恭王府的底蕴；

——陈光大姐，恭王府的学术领头人，一位从事过很多年艰苦的野外考古的专家，踏实、勤勉、低调、博学，令我受益良多……

又开始下雪了，真正的“六月雪”，万里外的故国想必早已一片火热。

明天不知道是否还能登顶，去拍拍那被冰雪包裹着的栏杆？

雪珥 2010年7月6日记于澳洲阿尔卑斯山

# 目 录

## 第一章 叔嫂共和

1

风啸天安门 2

叔嫂共和 一国两制 12

总理的劳碌相 19

## 第二章 皇家无亲

27

“窝囊”王爷绵中针 28

伟大领袖六合彩 37

王爷蓝筹股 44

## 第三章 风中芦苇

53

风中芦苇 54

“谋杀”同治帝? 60

中南海的脐带 68

紫禁城的平衡木 76

周公之死 82

## 第四章 老大帝国

91

英国议会：大清稳定压倒一切 92

枪杆子里出政权 99

洋干部下岗 105

谁家的走狗 114

## 第五章 美国兄弟

139

华盛顿的定情信物 140

黄龙旗下的美国葬礼 146

美利坚雪中送炭 153

谁可托福 160

鸟巢鸟感觉 168

北京欢迎你 171

## 第六章 西域狂沙东海浪

175

披着羊皮的熊 176

东海饿狼 179

抗俄还是抗日 182

天山风雨 185

日本趁火打劫 188

为保新疆失琉球 191

## 第七章 改革旗手

197

蝴蝶飞飞曾国藩 198

春意盎然李鸿章 204

## 第八章 中央“一抬”

211

号令不出中南海 212

改革的阳谋 218

## 第九章 裸泳的年代

225

猫儿闹大清 226

华商不爱黄龙旗 229

李鸿章吹起大泡泡 233

谁动了恭亲王的奶牛? 237

盛宣怀打“野鸡” 242

裸泳的奴家 245

## 第十章 帝国的出轨

249

骑着毛驴上北京 250

大清“地铁” 254

拆迁让谁更美好? 258

东方慢车谋杀案 261

李鸿章下英国象棋 264

大清铁轨不平行 268

后记 恭亲王：绝版之外

272

# 第一章 叔嫂共和



乐道堂的拱形花窗与多宝阁 乐道堂是恭亲王奕訢的起居处，用于分隔里外两进的多宝阁是室内最具特色的装饰。门框上透雕竹叶、菊花、洞石等天然式纹样。门四周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多宝阁上曾经摆满了瓷器、青铜器和其他珍奇的文玩。（陈鸿舜收藏，照片拍摄于1940年前）

---

## 风啸天安门

无论中英还是中法签约，在仪式的最后，城门上都会鸣放 21 响礼炮。这样轰鸣在天安门上空的礼炮，声声刺激着恭亲王的耳膜，但是，远在热河的领导核心，是否也能真切地听到这命运的砸门声呢？

---

天很冷了，北京城却很热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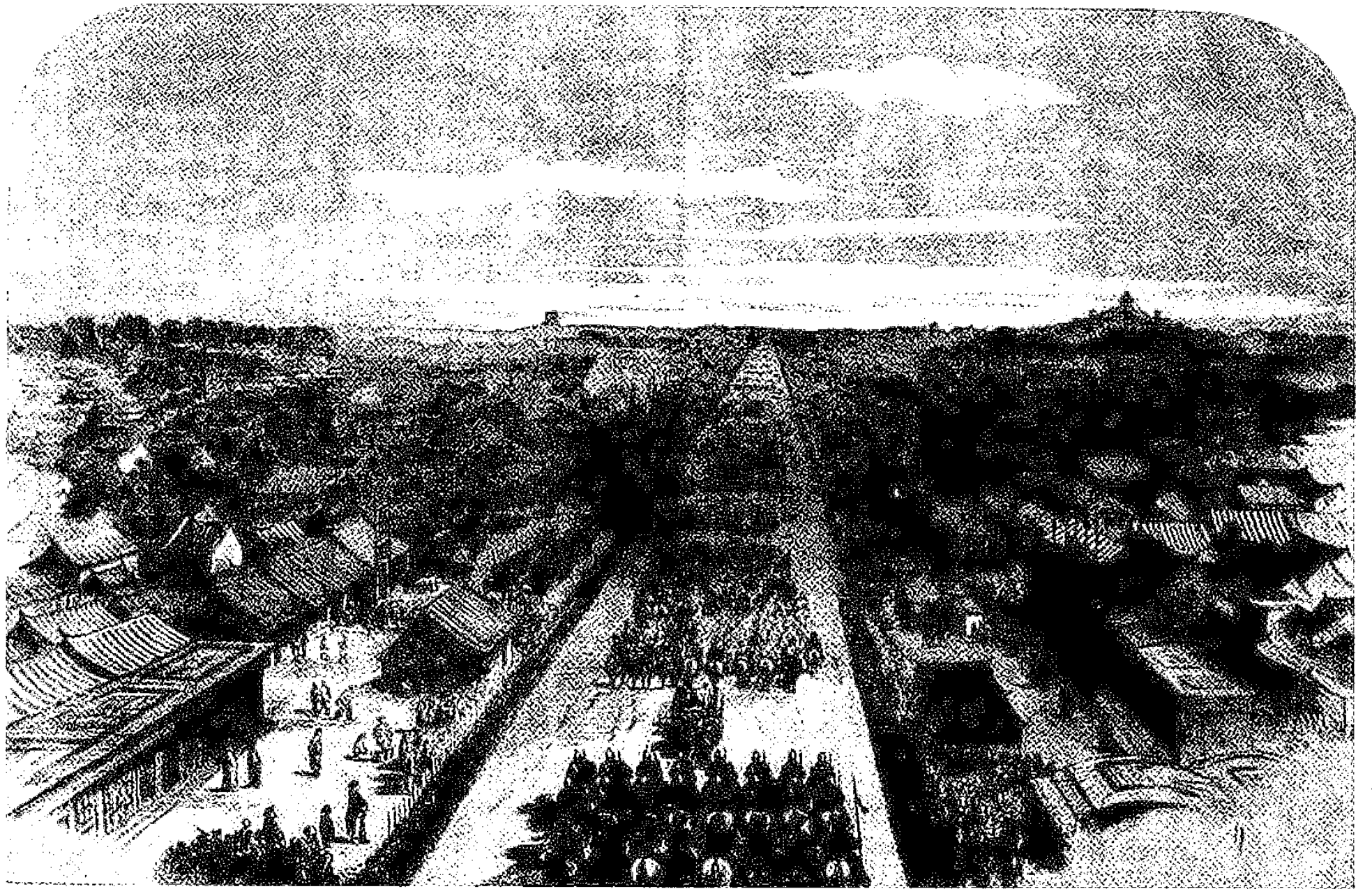
安定门上，大英帝国的米字旗猎猎飘扬。从安定门到天安门东侧的礼部大院，长达 3 英里的街道两侧，身着红色制服，头顶白色头盔的英军士兵，沿街排开，足有 3000 多人。

军乐声中，在两个军乐队的前导下，英军队伍分成数个方阵，浩浩荡荡地进入安定门。首先是 100 名炮兵组成的方阵，随即是几个步兵方阵、100 名军官代表方阵，在这些方阵后面，是英军司令部参谋们的队伍。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James Hope Grant）则在其卫队和助理们的簇拥下，骑着高头大马。

他身后 30 码，是一乘大轿，装饰着朱红色，16 名中国轿夫，身着崭新的号衣，抬得四平八稳。轿子中，正是英国全权使节、在华的最高长官额尔金勋爵（Ja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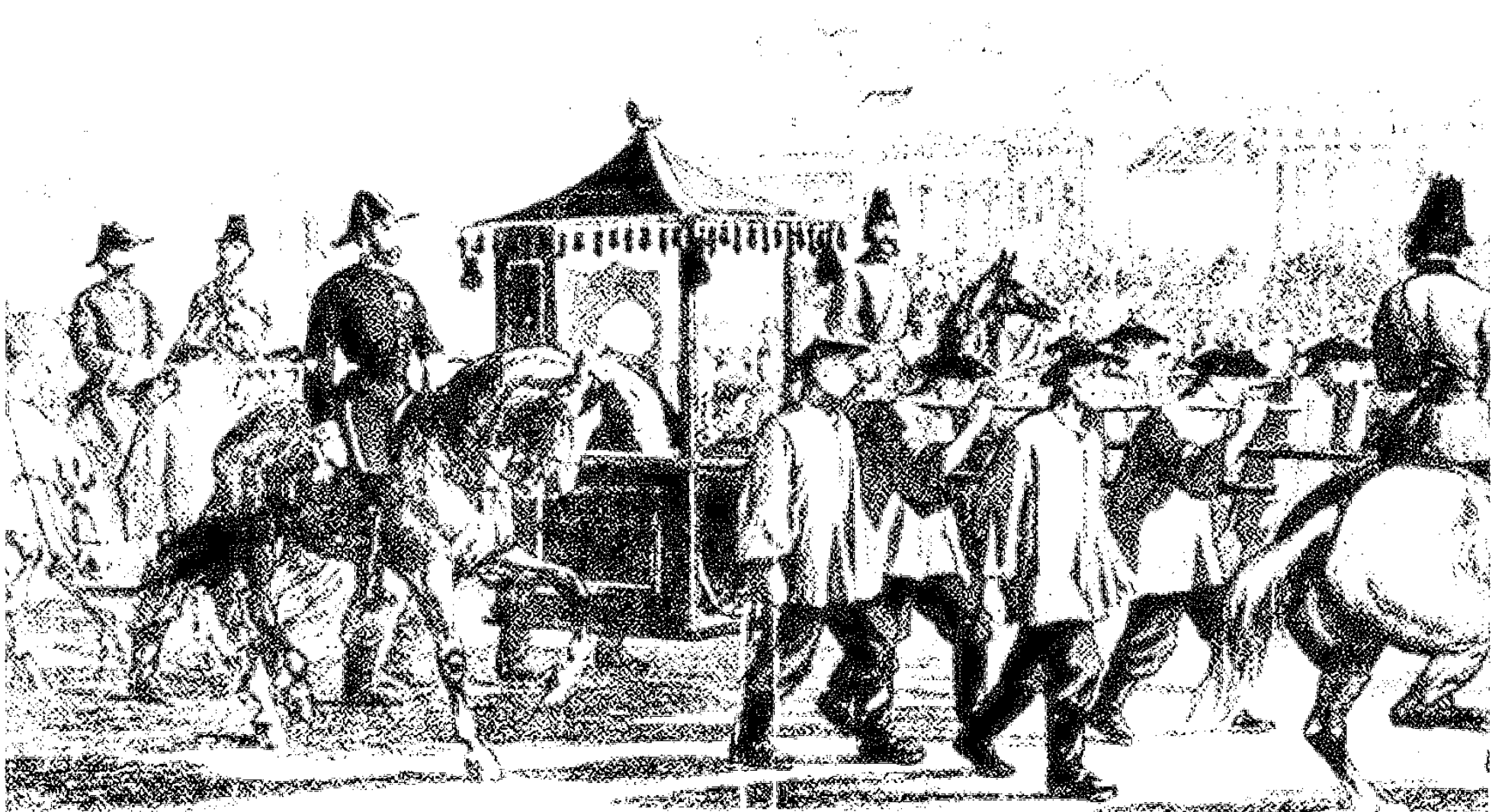




左页图：安定门并没有给北京带来安定，图为 1863 年 10 月 13 日英法联军占领后的北京安定门。随军意大利摄影师费利斯·比托拍摄。

上图：英国军队在北京城举行盛大武装游行，中心即额尔金勋爵乘坐的大轿。1860 年 10 月 24 日清晨，英国《伦敦新闻画报》记者沃格曼从安定门城上用画笔记录了英军进城的情景。

下图：额尔金乘轿场景的细部。额尔金勋爵乘坐 16 人抬的中国大轿，以他自以为的中国特色的方式试图建立英国在中国首都的威望。



Bruce，额尔金 Earl of Elgin 其实是爵号)，穿着鲜艳的礼服，正襟危坐。他的坐骑也满身披挂，跟随在轿子后面。几个步兵方阵在他的后方，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

这可是北京城从未出现过的西洋镜，北京市民们几乎倾巢而出，拥挤在街道两旁，希望能一瞥轿子里那位“伟大的鬼子”（Great Barbarian，《纽约时报》用语）。记者们的现场报道和当事人的日后回忆录，都清晰地记载道：尽管街道破旧，人群拥挤，但围观的中国人几乎鸦雀无声。在刺刀和强权底下，散漫惯了的大清人民，终于表现出了很好的文明素质。

这是1860年10月24日，一个寒冷的深秋时日。在经历了多年断断续续的战争后，中英两国将在天安门旁签署和平条约。

### 城内之盟

对于大清国来说，这是一次城下之盟——不，是城内之盟，北京实际上已经在英法联军占领之下：11天前，英法联军从安定门入城时，沿街站岗的清军士兵向这些“洋鬼子”们行跪迎大礼，北京市民则“观者如堵”，这座千年古都再度习惯性地展现了对于战胜者的顺从，一如200年前跪迎大清的辫子兵入城一般。半个世纪前莫斯科为对抗拿破仑大军而实行的焦土抗战，若让北京人来看，实在是太愚蠢了。

占领军确定了礼部衙门作为签约会场，莫非是要给“不知礼”的“鞑靼人”上一堂生动的国际礼仪课？

北京城墙上曾经对准攻占安定门的英法联军的清军大炮。图为随军记者费利斯·比托从安定门城楼向东拍摄的城墙顶部的情景，远处建筑为雍和宫。





爱热闹而又“好客”的北京市民纷纷围观英军入城典礼，大看西洋景。令英国人感慨的是，素来散漫惯了的大清人民，终于在这样的大型活动中表现出了很好的文明素质，不知道这是刺刀的威力还是别的原因？



英军发布的安民告示前，围了好多北京市民。早已习惯于迎接占领军和胜利者的北京人，如今要第一次迎接“洋鬼子”的部队。

本页图系英国《伦敦新闻画报》记者沃格曼绘制

礼部门前的广场及四周的街道，同样挤满了来看热闹的北京市民。中英两军士兵在两侧站岗警戒。英军的游行队伍足足行进了一个小时，才到达礼部。到时已是下午3点，大大晚于两国确定好的午时，这对于守时的英国绅士而言，是不可思议的怠慢。

额尔金的大轿直接抬进了礼部大门，穿过前院落轿，口令声起，两国卫兵向他行军礼，英军军乐队高奏国歌《上帝保佑女王》。大清国代表团团长、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已在此恭候多时，迎上前去，拱手致意。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回忆道：对于恭亲王的致意，额尔金答以“骄傲而轻蔑的一瞥”（a proud contemptuous look），只是略略一躬身作为还礼，“这一定令可怜的恭亲王怒火中烧”。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记者则观察到，恭亲王的行礼显得十分犹豫和焦虑，而额尔金勋爵更是十分冷淡。法国人记载说，当恭亲王上前致意时，额尔金居然佯装没有看见，甚至连头也没有回一下。额尔金勋爵要求恭亲王走在他的前面，“恭亲王只得这样做了，不过脸上却带着一种厌恶的情绪”。

恭亲王此时年方27周岁（不少文献为28岁，当为虚岁），却担负着大清帝国最为沉重的担子之一。1个月前，在联军的隆隆炮声中，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才匆匆起用了这位被自己足足排挤了5年整的兄弟。再就业后的恭亲王，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一边是联军的刺刀威胁，另一边则是死要面子强撑的流亡皇帝。经过艰难的折冲与折腾，中英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

在这样不得不“卖国”的“城内之盟”上签字，当然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脏活累活总得有人做，恭亲王并没有选择的机会。恭亲王本已带了400名精兵组成的卫队，出席签约仪式，但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他还是将卫队留在了正阳门（前门）外，只带着20名亲随进入内城，结果，没想到英国人却迟到了，令他们在这里苦候多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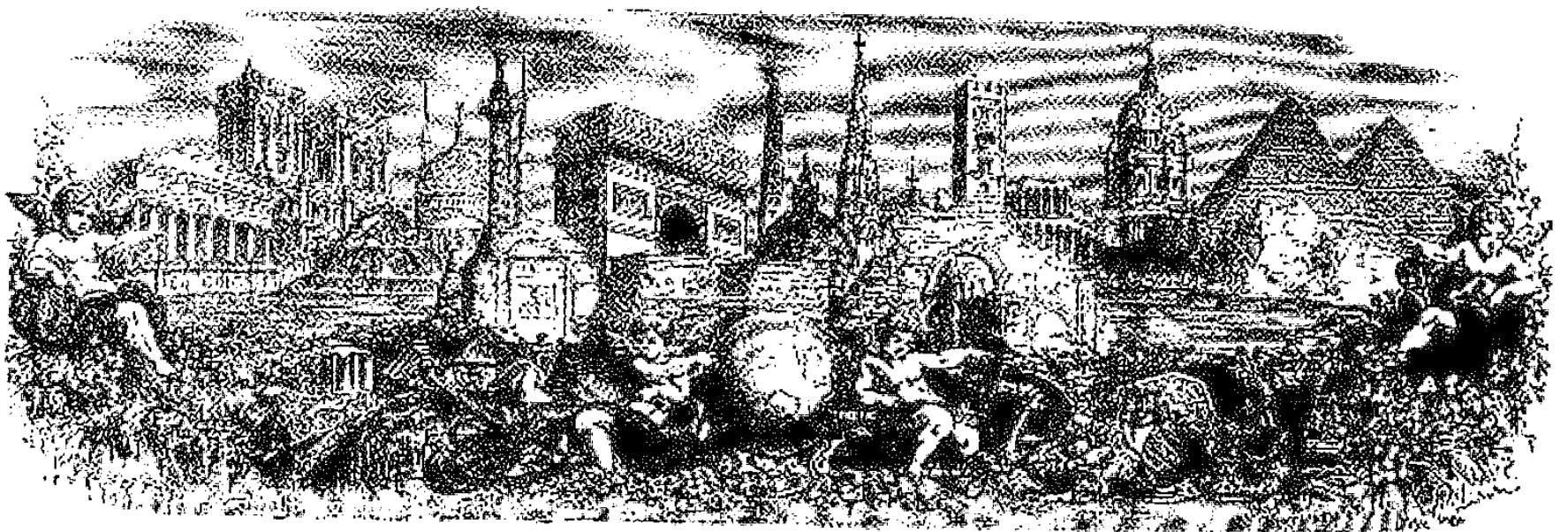
礼部大堂中间，放了三张桌子，中间一张摆着待签字的条约文本，两侧分别是给两国全权使节签字所用。观礼的100名英军军官站在左侧，这些都是英军中挑选出来的“好干部”。尽管英法联军在京郊大肆劫掠，但在北京城内却执行了严格的军纪，除了占领安



参与游行的英军官兵都是精挑细选的，一般士兵被严禁进入北京，以防他们在中国首都的花花世界把持不住自己。这是英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所颁发的军功章。

# LE MONDE ILLUSTRÉ

JOURNAL HEBDOMADAIRE



VIGNONS DE LA HAUTE SAISON ET LES DÉPARTÉMENTS  
 En 1864, 24 francs; — Six mois, 11 francs; — Trois mois, 6 francs.  
 Les autres : 20 francs l'an; — 10 francs les six mois.  
 Les abonnements partent de la fin de l'année, sans autres frais.  
 Les lettres doivent être adressées à M. le Directeur, rue de la Harpe, 171, Paris.  
 Les annonces sont reçues chez M. le Directeur, rue de la Harpe, 171, Paris.

5<sup>e</sup> Année, N° 197. — 19 janvier 1864.  
 Parait le samedi et s'envoie par la poste, le dimanche, à la Librairie Nouvelle.  
 Rédaction et Administration : 25, rue d'Orléans.  
 Chez P. A. BOUQUET, 61, High Street, London, W. C.

Toutes les communications relatives aux abonnements, à la rédaction ou à l'administration, doivent être adressées à M. le Directeur, rue de la Harpe, 171, Paris.  
 Toute réclamation, toute demande de changement d'adresse, doit être accompagnée d'une lettre instructive adressée à l'Administration, 25, rue d'Orléans.  
 Toute demande d'abonnement non accompagnée d'un bon sur Paris ou sur la poste, toute demande de mandat à l'étranger ou de mandat en mandat, sera considérée comme non avenue.



Entrevue du baron Gros et du prince Kozig, le 25 octobre dernier, dans le palais des Rites, à Pékin. (D'après un croquis de M. D..., officier de l'expédition.)

1864年，法国“Le Monde Illustré”画报的铜版画，描绘恭亲王奕訢在礼部会见英法联军代表，清廷被迫签下“北京条约”的场景。

Prince Kung □ 第一章 叔嫂共和

定门外，英军官兵除非特批，一律不得擅自进入北京城，因此，能见证并参与签约仪式，是莫大的荣耀。另一侧，则是观礼的中国官员。

额尔金勋爵入内后，直奔左侧签约桌坐下，然后示意恭亲王坐在右边。英国人留下的所有记载都承认，这是因为中国习俗“左”大于“右”，细节决定成败，英国在这上面也要压中国一头。而根据法国人的记载，双方在谁先入座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执，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谈判，结果决定亲王和大使同时入座”。总之，对于双方而言，气氛似乎都十分尴尬，《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题目干脆就是《侮辱恭亲王》(Humiliation of Prince Kung)。

典礼在恭亲王的开场白中开始，额尔金的顾问、日后著名的汉学家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威妥玛拼音”的发明者)担任翻译。

### 照相机惊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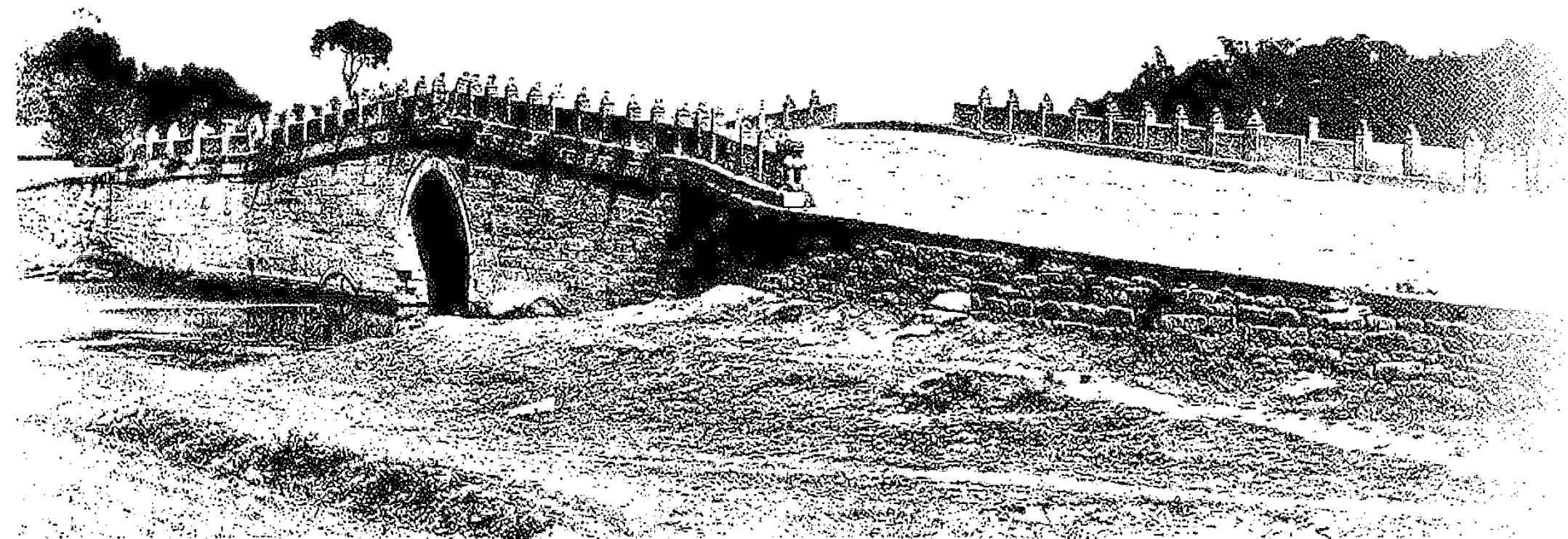
签约仪式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在场的英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却差点引起了一场大风波。

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回忆道：“在签约仪式中，那位不知疲倦的摄影师比托，急于为条约签订拍摄一张好照片，就把自己的照相设备搬了进来，把它放在大门正中，用巨大的镜头对准了忧郁的恭亲王的胸口。这位皇弟惊恐地抬起头来，面如死灰，朝额尔金勋爵看看，又向我看看，他似乎担心对面的这门样式怪异的大炮会随时把他的头给轰掉——那架相机的模样确实有点像一门上了膛的迫击

八里桥 1860年9月21日，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及万余名步兵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最终清军战败。次日，咸丰率后妃、皇子及众大臣从圆明园逃亡热河避难。

绝版

恭親王



炮，准备将其炮弹射入他可怜的身体。人们急忙向他解释这并没有什么恶意，当他明白这是在给他拍肖像照时，他脸上惊恐的表情顿时转阴为晴。”

而根据法国人的记载，在摄影的时候，额尔金勋爵一点也不考虑中国亲王的在场，竟下令全体肃立不动。他的话突然一出口，“把那些不懂其意的中国人都吓得半死，在英国摄影师的机头转动下他们连动都不敢动一动”。

由于当时室内光线不好，这次摄影并不成功。直到一周后，在恭亲王与额尔金的再次会晤中，比托才拍出了那幅后来闻名世界的恭亲王肖像照。

签约并互换文本后，恭亲王和额尔金相继致辞。双方共同表示，这一条约将有力地推动中英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永久友谊。额尔金随即告辞，恭亲王起身相送，送了几步后停住，额尔金便也停下来。这时，恭亲王身边一位主要官员，急忙上前耳语几句，恭亲王犹豫了片刻，还是将额尔金送到台阶边。

左下图：费利斯·比托拍摄的恭亲王肖像照之一。

右下图：额尔金（1811～1863）曾先后在牙买加和加拿大担任总督，并于1857年出任英国对华全权专使。1860年，率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并攻占北京，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为了教训清廷，额尔金打算烧毁故宫，在俄罗斯和法国特使的劝说下，此计划取消，但转而火烧了圆明园。



## 法国人抢协议

法国人对中英签约仪式的记载，与英国人的记载差别很大，将英国人在仪式上的傲慢无礼作为嘲讽的重点，俨然自己是大清国的哥们儿。“中国人总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来理解优先权和礼仪，而且在这方面很小心，也很敏感，（英国人）这样做当然严重伤害了恭亲王的自尊心……（额尔金）对中国亲王表现得傲慢、严厉和过分的放肆，弄得这位中国亲王异常激动不安，并在好几个场合中都流露出来。”他们认为，额尔金勋爵之所以对待恭亲王如此粗暴，是要传递一种深刻的政治信息，要令中国感到“此时所签订的不是一个和平条约，而是一个征服条约”。

《中法北京条约》在次日签订，法国人似乎的确比英国人客气多了。法国特使葛罗男爵（Jean-Baptiste Louis Gros）似乎远比额尔金勋爵要有绅士风度。恭亲王事后向咸丰皇帝报告说：“法夷较英夷更为恭顺。”英法之间虽然在中国问题上结为盟军，但算盘却不一样：法国只想捞一把就走，而英国却想着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在葛罗向巴黎的密报中，他坚信额尔金已经得到伦敦密令，要借此“消灭现今统治的皇朝，可能还要去援助南京叛乱分子（指太平天国），我不愿意，也不能够走到这样的地步”。

在中法签约过程中，也有些插曲。法军司令孟托邦将军（Cousin Montauban），因在北京郊区八里桥打败僧格林沁军队而被法皇封为“八里桥伯爵”（Comte de Palikao），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礼部）当我们坐下来时，就按照中国人的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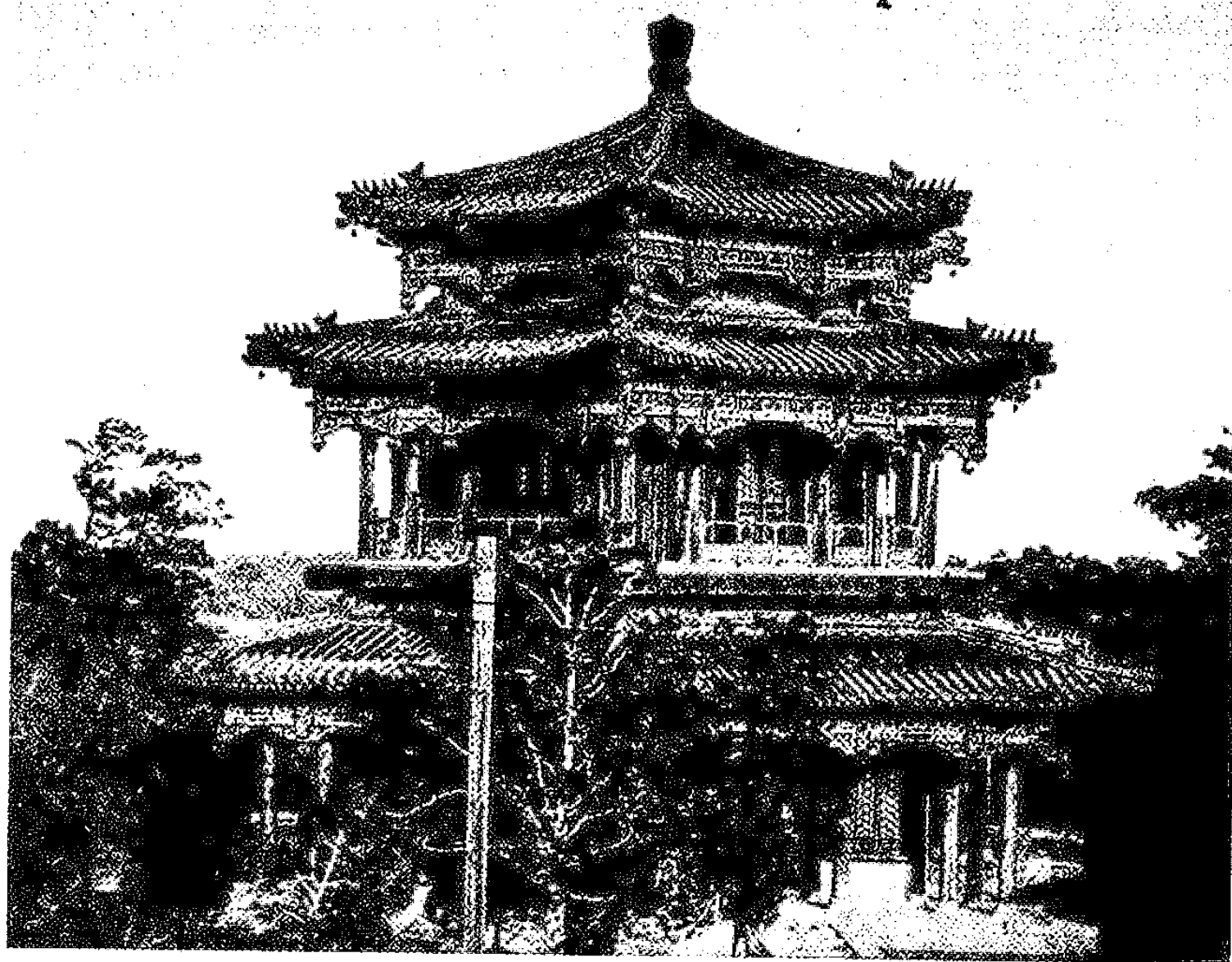


英军在北京设立的临时警察。“洋鬼子”在条约签订后，居然真的退兵了，这令恭亲王大为吃惊，第一次领悟到或许“蛮夷”们还是很讲信用的。英军在占领期间对北京城的良好管理，也令这个城市对占领者产生了怪异的好感。



图为被英法联军烧毁前圆明园的一座建筑，费利斯·比托摄。

费利斯·比托 (Felice Beato) 1883 年出生于意大利，1907 年去世。具有英国与意大利双重国籍，是 19 世纪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比托随军拍摄了大量弥足珍贵的照片，真实记录了北京皇家园林惨遭蹂躏的历史。



惯上茶，然而我对我的主人們的陰險狡詐一直是這樣的不信任，所以就仔細觀察，看看給我們喝的茶是不是和恭親王的一樣，來自同一茶壺。只有在看見親王首先飲茶後，我才開始喝起茶來。”

而到了互換批准書的時候，法蘭西的外交官和中國官員都有那麼幾秒鐘的猶豫，“因為大家都想晚一些把自己手頭的條約文本交給對方”，結果還是法蘭西的第一秘書占了上風，走向前去，一把抓住了中國官員的條約文本，搶了過來，然後才把法蘭西的批准文書遞過去。

與英法簽訂條約，這是年輕的恭親王第一次在外交舞台上正式亮相，卻受到了英國人的慢待。吊詭的是，在大清國的官方記載中，卻很難找到恭親王簽約受辱的細節。相反，在發給咸豐皇帝的報告中，恭親王說道：當額爾金看到自己只帶了 20 名護衛時，“誠詐自分”，“桀驁情狀為之頓減”，似乎是自己的坦誠與磊落減少了对方的戾氣。但恭親王話鋒一轉，認為這些洋鬼子的性格就如同犬羊，“時吠時馴，何足為喜怒”。設身處地地想，一個高貴的天潢貴胄，在占領軍的刺刀下奉旨“賣國”，受到侮辱，必然是深受刺激。這種窩囊氣，他不可能形諸文字，而只能深埋心中。

無論中英還是中法簽約，在儀式的最後，城門上都會鳴放 21 響禮炮。這樣轰鸣在天安門上空的禮炮，聲聲刺激着恭親王的耳膜，但是，遠在熱河的领导核心，是否也能真切地聽到這命運的砸門聲呢？

---

---

## 叔嫂共和 一国两制

这种“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不仅形成了皇族与外戚之间的微妙平衡，并且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中，维持和保障了领导阶层的“圈内民主”，为保持中央政权的基本稳定和凝聚作为统治基础的满清贵族，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

---

这是一个“非诚勿扰”式的故事，与一般爱情故事不同的是，这两个人的恩怨情仇牵涉到了天下社稷、人间苍生，乃至世界变局的宏大命题。小伙的名字叫做爱新觉罗·奕訢，人称恭亲王；姑娘的名字叫做叶赫那拉·兰儿，人称慈禧太后。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故事，至今仍然被如此演绎着。中国人很多时候都愿意用这样家长里短的平民心态和八卦视角，来观察那些曾经不可望、更不可及的伟大人物们，以便在艰难尘世中自我宽慰：彼此彼此，无非如此。

### 八九点钟的太阳

有关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任何八卦，自然于史无征，甚至连那传诵得更为广泛的慈禧太后与荣禄的地下恋情，也只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后，为了鼓动华侨们捐出自己的血汗钱，而炮制出来的唐人街街头肥皂剧，被英国的无良记者和文人加工后，成为所谓的《慈禧外纪》(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成了海内外推崇半个多世纪的“信史”。

即使在入关时豪放不羁的满人，在执政者的位置上坐了200多年后，于礼教这一基本原则，甚至比汉人还能严防死守。当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与世长辞时，慈禧太后还只是个26岁的“二奶”，作为“大婆”的慈安太后，比她更小，年仅24岁，正是流年不利的本命年。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刚刚处理完了与英法联军的艰难谈判，英法不仅撤军，而且转过身来协助大清中央镇压太平天国。恭亲王成为令国际舞台瞩目的政治新星，此时，他也只是个28岁的青年干部。恭亲王赶往热河奔丧，想向



年轻的奕訢（左图）和慈禧（右图）。一对相恋相爱的年轻人，因命运的作弄，而难以相守，甚至因爱成仇。这是坊间对恭亲王与慈禧太后的八卦演义。上图是笔者用电脑PS而成，博读者诸君一笑！

两位寡嫂见面请安，起初遭到“八人帮”拒绝，理由就是叔嫂私晤，不合礼法。14年后（1875年），同治皇帝过世，他的皇后随即自尽，尽管对其死因有很多猜想，但毫无疑问的是，她立即被中央宣扬为道德模范，树立了有史以来级别最高的贞节牌坊。

恭亲王与两位寡嫂之间的共同之处，关键就是两点：一、深感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日益跋扈，贵为太后和亲王，却毫无尊严与权威；二、他们都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深信世界归根到底是属于自己的，如果不能犯难一搏，今后的漫长人生都将在“八人帮”的阴影下度过。

在打倒“八人帮”的辛酉政变（也称祺祥政变）中，除了主流观点强调的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和斗争外，作为政变发动方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他们那飞扬的青春，无疑是难以忽视的因素。正是这种朝气，形成了他们冒险一搏的勇气，也奠定了之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基调。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这次政变的尖刀，对45岁的肃顺和54岁的端华实行外科手术般“精确打击”的，正是时年21岁的醇亲王奕譞（光绪之父、宣统之祖父）。或许，这不只是两个利益团体的搏杀，也是两个时代的格斗。

野史记载，肃顺在临刑前，引唐代杜牧的诗句作为绝笔：“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七绝《赤壁》），此事果然为真，则“周郎”、“铜雀台”、“二乔”的

矛头所指，很值得玩味。而高阳在他那著名的小说《慈禧全传》中，更是绘声绘色地记载道，肃顺在死前跳脚大骂：“恭六，兰儿！你们叔嫂狼狈为奸，干的好事！你们要遭天谴！”凡此种种，皆给热衷阴谋论、酷爱八卦的看客们，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 一国两制

年轻的叔嫂联手夺得了政权，但在制度设计上却犯了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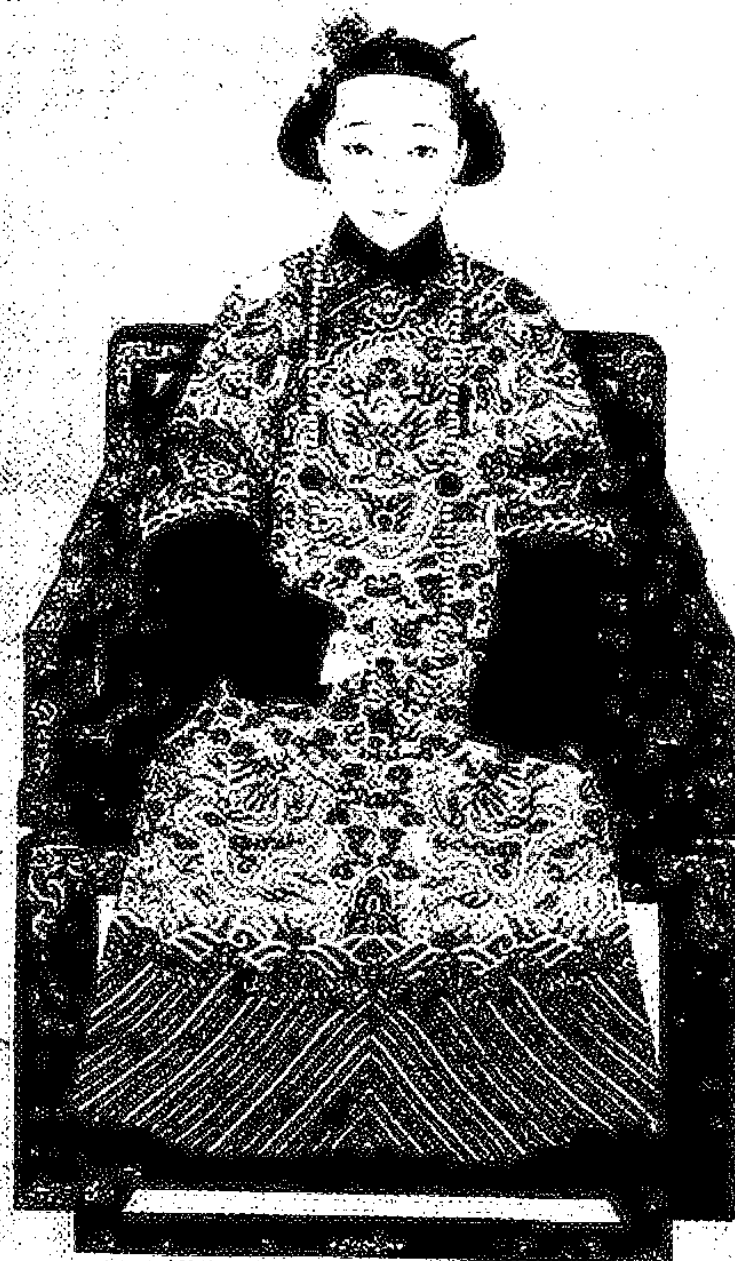
合法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是年仅6岁的同治皇帝，他需要辅政者乃至摄政者。而合法掌握辅政权乃至摄政权的“八人帮”，却已经被打倒，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面对这种局面，叔嫂们创造性地进行了一场涉及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国两制”，即太后的“垂帘听政”制度，与恭亲王的“亲王辅政”制度同时并存。

这两种制度，虽然史有先例，但都是权宜之策，并不符合大清“祖制”，更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防止君权旁落的基本准则。自古以来，后宫、外戚干政都是正统朝廷所不容许的，而且，“垂帘听政”很容易激发人们对武则天称帝的无限遐想。至于历史上的“亲王辅政”，大多都演变成为篡位的悲剧，在通往最高权力的台阶上，这些血缘高贵得离帝座只有一屁股之遥的亲王们，其实是睡在身边的、最为危险的政敌。

在大清国的现实条件下，“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成为唯一的选项，而且，为了防止出现武则天或多尔衮，这两种体制必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这种“叔嫂共和”的权力格局，在清初的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搭档中，已经做过试点，积累了实践经验。但在那个年代，孝庄的权威远不如多尔衮，实际上还是“亲王辅政”一头独大，只是因为多尔衮或出于政治觉悟或出于伟大爱情，才保住了顺治小皇帝的皇位传承。但已经无限接近于最高权力的多尔衮，最后还是没能逃脱“老二”们惯常的下场：身败名裂。

如今，两宫太后既不如孝庄那般具有运筹帷幄的能力，恭亲王也没有多尔衮那样一句顶一万句的威望，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真正的权力分享与制衡便得以成型，并且日益固化为“一国两制”，成为大清国“晚年”的主旋律。即使在恭亲王被贬的“甲申易枢”（1884年）中，也并没有出现后世主流史家所说的太后专政局面，无非以醇亲王奕譞顶替了恭亲王奕訢，依然是亲王辅政。到了宣统朝，则形成了摄政王载沣



慈禧（左图）与慈安（右图）。时人对慈安和慈禧的评价是各有所长，慈安“优于德”，慈禧“优于才”。但慈安不仅仅有德，而且有才，小事不拘，在大事上决不糊涂。慈安的存在对慈禧是有着相当的震慑作用的。

与隆裕太后的“叔嫂共和”局面。纵观清史，孝庄太后 / 多尔衮、慈禧太后 / 恭亲王奕訢、慈禧太后 / 醇亲王奕譞、隆裕太后 / 醇亲王载沣，成为四组“叔嫂共和”的搭档。

这种“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不仅形成了皇族与外戚之间的微妙平衡，并且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中，维持和保障了领导阶层的“圈内民主”，为保持中央政权的基本稳定和凝聚作为统治基础的满清贵族，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从此之后，大清中央核心虽有权力斗争，但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并不多，所谓的“洋务派”、“保守派”、“清流派”，其争斗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权力的分配，改革的节奏、力度、尺度上。除了在戊戌变法 / 政变、义和团 / 八国联军时期之外，高层的人事更替，很少带来政策的急转弯，新的领导班子往往萧规曹随，以渐进改革为基调的政策贯穿始终，令大清王朝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在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任小皇帝手上，依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寿命。

毫无疑问，涉及方向和旗帜问题的“路线斗争”的安宁，并不代表着涉及利益与势力的权力斗争的消停；“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这种“一国两制”的共存，并不代表着负责“听”的太后与负责“做”的亲王之间的和谐。帘幕内外的争斗，成为大清中央内部的主要矛盾。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年轻的太后们与亲王们（参与政权管理的并非只是恭亲王一人），基本奉行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太后们在后宫负责教育皇帝，而亲王们负责在朝廷管理国家。一切政令都通过形式意义上的“谕旨”下达，太后们更多的是代替皇帝履行国家元首的象征作用。

根据“一国两制”原则设定的权力框架，国家大事的处理程序有六个步骤：一、“慈览”，一切中外奏章，均首先呈递两宫皇太后“慈览”——请注意，是“览”，而不是直接处置；二、“详议”，即“慈览”后发交议政王（即恭亲王）和军机大臣详议；三、“请谕”，两宫皇太后代表小皇帝发出具体指示，实际上，基本是军机处拟好了处理意见报批，形式上的意义为主；四、“缮拟”，根据太后的批复（往往是“知道了”三字），军机处缮拟谕旨；五、“阅定”，太后审阅；六、“颁发”，发至内阁正式施行。

这一制度的设计，与当时西方的责任内阁有相似之处：太后等于国家元首，代表最高权力，而不介入具体事务；而亲王负责的军机处则等于国家行政机构，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的推进和落实。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实权显然是在恭亲王的手上。辛酉政变发生后，刚刚派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向华盛顿报告了中国的“宫廷革命”，准确地提到了恭亲王的摄政实权，却丝毫没有提及慈禧的名字，因为他压根没搞明白中国还有两个太后。在1868年《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流程的详细介绍中，几乎完全找不到太后在其中的作用。美国有历史学家相信，在太后与亲王的联合政权中，太后的作用是象征性的。

在这样的格局中，恭亲王自然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瓜田李下，嫌疑自生，恭亲王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令太后们感觉被怠慢，甚至怀疑将遭遇又一个多尔衮，实在也在情理之中。当“叔嫂共和”进入到第四个年头（1865年）时，两宫太后突然发难，一举褫夺了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



多福轩“同德延釐”匾额

多福轩为恭亲王奕訢会见同朝官僚、外国使臣处，殿内正中悬挂题词为“同德延釐”的匾额，据考证，这是光绪七年（1881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恭亲王奕訢五十岁寿诞时（实足48周岁），慈禧太后专门题写并命人送至恭王府的。这四个字是耐人寻味的，因为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慈安的突然病逝，使得慈禧集团自认为已羽翼丰满，她对权力已急不可待，匾上四字的意思是告诫恭亲王，希望双方可以联手，“同德”可理解为同心同德，“延釐”意为福祉绵延之意。与此同时，光绪皇帝也送来了题有“星辰毓瑞”的匾额。光绪集团中有醇亲王、翁同龢等人，甚至也有恭亲王本人，这个集团视恭亲王奕訢为倚重的栋梁，匾中四字有追捧之意，“毓”有养育之意，想表达的意思是：奕訢给我们带来希望。

后人普遍认为，这是慈禧太后主持的夺权行动，但这实在是两位年轻寡妇的联手亮剑。尽管都被尊为太后，但此前慈安太后贵为皇后，她之于慈禧，不仅是妻子妾，更是君于臣。这是很多研究晚清的人们，所容易忽视的基本定位。作为昔日的正宫娘娘，同治皇帝的教育，乃至日常生活，都是由慈安太后，而非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来负责。在后世的眼中，慈安太后的形象十分和善，甚至懦弱，但在最为关键的辛酉政变中，她所表现出来的果决和刚毅，绝不亚于慈禧，而且，“正牌太后”不必依赖“母以子贵”就已天然获得权威资源和号召力，更是慈禧难以企及的。从公私两方面看，慈安太后在捍卫皇权方面都绝非一个唯唯诺诺的跟班。维护和巩固同治皇帝的地位，应对来自国内外的一切挑战，两位太后担负着共同的使命，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区别或许只在于：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低调、一个高调。

在慈安、慈禧和恭亲王这个年龄相仿的三角组合中，真正的核心是年龄最小的慈安。她在表面上的“清净无为”，正是一个国家元首应有的超然姿态，从而放手让其他两位管理具体的行政事务，并且游刃有余、不露声色地调节着左右平衡：在褫夺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时，她站在了慈禧一边；而在之后处死慈禧的宠监安德海，尤其在为同治皇帝挑选皇后时，她又联合了恭亲王。如果我们认可恭亲王与慈禧均为人中龙凤，能如此周旋于这对龙凤之间的慈安太后，就不可能是懦弱无能的庸才。

1865 年对恭亲王的“修理”，效果是显著的。在一番深刻的自我批判后，恭亲王被允许重返领导岗位，但其定位却迅速地调整为一个管家，而太后们则超越了“皇嫂”、确定了“女主人”的主导定位。在她们看来，恭亲王似乎开始远离成为“多尔袞第二”的危险。

1881 年，慈安太后暴病身亡，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平衡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砝码失落了：三年后（1884 年），慈禧太后就驱逐了恭亲王。但实际上，在 1884 年那次著名的甲申易枢后，“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并未结束，顶替上来的醇亲王虽然比恭亲王的身段更为柔软，但绝非太后的附庸。

“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的权力天平上，慈安太后这一砝码的分量，背后正是满清“部族专政”的坚实传统，他们念兹在兹所防范的是：不能出现“武则天”，也不能出现“多尔袞”，这种原生态的权力分立、相互制衡，或许正是这个被称为“腐朽、没落”的政权，居然能活到 260 多岁的“高寿”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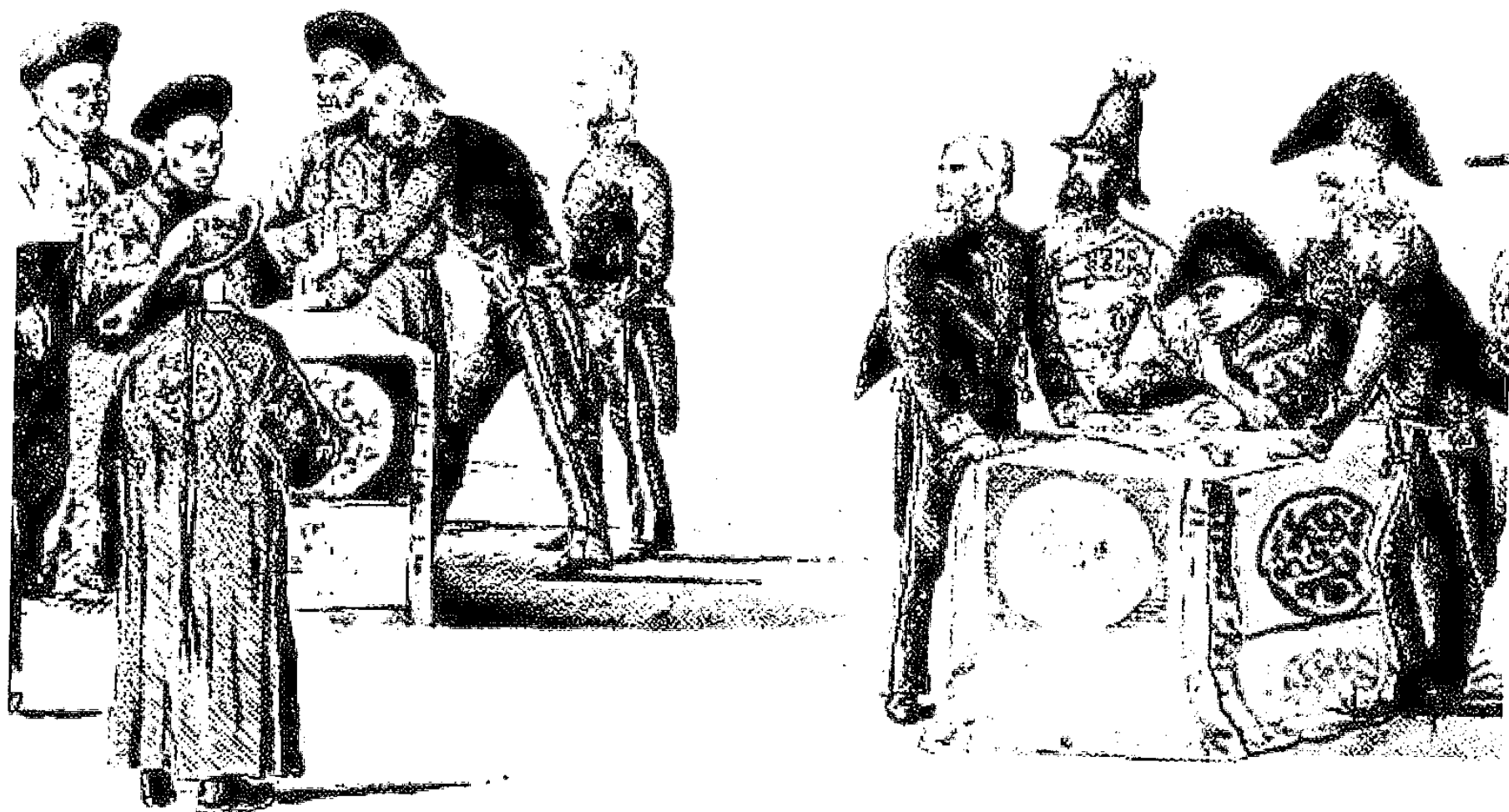
## 总理的劳碌相

总理往往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戏曲中都尊称为“千岁”乃至“九千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恭亲王之后的中国总理们，无论贤愚，几乎都是瘦肉型的，成了这个职位的标准形象，与那些总统、执政、主席们的“样样都伟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早已通过大量的情报及公文往来，对大清国这位年轻的“总理”了如指掌，但当英国代表团与恭亲王奕訢共处了短短的数小时后，依然为他的风度所折服。

签订《中英北京条约》，是27岁的恭亲王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面对着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占领军，面对着处处故意怠慢自己的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这位年轻人，从容不迫，应对自如。

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在回忆录中描写到签约情景时，感慨道：“恭亲王真是个谦谦君子，他明显地在控制着自己的紧张恐惧。”额尔金勋爵的助手洛奇（Henry



这是西方人描绘的《中英北京条约》签订时的现场情景，左二为恭亲王奕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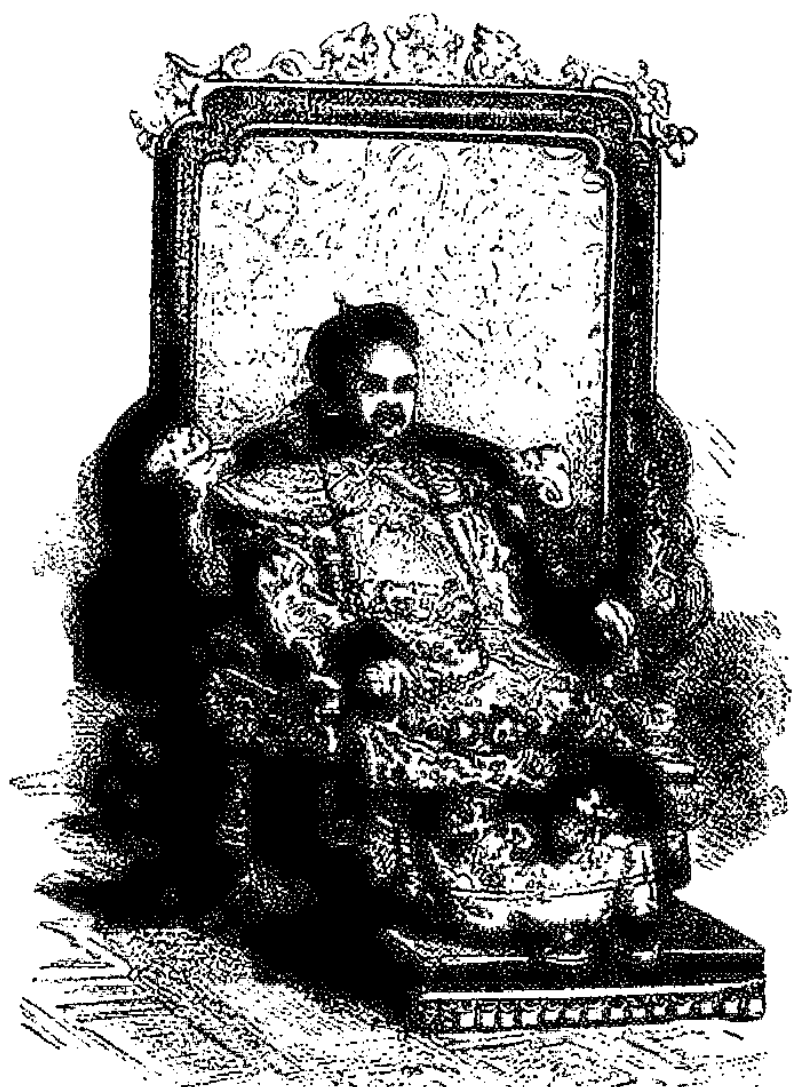
Brougham Loch) 则回忆说：“恭亲王当时只有 28 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多了。他的相貌很睿智，但显得十分焦虑。其实，考虑到他的处境，这并不奇怪。他隐藏了他的恐惧感，如果有的话。”

### 缺少“王子相”

自从上一次鸦片战争（1840 年）之后，二十多年来，英国人似乎从来就没有对中国高级官员有过任何正面的评价。年轻的恭亲王令他们发现，中国除了充斥着大量颟顸、愚昧、贪鄙的干部之外，也有如此风采照人、作风清新的高官。遍阅史料，无论是当时的新闻报道还是时人的日记回忆，虽然将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描写得极为阴暗，但却很难找到对恭亲王的负面评价，这位年轻的王爷，似乎成为铁幕后面唯一一朵绽放的鲜花。

即使从清代流传下来的野史看，恭亲王也很难称得上是帅哥。对于恭亲王的外表，与恭亲王多次接触的美国传教士、日后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这是英国杂志所绘的咸丰皇帝与皇后的画像，完全凭想象画出，咸丰看上去比恭亲王帅多了，其实根据史料，正好相反。英国人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搞清楚垂帘听政的其实是两位太后，而非一位，他们画笔下的皇后，也是一个虚构的形象。



Martin) 曾经直言不讳地写道,“恭亲王身形瘦削,肤色黝黑,因为近视而眯缝着眼睛,并不漂亮”,“他并非很有‘王子相’的人”。尽管有的资料说他“俊美”,但那也只是相对他的哥哥咸丰皇帝而言。据说,咸丰皇帝在少年时曾从飞驰的骏马上摔下来,伤及骨头,虽经名医多方治疗,但终生行走不便。从正史上,可以肯定的是,咸丰皇帝文弱多病,而恭亲王却身体健朗。咸丰皇帝虽然广储后宫,甚至在民间也留下了大量的无法考证的风流韵事,却只生下了一儿一女,这种广种薄收的极为衰弱的生育能力,直接导致了日后慈禧太后的上台。而咸丰的其他兄弟们,包括恭亲王及醇亲王(光绪皇帝的生父及宣统皇帝的祖父),都是枝繁叶茂,子孙满堂。

正史记载,少年时的恭亲王与咸丰兄弟俩,曾经共同习武,还共创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令老爹道光皇帝龙颜大悦,将枪法与刀法分别命名为“棣华协力”和“宝铎宣威”。同时,还单独赐给恭亲王一把金桃皮鞘白虹刀,由此亦可见恭亲王在这一“发明创造”中的关键作用。恭亲王习武善射,在史料中多有记载,而且传诵至今的众多诗文,文采飞扬,其文武全才,可谓当时皇子中的绝对佼佼者,但毕竟时运不济,与皇位无缘,在咸丰即位后更是备受猜忌。

## 直面暴风雨

尽管丁韪良并不恭维恭亲王的外貌,但却依然是恭亲王的铁杆粉丝之一。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那种直面暴风雨的勇气、决心和智慧,才是恭亲王在大清政界光彩照人的风采所在。丁韪良说,“恭亲王的命运之星升起在黑暗的暴风雨中”,他靠着“超凡的才智和勇气”,“在皇室危难的关键时刻,不止一次地挺身而出”,“尴尬的局面愈发衬托出恭亲王的尊贵与镇定”。

当皇帝出逃、政局波动时,年轻的恭亲王挺身而出,令西方国家刮目相看,恭亲王手上并没有什么资源,他“从未见过外国人,也没有显著的势力支持他,京师的御林军已经溃散,圆明园被洗劫,城市也已失陷”,然而,“就像朱尔·法夫尔(Jules Favre, 签订普法战争条约的法国外长)签订和平条约时那样,恭亲王没有表现出丝毫悲伤,毫不示弱,努力争取最有利的条款”。

即使在签约前后处处贬低恭亲王,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还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表达了对恭亲王的敬意,他认为恭亲王是个更容易沟通的对手。英国人注意到,

即使是在这种签订“城内之盟”的巨大心理压力下，恭亲王始终镇定自若、彬彬有礼。讲究等级的英国人甚至惊讶地发现，这位中国“王子”对那些翻译及协助签字盖章的秘书人员，“十分和蔼，如同对待一个朋友，而并没有摆出那种手握特权的皇家威严来”。

丁韪良日后总结道：恭亲王的虚怀若谷，正是他能团结一大批干部，在艰难时刻继续维持政府运转的关键。作为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经常有机会与恭亲王见面，恭亲王对他特别热情，每次见面，“都按照满人的习惯，亲热地握住我的双手，这与汉人跟我打招呼时的冷淡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人即使是亲密的朋友，也只是拱手而已，相互间敬而远之”。因为丁韪良十分熟悉中国文化，恭亲王还特别帮他取了个号“冠西”，意思是“冠绝西方”，从此，丁韪良也被称为“丁冠西”。

丁韪良说：“他总是听从下属的意见，他的讲话不过是总结了下属的考量。作为一个皇帝的儿子和另一个皇帝的兄弟，恭亲王是中国当今统治者构成材料的良好例证。”在甲午战争后的废墟中，丁韪良更是毫不隐晦地称赞恭亲王是大清改革的“老舵手”。

### 魅力来自亲和力

丁韪良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描绘了恭亲王的魅力：“他的眼睛、鼻子等，都显露出他是个相当有内涵的人。当他开始说话时，他的脸部飞扬着智慧的光芒。他说话很快，其话语的准确度远高于其深刻性。”“他行为举止既和蔼又优雅，说话迅速而有力，给人以有自主力量的印象。”

签订《北京条约》时英国代表团的成员、日后写了大量有关东方著作的芮尼医生（David Field Rennie）回忆道：“恭亲王十分和蔼可亲，他的长相是十分典型的鞑靼人：他的右脸颊上有两颗浅浅的瘢痕，连在一起，看上去似乎是之前长过疔子的痕迹。他的脸和手看上去都很小，手指十分小巧，如同妇人。”芮尼用大量篇幅，详细地描写了恭亲王在接见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绅士风度，为之大为倾倒。

恭亲王的这种翩翩风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成熟。1879年，美国前总统、内战英雄格兰特将军（Ulysses S. Grant）访问中国，这是西方国家政治领袖首次访华。格兰特随行的私人朋友、著名记者、日后的驻华公使杨约翰（1882~1885年



这张照片是 1860 年 11 月 2 日，恭亲王回访额尔金勋爵的时候，英国随军的意大利摄影师费利斯·比托给他拍摄的两张肖像照之一。这张照片拍摄十分成功，日后成为恭亲王的标准像，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张国家领导人的“玉照”。根据英军军医芮尼的描述，恭亲王那天“身穿一件紫色的，绣有黄龙的锦缎官袍，它们分别在胸前、肩膀上和背后用金线绣成直径为八英寸的圆圈。他戴着一顶边缘往上翘的官帽，除了在顶戴处有一个红绸做成的旋钮之外，并无其他任何装饰”。西方人惊奇地看到，即使是在这种签订“城内之盟”的巨大心理压力下，恭亲王始终镇定自若、彬彬有礼，眉宇间显露着与其 27 岁的年龄完全不符的沧桑。

清人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记载了当时的人对奕訢的基本印象，“恭邸仪表甚伟，颇有隆准之意，……叙谈颇久，人甚明亮”，“清室诸王，以恭邸为最贤明”。



丁韪良是清末时美国北长老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他在中国生活了62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文化影响力的外国人之一。图为丁韪良在京师大学堂内的住所。

绝版  
恭親王

John Russell Young) 写道：“恭亲王与之前我所见过的东方王子及政治家们不同，他十分生动。这是一个机敏的男人，直觉敏锐，意志坚定。印度和穆斯林的王子，以及我们在印度斯坦和埃及的朋友们，往往是呆板地坐着，整个谈话中面容呆滞，令你以为是在和石头对话。但是，恭亲王在谈话中，却表情丰富，十分生动。天很热，他边说话边摇着折扇，说到兴起的时候，他就将折扇半合着，指着格兰特将军的胳膊，同时，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将军的脸。”在美国出版的杨约翰回忆录中，画家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美貌若潘安的恭亲王形象。

在西方人的照相机和画笔下，这一时期的恭亲王给后世留下了一些影像。英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在《北京条约》签订后为恭亲王拍摄的照片，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张皇室照片。

根据西方人给我们留下的影像和描述，这位大清国“总理”的形象基本可以还原：他身材瘦削，甚至双颊凹陷，其腰围尺寸似乎与其地位完全不成正比，更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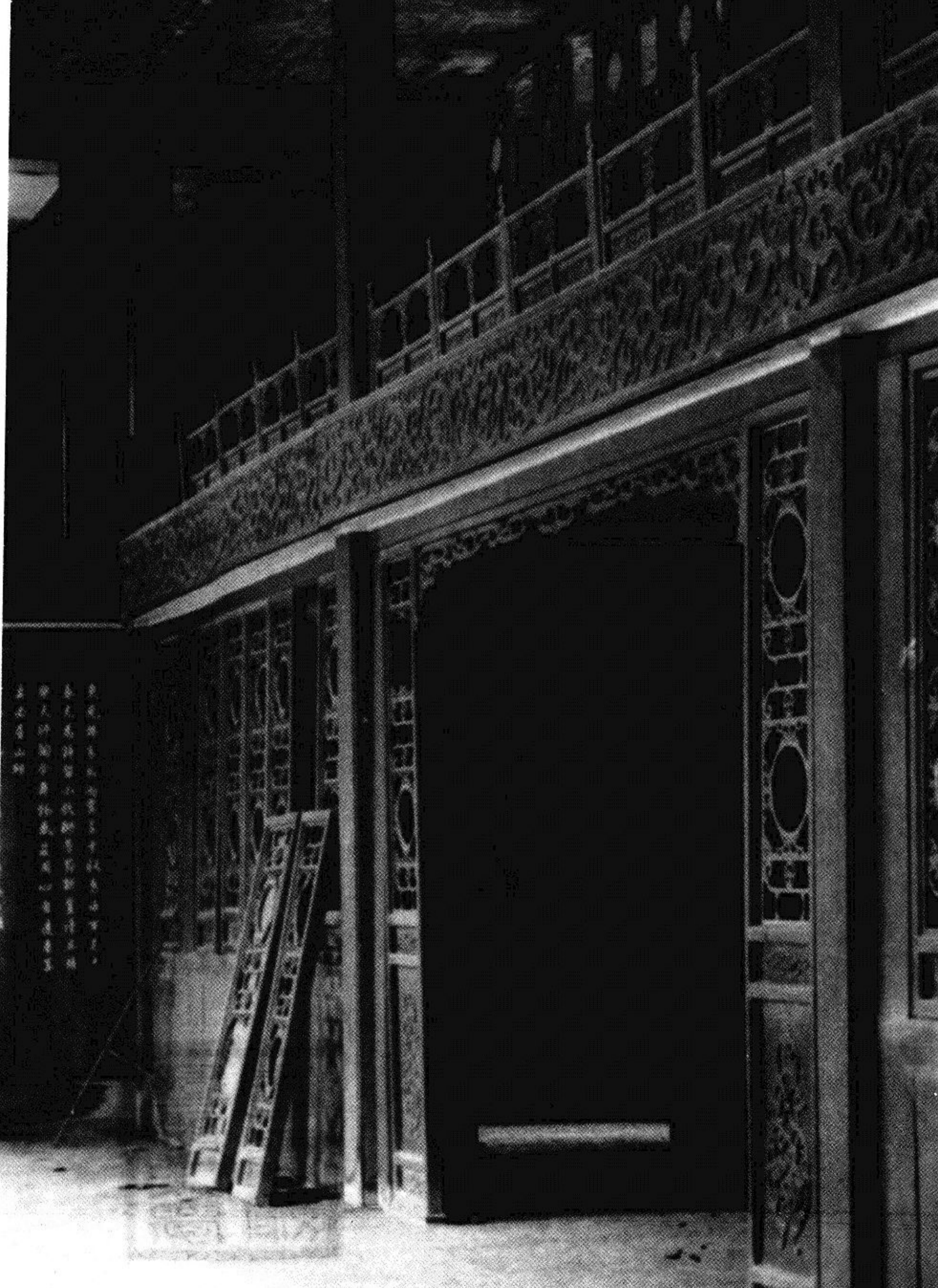
般高级干部们脑满肠肥的形象大相径庭。这种瘦削，无疑并非福相，多主终身劳苦，却并非缘于先天体弱，更不可能因为营养不良，或许正是江山社稷的沉重担子所致。作为最早在大清“铁屋子”里清醒过来的人，恭亲王却因为自己的特殊地位，不能大声地呐喊，只能一边高举大旗“抓革命”，另一边则悄悄改革“促生产”，能做的不能说，至少不能多说；能说的却不能做，至少不能真做。

在瘦削的外表下，他却是人格层面上的“美男子”，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对待列强占领军不卑不亢，对待自己的部属和蔼可亲，这令他在国际国内都赢得了相当多的认可。在那批判与斗争充斥的高层，他几乎是所有干实事者的总后台，而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口号，就是他当年鲜明地提出来的。在晚清的改革开放中，被后世推崇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其实只是改革的桨手而已，幕后的真正掌舵人、伯乐、保驾护航者就是恭亲王。

中国绘画向来不注重写实，恭亲王因此得以成为第一个留下真实影像的中国“总理”。总理往往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戏曲中都尊称为“千岁”乃至“九千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恭亲王之后的中国总理们，无论贤愚，几乎都是瘦肉型的，成了这个职位的标准形象，与那些总统、执政、主席们的“样样都伟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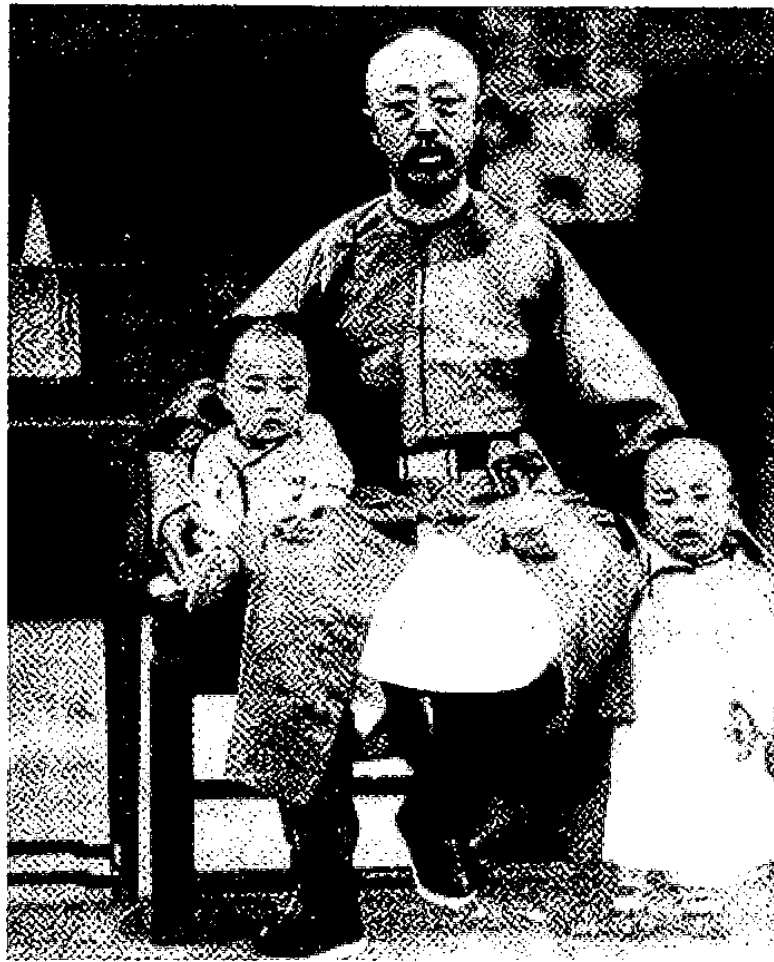
这自然因为执掌中国大船的艰难与繁琐，但或许也来自伴君如伴虎的如履薄冰。“老二”的身份是尴尬的，不能不做事，却不能做太多的事，尤其是不能做太大的事。投身于具体而细微的政务琐事，成为一个“事务主义”者，或许也不仅是其个性使然，而在于更能给老大传递一个信号：本人只会埋头拉车，不善抬头看路，更不会高瞻远瞩，请老大放心，更请老大多批评指正。毕竟，一个能力和品格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老二”，是老大心头最大的痛。

无论在画像还是相片上，恭亲王的眉宇间都显露着与其27岁的年龄完全不符的沧桑，是因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重担，还是因为这个微妙的地位呢？





## 第二章 皇家无亲



锡晋斋仙楼 锡晋斋因收藏有西晋时期大文人陆机手书的《平复帖》而得名。锡晋斋是恭王府建筑中的精品之作，其精美程度据说在整个京城的清代居室中是数一数二的。在恭亲王时期，这里曾是奕訢喜爱的消暑之所。（建研院历史所收藏，照片拍摄于1937年）

---

---

## “窝囊”王爷绵中针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权势之下，即使自己不想结党结派，也会自然成党成派，这是中国政治的无奈之处。恭亲王和醇亲王作为与最高权力最为接近的“老二”，虽然都十分“忧谗畏讥”，但还是不能不成为遮天的大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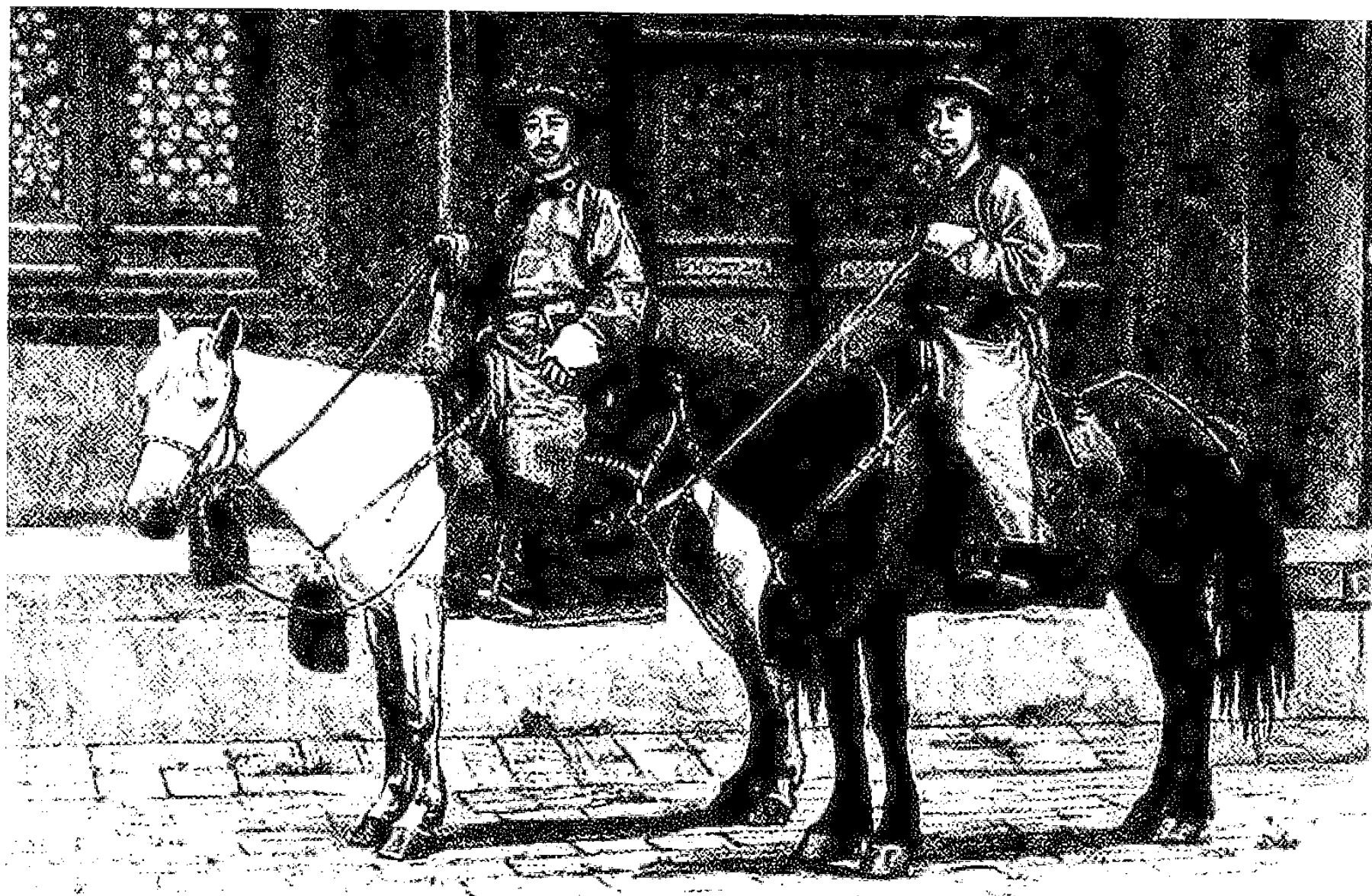
---

1884年4月，世界似乎被北京的“政变”弄懵了。52岁的大清“总理”、恭亲王奕訢，在执掌权柄23年后，被突然“双开”，整个军机处下岗。新的军机处迅速组建，并且“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恭亲王的弟弟、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实际接替了他的领导职务。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

鲜为人知的 Prince Chun（醇亲王）突然与曾经如雷贯耳的 Prince Kung（恭亲王）一样，成为西方媒体的主题词，各色人等睁大双眼，试图从来自北京的蛛丝马迹中，寻找中国的未来发展动向。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大摆乌龙，报道说“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用大篇幅回顾恭亲王伟大的改革一生。而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则说：“这是一场突然的政变，但政权的易手，只在中国首都产生影响，其后果却还很难预料。”这家世界第一大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报道，并且自信地宣称：“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中外关系史的新时代的开始。”

### 老七“老气”

醇亲王刚刚取代恭亲王的地位，御史们就上书说，作为皇帝本生父，醇亲王应该避嫌，不可“与闻机务”，参与军国大事。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游戏中，“避嫌”不仅是“显规则”和“潜规则”的主要组成部分，更是一门精深的政治艺术。当年，醇亲王得知自己的儿子载湉（即光绪）被选为接班人后，焦虑万分，乃至晕倒在工作岗位上，最后以健康为理由在30多岁的盛年提前退居二线。这种及时而适度的“晕厥”，体现了这位王爷讲政治、顾大局、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一面。相比较而言，执政20多年的恭亲王，“晕厥”总是来得不够及时、不够彻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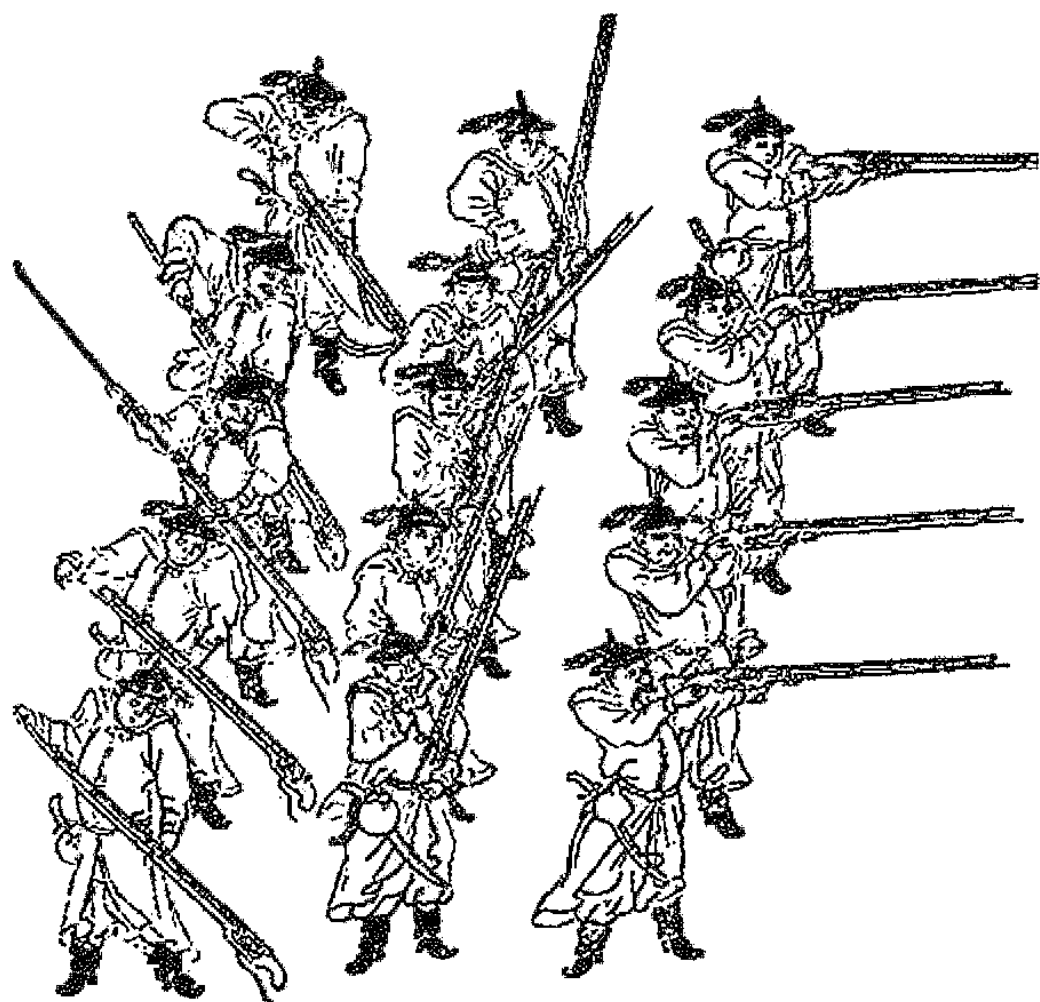


醇亲王与恭亲王兄弟俩并辔而立。在打倒肃顺等顾命大臣“八人帮”的“祺祥政变”中，醇亲王的功绩并不亚于恭亲王，“亲王辅政”其实也有醇亲王的份。

对于御史们的反对，慈禧太后批示说：“自垂帘以来，揣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谕令奕譞与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专指军国重事，非概令与闻。奕譞再四恳辞，谕以俟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命。此中委曲，诸臣不能尽知也。”御史们本来也是做做分内的应景文章而已，自然适可而止，皆大欢喜。

与聪明外露、果决刚毅的六哥恭亲王相比，排行老七的醇亲王似乎多了些“老气”，表现得更为低调、更为绵里藏针，也更为大智若愚。时人就曾以“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的尖刻评价，认为这位新任总理的才具，比起恭亲王来实在只是“驽马”、“柴胡”而已，这种评价一直延续至今。

在打倒肃顺等顾命大臣“八人帮”的“祺祥政变”中，醇亲王奕譞的功绩往往被掩盖在慈禧和恭亲王的光环背后：正是他带兵将肃顺和端华从热被窝中抓住，完成了政变中最艰难、最有风险，也是最为关键的任务。在之后的“叔嫂共和”体制中，他执掌首都卫戍部队的主力“神机营”长达30多年，实际上形成了恭亲王掌握外交、醇亲王掌握军事的基本格局。在醇亲王的主持下，“神机营”成为大清国军事改革的“特区”，“添习火器技艺”、“改弓箭为洋炮”，甚至配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虏



神机营 神机营为清末禁卫军之一，道光十九年（1839年）由御前大臣奕纪创议设立。由于神机营只重视形式上的操练布阵而不重视实战效果，至光绪后期已腐败不堪，几同虚设。图为神机营采用“三段击”战术进行操练。

伯（Krupp）钢炮、哈乞开思（Hotchkiss）步枪、毛瑟（Mauser）后膛枪等。在装备和训练方面，远超过李鸿章那支更为有名的淮军。

“叔嫂共和”的特征是“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两制并存，“亲王辅政”是满清亲贵们能接受“垂帘听政”的条件和前提。而醇亲王不仅是皇叔，也是慈禧太后的妹夫，这注定了他能被最大多数的人所接受。在慈禧眼中，这无疑也是对恭亲王的一种制衡，尽管他在恭亲王早期两次被慈禧修理的时候，都义愤填膺地站出来为六哥说话，却在第三次成为实施打击的主力 and 实际的替代者。

醇亲王在取代恭亲王前，给世人的感觉相当地“左”，比较保守、排外。对恭亲王的改革，尤其是“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政策，他总是嗤之以鼻，建议太后“摒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甚至两次秘密上书，建议削弱恭亲王的权力。野史中说他“疾其兄之专权，久有眈眈之意”。毫无疑问，这样的互相监督，正是慈禧最希望看到的。

同治死后，光绪即位，醇亲王虽然为避嫌退居二线，但作为影子“太上皇”，还是吸引了各种人物纷纷投靠到他的门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权势之下，即使自己不想结党结派，也会自然成党成派，这是中国政治的无奈之处。恭亲王和醇亲王作为与最高权力最为接近的“老二”，虽然都十分“优逸畏讥”，但还是不能不成为遮天的大树。法国入侵越南，局势告急，慈禧太后要求闲居的醇亲王多挑担子，



醇亲王与福晋叶赫那拉氏 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这是慈禧太后做妃子时，为自己布下的一着目光远大的“闲棋”。自此，醇亲王就成为她自觉不自觉的同盟者。而当同治夭亡，慈禧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妹妹亲生的儿子做皇帝（即光绪）。这种政治上的血缘关系，令慈禧太后的权力有效期延长到了半个世纪，醇亲王家族也因此成为大清帝国历史上最为显赫的家族。

并最终用他取代了恭亲王。

之前以高调的“极左”面貌出现的醇亲王，一旦主政，便令人惊愕地实现了大转身。在对法战略上，他几乎完全继承了此前所批判的恭亲王的“投降路线”，甚至走得更远，令海内外观察家们跌破眼镜。当“极左派”们指责李鸿章对法屈膝时，老李气定神闲地说：那都是恭亲王和醇亲王两位王爷确定的方针，我老李无非是个执行者而已。

对于自己当看客时的“极左”言论，挑上担子的醇亲王承认自己“尝持偏论”，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但事实上，从醇亲王变脸之迅速和彻底来看，其之前的“极左”面貌，极有可能只是为了赢取“基本教义派”支持的一种手腕。在野的时候，站着说话不腰疼，可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而一旦亲自执政，为了儿子的江山社稷，他也就只能成为或者还原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作为他的亲密战友，大清国首席洋干部、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在4月27日写给伦敦的信中，谈及中法战争时说：“或者恭亲王表面上虽然和平，而暗地里却在反对进步，排斥外国人，并且主张战争。而七爷和他的朋友反倒是主



醇亲王与恭亲王兄弟俩的老年合影  
光绪十五年(1889年)摄于恭王府花园“秋水山房”内，时年奕訢58岁，奕譞50岁。醇亲王的儿子被选中作为皇位继承人(即光绪)，兄弟俩开始生分。到了醇亲王自己挑起国家重担后，他才领悟到恭亲王作为当家人的难处，兄弟俩和好如初。晚年时，老兄弟俩经常聚会，一同发发牢骚，倒也是一种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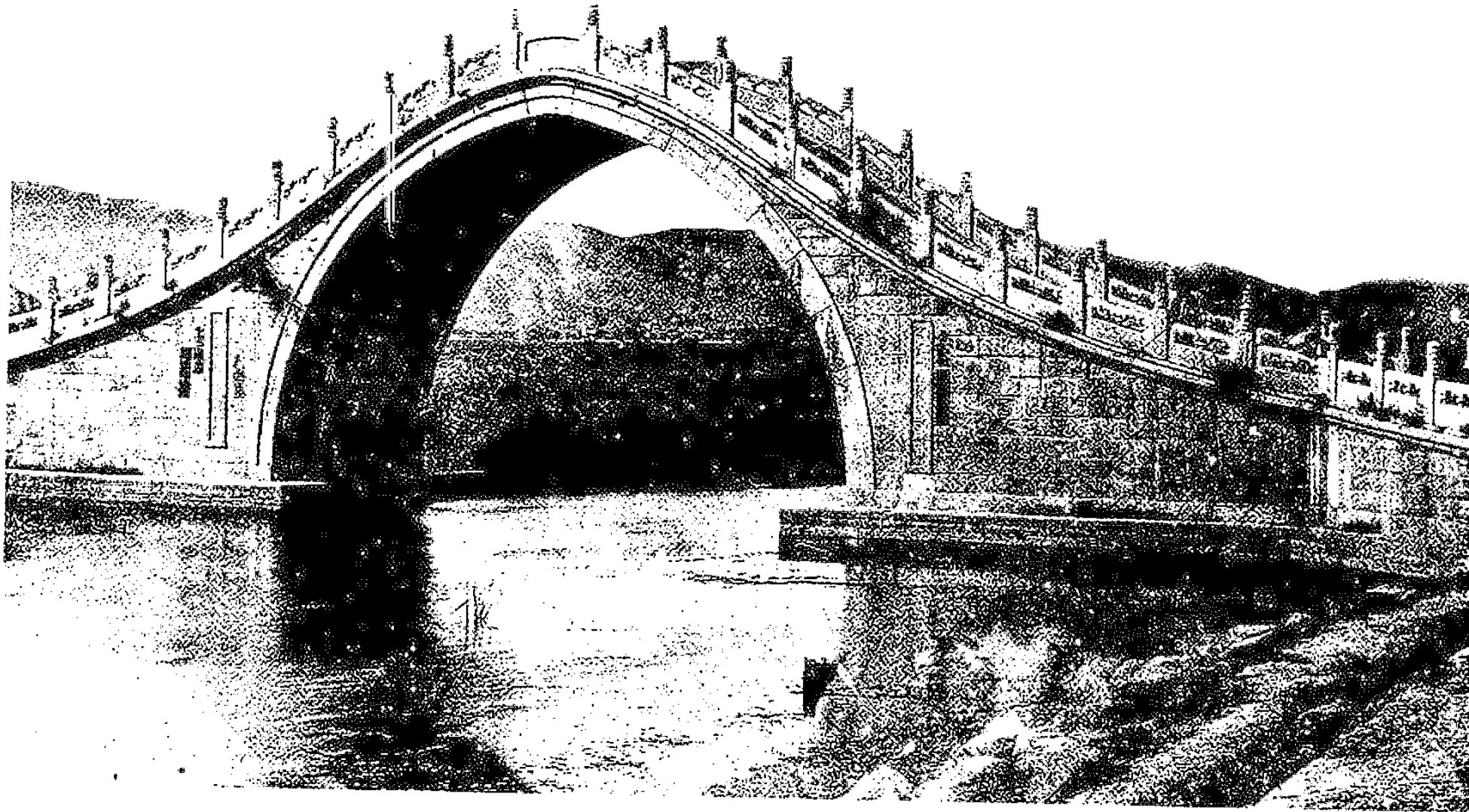
张和平和进步的——我有一半倾向于相信这是正确的解释。在中国有时须应用颠倒的法则。我想七爷如果控制这政府，很可能中国真正地能够进步。”

大清国第一轮改革开放，历时三十多年。以甲申易枢为界，醇亲王主政的后十年，与恭亲王主政的前二十年相比，几乎所有改革措施都没有被中止，而且在海军、铁路、电信等基础建设方面，得到了更为长足的进步，尤其在新疆和台湾先后建省，大大加强了对边疆省份的控制。外交方面，醇亲王也展现了与恭亲王一般的灵活身段，以至于后世的主流史学家们批判这位“爱国王爷”一挑起管理国家的重担，怎么就和乃兄一般软弱、一般“卖国”。这类似于恭亲王当年发动政变，处决了肃顺等人，却几乎完整地继承了肃顺的所有政策，尤其是重用曾国藩等汉臣的政策，将权力斗争与政策连贯有效地进行了区隔，不因人废事，更不因人废制。

更为吊诡的是，野史把恭亲王、醇亲王哥俩争权传得有鼻子有眼，实际上这哥俩时常聚会，并且共同感慨挑担累、挑这付看客多多的大清担子更累。或许，那种留在纸面的“争执”，只是“前人撒土、后人迷眼”罢了。

### 绵里藏针

低调得近乎窝囊的醇亲王奕譞，其家却一连出了两任皇帝(其子光绪、其孙宣统)，一任摄政王(其子载沣)，两个郡王(其子载涛、载洵)。道光皇帝的儿孙当中，风水几乎都流往老七家中。



玉带桥 英国工程师托马斯·查尔德 1877 年拍摄于颐和园

和恭亲王一样，醇亲王成为中央二号首长、挑上国家重担后，嘴巴立即闭上，尾巴马上夹紧，而他对慈禧太后的态度，成为后人诟病的主要对象。主流的观点认为，他在慈禧面前，比恭亲王更能逢迎、更为软弱，而最大的罪证就是不惜拿海军军费为慈禧太后建设颐和园，令北洋舰队成为“房奴”。

颐和园的建设资金来源，一直是蒙在慈禧和醇亲王，包括李鸿章头上的阴影，人们普遍认为他们挪用了本该用于北洋舰队的军费，而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但这一指控，如同针对晚清的诸多政治抹黑一样，是完全虚构和曲解的。

这一指控的来源，缘起于《翁同龢日记》（光绪十二年十月）。庆亲王与醇亲王见面，“深谈时局”，醇亲王请庆亲王转告翁同龢等，在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的问题上，要“谅其苦衷”，他的目的就是“以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溱阳也”。这么做的动机，与其说是逢迎慈禧太后，不如说是营造一种更为和谐、团结、吉祥的氛围，一则表白自己的忠诚，让领导放心，二则也希望老佛爷及早放手，使光绪皇帝能够尽早单飞。这是一种无需言辞、心照不宣的表白。

严肃的史学论证却认为，此“渤海”并非北洋舰队活跃的“渤海”，而与下句中的“溱阳”一样，指代的是一处塞上行宫“白海”，其意思也就是让慈禧就近在京郊修园林，



奕譞、李鸿章（右）和善庆（左）1886年奕譞上奏折，奏请设立水操学堂。同年，水操学堂在颐和园的昆明湖创办。图为奕譞、李鸿章和善庆检阅水操学堂时的合影。

而不是如同祖宗们那样跑到更为遥远的塞上去建行宫。

更为关键的是，为北洋舰队预留的经费，是根据收支平衡的基础所做的国家预算，众目睽睽之下，根本没有截留的余地。为修颐和园而筹集的260万两白银，虽然名为“海军军费”，却并非来自财政拨款，而是各省督抚们的私人“报效”。醇亲王因为同时监管颐和园工程和海军建设，就将这笔款子以北洋的名义同时存入天津的外资银行生息。取名“海军军费”，为的是减少舆论对中央的可能压力，却没想到效果适得其反。而这些舆论的源头，来自康梁师徒流亡之后的政治抹黑，如同他们以武则天的小说形象为蓝本虚构慈禧私生活一样。梁启超晚年自承当年文字均为政治宣传所用，不可作为信史。

实际上，围绕北洋舰队的军备更新、扩充，争论的焦点并非预算经费的运用，而是对军事改革的不同应对思路。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派”，根本不顾及军事技术革命的浪潮，对李鸿章提出的北洋舰队更新方案横加阻遏，认为吨位数已居世界第八就足以保卫海疆，在国家预算中大量缩减了北洋的军费，导致北洋的相对战斗力大为下降。

同样在颐和园的修建上，恭亲王的“硬抗”，就远不如醇亲王的“软受”。而醇亲王也从这样的政治默契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空间：在他执政期间，所有改革措施都更为直接，时人慨叹醇亲王比恭亲王要更加痛快果断。从李鸿章留下的各种文献





左上图：醇亲王奕譞与第五子载沅、第六子载洵的合影。

右上图：醇亲王与少年载沅的合影。大儿子光绪皇帝入宫后，醇亲王小妾所生的载沅成为实际上的长子，并由福晋叶赫那拉氏亲自抚养，这也令载沅被慈禧太后当做亲密晚辈，为载沅之子溥仪日后登基奠定了基础。

左下图：义和团运动之后，载沅受命作为清廷特使前往德国，去为德国公使克林格在北京被杀一事向德国皇帝致歉。

右下图：童年的载洵与载沅

看，他把恭亲王更多地当做英明领导，而把醇亲王更多地当做知音和战友。每当李鸿章的改革遭遇阻击或挫折时，恭亲王是暗中保驾，醇亲王则是公开护航，旗帜鲜明，态度清晰，毫不含糊。

从醇亲王在慈禧面前的柔软身段看，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绵里藏针；而从醇亲王对待改革和改革者的鲜明态度看，他更有“针尖带绵”的一面。这种性格遗传给了他的儿子、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溥仪之父），这位末代摄政王在内政（政改力度空前绝后）、外交（既敢于与美德两国结盟，也敢于派军舰巡视西沙东沙等群岛）上频繁亮剑，却能容纳反对势力，甚至赦免汪精卫那样的欲取他性命的刺客，而在改朝换代后，甘于乃至乐于被人误以为“窝囊”。

1888年，醇亲王一度病危，自以为不久于人世。当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去看望他时，他的政治遗嘱就是“勿忘海军”，并且将当年（1886年）检阅北洋舰队时慈禧所赐的一块如意，交给了光绪（醇亲王两年后方去世）。无独有偶，十年后（1898年，戊戌年），恭亲王在临终前，也是握着光绪皇帝的手，叮嘱他要小心康梁等打着改革旗号实现政治野心的“广东小人”。

作为中央的最核心，这两位亲王和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如何巩固和加强这个政权。改革、开放，与时俱进，乃至后来的以扩大执政基础为手段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目的。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显规则”，为修园林而自毁长城的事，从常理上说，应该不可能成为他们的选项之一——除非他们真的如抹黑宣传所说的愚昧得近乎脑残。

醇亲王给子孙们留下了一幅极堪品味的家训：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

财也小，产也小，后来子孙祸也小，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锦衣玉食的凤子龙孙，能从荣华富贵中勘出此番深意，这是一种什么胸怀？

► 右页图：在权力斗争面前，慈禧太后从来不会露怯。为了驱逐恭亲王，她亲笔撰写上谕，尽管别字连篇，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的纵横捭阖。

## 伟大领袖六合彩

惇亲王奕訢本来是最有机会成为皇帝的，因为按他母亲祥妃的预产期，他将是道光皇帝存世的“长子”。但道光皇帝另一已经怀孕的妃子全嫔更有心计，她收买御医偷偷配了催产药，实行“计划生育”，终于抢在祥妃之前，生下了儿子奕訢，也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

慈禧太后绝对没想到，在咸丰兄弟中排行第五的惇亲王奕訢，平日里看着极为窝囊，而且与老六、恭亲王奕訢并不相容，这次却会跳出来，为恭亲王说话。

而且，太后刚刚任命他及醇郡王、钟郡王、孚郡王四人，取代恭亲王，轮流领班朝会，即主持中央的每日国务例会。这等于是惇亲王中了政治六合彩，可他为何如此不识抬举呢？

### 仗义执言为弟请命

这是1865年4月3日，离太后亲自动笔，以皇帝口吻撰写上谕，将恭亲王“双开”才一天。在那篇别字连篇的上谕中，慈禧太后指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谮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谈乱道”。

論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兩宮  
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朕親  
親王辦事洵情貪墨多招物議  
等弊嗣此重情何以能辦公事  
實據是出有因究屬庸懦知事  
恭親王從議政以來妄自尊大  
以仗爵高權重目無君上看朕  
挾致往；諂始離間不可細問  
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許多取巧  
以後何以能辦國事塔不即早  
政之時何以能用人朕正詞此  
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寬大之  
者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  
旨一頁小書片是朕果全之意  
寺俞

而事件的起因就是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于一周前上疏，弹劾奕訢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并要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

太后同时任命了新的行政领导班子，一下子让四位王爷同时上台，满以为这样就能团结大多数可以团结的人，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惇亲王几乎全盘否定了慈禧太后对恭亲王的指控：“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着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要求“飭下王公大臣集议”，进行集体研究，商议对恭亲王的处分。

这份奏折语气谦卑，却带着骨头。慈禧太后批阅后，当天就召见军机大臣文祥等，指示说：“恭亲王于召见时一切过失，恐误正事，因蔡寿祺折，不能不降旨示惩。惇王折亦不能不交议。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朝廷用舍，一秉大公，从谏如流，固所不吝。君等固谓国家非王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下令第二天召开王公大臣翰詹科道等“中央全会”，专题研究蔡寿祺和惇亲王的奏折。

但是，在第二天的中央全会前，慈禧太后却单独召见倭仁等大臣，告诉他们：“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汝曹为我平治之。”按照她的这个指示，倭仁等确定了中央全会的批斗会基调。

结果，在会上，文祥和倭仁传达的太后指示精神，完全是相反的。与会的中央干部们或者就是以惇亲王和倭仁为首，分成了两派，相持不下；或者看看水太深了，不敢表态。大家只能确定六天后（4月9日）再议。

第二次中央全会的前一天（4月8日），排行老七的醇郡王奕譞（即日后光绪皇帝之生父、宣统皇帝之祖父）回京，也上疏为六哥恭亲王抱不平。

醇郡王在报告中认为，要客观看待恭亲王的表演，成绩毕竟是主要的，“感荷深恩，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缺点则是次要的，具体表现在“小节有亏”，而原因也在于恭亲王太忙了，“至其往往有失于检点之处，似非敢有心骄傲”。最为关键的是，蔡寿祺的指控“本无实据”，如果因此将恭亲王调离了领导岗位，“不免骇人听闻，于用人行政，殊有关系”。所以，对待恭亲王还是要批评为主，“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

在第二次中央全会上，大臣们和王公亲贵们依然分成了两派。倭仁起草了一份

以“批恭”为主的决议，但遭到王公亲贵们的坚决反对，已经60岁的肃亲王华丰（即善耆之祖父、川岛芳子之曾祖）干脆另写了一份决议。倭仁没办法，只好四次修改自己的稿子，王公亲贵们依然不同意，最后，与会人员分别按照政治路线站队签名：军机大臣多在倭仁的稿子上签名；王公亲贵们多在肃亲王的稿子上签名；纪检部门（“都察院”）、老干部及干部子弟管理局（“宗人府”）等则另行上了报告，五花八门，中央领导班子几乎分裂。

4月11日，两宫太后终于接受了醇亲王们的意见，表示说，出于“防微杜渐”的目的，必须对恭亲王“略示薄惩”；但为了大局的需要，恭亲王可以边工作边检查。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则再也没有恢复。

### “计划生育”错过皇位

在这次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的首个回合交手中，慈禧太后对率先抗拒的醇亲王十分不满，她在召见倭仁时，质问道：“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醇王耶？”

原来，1861年咸丰帝去世后，两宫太后与恭亲王、醇亲王等密谋除掉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当时，恭亲王赶到热河吊孝，与肃顺、醇亲王等一起吃饭。饭桌上，被排除在密谋之外的醇亲王，当着恭亲王的面，手提肃顺的大辫子嚷嚷道：“人家要杀你哪！”肃顺是个大度惯了的人，只当是玩笑，连声说：“请杀，请杀。”恭亲王却被吓得半死。后世多将此解释为醇亲王对恭亲王的嫉妒。

其实，醇亲王奕詝本来是最有机会成为皇帝的，因为他才应该是道光皇帝的“长子”。在奕詝出生之前的两个月，道光皇帝刚刚失手踢死了长子，而次子、三子均在2~3岁时早夭。当时，后宫有两位嫔妃祥贵人（醇亲王奕詝之母）、全嫔（咸丰皇帝奕訢之母）都怀着身孕，按预产期的测算，祥妃最早生产，即日后的醇亲王奕詝将成为道光皇帝的四子，也即存世的长子。根据野史的说法，全嫔很有心计，她收买御医偷偷配了催产药，实行“计划生育”，终于抢在祥妃之前，生下了皇四子奕訢（咸丰皇帝）。六天后，奕詝（醇亲王）来到人间时，却发现已经有人加塞了，他只好成为皇五子。再一年后，道光的另一妃子，早夭的次子、三子之母静妃生下了皇六子，即日后的恭亲王奕訢。

老妈“抢跑”的结果，令奕訢（咸丰皇帝）备受早产的煎熬，体质很弱，加上成年后纵欲，结果在年仅30岁时即病逝，只留下了一儿（同治皇帝）一女。

迟到的五阿哥奕詝（惇亲王）在16岁那年（1846年），被父皇道光下令，过继给八年前已经去世且无子嗣的惇亲王绵恺。绵恺是道光的三弟，因性情粗疏，不断犯错，爵位就不断在亲王、郡王间上下。奕詝过继后，被封为惇郡王。这年正好是道光65岁，他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奕詝就算是出局了。据说，奕詝出局，不仅因为长得丑，没有天子相，而且大大咧咧，不好读书，十分粗俗。

大大咧咧的奕詝，接了大大咧咧的惇亲王绵恺的爵位，倒也是相配。日后，老四奕訢（咸丰皇帝）即位，将老六奕訢晋升为恭亲王，并将恭亲王和惇郡王都安排在中央工作，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亲王们不可兼军机的祖制。当了中央领导人的惇郡王奕詝，依然不改散漫的习气，如同他那位嗣父绵恺一样，不断“失礼”，不断被痛责，因此在1855年丢了郡王爵位，降级为贝勒，撤销一切行政职务，下放到上书房学习班改造。估计是学习班教导有方，一年后奕詝捡回了郡王的爵位，数月后又成功晋级为亲王。

### 偶尔露峥嵘

这位惇亲王的脾气，与严谨的恭亲王截然不同。据说，他在大夏天时会手持大蒲扇，光着膀子在什刹海边纳凉，和下人们也不讲究规矩，很有平民色彩，北京城因此留下不少关于他的民间传说。

虽然因为妈妈的肚子而错过了皇位，但这位王爷并没有对政治彻底死心，在关键时刻还是很有权力的直觉的。除了当着恭亲王、肃顺的面说肃顺要被杀头之外，他在几次政治风波面前，都有着看似匪夷所思的表现。野史记载，惇亲王经常嘲弄慈禧太后，有一次，慈禧想把自己不喜欢的同治皇后阿鲁特氏废位，惇亲王当时负责宗人府，坚决反对：“欲废后，非由大清门入者，不能废大清门入之人，奴才不敢奉命。”大清国的规矩，只有皇后过门才是从国门“大清门”抬入的，慈禧本人是“二奶”出身，嫁入皇宫时没有任何仪式，因此终生耿耿于怀。

正史上记载，1884年甲申易枢，就是这位惇亲王和恭亲王合唱双簧，在讨论对法国作战方案时，兄弟俩却大谈当年十月为慈禧祝寿进献之事。一同觐见的光绪皇



载漪（1856 ~ 1927），因为娶了慈禧太后的亲侄女，其子溥儀曾被立为同治皇帝的继嗣“大阿哥”。1900年，载漪（左图中坐者）、载澜（右图）因力主用义和团抵抗洋人被革爵，发往新疆，永远监禁。1927年载漪病死于宁夏。载澜在新疆受到地方官优待，过着骄横糜烂的贵族生活。辛亥革命后，潜回东北老家，病死于沈阳。

帝老师翁同龢觉得他们“极琐屑不得体”，并在日记里感慨：“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而这，或许正是恭亲王在醇亲王的配合下，故意以“极琐屑不得体”来主动获咎，给所有人，尤其是老七、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的上台提供一个机会。

可以说，在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和恭亲王辅政的“一国两制”中，这位“粗俗”、“散漫”的醇亲王，成为在太后与恭王之间的另一个平衡物。而恭亲王在其执政生涯中，得到了这位比他大一岁的五哥的特殊协助：口无遮拦的醇亲王，是慈禧相当忌惮的人物。

醇亲王家似乎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折腾点令全国乃至世界刮目相看的动静。醇亲王有三个儿子：载濂、载漪、载澜，在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中，这三兄弟都是义和团的幕后推手，而尤以老二载漪最为著名。载漪自幼好武，加入了满洲亲贵的精锐部队“神机营”，展露才华，被慈禧太后看中，将自己弟弟桂祥的三女儿许配给了载漪。

成了慈禧太后的内亲，自然能够在政治上不断进步。载漪是家中老二，无法继承父亲的爵位，而且，当时醇亲王还在世，一门也不可能封两个王爵。慈禧太后于

是下旨，令载漪过继给刚刚去世且无子嗣的瑞郡王奕志，袭了爵位，但是，在撰写委任状时，出现了笔误，将“瑞”字写成了“端”，只好将错就错，载漪就成了“端郡王”。他的英译名 Prince Tuan 在西方几乎家喻户晓，就是因为他被八国联军指定为义和团动乱的“头号罪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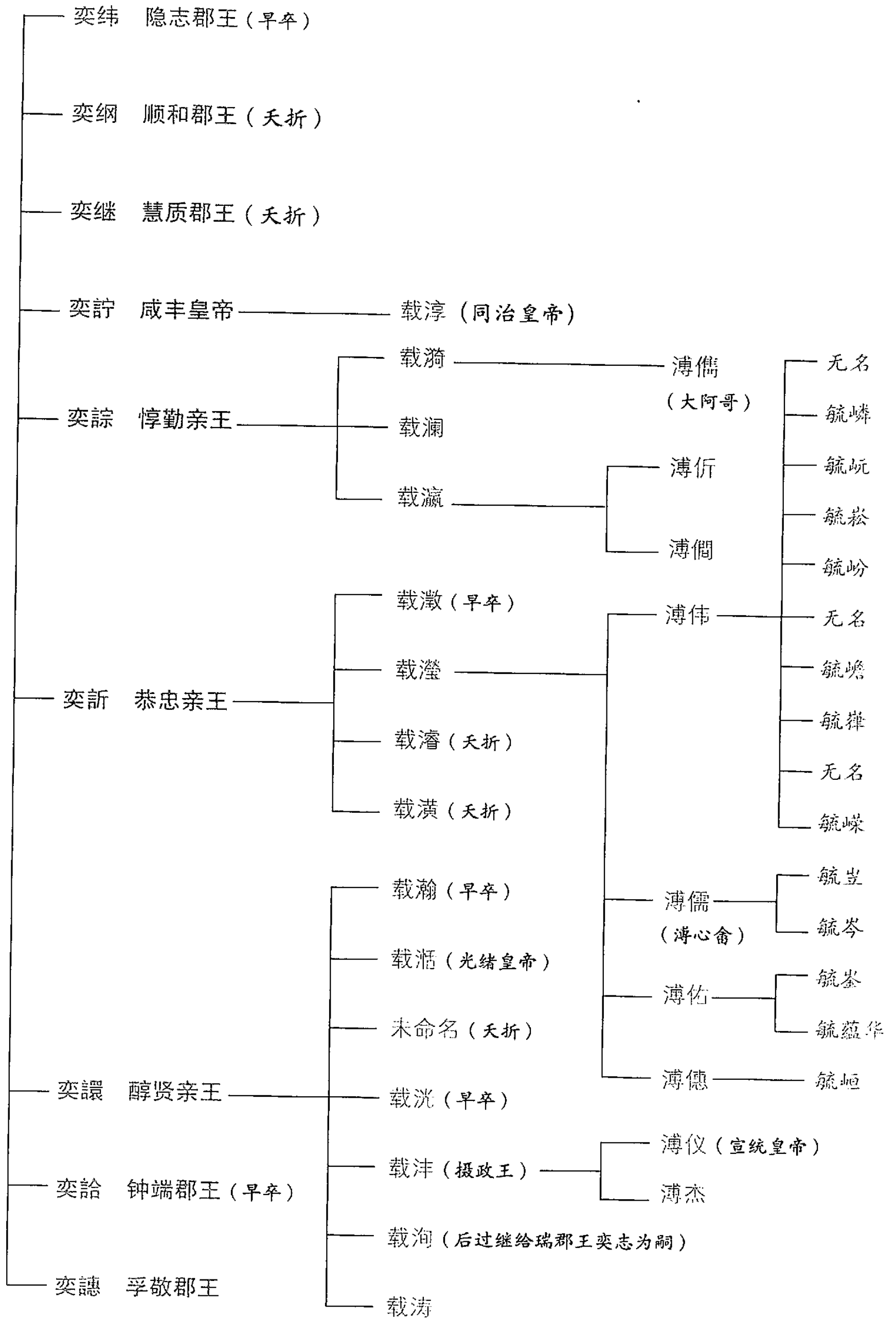
1898年，光绪皇帝及其身边的一小撮年轻干部，发动了盲目而操切的“戊戌变法”，将包括真正在第一线改革的实践者在内的几乎所有干部，都推到了所谓“改革”的对立面。反弹力度之大，甚至威胁到光绪的帝位。已经退居二线的慈禧太后力挽狂澜，亲自出马，以“戊戌六君子”的脑袋为最小代价，保住了光绪的帝位。同时，为了向“改革”的受害者们妥协，她同意为已经证明了是“天阉”（先天的阳痿病患者）的光绪皇帝立嗣。候选人中，只有载漪年方15岁的儿子溥儒，与她血缘最为接近，是嫡亲的侄外孙，于是被册立为“大阿哥”。没想到，这一接班人的指定，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激烈反弹，列强拒绝承认。于是载漪终被洋人们逼上“灭洋”的道路，试图通过义和团这一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来支撑起儿子将来的帝位巨舟。

溥儒备位东宫，是继其祖父惇亲王奕詝在娘胎中以来，第二次最为接近最高权力宝座。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放火”发动群众后，这把群众运动的火却最终失控。在八国联军的炮口下，载漪差点被当做战犯扭送联军处决，而溥儒自然是与皇位永远分手了。

龙生九子，在道光皇帝的九个儿子中，除咸丰之外，奕詝、奕訢都曾先后有机会问鼎帝位。惇亲王奕詝改换了谱系，只能做个“荒唐王爷”，自娱自乐；恭亲王奕訢虽然地位崇高，处在大于2（老二）、小于1（老大）但无限接近于1的地带，却忧谗畏讥，蹉跎一生，壮志难酬。大清国的政治六合彩，落在了并无任何资源优势的老七醇亲王奕譞头上，真正可说是渔翁得利。老七一家连出两任皇帝（光绪及宣统）、两任醇亲王（奕譞与载沣）、两位郡王（载涛与载洵），炙手可热。这是造化弄人、天意难测，还是政治行情黑庄盛行、波云诡谲呢？



# 道光皇帝世系图



---

---

## 王爷蓝筹股

庆亲王奕劻在低调地展示着自己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的同时，却高调地展示着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表达自己有能力、无理想，以自污而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充满牛劲的恭亲王，最终不得不做熊，而装熊的奕劻，最后却成了真正的牛人……

---

---

大清国的政治行情，有点阴阳不定。“庄”后有“庄”，“庄”外套“庄”，令人眼晕。官场如股市，惯于追涨杀跌的官员们为此头疼不已，既怕错过绩优股，更怕沾上垃圾股。风险四伏，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却也未必会赢。

这不，恭亲王这只坚挺了23年的蓝筹股，却在1884年的春夏之交，突然就崩盘了：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彻底被“双开”。大盘引领者，改为光绪皇帝的老爸、醇亲王奕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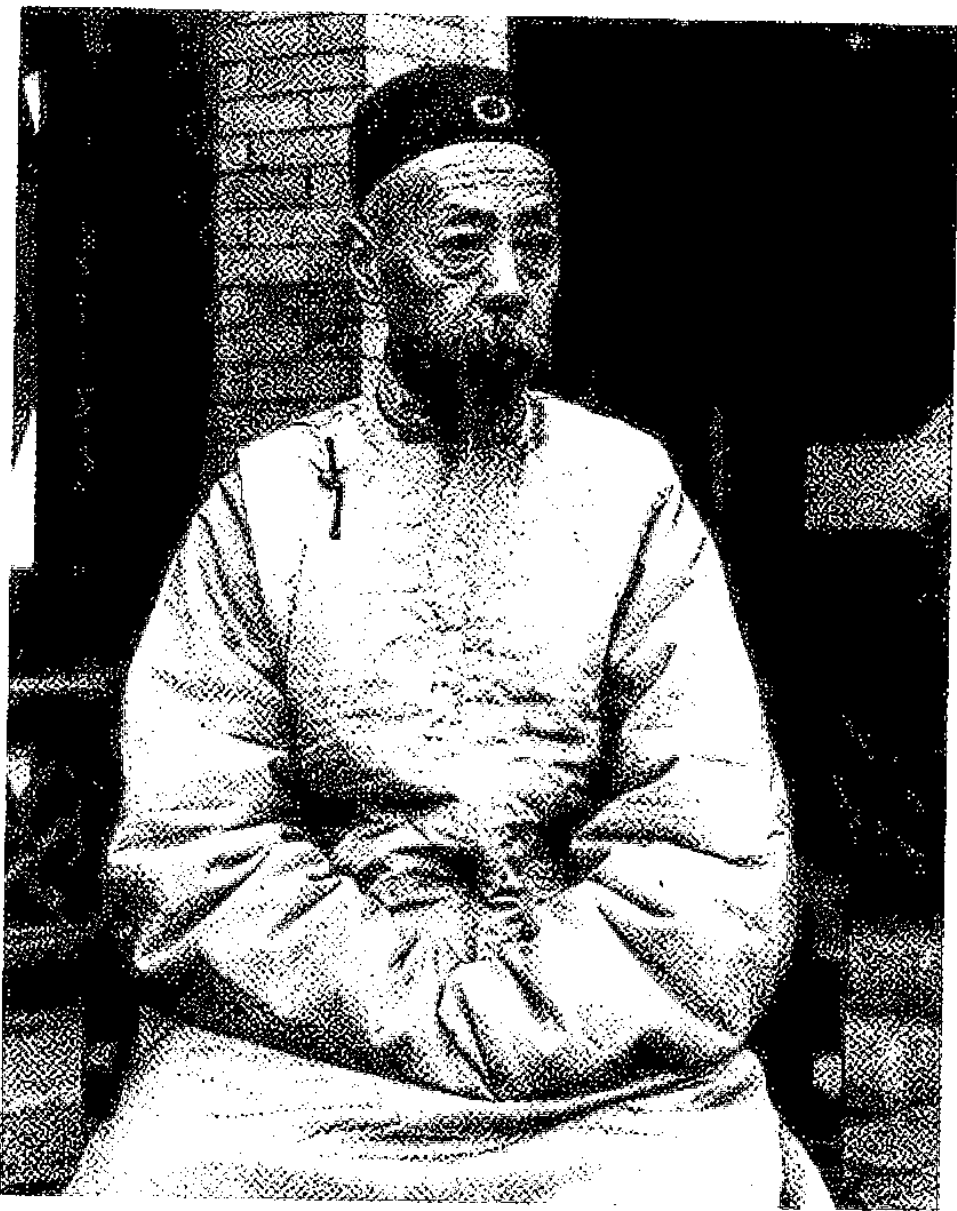
毫无疑问，有个做皇帝的儿子，哪怕这皇帝当得很窝囊，那也绝对是优质资源。光绪皇帝即位后，醇亲王为了避嫌，一度退居二线，深藏不露。如今突然改制亮相，闪亮登场，那些早已看好这只潜力股的官员们，一拥而上，疯狂追捧，掀起了一轮狂热的政治牛市。

醇亲王的行情高开高走，并且保持高位运行，这其实并无悬念。令众人惊叹的是，在醇亲王的牛腹底下，一只盘口小、价位低的“创业股”，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飞冲天。

### “创业股”黑马

这匹黑马，就是刚刚接替恭亲王执掌总理衙门，并被晋封为庆郡王的贝勒奕劻，也就是日后在国际舞台上大名鼎鼎的 Prince Ching（庆亲王）。

奕劻当然是龙种，但有点偏远，属于皇族的旁系。奕劻的祖父，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七子永璘，册封为庆亲王。清代的宗室爵位共分十二级，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是高级爵位，随后是四类“公爵”：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



庆亲王的形象，一直不像个王爷，倒像个账房先生。作为著名的“庆那公司”的老大，他的贪腐具有国际知名度，但在那贪名之下，或许他也有着另一把称量江山的秤？

分辅国公。“入八分”就是八种标帜，分别是朱轮、紫纒、背壶（车上可带暖壶）、紫垫、宝石、双眼（可插双眼雉翎）、皮条（车上有皮鞭可驱散路人）、太监。再往后就是四类“将军”：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分别相当于一品至四品的武官级别，每类“将军”中又分三等，俸禄不同。

按照清代的规定，爵位逐代递减。永璘死后，儿子绵愍袭位，爵位降为庆郡王。绵愍死后无子，先由仪亲王之孙奕彩过继，承继了“贝勒”的爵位。但奕彩居然在居丧期间纳妾，犯了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被革除爵位退回本支。老庆亲王永璘的其他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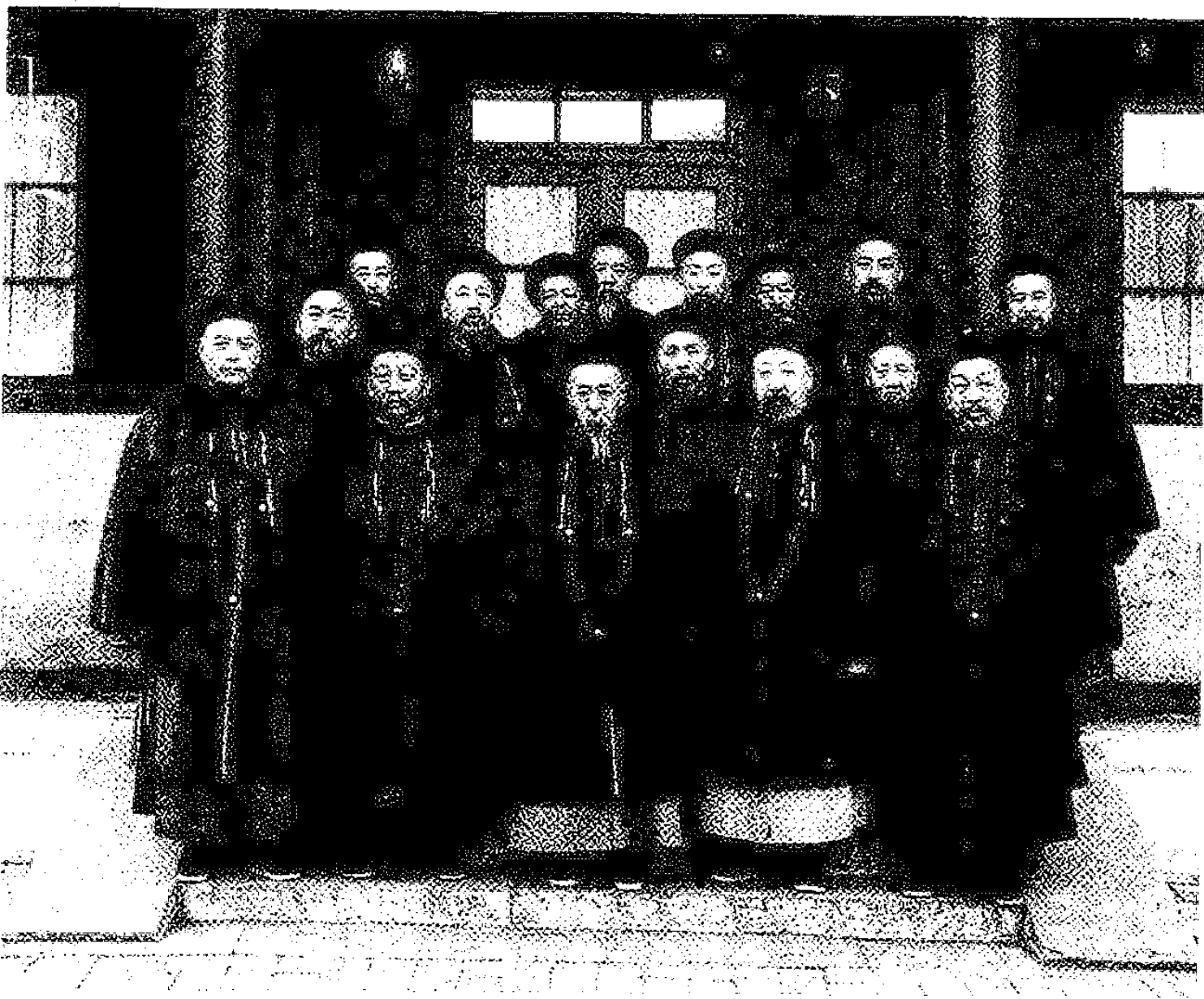
们，随即为了争夺这个贝勒爵位，展开了残酷斗争，这可惹恼了道光皇帝，于是干脆将爵位降了六级，越过贝勒、贝子及四类“公爵”，飞流直下三千尺，直接降为相当于一品武官的镇国将军，而且是其中最低的三等，勉强维持永璘的祭祀而已。这种政治待遇上的高台跳水，往往能在瞬间摧毁一个簪缨世家，根本不需要等候“富不过三代”的时限。

永璘的第五子绵悌承袭这个“三等镇国将军”的爵位。吊诡的是，老庆王家的这个爵位，似乎被诅咒了一般，谁承袭谁就断子孙，绵悌死后又断香火。这回，轮到了其六弟绵性的儿子奕劻，过继袭爵，爵位则按规定递减为辅国将军，相当于二品武官。

奕劻承袭了辅国将军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恭亲王奕訢腾房。老庆亲王永璘的府邸原是和珅的老宅，和珅毕竟曾是大清国的首富，而其子又娶了乾隆皇帝的女儿，和府因此又可享受公主府的级别，規制特别宏伟。奕劻以二品级身份，住在这样一座豪宅里，实在过于扎眼，极不相称。或许，老庆王家风波不断，香火不旺，就可



绝版



左上图：身着朝服的庆亲王，在升迁途中的每个岗位上，都展现出了骄人的工作能力。这位贪墨王爷成为大清诸多改革者幕后的保驾护航者，甚至被英国人认为是中国进步的动力所在。这再度证明了：历史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

右上图：怀抱着幼子，庆亲王奕劻展示了一个家居好男人的形象。

下图：庆亲王的一大长处，就是特别能团结干部，这或许来自于他早年的坎坷，而绝非简单的买官卖官的“商业关系”就能建立的。后人常说他是“北洋系”的庇佑者，甚至说他被袁世凯收买和利用，但或许，他才是北洋系的真正幕后老板，袁世凯被他驱使而不自知？

能是出于这种“伤福”的“逾制”。道光皇帝下旨，老庆王府赏给了刚册封的恭亲王奕訢，这就是至今著名的恭王府，而奕劻则搬入了大学士琦善（就是传说中那位整林则徐的“奸臣”）那座被查抄罚没的宅第。

说来也怪，搬了房子后，老庆王家的熊市行情，便到头了，开始春暖花开。一年后（1851年），奕劻升到了贝子；十年后（1860年）升到了贝勒；二十二年后（1872年）成为御前大臣并且赏加郡王衔，而到1884年恭亲王倒台时，则出任总理衙门大臣，正式晋封庆郡王。袭爵时的奕劻，和堂兄恭亲王的地位至少差了十级。正常情况下，这两个家族将永无可能并驾齐驱，但到了甲午年（1894年），奕劻获封庆亲王，1908年更是获得了世袭罔替（即“铁帽子王”，子孙袭爵时不必递减爵位），彻底追平了恭亲王。而且其妻妾中还封了6位“福晋”，超出了清制规定的亲王只能封5位福晋的限额。

以一个旁支宗亲，而成长为清代第十二位也是最后一位“铁帽子王”，奕劻爆出了大清官场最大的冷门。

## 阴阳线

晚清参与中央工作的四大王爷（恭亲王、醇亲王、醇亲王、庆亲王）中，单从个人仕途成就来看，奕劻无疑可拔得头筹。恭、醇、醇三人，均是道光的儿子，先天资源就十分丰足。在他们这些凤凰面前，奕劻就如同草鸡。但“草鸡”也有“草鸡”的优势，特别谙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特别能办事，特别能察言观色，尤其特别能伏低做小，时刻准备着跃上枝头亮亮翅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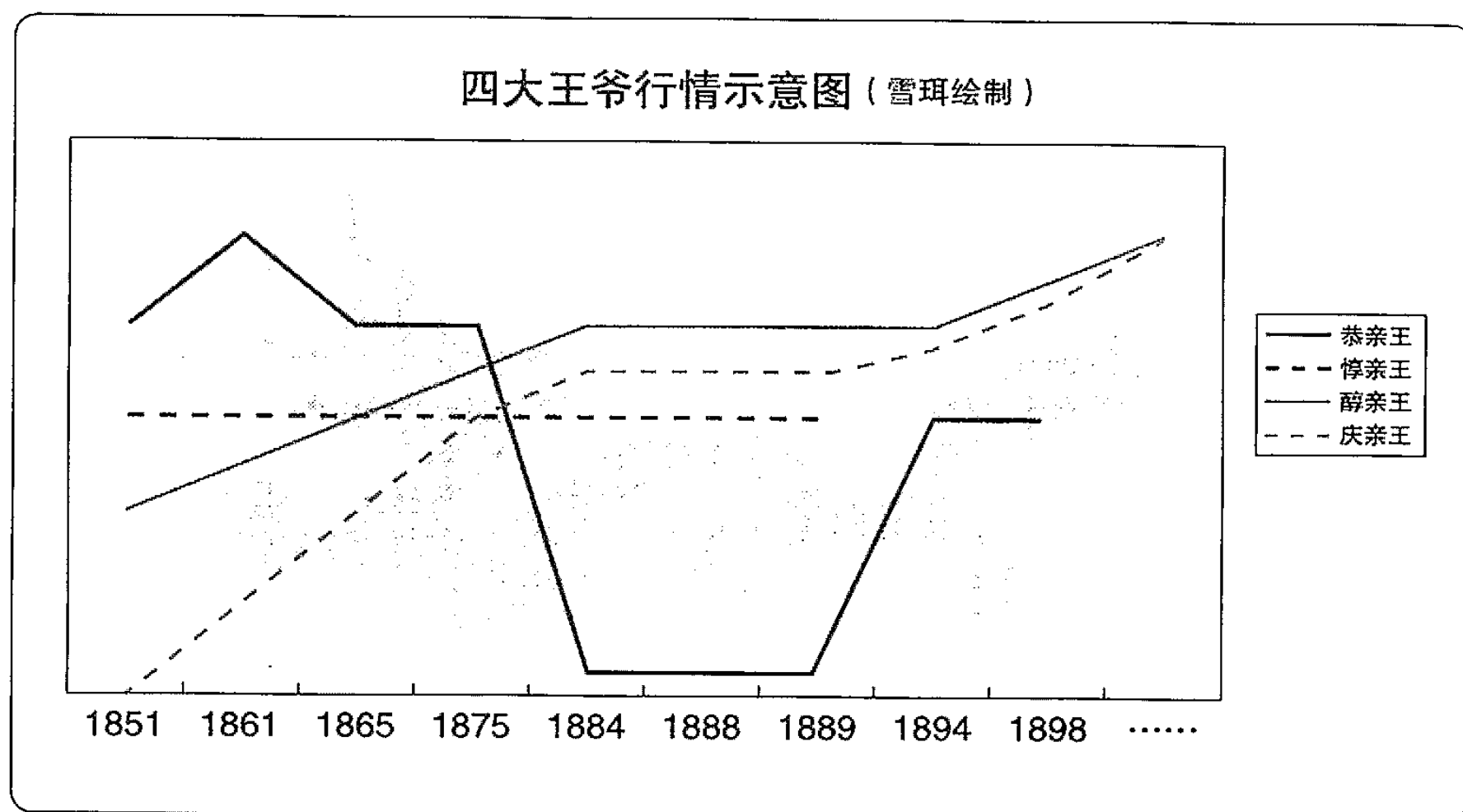
四人中，恭亲王为人最为周正严谨，这也源于他从28岁开始就挑起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担。从恭亲王留下的诗文来看，这本是个内心世界异常丰富的才子，但因长期陷入政务和政争，他的“幸福感”指数绝对是四位王爷中最低的。从他的照片和西方人的画像看，他就是一脸的“苦相”，劳碌命。而他的个人生活似乎也缺乏色彩，单调乏味，甚至连子嗣都不旺盛，考虑到之前和珅、永璘等人如过眼云烟般的短暂富贵，这座府邸的风水的确令人生疑。

恭亲王待人宽厚，这点连西方人都大为认可。这令他的周围凝聚了一批精英，在内忧外患中，支撑起了政府的运行。恭亲王自身崖岸高峻，洁身自好，既不似四

哥咸丰皇帝那样“绯闻”不断，也不似后来的庆亲王奕劻那样“丑闻”绵绵，对于恭亲王个人道德的仅有指控，是说他曾默许门房收取进门费（“门包”），但这也是野史所载，孤证而已。

惇亲王奕訢则因老妈不重视“计划生育”，而错过了本能成为皇家老大的机会，后来又被老爸道光皇帝送给别人家承嗣，心里多少有些不平，以王爷之尊跑到街头小摊大碗喝酒、赤膊躺在什刹海边纳凉等“平民”作风乃至“痞子”作风，也多少有些故作姿态。他在“叔嫂共和”的体制下，也长期在中央工作，敲敲边鼓，有时倒也能发挥些平衡的作用。

醇亲王奕譞，给时人和后人的印象都是“窝囊”，为人低调，不显山、不露水，却一门出了两任皇帝（其子光绪、其孙宣统），一任摄政王（其子载沣），两个郡王（其子载涛、载洵），在道光诸子中独领风骚。晚清半个多世纪，实际上就是醇亲王家的时代。



这四位王爷，在大清国的政治行情表中，画出了不同的曲线。恭亲王的走势基本是一条下行的阴线，高位开盘，盘中三次剧烈震荡（“三起三伏”），在1884年的甲申易枢后，则直线下跌，从此就深度被套；惇亲王则是中位开盘，中位行走，小有起伏；醇亲王则是中位开盘，持续走高，盘中十分活跃，最终成为大盘的“领头羊”；最有戏剧性的是庆亲王奕劻，低位开盘，急剧拉高，中间甚至连起伏都没有，亮出了一条极为灿烂的阳线。

血统上毫无优势的奕劻，绝对是个另类。他有着恭亲王那样的办事能力，在恭亲王之后实际主持大清外交近30年，并且成为李鸿章、袁世凯等改革者及实力派的政治靠山，在诸如甲午战争、庚子事变、新政改革乃至辛亥革命等重大转折关头，他都是主角之一。

奕劻也有着醇亲王那样的隐忍和低调，他的权力伸展和布局，都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对上级从来都是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之后再想法“遇见红灯绕着走”。作为一个毫无先天资源的旁系宗室，奕劻只能依靠后天的努力，多笼络那些能办事、尤其能办大事的人，以便形成合力。野史传言，光绪驾崩时，有人甚至想拥戴奕劻之子载振，这虽是野叟村言，却也代表部分官心民意。

奕劻更有着惇亲王那般的大智若愚，他或许是这四个王爷中名声最不好的。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著名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也提到他家就是中国官场“集市”（market），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toll）。后世有人称他为大清“首富”，虽未必尽然，但也“虽不中亦不远矣”，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以上的存款。他与军机大臣那桐一道，因特别能贪，而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

这四位王爷，在大清国的政治行情表中，画出了不同的曲线。恭亲王的走势基本是一条下行的阴线，高位开盘，盘中三次剧烈震荡（“三起三伏”），在1884年的甲申易枢后，则直线下跌，从此就深度被套；惇亲王则是中位开盘，中位行走，小有起伏；醇亲王则是中位开盘，持续走高，盘中十分活跃，最终成为大盘的“领头羊”；最有戏剧性的是庆亲王奕劻，低位开盘，急剧拉高，中间甚至连起伏都没有，亮出了一条极为灿烂的阳线。

## 防火墙

四位王爷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学会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尤其在领导面前多反省、多自我批评。这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庆亲王，他的身段最低。当然，因为出身的问题，他也缺乏“强颈”的资本。其次是醇亲王，这位皇帝的本生父，最拿手的就是以柔克刚，绵里藏针，猛声不响发大财。然后是恭亲王，在慈禧太后的不断敲打下，恭亲王从以批评太后为主，转变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之后就

是以自我批评为主。做得最不尽如人意的是醇亲王，他时不时地要和老大们抗上一抗，这与其说他有所图，不如说是他的心态平衡问题，当然，他也不敢真玩，以装疯卖傻为主，留条退路，便于大家一笑了之。

最为低调的庆亲王，属于那种不怕肉麻的主儿，能高举红宝书，高喊万岁，为了巩固地位，啥都能干，也啥都敢干。最令当时的政治观察家及日后的历史学家大跌眼镜的是，这位王爷可算是唯一一个敢于大张旗鼓地贪腐的国家领导人，因此而高调地成为大清国的“首富”之一。晚清两次以反腐败的名义出现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奕劻，而奕劻居然依然屹立不倒。能够做到在这种时候依然雄起，一靠手上的真本事，内政、外交都还算有两把刷子，甚至连与八国联军谈判那么艰难的活儿，都能和李鸿章两人扛下来。在晚清改革的几次反复中，奕劻都是改革者背后最为坚强也最有技巧的支持者，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甚至认为他是“推动中国政府（进步）的一个杠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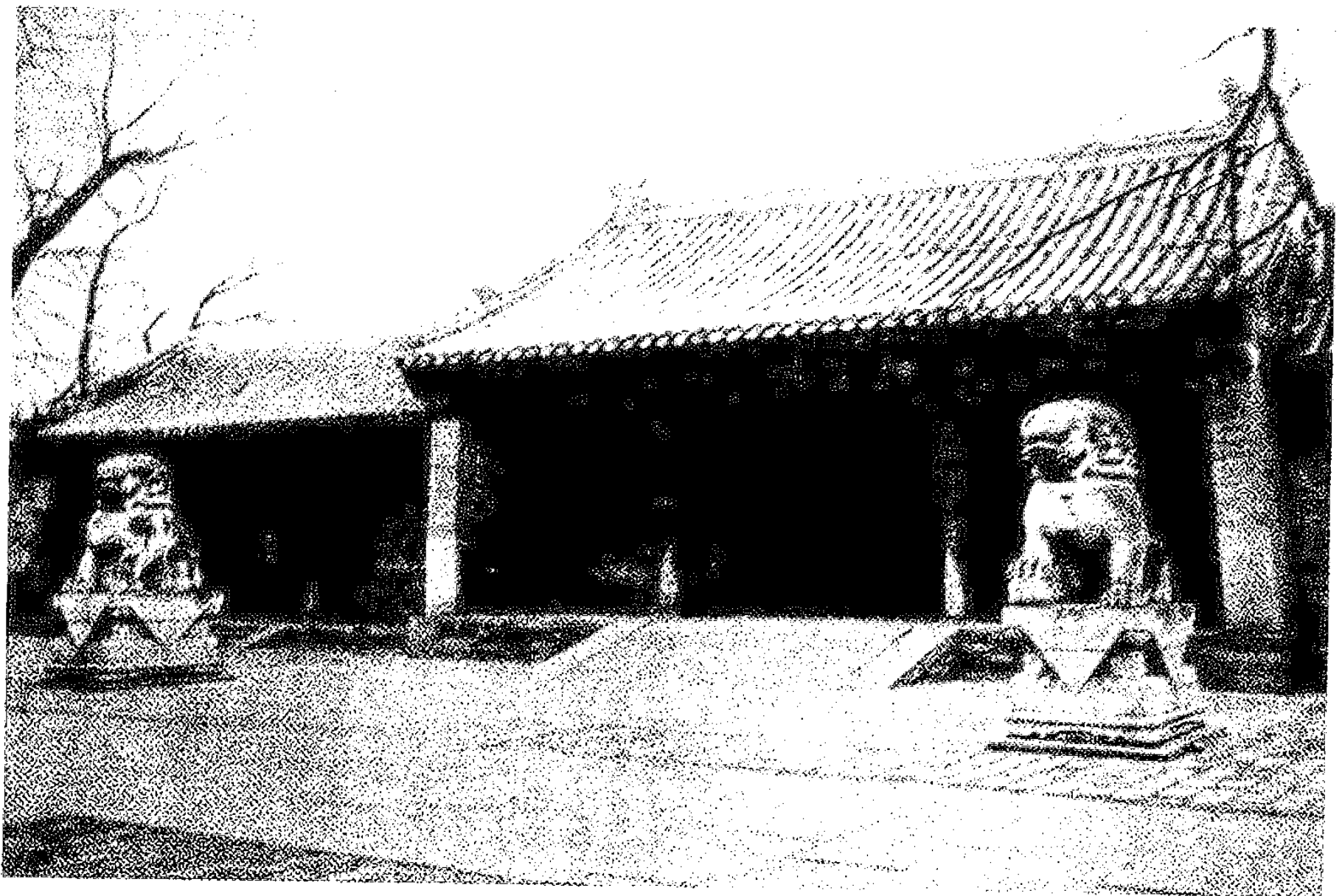
本事之外，当然还得乖巧。恭亲王未必就对官场潜规则陌生，但他的高贵身份、卓越才华以及巨大的影响力，令他可以不屑于这种面子游戏，当然最后又不得不服低做小。奕劻则不仅对官场游戏烂熟于心，而且敢于放下身段，婉转歌喉，亲身实践厚黑学。奕劻心里明镜一般，在低调地展示着自己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的同时，却高调地展示着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表达自己有能力、无理想，以自污而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

这种既能干又安全的干部，显然是大多数的领导们最乐意见到的，而这或许也正是奕劻成为大清政坛上增值最快的绩优股的根本原因？充满牛劲的恭亲王，最终不得不做熊，而装熊的奕劻，最后却成了真正的牛人，也难怪大清官场最后成了一个“熊出没注意”的乐园……

右页上图：阿司门及甬路 根据恭王府的建筑规制，在宫门与倒座房之间的院落里，设置有东西向的阿司门（过道门），供王府人员行走。1950年代为了建办公楼，这些院落中的所有建筑被拆除。

右页下图：恭王府宫门 1912年，一位名叫山中定次郎的日本古董商通过小恭亲王溥伟，掠夺性地购走了一大批恭王府旧存文物，并于1913年分别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公开拍卖，此照片即为拍卖文物图录中的插图。可以看到宫门前有宽敞的院落，立着两只石狮，显得庄重肃穆。（照片来自《纽约1913年AAA恭亲王竞卖》，1913年）







## 第三章 风中芦苇



绿天小隐西侧长廊 在恭王府花园中路滴翠岩顶上，有小轩三间，称为“绿天小隐”。这里是主人与家人或朋友品茶赋诗、对酒当歌的地方。恭亲王奕訢的次子载滢有诗云：“寄身城市间，托兴烟霞外。闲园卧绿天，小隐怡情最。”（陈鸿舜收藏，照片拍摄于1940年前）

---

---

## 风中芦苇

西方人将恭亲王形容为“暴风雨中弯折的芦苇”，他们或许不会完全明白，在风暴中低头，这与其说是芦苇的屈服，不如说是芦苇的生存之道。烈风如刀的任何所在，能蓬勃生长的，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参天大树。

---

---

阳春三月的北京城，却被一场“倒春寒”所笼罩。突如其来的政治批斗，将大清国“总理”、恭亲王奕訢推向了风暴的中心。代行国家元首职能的慈禧太后，坚决要求恭亲王下岗。

这是1865年，距离慈禧与恭亲王戮力同心，一举粉碎以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大臣集团，仅仅过去四个年头。双方把政治盟誓写在了年号“同治”之上，但这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今却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北京，乃至全中国、全世界都被震撼了……

### “同志”难“同治”

这场风波来得似乎有点突然。

这年3月31日，“翰林院编修”兼“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了一道奏折，指控恭亲王奕訢“揽权纳贿，徇私骄盈”。蔡寿祺此时的官职，类似大清中央办公厅的中级干部，兼国家通讯社的高级记者，有撰写“内参”的权力。中国官场上，笔杆子从来就是投枪与匕首，有时甚至比枪杆子还管用。但蔡寿祺居然敢炮轰当朝总理，莫非真是书呆子犯了痰气？

能在高手如林的中央国家机关混到高级笔杆子的级别，蔡寿祺当然有几把刷子。大清官场如赌场，撑死胆大的，憋死胆小的，爱拼才会赢。风险最大、收益也最大的，就是提前买入政治原始股。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只是名义上的代理国家元首，实权都握在恭亲王手中，太后们的确如同乏人问津的冷门股。蔡寿祺逆市操盘的算盘打得并不坏：恭亲王乃当朝显贵，投怀送抱的人早已大排长队，与其锦上添花，不如



“双面”慈禧 有关慈禧的形象，从清末开始就有不同的版本。她的崇拜者们（其中主要是女性，包括很多西方女性），将她描绘成一个慈祥、睿智、果敢的伟大女性。美国女画家 Catherine Karl 入宫数月，她所画的慈禧（左图），成为大清国参加世博会的主要展品，轰动美国。而慈禧的政敌们则将她描绘成一个凶残的老太婆（右图），更多地显露她的冷峻的一面。多面化，本是常人的常态，慈禧也不能例外。

给另一家雪中送炭，烧烧太后的冷灶。何况，如今已经熬过了太平天国的内乱及英法联军的外患，也不怕窝里折腾一下了。

慈禧太后当然明白，权力争夺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蔡寿祺一搭台，慈禧太后赶紧唱戏，并且雷厉风行，两天内就宣布将恭亲王“双开”：“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这一声政治炸雷，果然快得让人不及掩耳。大清官场在省过神来之后，立即反弹，无论王公勋戚，还是文武百官，纷纷请愿，强烈要求挽留大清的好总理恭亲王。各方博弈了一个多月，恭亲王终于在太后面前“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做了违心的自我检讨，深挖思想根源，灵魂深处大闹革命，慈禧则收回成命，归还了这位前政治盟友的几乎所有乌纱帽，但依然去除了“议政王”的头衔。

在一片和谐至上、理解万岁的欢呼声中，这场持续了39天的政治风波平息了。大清政坛终于换了老大，牝鸡司晨的新时代开始了。

### “风暴中的芦苇”

4月18日，风波还在进行当中，《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就发出了报道，将其称为一场“革命”，认为这一事件足以展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某些特性。在详细介绍了风波过程后，《纽约时报》发出疑问：在恭亲王的治理下，统治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保持了稳定，赢得了持续发展和国际信任，内政外交方面日渐理顺，如今风云突变，“新朝代的黎明是否会蒙上朝臣内讧和内政纷争的阴霾呢？”

在提到恭亲王的妥协时，《纽约时报》将其形容为风暴中弯折的芦苇，甚至在风暴尚未来临前就已经屈膝。无独有偶，长驻北京的另一位美国人、38岁的传教士、同文馆教师丁韪良，在其6月1日为《哈泼斯》(Harpers)杂志写的文章中，也将恭亲王形容为暴风雨中弯折的芦苇。这位日后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校长，忧心忡忡地说，“斯巴达曾经在两位国王的共同统治下实现和谐，罗马也曾在两位执政者的共同领导下走向成功”，如今，恭亲王已经被打倒，获得胜利的这两位“教育

绝版

恭親王



右图：美国《哈泼斯》杂志  
1866年所刊登的恭亲王画像。



左页图：北京护城河边的芦苇。很多时候，局外人似乎更能一针见血地看到大清国政治的真谛，比如美国人将恭亲王描绘成风暴中的芦苇。美国人无法真正理解的是，本可成为参天大树的恭亲王，为何最终选择了成为芦苇的命运。

程度低下的女性”，能领导好中国吗？

作为改革与开明的代表，恭亲王的落败被西方普遍解读为大清政治的一次倒退和反动。而在后世中国的主流史学者们眼中，这一风波也成为慈禧太后弄权的一大罪证。恭亲王当然不是蔡寿祺所指控的“权奸”，但平心而论，他毫无疑问地是“权臣”。“君子无罪，怀璧其罪”，整天与最高权力瓜田李下地黏糊在一起，招来嫌疑也几乎是必然的。白居易曾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恭亲王就是大清朝名副其实的“周公”，他的政治命运三起三落，受尽猜忌，其背后原因无非是：在最高权力的卧榻之侧，他发出的鼾声实在太过于响亮了。

西方人或许不会完全明白，在风暴中低头，这与其说是芦苇的屈服，不如说是芦苇的生存之道。烈风如刀的任何所在，能蓬勃生长的，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参天大树。尽管几番沉浮，恭亲王却一直是同治、光绪两个时代最有势力和实力的政治人物，即使退居二线、三线，他的影响力依然在左右着大清的內政外交。那些在日后的史书上远比他更有光彩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无一不是在他的羽翼遮蔽下，才从官场的刀光剑影中幸存下来；而他大力提倡、呼吁并身体力行

的改革，不仅体现在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中，也体现在随后的政治改革（1901~1911年“新政”）中。

恭亲王的“芦苇”个性，也证明了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权力既不是职位，也不是头衔，而是影响力。一介布衣、一个“群众”，只要有足够的影响力，照样能呼风唤雨，甚至左右政局，后世的李鸿章、袁世凯等，也都儿起儿落，却在任何时候都能成为旗帜与方向。

## 被湮没的舵手

当然，芦苇毕竟只是芦苇，而非参天大树。

在这场风波中，本是参天大树、亦有资本可继续成为参天大树的恭亲王，最终选择了成为芦苇的命运。风波持续39天，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颠颠地去做检讨，就足以证明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史料，来还原他当时的心态：是顾全大局还是爱惜羽毛？是厌倦内斗还是害怕对抗？

从此，恭亲王从“同治”公司的缔造者、合伙股东降级成为职业经理人、高级马仔，在慈禧太后的眼中，这是个不能不重用，又不能不控制使用的人才。一个优秀得几乎无懈可击、小心谨慎得无可挑剔的人，这种完美本身就是他最大的缺点。曾经丰采四溢、棱角分明的“鬼子六”，自此甘心自我矮化，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皇座乃至皇座后面的帘子上；在展现超强行政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的同时，展现了萎靡得如同太监般的政治性格，一手硬、一手软，奠定了一个操盘手、一个管家、一个技术型官僚的典型“老二”形象。

小心谨慎的“老二”，依然不能逃脱生前被清洗、身后被注水的命运。由恭亲王倡导、推动并亲自操盘的大清改革，无论深度、广度还是力度，乃至遭遇的阻力，都可谓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从1860年代开始，恭亲王主导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救亡与启蒙、御侮与内治、稳定与发展、效率与公平、扩大执政基础与维护执政地位等；举凡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无一不是在他保驾护航下得以出台、推进；改革的主要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无一不是在他的保驾护航下得以保全、发展。但是，因为现实政争的需要，自1884年“甲申易枢”、恭亲王被逐出权力中心后，他作为“老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就受到长期的、持续的、人为的矮化、淡化及边缘化。



慈禧太后显然更乐于让恭亲王的亲密战友、属下、学生李鸿章，来充当改革的门面，这不仅是因为“李大架子”那一米八的雄伟身高和“看见红灯绕着走”的机智灵便，更因为李鸿章无论获得多么崇高的地位，也还是安全、可控的。

当李鸿章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普遍看做中国改革的旗手时，人们似乎忘记了，在恭亲王指挥的航船上，李鸿章只是一个桨手而已；当后世的人甚至喊出了李鸿章是大清改革的总设计师时，人们的确忘记了，在恭亲王的设计工作室里，李鸿章只是个描图的学徒而已。而进入民国之后，随着整个晚清历史被有意识地妖魔化，恭亲王愈加被忽视了。

恭亲王的宅邸，至今坐落在后海边上。如织的游人中，多是来此瞻仰和珅故居，沾点财气与福气，很少有人关心“慈禧太后的小叔子”。一部有关恭亲王的电视连续剧，虽然有名角压阵，似乎并没受到票房待见，“一生为奴”的标题略显刻薄，倒也还算符合大多数人的观感。

似乎是作为另类导游词，在整修如故的恭王府内，居然在墙壁上还能清晰辨认出斑驳的红色大字标语：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忠实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

恭王府府邸的每一组四合院都有围墙相隔，院落之间不能够随意穿行，墙与墙之间形成了夹道，尤其到了夜间，院门上锁后，夹道更加静谧而幽深。岁月恍惚，当年的“最高指示”在墙上仍清晰可见。



---

---

## “谋杀”同治帝？

恭亲王的性格是绵里藏针的，在阴柔的外表下，却是一种果决，这在其打倒肃顺等“八人帮”及解散阿思本舰队时展露无遗。当他在慈禧身后，高举旗帜、高喊万岁时，慈禧如果真能对他彻底放心，慈禧就不会成其为慈禧了……

---

---

1875年2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和《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同时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极短的报道，正文只有14个英文单词：“来自中国的电讯表明，这个国家的内战将无法避免。”

次日，这两家报纸又在显要位置刊发了一篇报道，称虽然醇亲王之子（即光绪皇帝载湉）已被选为接班人，但同治皇后阿鲁特却身怀有孕，如果她能诞育一位皇子，则帝位之争必将趋于激烈。报道又说，传言皇后已经自尽，但无法得到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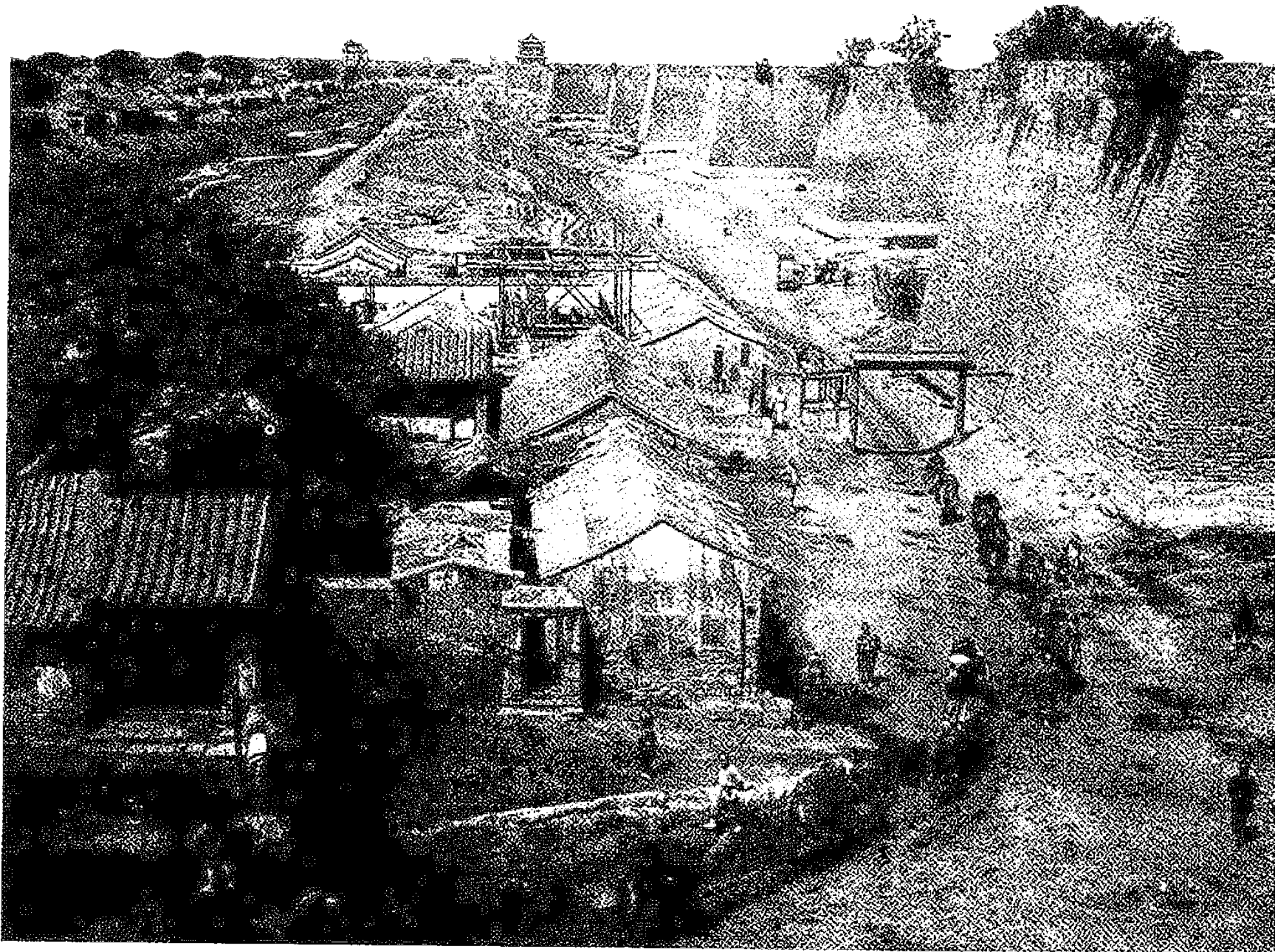
此时，距离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正好一个月，尽管大清国竭力给国民和世界营造一个印象：大清国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越来越好。但在这一大好形势下，西方人似乎并不领情。1月31日，这两家大报的头版上就同样刊登了一则短消息：“传言说，因皇位继承问题，北京已经爆发骚乱。”

有关红墙内阴谋的种种揣测，在西方蔓延。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年43岁的恭亲王奕訢，再度站到了风口浪尖。

### “可怜天子出天花”

同治皇帝的夭折，吸引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无疑是因为中国绝对无可否认的大国（并非强国）地位。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得到同治死亡的消息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与中国》(England and China)的文章。文章认为，同治皇帝统治着3亿多的庞大人口（英德当时的一些地理学家甚至估计当时中国人口在4.5亿~5亿），远远超过大英帝国（包



北京古城墙 北京高大的城墙不仅将城墙内外分割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同时也阻隔了消息的流通。而消息的闭塞恰是流言得以传播的先决条件。

括所有殖民地)的2.8亿人口，两国人口相加，就等于人类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事情，中英两国无可争议地是世界上的最大的国家。

如今，这个与英国一般伟大的国家失去了他们的领袖，世界当然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官方公布同治的死因为天花后，一时之间，天花 (smallpox) 和种痘 (vaccination) 的基本知识就成为西方各报争先报道的内容之一，以满足读者的强烈需求。

除天花之外，有很多非官方的史书，认为同治皇帝少年风流，私生活不够检点，沾染了严重的性病。这些疾病与天花协力，摧毁了这个少年天子。而史家们争论不休的，就是谁该对同治皇帝的放荡负责。在这些责任人中，公认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

慈禧太后被攻击的理由，是因为她过度干预了儿子的房帑秘事。传言她并不喜欢皇后阿鲁特氏，以至于同治皇帝不敢与皇后同房，却也不愿按照慈禧的心意，去临幸她所钟意的慧妃（富察氏），于是，经常独宿养心殿，为了解闷，便开始偷偷溜出宫去寻花问柳。而为了防止被官员们撞上，他还不肯去高级娱乐场所，尽选择那些低档的、官员们不常去的地方，结果沾染了一身的性病。

恭亲王被攻击，则因为正是他儿子载澂，充当了皇帝寻花问柳的伙伴。而恭亲王又以从儿子那里逼问得来的实情，作为向皇帝进谏规劝的砝码，导致与皇帝关系紧张，双方关系搞僵。恭亲王不久便被同治皇帝以“无人臣礼”为由，予以“双开”（取消亲王爵位、撤去一切职务），引发轩然大波。

## 接班人选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同治皇帝终于病倒了。在他病重无法办公的时候，任命了自己的老师李鸿藻代行批答奏章。李鸿藻很谨慎，只敢批示“知道了”、“交该部议”等废话。一周后，在亲王们的请求下，同治皇帝同意，除了汉文奏章让李鸿藻代批外，恭亲王代批满文奏章。慈禧太后则召集军机和御前大臣，发表了重要讲话，谈了一个小时之久，大意就是皇帝如今都无法亲自批阅文件，要大家想想办法。恭亲王带头表示，自然还是要请太后出来掌舵。慈禧指示，“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次日，同治在病榻前召见恭亲王，亲自交办该事，“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并叮嘱恭亲王“照常好生办事”，“语简而厉”。随后，就发布上谕，由太后批阅裁定折件，恭亲王到手才5天的文件审批权，就又消失了。

比文件审批权更重要的，当然是接班人的问题。

同治皇帝死后，有关其接班人的选择乃至争论过程，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而在野史中，却存在许多不同的版本。

说法之一，是当时皇后阿鲁特身怀有孕。果如此，当然必须等待她的临产，如果所生是男孩，继承人问题便迎刃而解；如果所生是女孩，则再另行挑选接班人。史家经常引用的一段“野史”，说是慈禧当时表示：“皇后虽已有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

恭亲王则认为：“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表，如生皇子，自当嗣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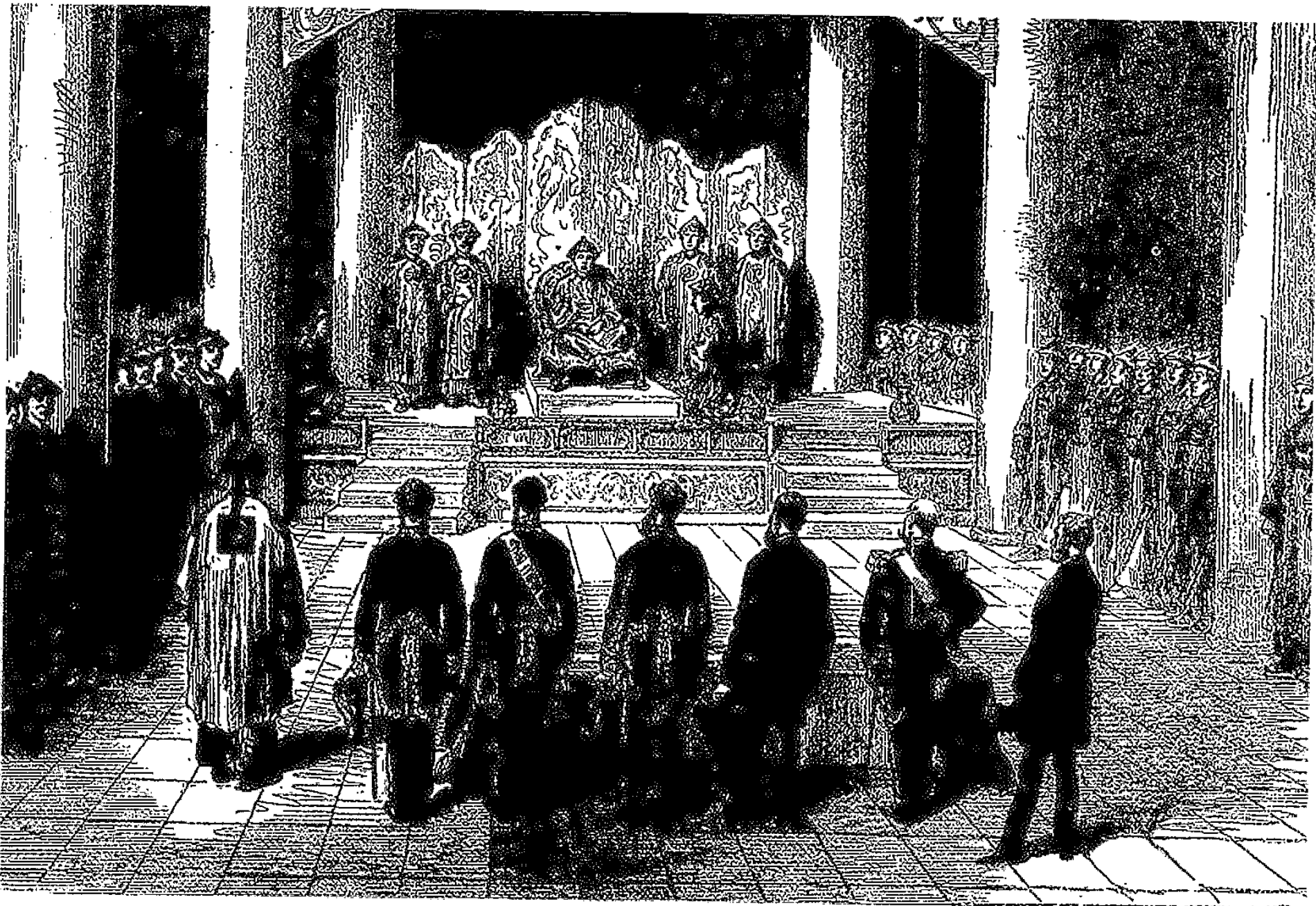
同治皇帝给这个世界留下的，并没有什么好印象，无非一个放荡的少年天子。但按照中国式的习惯，同治皇帝的官方标准像，依然是英俊潇洒和法相庄严的，这与西方雕塑家手下的东亚病夫形象完全不同，只是不知道这位雕塑家的原型来自哪里？莫非是那些摄于鸦片馆的老照片？那倒基本能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形象。

如所生为女，再议立新帝不迟也。”

其他王公大臣也几乎都赞同恭亲王的意见，但慈禧却坚决反对：“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恐致动摇国本。”

这个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段子，其实连野史都称不上，其来自两个英国人写的《慈禧外纪》，而这本初版于1910年、畅销世界数十年的“历史巨著”，已经被无可争辩地确定为“伪书”——一部彻头彻尾的历史小说而已。两位作者创作同治皇后怀孕的灵感，估计就是来自于那与中国御史们一样“风闻报事”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

说法之二，同治皇帝曾想立孚郡王之子、贝勒载澍为接班人。据说同治已经要求其师傅李鸿藻在病榻前起草这一传位诏书。但这一说法同样源自《慈禧外纪》，被国内大量辗转摘引后，添油加醋，最后说是李鸿藻心中害怕，起草完后就到慈禧那里去汇报，慈禧一看大怒，下令给皇帝“尽断医药饮膳”，活活饿死了自己这位亲生



同治皇帝虽然短命，却开创了“中国皇帝接见外宾”的先例，这也令他成为首个被西方人士近距离接触的“天子”。图为同治皇帝接见外交使团的情景。

骨肉、少年天子。

说法之三，是同治皇帝选择了陪伴自己一同去寻花问柳的哥们儿、恭亲王之子载澂。据说，因此之故，当同治皇帝驾崩，慈禧召集领导班子商议接班人大事时，恭亲王居然说了句：“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这一说法，来自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但日后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当时还在老家刻苦攻读迎接高考呢，这当然也是道听途说。

说法之四，则是从下一辈的“溥”字辈选择，这一辈居长的是当时6岁的溥伦（后出任农工商大臣，拥护共和），但溥伦的父亲载治却是从远房过继给隐志郡王奕纬（道光长子，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长兄，早夭）的，不是近支亲室，血统不纯。这说法，同样源自于《慈禧外纪》而被广为转载，极不可靠。

尽管以上说法的来源都相当不靠谱，但也大致列举了当时可能的接班人选。从各方面衡量下来，载湉（光绪）作为接班人的确是相当合适的，尤其在血统上，他

不仅是醇亲王奕譞之子，最纯正的天潢贵胄，而且其生母、醇亲王福晋正是慈禧太后的嫡亲妹妹。也就是说，慈禧太后身兼载湉的伯母和姨妈双重关系，这是其他皇侄们（包括恭亲王的儿子们）所无可比拟的。

## 绝路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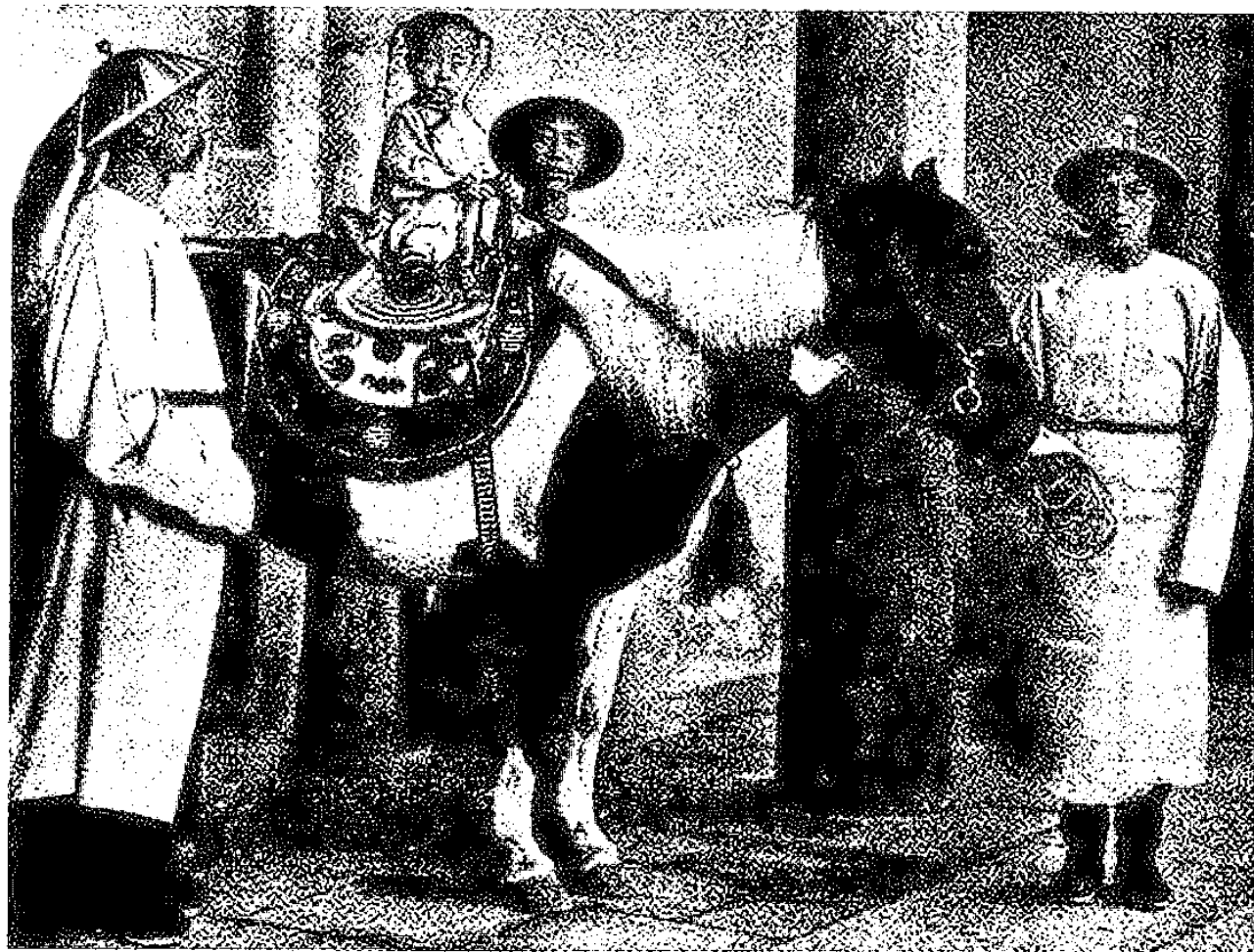
同治皇帝死后不久，皇后阿鲁特便也香消玉殒。

根据官方公布的文件，这位皇后死于悲痛，“毁伤过甚，遂抱沉疴”。官方的评价很高，说她正位中宫后，“淑慎柔嘉，壶仪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悲痛是可以想见的，但一个 21 岁的健康的年轻女子，会因悲痛过度而死亡，则是比较离奇的。也无怪乎后来野史中出现很多段子，来试图重新阐释阿鲁特的离奇死亡。

以《纽约时报》等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乐于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解读皇后之死，而其立足点就是皇后其时身怀有孕，慈禧为了一己的权欲，居然连亲生的孙子（或孙女）都不顾，迫害皇后致死。这种说法，在《慈禧外纪》出版后，经多方辗转摘引，几乎成了一种定论与共识，尽管其毫无史料支持。

中国本土产的野史，在更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婆媳是天敌”之外，也将焦点聚集在权力斗争上：阿鲁特皇后将是慈禧太后干预政治的竞争对手之一。各种段子综合

小王爷载湉是醇亲王奕譞的次子，后成为光绪皇帝。图为光绪 3 岁时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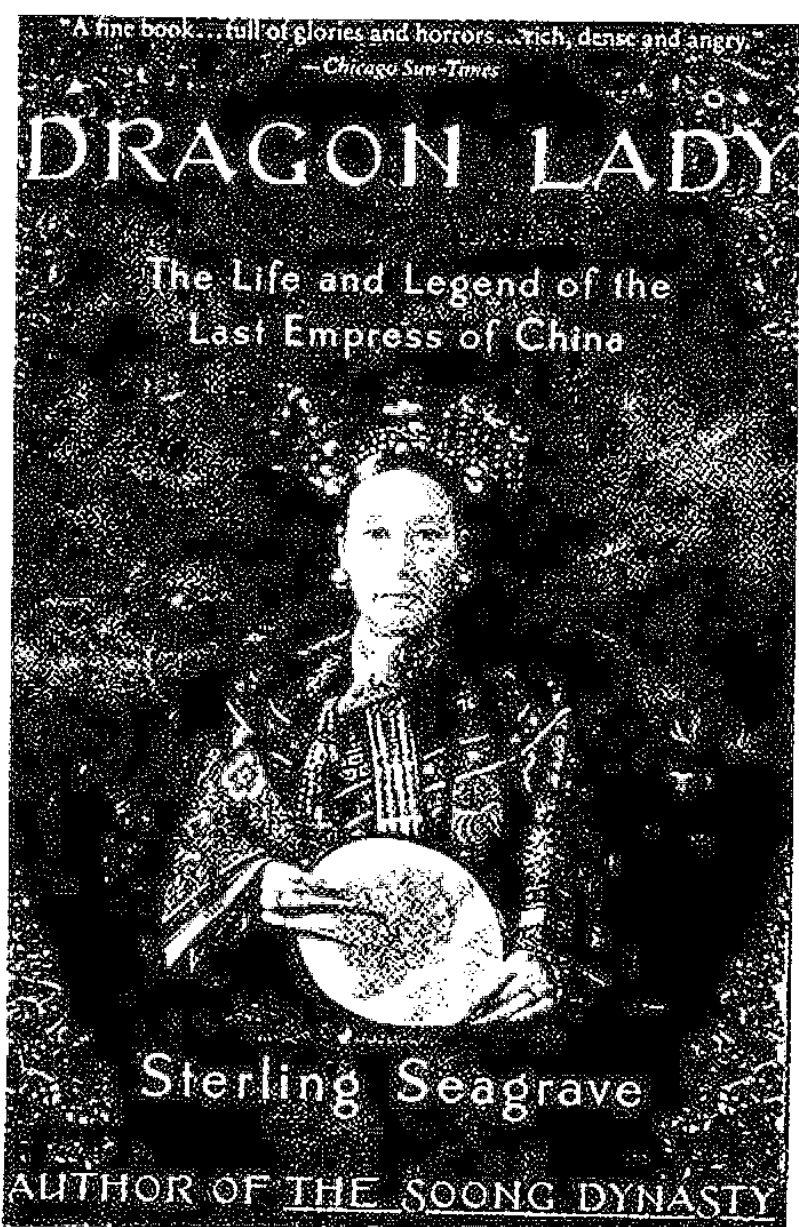
起来看，基本说的是同治死后，慈禧便有逼死皇后的打算，逐渐断绝了她的饮食供应，皇后无奈，写信给娘家，其父回信只有四字“皇后圣明”。皇后知道娘家也没办法了，只好自杀身亡。关于她的自杀，有说是吞金，有说是绝食。

当后世将所有的指责都指向慈禧时，一个美国学者却发出了惊人之语：所有这些都是恭亲王的阴谋。

## 凶手就是恭亲王？

美国学者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那本极为畅销的慈禧传记《龙夫人》（Dragon Lady）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说同治皇帝、皇后、荣安公主的一连串离奇死亡背后有阴谋的话，那最大嫌疑人不是慈禧，而是恭亲王。

西格雷夫首先排除了慈禧太后“作案的动机”：无论如何，阿鲁特能够成为同治的皇后，必定是经过慈禧的首肯；而自己的孙子（如果阿鲁特真怀孕的话）能继位，对慈禧的地位不仅没有伤害，而且还将“给她在下一代中的安全提供保证”。其实，西格雷夫没有提到，作为太皇太后，并不必然丧失自己的权力，清代初期的孝庄太后，



美国学者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龙夫人》（Dragon Lady）一书中认为，在同治皇帝、皇后、荣安公主的一连串离奇死亡背后，如果有阴谋的话，那最大嫌疑人不是慈禧，而是恭亲王。

右图：恭亲王的性格是绵里藏针的，在阴柔的外表下，却是一种果决，这在其打倒肃顺等“八人帮”及解散阿思本舰队时展露无遗。当他在慈禧身后，高举旗帜、高喊万岁时，慈禧如果真能对他彻底放心，慈禧就不会成其为慈禧了……



就是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在其孙子康熙皇帝的早期，成为执掌实权的摄政者，而不是康熙的生母。太皇太后摄政的难度，并不比皇太后摄政的难度高多少，两者都是同样的权宜之计而已，关键在于政治力量的平衡。

西格雷夫还引用了一个此前没被人关注的细节：就在这一连串死亡发生的时候，慈禧本人也身染重病，并且蔓延了8年之久。加拿大华裔学者邝兆江（Luke S. K. Kwong）在其由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著作《百日维新的碎片》（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中，考证了慈禧太后一直患有严重的肝病。而在1875年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地说：“（慈禧）太后，两位摄政者中更有权势的一位，也病得很厉害……数月以来，（慈禧）病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街头百姓中每天都有人预期她会死掉，甚至有好几次谣传她已经死了。”

据此，西格雷夫问道：“到底是谁给慈禧所有的直系家庭成员下了毒呢？恭亲王毫无疑问有最强烈的动机，但他并不会弄脏自己的双手。如果真的有必要下狠手的话，自有李鸿章这把老练的解剖刀替他完成这项秘密的外科手术。”而他认为，恭亲王的动机在于，“同治已经给亲王带来了十年的麻烦和阻碍，恭亲王的恼怒可能转嫁到了慈禧头上，怪她没有对儿子采取强硬手段，因而牵涉到了亲王自己的利益……无论

是谁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总归是有人决心要干掉同治，还有他的皇后、他的母亲和他的异母姐姐，就好像是为下一拨食客匆匆打扫宴会的餐桌”。

恭亲王的性格是绵里藏针的，在阴柔的外表下，却是一种果决，这在其打倒肃顺等“八人帮”及解散阿思本舰队时展露无遗。当他在慈禧身后，高举旗帜、高喊万岁时，慈禧如果真能对他彻底放心，慈禧就不会成其为慈禧了……



---

---

## 中南海的脐带

政治的土壤也要靠“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吗？权力绝对需要生物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播种，放下清高与孤傲，寻找合适的土地，燃烧激情，生根、开花……

---

---

年年端午，今又端午。

端午纪念屈原，本就是个伤怀的日子，而在这个端午的前一天（1876年5月27日），恭亲王奕訢最亲密的助手文祥告别了人世，享年58岁。

老友新逝，43岁的恭亲王赋诗一首，悲歌道：“从今别有盈杯泪，不向湘江哭屈平。”

案桌上，雄黄酒正散发着苦涩，而哪一杯雄黄酒，能为大清国辟邪呢？

### 君子不党

如果说，大清国改革开放的主心骨是恭亲王，那恭亲王的主心骨就是文祥。

这位主心骨中的主心骨，在恭亲王成为大清中央核心之前，就已经是咸丰皇帝麾下的重要干部。1858年他跻身政治局候补委员（“军机大臣行走”），次年扶正（“军机大臣”），进入了国家最高决策层。英法联军来犯，咸丰皇帝逃离京城，文祥奉命留下，出任首都卫戍部队代理司令官（“署步军统领”），“从恭亲王奕訢议和，出入敌营”，配合恭亲王与英法的外交谈判。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与恭亲王及恭亲王的岳父桂良等结下深厚情谊。在恭亲王与慈禧密谋发动政变，打倒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时，文祥成为恭亲王的主要谋士。在热河及北京的政变方的密信来往中（“热河密札”），文祥是密札的主要读者之一。辛酉政变后，两宫太后及恭亲王组成了“叔嫂共和”体制，恭亲王成为中央日常工作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文祥作为他的主要助手，是恭亲王的改革开放在中央的主要执行者，与在地方的主要执行者李鸿章等遥相呼应。

文祥 (1818 ~ 1876)，晚清洋务派大臣。1860年，英法联军攻逼北京，咸丰皇帝出走热河时，命署步军统领，随恭亲王奕訢留北京与英法议和。次年，与奕訢及大学士桂良等联名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被任为总理衙门大臣。任职期间，倡导洋务“新政”，成为晚清中央政府中著名的洋务派首领之一。1876年病死，谥“文忠”。



文祥在海内外的威望都很高。梁启超曾认为，1860年代是“文祥和沈桂芬（恭亲王的另一得力助手）的时代”。蒋廷黻则称其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盛赞其“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将其视为与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并列的“五个大领袖”。

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 (Frederick Bruce) 说，从未遇见过比文祥更聪明的人。大清国的洋干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则对文祥有着更高的评价：“他影响之大，同时代的中国政治家中无人可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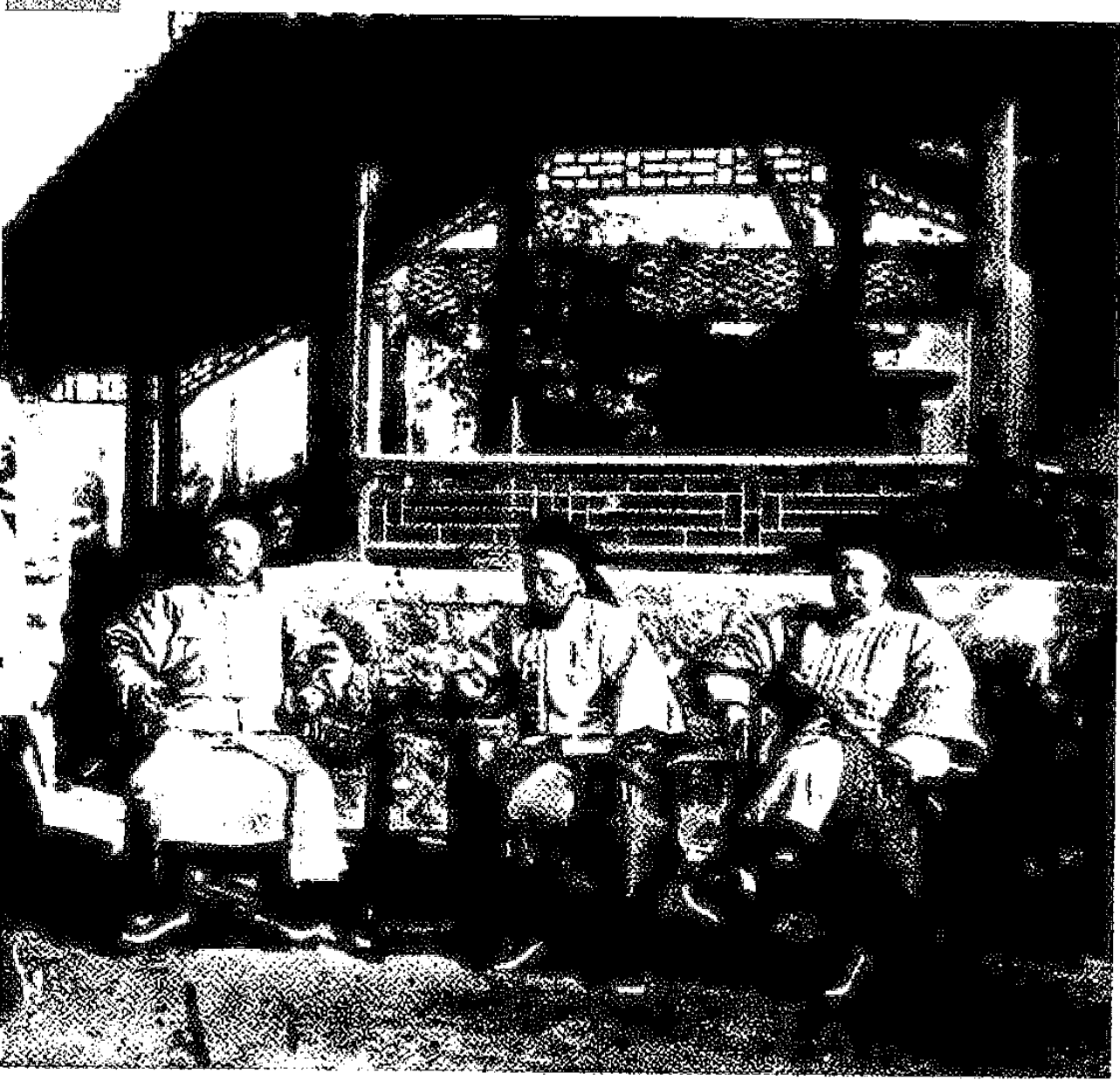
更为难得的是，在几乎无官不贪的大清国，文祥的清廉令中外侧目。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 (William Henry Seward) 访问大清时，曾想到文祥家中拜访，要见一见这位运筹长城以内、决胜大洋彼岸的世界级政治家，却遭到了文祥的婉拒。他回信说“寒舍凋敝，不宜接待贵宾”，而亲自到美国公使馆拜访。“寒舍凋敝”还真非虚词，虽贵为国家领导人之一，文祥居然还住在租来的房子，“每月房租仅四块半，不会多

么堂皇”（丁韪良记载）。

丁韪良坚信：“只要他活着，总理衙门的全部动力都来自于他。他智勇双全，如能活得更长久，他肯定会竭力反对法国人侵吞东京（Tonquin，即越南北部的北圻）……总之，产生了文祥和宝鋆（恭亲王另一助手）的种族绝不虚弱。”文祥去世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的文告中，盛赞文祥“外交内治，无不尽心筹划，实为股肱心膂之臣”，这可说是中央对其的盖棺论定。

吊诡的是，尽管海内外无不将文祥视为恭亲王的亲密助手，却并不认为他们是小团伙，丁韪良甚至质疑：如果文祥还活着，“他究竟会阻止恭亲王下台，还是加速其进程，造成更大的灾难？”可以说，文祥所效忠的，并非恭亲王本人，而是这个政权、这个国家。

不仅文祥如此，恭亲王团队中的几乎所有人都如此，这些当时中国最有能力、又最了解世界的顶尖干部们，并未如他人那样结成一个“恭党”。在大清国开始改革开放，直到辛亥覆灭的半个多世纪，所谓保守派、清流派等，都是门户清晰、壁垒森严、党同伐异，唯独以恭亲王为开端和代表的改革者，却并不成派。



## 裙带 vs 脐带

君子群而不党，如果非得要说有个“恭党”，那其实就是个“干活党”。这样松散的“党”，其工作“战斗力”超强，而应对内部政争则基本采取太极手法。在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为不同核心的政争中，“群而不党”的恭亲王总是要落败下风。

婚姻是编织政治蛛网的关键，在这方面，恭亲王这只蜘蛛似乎远不如慈禧太后勤快。唯一能被称作恭亲王靠山的，或许就是他的岳父桂良。

16岁那年（1848年），在父皇道光皇帝亲自指婚下，奕訢（日后的恭亲王）迎娶桂良之女，作为自己的嫡福晋（即正妻）。此时，63岁的老干部桂良已从云贵总督的任上调回京师快一年了，不仅担任镶红旗汉军都统、兵部尚书等要职，而且代理镶黄旗蒙古都统，是掌握枪杆子的中央实权派。之前，道光皇帝为其四子，即日后的咸丰皇帝所选的岳家，则是地位、名望及权势远不及桂良的太常寺少卿富泰。时人及后人一般都认为，这是当时道光皇帝属意奕訢作为接班人的又一例证。

没有任何史料记载，成亲后的奕訢，如何得到了岳父桂良的精心教导。多年后，奕訢以27岁的年龄承担起救国重担，甫一亮相就在国际国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

左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们，从左到右依次为：成林、文祥、宝鋆，沈桂芬、童 显、毛昶熙。

右图：岳父桂良是恭亲王在政治上的导师，桂良本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转变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从之前的主战派，转而主持和谈，他提前完成了这个帝国的高级干部们最后都不得不完成的睁眼看世界的任务。图为美国1870年《哈泼斯》杂志上的桂良像。



KWEILIANG, FIRST COMMISSIONER.



游刃有余。考虑到清代皇子不得结交大臣的严格规定，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只有岳父桂良才可能是年轻恭亲王的政治教父。

1860年，在英法联军的炮声中，奕訢临危受命，负责与英法谈判，桂良与文祥等，都是在他身边保驾护航的重臣，也是大清中央老中青不同年龄干部“传、帮、带”的经典组合。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败方，桂良却在本次谈判中，以自己的睿智和气质折服了敌人。英国人俄理范（Laurence Oliphant）在1858年曾陪同额尔金在天津与桂良会谈，他日后回忆说：“桂良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平静而慈祥，充满智慧，虽然艰难的处境令他眼神黯淡。他的姿态优雅而高贵，是一个十足的绅士。”这些当然会对恭亲王产生重大影响，并为其形成日后绵里藏针的外交风范打下基础。

辛酉政变中，恭亲王与两宫太后都是不到30岁的青年，而对手则是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政治经验十分丰富。桂良、文祥等政坛老手兼高手，正是指点和策划叔嫂同盟对抗“八人帮”的军师。政变后，桂良被提拔为军机大臣，正式迈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却旋即逝世，令恭亲王痛失臂膀。

自此之后，恭亲王便不再有来自血缘或姻亲方面的无条件的支持者。他自己的兄弟，如五哥惇亲王奕詝、七弟醇亲王奕譞，各有自己的算盘，无法倚靠。而贵族



上页左图：恭亲王长子载澂，俗称澂贝勒。



上页右图：这个相貌实在并不出众的老太太，就是恭亲王长女荣寿公主。她年少时深得慈禧喜爱，被破格晋封为品级最高的、相当于亲王的固伦公主，有“粉侯”之称。终其一生，都与慈禧保持了极为融洽的“母女”关系，并且与光绪皇帝相处得十分友好。

右上图：恭亲王次子载滢及其长子溥伟。载滢的另两个儿子分别是溥儒和溥德。



左上图：溥伟，恭亲王奕訢之孙，后过继给载澂为嗣子。奕訢病逝后，由其承袭王爵。

右下图：溥儒，恭亲王奕訢之孙，载滢次子，中国著名书画家，与张大千并称为“南张北溥”，也是恭王府的最后一位主人。

之间最为常见的结亲，也没有为恭亲王带来多大的政治资源。他的儿女或者早夭，或者婚姻不幸。

恭亲王的长女荣寿公主深得慈禧喜爱，几乎当做亲女一般。亲王之女本只能封为郡主，而她却被破格晋封为品级最高的、相当于亲王的固伦公主。作为大清国“第一女儿”，荣寿公主年少时相当跋扈，有“粉侯”之称。尽管在恭亲王与慈禧的权争中，荣寿公主曾经受过一些影响，但终其一生，都与慈禧保持了极为融洽的“母女”关系，并且与光绪皇帝相处得十分友好。

恭亲王最为看好的长子载澂，天资聪颖，文武双全，像极了父亲，但却放浪不羁，经常带着同治皇帝流连于京城各种地下娱乐场所。而且，因担心被官员们碰见，还不敢去高级场所。兄弟俩因此沾染了一身的风流病症，双双早夭。同治皇帝死在载澂之前，据说还曾想过把皇位传给这位一道眠花宿柳的堂兄弟，在前往出席讨论接班人的中央会议时，恭亲王居然说了句：“我要回避，不能上去。”很是出了一回丑。载澂一死，加上次子载滢早已过继给八弟钟郡王奕詝，恭亲王几乎断后。多亏慈禧太后下令，将载滢的长子溥伟过继回来，作为载澂的儿子，才算接上了香火。

在那个时代，生育力就是核心竞争力，先有“脐带”关系，才能带来更多的“裙带”关系，恭亲王的核心竞争力如此不济，令其政治影响力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其似乎巍峨的权力大厦，无非是个豆腐渣工程。日后的袁世凯，虽然短寿，却在这方面颇下工夫，生育力超强，以“脐带”带动“裙带”，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官”系网，受益匪浅。

## 太后太厚

与身后凋零的恭亲王相比，生育力同样不济的慈禧太后，却显露出了更为深厚的政治功底：她通过插手娘家亲戚的婚姻安排，及一连串复杂的继嗣安排，结成了一个牢固的网络。

首先，她将自己的亲妹子嫁给了咸丰及恭亲王的七弟醇亲王奕譞，成功地将醇亲王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相当有远见的布局，同治死后，就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慈禧太后还力排众议，将自己的亲外甥、醇亲王之子载湉过继为咸丰之子，即光绪皇帝，保证了皇座上依然流淌着叶赫那拉的血脉。



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则适时地提供了最佳的政治作品：三个女儿，这等于是给慈禧太后提供了三次整合政治资源的好机会。

在她亲自做主下，桂祥的长女叶赫那拉·静荣，嫁给了镇国公载泽。载泽是满族亲贵中的人才，眼光远大，思路清晰，日后率团出访欧美考察政治体制，成为大清第二轮改革开放的旗手之一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推动者。

桂祥的二女儿叶赫那拉·静芬则成了光绪皇帝的皇后，表兄妹亲上加亲，只是此女实在太过丑陋，光绪皇帝对她敬而远之。这就是日后著名的隆裕太后。

桂祥的三女儿叶赫那拉·静芳，则由慈禧做主，许配给了醇亲王奕詝的次子载漪作为福晋。不久，慈禧就下令载漪过继给刚刚去世且无子嗣的瑞郡王奕志，袭了爵位，这就是日后名震中外的“端郡王”。静芳之子溥儀，还曾被选为“大阿哥”，作为光绪的接班人。

光绪死后，慈禧选择了溥儀作为接班人，溥儀的父亲载洵虽由醇亲王奕詝的侧福晋所生，却从小由嫡母、慈禧太后的妹妹亲自抚养，而且，载洵的婚事也是慈禧亲自指定的，娶的是荣禄之女，此女与恭亲王女儿荣寿公主一样，也因慈禧养女的身份而成为一代“粉侯”。

如此亲上加亲，枝蔓瓜葛，形成了“阀阅世家，连渊贵胄”。大清国晚期半个多世纪，女人当国，牝鸡司晨，虽然不符合体制，也不符合礼制，却并没有遭遇激烈的抵抗，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这种政权实质上是“叔嫂共和，一国两制”，太后垂帘作为国家元首，而亲王辅政，真正执掌中枢；二、慈禧太后本身有能力、有魄力，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知道自己权力的适当边界在哪里；三、慈禧太后以“脐带—裙带”为纽带，结成了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虽谈不上肝胆相照，但绝对是荣辱与共。

据说，恭亲王曾经感慨，大清国终究要亡于方家园（慈禧太后娘家故居）。记载此事的王照，是操切的戊戌变法的参与者，其抹黑宣传的能力丝毫不亚于梁启超，可信度极低。

在一个讲究门第、世系、关系的社会中，读书人尚且一边饱读圣贤书，一边使劲通过同学、师生的关系结为利益团体，恭亲王的土地上却是一片荒芜，禾苗没有茁壮生长。他莫非不知，政治的土壤也要靠“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吗？权力绝对需要生物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播种，放下清高与孤傲，寻找合适的土地，燃烧激情，生根、开花……

---

---

## 紫禁城的平衡木

体操中的平衡木，没有男子项目，原因据说很简单，如果摔落后正好跨坐其上，会导致致命危险。政治体操中的平衡木也如此，“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才能杜绝“鸡飞蛋打”的危险，除非你不玩。

---

---

1884年5月2日，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发出了一篇震撼性的报道：“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这篇报道回顾了这位中国总理“两起三落”（他的第三“起”要等到十年后的甲午战争才会来到）的政治生涯，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并且拿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来做陪衬。据说，每当西华德谈起中美关系，为了强调自己的权威性，最爱将恭亲王挂在嘴边：“恭亲王与我共同认为……”

这篇长达近千单词的报道，代表了当时美国及国际社会对恭亲王的主流评价，但其核心内容却大摆乌龙。因为52岁的恭亲王还好好地活着，在他那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的王府中，正荡起双桨，推开波浪，看着阳光洒在湖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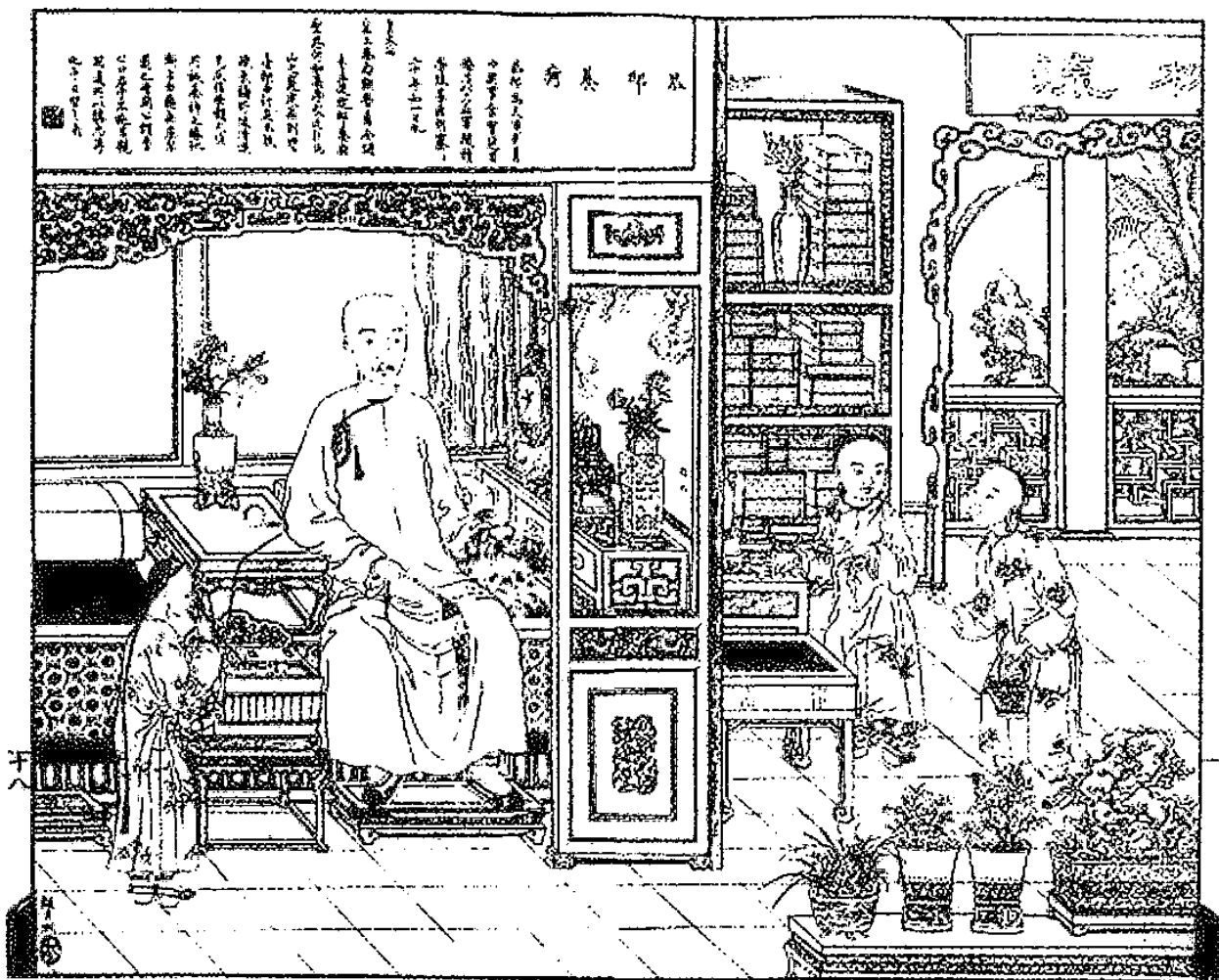
但无风不起浪，恭亲王的确在20多天前（4月8日）被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

### 不品杯酒释兵权

引发恭亲王下岗的直接导火线，是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在4月3日上的道奏折，从题目就能看出其鲜明的立场：《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议》。此时，中法战争已经爆发，清军在越南北圻丧师失地，朝野震惊。盛昱奏折中的攻击目标是政治局委员兼中组部部长（“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李鸿藻，正是他推荐任命了前敌将领，但是，恭亲王作为首席军机大臣，不能不承担领导责任。盛昱的本意，在于敲打敲打军机处，推动善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但是，5天后，慈禧太后的批复令众人大吃一惊：军机处全体下岗。

这一天，慈禧太后反常地没有召见军机大臣，而只是召见了军机处的“秘书长”（领班军机章京），按照她的思路拟定了圣旨，指责恭亲王等军机大臣“委蛇保荣”，



恭邸养病图 原载于当年《点石斋画报》。起居注官盛昱上书朝廷，指责以奕訢为首的军机处用人不当，使清军在广西、越南的中法冲突中坐误时机，要求将负有责任的军机大臣予以惩治。慈禧太后立即借此把奕訢等人逐出军机处，开去奕訢一切差使。奕訢被迫交权，以养病的名义赋闲在家。

地位越来越高，却越来越不思进取（“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簞簞不伤，或谓昧于知人”。处理结果是，恭亲王奕訢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原品休致；李鸿藻、景廉降二级调用；翁同龢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

同一天，慈禧太后宣布组建由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组成的新的军机处，随后又宣布“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至此，以醇亲王奕譞为首的新的行政核心组成。

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在主流史家眼中，“甲申易枢”普遍被看做是慈禧太后抢班夺权的“疑似政变”，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反动”势力向以恭亲王为首的改革派们的反攻倒算。利用中法战争的失利，慈禧太后甚至不用一杯酒，就成功地解除了恭亲王的权力，至于李鸿藻等人，则成了陪衬而已。

### 琐屑的总理

甲申易枢当然有极为浓烈的权争色彩，但在慈禧太后“夺权”之外，恭亲王也的确在此前暴露出了极大的破绽。



恭王府花园有一座由许多带有孔穴、成蜂窝状的珍贵太湖石叠加而成的假山，这里是花园的中心和制高点，被称为“大主山”，载滢诗中称其为“滴翠岩”。

根据当时的末班军机大臣、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日记记载，3月30日，慈禧太后召集紧急会议，讨论越南军情。当天，军机处已接到电报，得知北宁、谅江已失守。会议上，恭亲王却大谈当年十月为慈禧祝寿进献之事，“极琐屑不得体”。慈禧太后终不耐烦，表示说早已决定不为生日搞什么“进献”了，何必请旨呢，“且边事如此，尚顾此耶？”但恭亲王“犹刺刺不休，竟跪至六刻（一个半小时），几不能起”。第二天的会议还是如此，还增加了一个惇亲王奕訢（恭亲王的五哥），两位王爷兄弟“所对皆俗语，总求赏收礼物”，慈禧太后的话就开始说得重了：“心好则可对天，不在此末节以为忠心。”翁同龢看不下去，只好“越次”发言，劝两位亲王“宜遵圣谕，勿再琐屑”，总算给大家找了个台阶，“两王叩头，匆匆退出”。翁同龢则在当天日记里感慨说：“天潢贵胄，亲藩重臣，识量如此！”

翁同龢的日记，虽然经过他日后不断地修正调整，但基本事实的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吊诡之处在于，此前在处理一系列内政外交中杀伐果断的恭亲王，何以此时变得如此琐屑？年龄上，他此时才50岁出头，作为国家领导人，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虽然从1883年开始他休了一年的病假，但已经病愈；经验上，从20多年前临危受命，



与兵临城下的英法联军谈判开始，他长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清国上下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比他更能驾驭复杂的局势。所以看来只有一种合理解释：恭亲王的变化，非自主也，实无奈也。

8年前（1876年），恭亲王的得力助手文祥病逝后，慈禧太后将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安插进了总理衙门。李鸿藻是倭仁一类的人物，能唱出调门很高的政治高音，但基本不干事，只管挑刺，做监工。毫无疑问，这种组织措施上的“掺沙子”，就是为了防止恭亲王在这个几乎等于“国务院”的衙门中尾大不掉。曾经团结一心的总理衙门，从此派系林立，只在表面上维持着一团和睦。在这之后，无论军事、经济、人才建设等任何改革，都无不遭遇重重阻力，打横炮的，使绊子的，弄得恭亲王也心灰意冷。1882年他因病离职，病是真的，但身病的根源仍是心病。病愈后返回工作岗位，又碰上了中法在越南对峙。以李鸿藻等为首的“清议派”虽高喊主战，但实际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们的背后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这位王爷此时也政治春情萌发，希望能贡献力量了。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务实派，则认为此时最好还是避免战争，以外交手段为主，韬光养晦，夹紧尾巴，先把国内建设搞上去，厚殖国力。了解家底的恭亲王是倾向于韬光养晦的，但却架不住主战派的道德攻势，十分为难。同样的，作为最后拍板者的慈禧太后，也左右为难、上下摇摆。显然，

无论战还是和都有风险，而无论出现任何风险，其责任当然不能由太后来承担，恭亲王就是那个注定要做“检讨”的冤大头，这是他的角色注定了的“台词”。而在“战无可胜”的情况下，本就不主张冒险一战的恭亲王，选择以婆婆妈妈的琐屑来主动获咎，是给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台阶。

盛昱弹劾军机处的奏折，被慈禧太后足足压了5天。收到奏折的次日，正是清明节，慈禧太后将恭亲王打发出京，随后多次秘密召见了光绪的生父醇亲王，确定了中央新的领导班子。以恭亲王20多年执掌最高权力所形成的触角，他必然也能及时掌握这些异动情报。如果说甲申易枢是慈禧太后发动的不流血政变，那恭亲王绝对是心照不宣，并且默契配合地“被政变”了，一个愿打，一个也愿挨。

“政变”后，时人嘲讽新的领导班子比老班子无能，写了一副后世传诵的对联：

易中枢以驽马

代芦服以柴胡

但包括西方记者在内，有多少慷慨激昂的人理解高层政治中的无奈？

### 平衡木上骑毛驴

恭亲王在中法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无奈、无力和无能，并不是第一次。与他相熟的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校长丁韪良就说：“总理衙门这台机器是根据测微螺旋的原理制造的，将震动最小化，但并不促进问题的解决。”这并非“机器”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定位问题。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早已证明，一个执政者，尤其是改革者，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威资源作保障，他的改革是难以推进的。而恭亲王所能掌握的权威资源，并非完全自主，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取决于他和慈禧太后之间的权力平衡。大权旁落，除了作为减震器外，还能做什么呢？

在整个大清国的权力架构中，随着恭亲王地位的不断下降，他日益成为一个大管家，平衡着上、下，平衡着左、右，平衡着“抓革命”与“促生产”。另一个近距离观察紫禁城政治的美国传教士学者明恩溥（Arthur H. Smith），就将恭亲王形容为“朝廷统治机器的重要的平衡轮”。这种“平衡轮”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在失去后才体现出来。当1898年恭亲王去世后，大清国果然失去了平衡，先是向右急转弯（“戊戌

变法”)，期间那位被恭亲王称为“广东小人”的康有为暴得大名，然后是向左急转弯(“戊戌政变”及义和团)，国家元气被折腾殆尽。

对于大清改革的艰难，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看得很清楚。恭亲王去世3年之后，在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他为英国《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撰写了一篇名为《中国、改革和列强》(China, Reform and the Powers)的著名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一个毛驴的寓言：

老人和男孩牵着毛驴去赶集，路上碰到一个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教导他们说让驴跟着走而不利用实在是一种浪费，于是老人骑上了驴。另一个鼓吹儿童权益的改革者，却斥责老人怎么忍心让孩子在一边跟着毛驴跑，于是，换了孩子骑驴。第三个改革者责怪健康的孩子，岂能让患有风湿病的爷爷踉跄步行，于是，一老一小同时骑驴。这时动物保护协会的人不答应了，大声斥责他们，告诉他们最适当的方式就是牵着驴走。最后，老人、孩子和毛驴都掉到深沟里，而各位出主意的改革者们，只能站在沟边束手无策。

赫德的结论是，不要对中国的改革横加指责，“人们最熟悉的可能仅仅是自己所在的那个领域”而已。

而恭亲王的艰难之处，不仅在于很多人对是否骑毛驴、如何骑毛驴七嘴八舌，而且，日渐丧失权力的他，还只能在狭窄的平衡木上骑毛驴。体操中的平衡木，没有男子项目，原因据说很简单，如果摔落后正好跨坐其上，会导致致命危险。政治体操中的平衡木也如此，“欲练神功，必先自宫”，才能杜绝“鸡飞蛋打”的危险，除非你不玩。因此，包括恭亲王在内，作为权力排行榜上的“老二”，中国历史上的“总理”们，总是不得不告别阳刚，走向阴柔；只关心问题，不关心主义(或假装不关心)；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或假装不抬头)，并且在任何必须向老大低头的场合，主动地、深刻地检讨自责，从而即使在暴政、庸政泛滥的年代，也能离奇地建立起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操劳、亲切、忍耐、值得无限回忆的好管家形象。

中国宰相，其职责就是“调和鼎鼐”，做好政治大厨。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当所有的烹饪用油都已经是被深度污染而后“漂白”的“地沟油”时，大厨所能做的，也就只能是尽量将饭菜做得可口些，当毒性发作时，口舌至少还能享受到致命的快感……

---

---

## 周公之死

权力等级上“老二”的忠诚与否，只能到撒手人寰的最后时刻才能真正得出结论，慈禧给予恭亲王的谥号为“忠”，绝非对过程的描述，而是对结局的概括。

---

---

1898年5月29日，农历四月初十。

大清中央向全国干部群众沉痛宣布：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大清王朝战士，努尔哈赤、皇太极等的优秀儿子，大清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重要旗手，长期担任大清“总理”并受封为世袭罔替恭亲王爵位的爱新觉罗·奕訢，因病医治无效，已于本日与世长辞，享年65岁（虚龄67）。

在恭亲王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亲自到恭王府探望病情，并以其他方式表达对恭亲王健康的关注。

### 平衡轮停摆了

国际社会也对恭亲王之死表示了高度的关注。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则在其著作《动乱中的中国》（China in a Convulsion）中认为，恭亲王的逝世，令中国这架“错综复杂的政府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轮”。大清国的洋干部、美国人马士（H. B. Morse）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中，认为：“一般人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泰晤士报》（Times）驻华记者濮兰德（J. O. P. Bland）认为“恭亲王的死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果他还活着，或许不会有义和团乱事”，这是1900年义和团—八国联军动乱后，西方人的普遍观感。

对于恭亲王的地位，美国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曾在恭亲王最后一次复出时（1894年），有过精彩的论述。何天爵认为，只有恭亲王才能“为帝国政策带来改观和进步”。他认为，恭亲王是精通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将外交对手





恭亲王奕訢遗像 多亏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细心，恭亲王的形象才被真实地记录下来，给后人展现了一个大国总理、一个“周公”的形象。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认为，恭亲王的逝世，令中国这架“错综复杂的政府机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平衡轮”。大清国的洋干部、美国人马士认为：“一般人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认为“恭亲王的死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果他还活着，或许不会有义和团乱事”，这是1900年庚子事变后，西方人的普遍观感。

美国外交官何天爵曾在恭亲王最后一次复出时（1894年）表示，只有恭亲王才能“为帝国政策带来改观和进步”。他认为，恭亲王是精通东方外交艺术的老手；他总是将外交对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认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体的问题上；他既高傲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坦率而有节制，有时办事迅速有时拖拉磨蹭，显得既有耐心又脾气暴躁——所有这些特点都根据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变化随时转换使用。

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认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体的问题上；他既高傲又谦和，既粗鲁又文雅，坦率而有节制，有时办事迅速有时拖拉磨蹭，显得既有耐心又脾气暴躁——所有这些特点都根据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变化随时转换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诀在于他能够事先判断出需要妥协的时机。他不断转换面具并不说明他是个优柔寡断之徒，隐藏在众多面具之后的他在认真琢磨着对手，判断对方的意图政策，再决定自己的对策。在最后时刻来临之前，他丝毫没有妥协投降的迹象，积极对付，毫不屈服。正当他的对手集中全力要发动最后一击的时候，对手会发现他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脸微笑的谦卑的伙伴。作为所谓的“防御外交政策”——中国迄今为止只有这一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显得出类拔萃。帝国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明白帝国可能的未来和帝国自身的弱点。帝国活着的人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富有经验，担当重任……实际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是政府政策制定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 “反动”遗言

在恭亲王病重期间，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以各种方式向他表示了慰问，并且就恭亲王身后的国家大事，进行了广泛而坦率的探讨。

一个广为传说，但显然无法从正史上得到确证的故事，是说恭亲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告诫光绪皇帝：“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戊戌履霜录》）高层密谈，自然是不可能泄露给位卑言轻的史家的。而人们更愿意假定此一政治遗言为真，并将其广泛解读为恭亲王“反动”的证据。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也在各种场合，强化了恭亲王反改革的形象。从各种可靠及不可靠的史料来看，恭亲王“反改革”似乎是真——但是，那只是反康梁的所谓“改革”而已。

有关戊戌变法的真相，近年来已经被越来越多地揭示出来，康梁在变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都被他们自己后来的精心宣传所拔高。在他们仓皇出逃的时候，给予他们掩护的日本和英国的外交官，无人认为他们是大清改革的所谓先行者、是能为理想而献身的勇士；相反，在发往各自政府的报告中，外交官们对康有为的评价十分糟糕，之所以伸出援手，一是出于所谓的“人道”，二则是考虑到各自国家的在华利益，手上握住了康有为，就多了一个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戊戌变法的实质，与其说是一场改革，莫如说是一群急于获得政治地位的野心家（如康有为等），与一部分不谙世事的理想主义者（如谭嗣同等），联合推出的一场政治大跃进。盲目而操切的“变法”，自发动之初，就贸然地将重点放在了打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们的铁饭碗上，一夜之间就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等六个中央部委；裁撤了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为他们与总督同在一地；裁撤了全国那些没有运输业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这种组织人事上的休克疗法，令全国公务员，尤其是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们，人人自危。这势必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是改革者还是保守者，都推到了这场所谓“改革”的对立面。

而这些，正是改革经验丰富、政治嗅觉灵敏的恭亲王之所以至死反对如此“改革”的原因。其实，除恭亲王之外，几乎所有的改革实践者们，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都与这场以滥发红头文件为主要方式的“改革”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而后世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如果恭亲王不死，这一以文字上的虚幻快感取代应有审慎的儿戏“改革”，将可能无法推行，而这究竟是因为恭亲王的“反动”，还是因为他的明智加睿智呢？



从戊戌变法开始，中国近代史几乎成了一位杰出的策划大师，将自己包装成了伟大的改革家、皇帝的心腹、中国的脊梁，进而以此为业，在海外过上了腰缠万贯、眠花宿柳、招摇撞骗的寄生生活。

## 打倒翁同龢

除提醒光绪要警惕“康梁小人”之外，恭亲王还有一条同样难以证实或证伪的政治遗言：打倒翁同龢。

这一记载的来源是《申报》。恭亲王死后一个月，这家大清国最为主流的媒体，发表报道称，恭亲王重病期间，光绪皇帝前来探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这等于是恭亲王推荐干部。

恭亲王首先提到了李鸿章，但他因甲午战败而积谤过多（“合肥相国积毁销骨”），一时难以重用，因此，恭亲王认为中央只有荣禄，地方上只有张之洞、裕禄三人“可任艰危”。当光绪皇帝专门问及如何评价自己的老师、担任财政部长（“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时，恭亲王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翁同龢是国家的罪人，“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报道进一步指出，甲午战争前朝鲜局势紧张，高层曾经拿出了三套方案：一是将朝鲜降格为行省，把朝鲜国王迁回内地供养，参照孔子后裔的榜样，“世袭罔替”；二是派遣重兵进驻朝鲜，代理其国防；三则是将朝鲜列为各国利益均沾、共同保护的“公共之地”，以便相互牵制。但当时已经执掌中央财政大权的翁同龢，一味



翁同龢遺像

翁同龢是那种在儒家光辉下正襟危坐的伪君子，他在政治上的破产，恰恰是他的学生光绪皇帝的自我觉醒、不留情面。如果说戊戌变法前后光绪皇帝还有一件事情是做对的话，那就是让这位老师下岗回家。

門下士張元濟放題

高调主战，却又不积极备战，导致主战的偏激舆论占了上风，错过了外交解决的最佳时机，终至尚未准备就绪的陆海军一败涂地，“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列强趁机掀起瓜分浪潮，“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贖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

客观地说，将甲午战争的失败，只归罪于翁同龢一人，与只归罪于李鸿章一人一样，都是过度之责。但是，翁同龢这类将自己的“名声”、“羽毛”看得重于国家利益的“清流”，的确对李鸿章这类“干活的人”造成了巨大的掣肘。李鸿章曾经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证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

政治斗争总是残酷的，但恭亲王一生，除了与慈禧有过几次硬碰硬之外，很少如此剑拔弩张，他与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几乎都是和平相处，怀柔以对，以期感化及争取对方，这也成为总理衙门对付政敌的基本策略，令改革维持了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下图为甲午战争期间清军士兵在北京街头练习弓箭。



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甲午战前十多年，日本侵略琉球和台湾，李鸿章就向中央发出了警报，应将日本作为中国国防的主要假想敌。但翁同龢为了政争的需要，死死捂着钱袋子，导致北洋海军多年未进行军备更新，却又逼着李鸿章与日本决战。甲午战败后，日本方面指定只和李鸿章进行和谈，中央在商议时，翁同龢明知不割地不可，但为了爱惜自己的名声，坚决要求绝不可割地，实际上是想洗清自己。李鸿章也急了，干脆表示自己没这本事，还是请翁师傅亲自去趟日本，这才令翁同龢改口。从个人政治品格上来说，李鸿章远比翁同龢要坦荡磊落许多，更有担当，更有责任感，更勇于任事。从后世我们所能看到的史料来看，李鸿章未必是个“真小人”，而翁同龢却绝对可称是个“伪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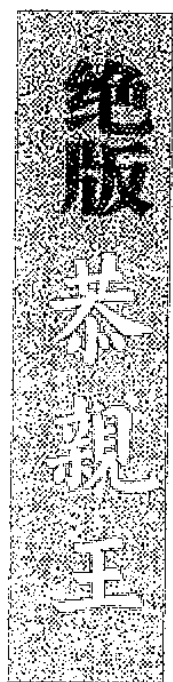
无论恭亲王驱逐翁同龢与告诫康有为的两个口头遗嘱真实性如何，他作为一个实干家，对翁、康之类玩嘴上虚功夫的人，是有足够警惕的。实际上，在此之前，翁同龢已经表露了对康有为的极大支持，多次表示赞同康有为等提出的“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休克”疗法，而这将导致国家机器的重建，“休克”将完全可能造成大面积的瘫痪和崩溃。

恭亲王去世后不到一个月，刚刚成为事实上的“总理”，并启动了戊戌变法的翁同龢，就被突然“双开”，送回了常熟老家。这是戊戌年众多扑朔迷离的怪事之一。一直以来史家对此的解释，都是归因于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为首的“帝党”进行权力斗争，慈禧将翁同龢清除出中央，以削弱光绪的力量。这种已被广泛接受的论点，近年却被发现是天方夜谭。更多的证据表明，正是光绪皇帝本人不满于这位“居心叵测，并及怙权”的老师，而亲自下旨令老师下岗的。在恭亲王临终发出了对康有为和翁同龢的警告后，光绪皇帝还曾亲自测试了翁老师对康有为人品的评价，却发现翁老师前后不一，十分可疑。这在翁同龢自己的日记中，也有闪烁其词的记载。

## 至死方忠

恭亲王身后得到的哀荣，是不同寻常的。

他去世后的次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就亲自前往恭王府悼念，对恭亲王的一



生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赐谥号为“忠”，配享太庙，入京师贤良寺。慈禧太后还下令“辍朝加两日”，即中央的丧假从3天改为5天，同时，“皇帝素服十五日”，这是人臣罕见的哀荣。

慈禧太后与恭亲王是掰了近三十年手腕的老对手，恭亲王在政治上的三次大崩盘，除了第一次之外，都与慈禧有着直接的关系。“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作为大权在握的“老二”，恭亲王永远都是最高权力的最大威胁者。只要看看不绝于史的残酷的权力斗争和血腥的宫廷阴谋，就会明白，对于恭亲王既利用，又防范，绝非出自慈禧太后神经质的多疑，而只是一种权力的常识而已。“老二”的忠诚与否，只能到撒手人寰的最后时刻才能真正得出结论，谥号为“忠”，绝非对过程的描述，而是对结局的概括。

下岗在家十年，恭亲王常去的地方是京西古刹戒台寺。寺内有棵“卧龙松”，驰名京师。若干年后，恭亲王之孙溥伟来到戒台寺，在感慨祖父跌宕起伏的一生之余，挥笔为之题写“卧龙松”三字，刻碑立于松下。当年已逐渐习惯了忧谗畏讥的恭亲王，如此不避嫌疑地到此凭吊，究竟是如何心意？或许，一条不能腾飞的卧龙，在一个只以成败论英雄、信奉张牙舞爪的社会里，可能就是一条爬虫而已……



北京戒台寺的卧龙松





## 第四章 老大帝国



水法楼 景 在恭王府后罩楼最西侧，曾建有一座室内带有流泉的花园，俗称“水法楼”，它曾是国内惟一的“室内园林景观”。令人叹息的是，在辅仁大学入驻恭王府后，水法楼被拆毁。这座水法楼建筑构思巧夺天工，仅根据目前的图纸和史料，建筑师仍无法将其复建还原。（陈鸿舜收藏，照片拍摄于1940年前）

---

## 英国议会：大清稳定压倒一切

---

恭亲王在合适的时机打出了一张合适的牌，仅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将一个攻入自己首都的武装到牙齿的强敌，变成了同志加兄弟。从此，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保持了长时间的友好关系，大清国藉此获得了30年的宝贵的国际和平时间，得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

大清国的稳定压倒一切，大英帝国应当不遗余力地帮助大清国进行全面改革，乃至帮助大清政府平息任何动乱；维持中国稳定、推进中欧贸易符合英国的最大利益，英国的对华政策必须是“忠诚、坦率及友好的”；英国如果不能支持大清国的改革，那无异于自杀。

这样的论调，并非出自于某位“大清人民的朋友”之口，却恰恰来自英国著名的鹰派、两次鸦片战争的主要决策者巴麦尊勋爵（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这位曾经使劲鞭打中国龙的强硬主义者，却在1863年7月6日，以首相身份向英国议会发表了长篇演说，鲜明地提出要扶持中国。

究竟是什么，令一只咄咄逼人的雄鹰，变成了一只温顺友好的鸽子呢？

一切都源自恭亲王奕訢那务实的外交政策。

### 大清国的大订单

再颞预、再腐败的政权，到了生死存亡而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时候，多少都会变得与时俱进起来。1862年初，随着太平军相继攻陷东南财赋重地宁波、杭州等地，兵锋直指上海，大清国的领导核心真切地感受到了没顶的压力。

战争处于胶着状态，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恭亲王，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包括不久前还在刀兵相向的英法等列强，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在关键时候挽救东南、挽救大清。拖延已久的舰队采购计划，被迅速地摆上了议事日程。



A LESSON TO JOHN CHINAMAN.

Mr. PUNCH. "GIVE IT BDI W333. PAM, WHILE YOU ARE ABOUT 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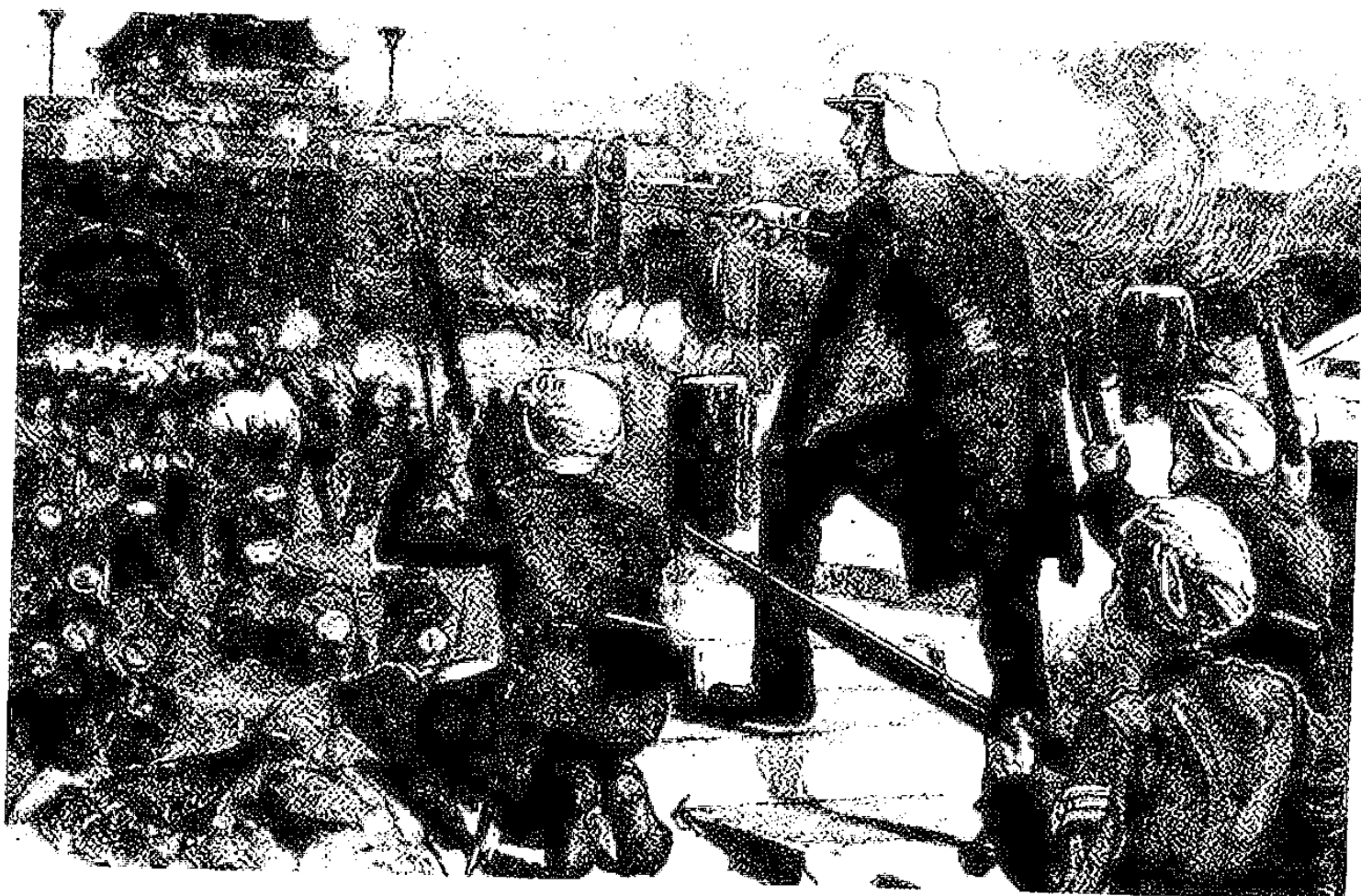
无论是鹰还是鸽，在英国人眼中，中国总是需要引导和训诫的，无论是用棍棒还是用胡萝卜。图为1857年英国报章上的漫画《教训中国人》。

早在上一年（1861年），大清国的洋干部、代理总税务司、英国人罗伯特·赫德，就向恭亲王建议，可以从英国购买几十艘舰艇组建新式海军，这将大大加强前线官军对太平军的军事优势。这项建议得到了英国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Wright-Bruce）的大力支持。赫德建议说，此项费用可以通过提高鸦片关税和对鸦片征收货物税来筹措。

卜鲁斯是英国第一位常任驻华公使，他的哥哥正是著名的额尔金勋爵，恭亲王的洋对手。

赫德和卜鲁斯的提议，立即得到恭亲王的响应。在他的盘算中，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好事：既可以打击“长毛”，又可以“笼络”列强。他向当时重病中的咸丰皇帝写了报告，咸丰皇帝也很是兴奋，立即批转曾国藩、官文、胡林翼等前线将帅，征求意见。虽然得到了朝野上下的基本支持，但赫德开出来的预算，高达150多万两白银，这令囊中羞涩、两袖“清”风的大清中央很是为难，只好不断折冲，压低预算。直到太平军饮马西子湖，此时赫德的预算也调整到了80万两，恭亲王便不再犹豫，指示赫德，授权正在英国老家度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赫德此时还是代理他的职务）采购这些军舰。

这是一张庞大的订单，中国人的购买能力令英国朝野大为兴奋：6艘炮艇和3艘快艇，外带全套的人马，每艘炮艇配备舰长1人、军官2人、轮机手2人、炮手2人、



左图：1864年，英国人戈登率洋枪队协助清军攻打苏州城太平天国守军。

水兵 10 人；每艘快艇则配备舰长 1 人、军官 1 人、轮机手 3 人、炮手 4 人、水兵 30 人。这不仅能大大拉动英国军火行业的 GDP，而且英军官兵到大英帝国之外再就业，将大大加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

这是大清国第一次国际大采购，也是恭亲王奕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拍板决定的最大一笔财政支出。吊诡的是，这样一桩动作极猛的改革举措，却出乎意料地没有遭到来自保守派的反对，没有喝彩，也没有反对，万马齐喑。在来势凶猛的太平天国面前，卫道士们终于学会了什么是顾全大局。

这是大清国在引进技术和人才方面的重大尝试，这样一支完全采购自“洋鬼子”的舰队，加入到“国有资产”的行列后，无疑将令大清中央更有决心、有能力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当然主要还是国内敌对势力的挑战。此时，清政府另一个“引进—消化—吸收”的项目“洋枪队”（后更名为“常胜军” Ever Victorious Army），正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发挥巨大作用，一支“水上洋枪队”无疑将令“对外开放”的伟大成果首先在对内战争中绽放。

大清国的集权体制，在这种关键时刻体现了高效的制度优越性。中央迅速拍板，赫德立即（1862年2月24日）急电英国，通知李泰国，北京已经命令两广总督劳崇光为舰队支付第一期款项。

此时，李泰国已经与英国海军上校、著名的北极探险家阿思本（Sherard Osborn）

清朝征剿太平天国时，开始参用西法训练士兵，并聘用了英国人戈登、美国人华尔等洋将。戈登的洋枪队给太平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右图：英国人领导下的“常胜军”的夏季装扮。



进行了接触，邀请阿思本出任拟议中的舰队司令。采购开始紧张地进行，但此时，英国议会却开始杯葛这一受到政府支持的军火外援项目。

### 英国议会大辩论

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及运动初期，英国对华政策的主流还是炮舰政策，对清政府以打压为主。但中国内战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力，令英国在华最为重要的商业利益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们这才看清了清政府在稳定中国局势方面的关键作用，遂开始调整政策，转而扶持清政府，同时在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过程中加紧渗透，力图将中国政权“英国化”，这成为英国政界有远见者们的共识。

这些人目光短浅的传统炮舰政策的支持者，以及出于宗教或政治理想等各种原因而亲太平天国的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阿思本为中国“打工”的申请，令英国内部就中国政策的分歧公开化和表面化。1862年7月25日，英国下院会议辩论中，议员海亚（Sir J. HAY）提出，阿思本作为英国军官，究竟是否可以服务于“中国的叛乱方”或者“那个腐朽的王朝”？一旦处理不慎，这就完全可能将英国拖入一场预料之外的中国内战冲突之中。

议员塞克斯上校（Colonel SYKE）指出，英法军队协助中国官军“解放”宁波后，“解放者”们对这座城市造成的破坏远甚过太平军。当时在华的一些英文报纸对此也

有报道：“(官军)于数小时内所破坏的较之叛军占领宁波的五个月内破坏的要多得多”（《中国邮报》）；“再没有比联军从太平军手里夺取宁波的行动更荒谬、更无理、更不义的了。我们应该公正地把英国皇家兵舰丢乐德舰长的永垂不朽的可耻行为载于史册”（《香港日报》）。一年多后的《泰晤士报》（1863年7月17日）也承认，毫无军纪的联军和中国官方雇佣的洋枪队在宁波进行了大规模破坏，遭到西方商人和中国官方的一致抱怨，不得不安排他们撤离。

塞克斯上校说，在上海，没有任何西方人受到太平军的威胁；相反，太平军总在不断寻求与西方人的友谊，然而西方人却主动协助官军参战，“我们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就是狼对待羊的态度，不管羊是在河的上游还是下游喝水，结局都是一样的”。他认为欧洲雇佣军要从太平军手中“解放”嘉定，实际上就是抢劫“抢劫者”，“黑吃黑”而已。上海其实并不存在危险，“黄浦江平静得就如像泰晤士河一样”。他质疑道：“这些在中国的军事行动，驻扎当地的英国官员是否了解情况？是否已向议会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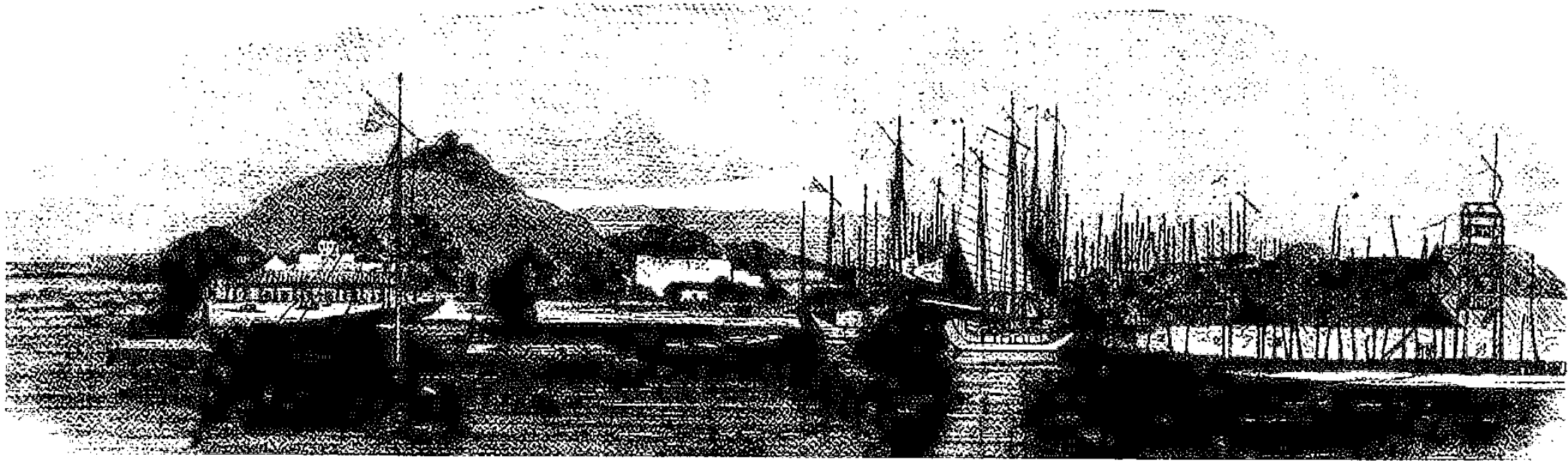
塞克斯上校是英国少数对太平天国持同情态度的议员之一。他曾经质疑英国外交系统，为什么没有将在华出版的英文报刊上有利于太平天国的报道送交伦敦，这极大地误导了欧洲舆论。他认为卜鲁斯等人称太平军为土匪“显然是在有意颠倒黑白”，他在报端撰文道：“如果说他们是土匪，那么，当荷兰人民起来挣脱西班牙的枷锁时他们都是土匪；我们自己的英联邦也是由土匪建立的；当美洲殖民地人民从宗主国手中争得独立时他们也是土匪；美国的南方同盟在抵抗北方联盟时也是土匪！如果夏福礼领事（英国驻宁波领事）更好地温习一下历史，他就不敢贸然断言。”

议员维特·布莱德（WHIT BREAD）则要求议院明确，如果英国军官们为中国政府服务，其服务年限不可视为在英国海军的服务年限；在中国所获得的薪水、晋升等，也与英国政府无关，不被皇家海军所承认；而如果在上海受伤或阵亡，也不可能享受英国的任何抚恤。这等同于要求他们“留职停薪”。

右上图：打着上帝旗号的太平天国，一度令英国在国家利益和宗教信仰两个层面都对大清政权产生了巨大的动摇。英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脚踩两只船，甚至还派出高级官员及军方代表，访问洪秀全占领下的南京。图为英国人画下的从水路上看到的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情景。

右中图：变更衣冠服制，在中国历来具有社会政治含义，往往是改朝换代的标志。图为英国人笔下的太平天国将士们，剪去了辫子，恢复蓄发的习俗。

右下图：太平军中不只有男兵，还设有女兵。图为西方人描绘的有男有女的太平将士们在上海城外的场景。



在一片争论声中，虽然最终是“亲华”的一方获胜，但在阿思本舰队的整个筹建过程中，反对的声音还是时有所闻。为了得到议会的支持，英国首相巴麦尊勋爵亲自出马，向议会发表长篇演说，为阿思本舰队辩护，提出了亲华政策。

作为一名鹰派，巴麦尊不仅因主导两次鸦片战争而闻名，也在镇压印度民族起义、发动对俄的克里米亚战争、支持美国内战时的南军等大事件中，表现活跃。在演说中，他对一些议员质疑阿思本舰队清剿“海盗”的使命大为恼火，他嘲讽他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丝毫没有认识到，只有阿思本舰队才能将中国海流域的“土匪”彻底扫清，确保中欧之间贸易的畅通。

他还提出，俄国和法国对中国觊觎已久，英国应该大力帮助中国整顿财经体系，建立强大的陆海军，以抵御可能的侵略。只有英国力量的存在，才能令俄法不敢轻举妄动。这几乎与恭亲王所分析的基本一致：列强之间即使“同床”，也必然无法“共梦”，中国大可从中获得宝贵的支持，无论对内对外都是大有裨益的。

巴麦尊的演讲，高屋建瓴，厘清了大英帝国在对华政策上的模糊认识。据《泰晤士报》报道说，在巴麦尊演说结束时，激动的议员们起立并长时间欢呼。一个多月后，维多利亚女王批准阿思本舰队计划，英国枢密院随即正式发布敕令，批准这一行动。

恭亲王在合适的时机打出了一张合适的牌，仅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将一个攻入自己首都的武装到牙齿的强敌，变成了同志加兄弟。从此，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保持了长时间的友好关系，大清国藉此获得了30年的宝贵的国际和平时间，得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史称“洋务运动”及“同光中兴”……



## 枪杆子里出政权

恭亲王再度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即使是“腐败无能”如满清者，也同样，甚至更加理解“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式真理，什么都可以丢；就是枪杆子不能丢，什么都可以牺牲，就是枪杆子不能牺牲。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来不得丝毫的松懈与让步。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一向温文尔雅的大清“总理”、恭亲王奕訢，终于发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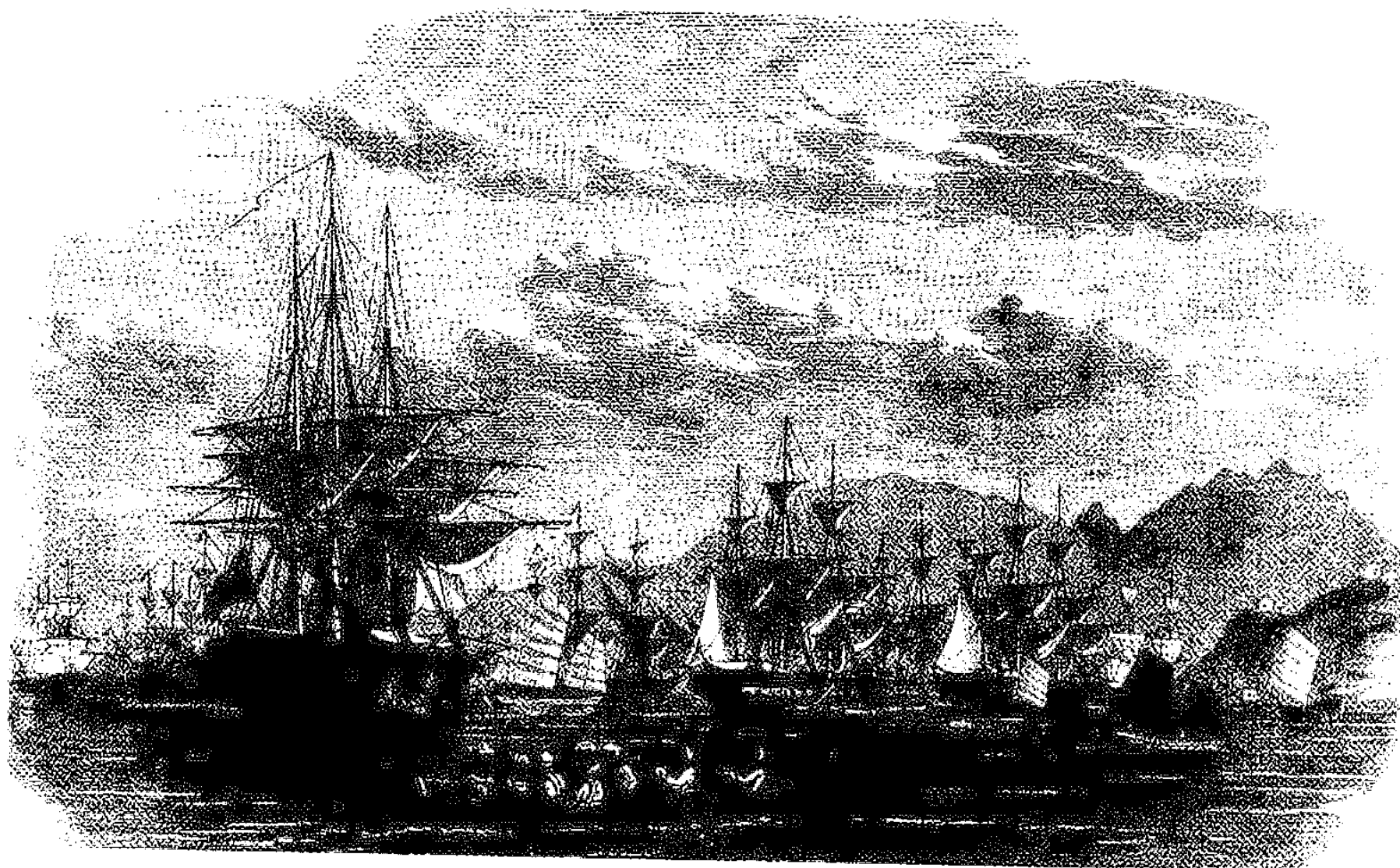
在给英国公使回复了多封态度和蔼但措辞强硬的信后，恭亲王下令：解散大清国的首支新式舰队，还未正式上任的舰队司令、英国籍的洋干部阿思本连同舰队全体英国籍官兵一律下岗。

在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恭亲王旗帜鲜明地捍卫了自己的立场：大清国的枪杆子，必须永远听从大清召唤，必须坚定地服从大清指挥，这是大清国武装力量的基本政治要求，这是不可后退的基本原则。

### 大清国订购整支海军

这是1863年10月。那支悬挂着黄龙旗、装备着最新式舰艇及武器、由清一色的英国官兵组成的“中英联合舰队”（英国报章的习惯称法，中国史书则普遍称为“阿思本舰队”），正停泊在大清帝国的东部沿海。如果没有这一波折，这支舰队将成为大清帝国及东亚地区的首支现代化海军（北洋舰队在此后11年才出现），地区平衡、世界均势乃至中国和世界的近代史都将因此而重写。

英国人对这支舰队是全力支持的，自英国议会在立法方面放行之后，舰队的组建工作进展神速，英国军方不惜将最先进的舰艇卖给中国政府。负责采购和组建的大清国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看中了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此人在军界以北极探险而著名，并曾经亲自参与过两次鸦片战争，是大清人民的老对手了，对中国相当熟悉。李泰国代表中国政府，正式聘请阿思本担任这支舰队的司令，任期四年，



阿思本舰队配置了当时最先进的舰艇，比图中这些同时期停靠在香港的英国舰队更为先进。

并且签订了一份共有 13 款内容的协议。

在“李—阿协议”中，明确约定，阿思本作为舰队司令，只服从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谕旨，而且李泰国对于不合理的谕旨还可以拒绝转达。这一明显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实际上将舰队变成了李泰国的私人武装，这成为日后争议的焦点。熟悉中国国情的赫德立即给李泰国写长信劝告，但毫无效果。

有意思的是，李泰国和阿思本两人，在这份日后产生颇多争议并导致舰队计划流产的协议后，加了不少注解，详细解释他们设立这些条文的考虑，但这些注解似乎没有得到中国历史学界的足够重视。

其中第一条注解明确说明，“我们不得不和善于欺骗和背信的亚洲人打交道，他们会随时以眼前利益和自己的观点进行修正。我们毕竟给他们提供的是实质的军事援助，必须防止这种援助被滥用，给我们自己及大英帝国中我们的支持者们带来丑闻。我们要保证女王枢密院所给予我们的巨大权力和责任，不至于被我们自己、我们的继任者乃至中国政府所滥用”。

从这一注解可看到，李泰国在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与作为大英帝国的臣民两种身份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样的身份冲突，也是他一直找不准自己定位的原因。而依照这一注解，整个舰队计划似乎不是中国的政府采购行为，而更像是

英国的一个政府援助项目。

李、阿两人在注解中详细说明，中国的地方官员们是靠不住的，在没有帝国政府授权的情况下，中国地方官员居然可以自行购买欧洲舰艇，自行招募各国水手，“扬子江上的舰艇一半属于（招安改编的）海盗，一半属于此类武装民船”。李泰国和阿思本因此认为，他们经手的舰队必须确保直属于中央政府，以与这些“海盗们”相区别。

致命的是，这两位似乎处处为中国利益着想的英国绅士，没有解释，也无法解释李泰国凭什么可以选择性地遵从或拒绝中国皇帝的谕旨。

当李、阿两人在伦敦沉浸于千秋伟业的大梦时，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清军围攻南京（太平天国的“天京”）日急，太平天国最骁勇的忠王李秀成率大军回救首都，上海之围遂解，李鸿章所部淮军在英法军、“常胜军”配合下，收复嘉定。军事态势对太平天国越来越不利，恭亲王已经完全不需要依赖阿思本舰队来实现军事救急。

## “总统”之争

李泰国会同阿思本制定了将舰队分阶段开往中国的计划后，就携眷赶回了上海，与代理其职位的赫德见面，然后一同赶往北京，觐见恭亲王。

恭亲王给了兴冲冲的李泰国兜头一瓢凉水：中国政府拒绝接受李—阿协议，舰队必须接受身处前线的地方督抚的节制，才能保证其在战场上发挥作用。李泰国则坚持舰队只能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指挥，他的观点得到了英国公使卜鲁斯的坚定赞同。双方形成了僵局，多次联席会议均不欢而散。

卜鲁斯于6月16日致函恭亲王，要求中央政府必须将关税和指挥权抓在手中，以保证舰队的运转费用和军饷，及不受地方当局节制。

恭亲王则毫不客气地回信指出：是否准许英国军官为中国效劳，当然是英国公使的职权范围，不同意就拉倒；但如果同意，则英国军官由谁指挥、饷银从何开支，这就是亲王的权力范围，不用英国人瞎操心。

其时，卜鲁斯处境相当尴尬，因为戈登率领的“常胜军”就是由地方政府节制的，如果也要“坚持原则”，则戈登等军官就必须离开“常胜军”，赫德认为这将成为英国远东政策的噩梦。

在这些谈判中，赫德敏锐地发现：中国皇帝虽在形式上是最高权威，但这种权威并非无限的。皇帝对官员的监督管理是在事后，地方事务——包括当地的对外事务在内——都是由地方官员们自行掌管。任何“直属于北京”的舰队，如果不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指挥下，其实难以在南方的战事中发挥作用。

经过几轮辩论，最终双方同意在阿思本之上设立一位中国“总统”（总司令），由曾、李推荐人选；而阿思本则担任“帮同总统”（副总司令）。双方达成了五条协议，对包括舰队的维持费用在内的诸多事项做了详细安排。7月2日，赫德在日记中写道：“解决舰队的事情成功了。”

现在就等着舰队及阿思本的到来。

## 最后通牒

阿思本的到来却令情况再度恶化。

阿思本舰队的第一批舰艇于8月1日到达长江口，阿思本本人则率领第二批舰艇于9月上旬到达，最后一批舰艇在10月6日进入中国港口。

阿思本到华后，先在上海逗留了几天。据他后来所写的备忘录，当时李鸿章在上海大挖他的墙角，其代理人积极游说阿思本舰队官兵，承诺更高的薪水，甚至可以将第一笔报酬先打入这些官兵的英国银行账户。阿思本在备忘录中对这样的“中国特色”大吃一惊，随即开除了牵涉其中的14名官兵。这加剧了他对李鸿章的不信任感。

阿思本于9月25日到达北京，获悉了李泰国此前与总理衙门达成的五条协议，勃然大怒，他认为这不仅与此前的协议大相径庭，而且海军舰队要听命于地方政府，这是大忌，“如果这就是中国特色，难怪他们无论陆战和海战都要打败仗了”。他认为，此前所签的官兵雇佣协议，前提就是他必须作为舰队司令，如果另设中国统帅，那这些合同就全部无效了。

随后，阿思本将自己对李鸿章的怨愤都发泄出来，“李鸿章是个能干的中国人，但也是个不守规矩的人，他的行为就是想削弱我的权力，然后可以更好地驾驭我或抛开我，就像他对其他欧洲军官一样”。他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传播西方文明，推进全人类的商业利益，如果听命于李鸿章，这些从英国海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将士，



阿思本官方画像 枪杆子听谁指挥，这是中国政治大盘操盘的最关键环节。桀骜不驯的阿思本显然过低地估量了恭亲王对此问题的坚定，造成这支最为先进的舰队的流产。

就和被李鸿章招安而来的海盗们没有区别了，“联合舰队就会从蒙上帝赐福的舰队，堕落到被中国人民和在华欧洲人诅咒的地步”。他毫不隐讳地写道：“我如果在这问题上软弱，就会如戈登那样被李鸿章玩弄。”

强悍的阿思本和李泰国两人联手，与恭亲王及总理衙门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而唯一能在其间回旋的赫德，则又已经南下上海，出任他的“上海税务司兼管长江口及宁波关务”。

在没有赫德斡旋的情况下，只经过3天的激烈辩论，阿思本就直接给恭亲王写信，指责恭亲王的决定“直接违反我和李泰国先生的正式协定……我到中国来是为皇帝效劳……而不是仅仅充当地方当局的仆人……中国总理衙门认为‘恭亲王所议之办法系中国的常理’，对此，我的答复是，我以及我的追随者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使我们习惯于中国水兵或士兵所受的通常待遇，也不是为了帮助他们在对待欧洲雇员或一般欧洲人方面执行一项倒退的政策”。

其后三周，李泰国和阿思本在总理衙门“诱骗、争论和咆哮”，恭亲王均未露面。

10月15日，作为“客卿”的阿思本居然向恭亲王发出了“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批准他和李泰国的协议，否则他就立即解散舰队。在这封“最后通牒”中，他辩护说自己和李泰国的一切言行均严格执行了恭亲王最早的指令，抱怨中国政府没有遵守诺言。

这封信终于激怒了恭亲王及总理衙门，即使一向十分温和的大清外交部副部长（“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也甩出了重话：大清国即使退回到关外，也绝不会屈服于阿思本的无理要求。

10月19日，没有得到回音的阿思本请示英国公使卜鲁斯，说明他想解散舰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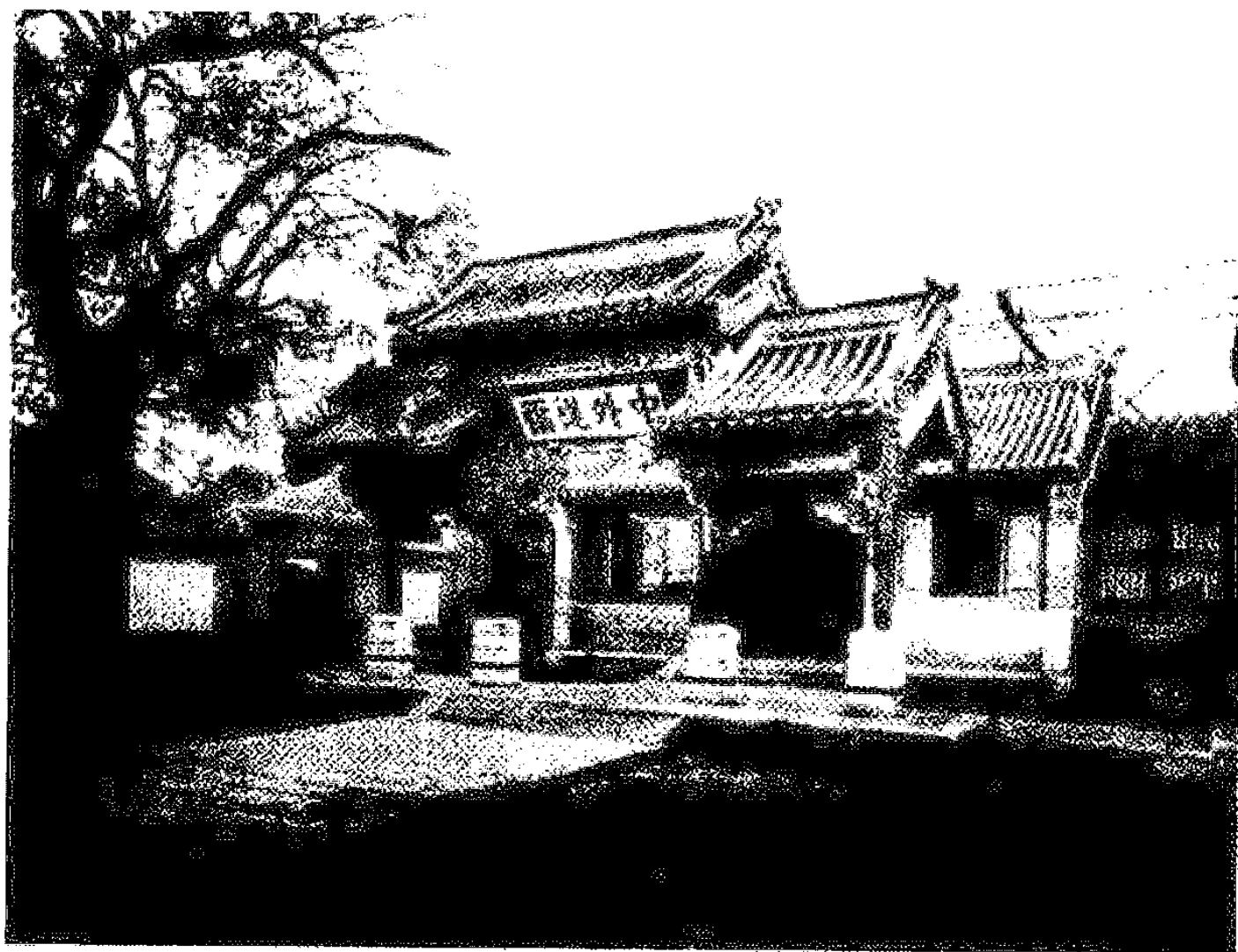
但由于所有舰艇是清帝国的财产，他无法处置，同时又担心如此强大的舰队如落入地方政府手中，会出现大的风险。

卜鲁斯回信说，他已经告知恭亲王和总理衙门，这支舰队的指挥权只能由女皇政府信得过的人指挥；他要求阿思本想方设法先将舰队留在手上，在得到英国政府指令之前，不得移交给任何人。

随后，在美国公使蒲安臣斡旋下，总理衙门和英国公使进行了紧急磋商，最后双方同意由阿思本遣返所有人员及舰艇，中国政府承担所有的经济损失。

这一事件，令大清国损失了80万两白银。但经此折腾，恭亲王再度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即使是“腐败无能”如满清者，也同样，甚至更加理解“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式真理，什么都可以丢，就是枪杆子不能丢；什么都可以牺牲，就是枪杆子不能牺牲。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来不得丝毫的松懈与让步。

阿思本舰队解散十一年后（1875年），在赫德牵线下，恭亲王再度拍板，向英国采购军舰，但上至舰队司令，下到普通水兵，都是清一色的大清子民，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北洋舰队。后人无从得知，恭亲王在枪杆子问题上如此坚持原则，究竟为大清国带来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因内忧外患而危在旦夕的政权，此后又支撑了四十多年之久，并且还时不时地迸发出貌似中兴的星星之火……



总理衙门外牌楼的正中门楣上书有“中外提福”四个大字。《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遐迩一体，中外提福。”“提”通“提”，意思是：远近犹如一个整体协调统一，对内对外都是一种福祉。但这美好的愿望终究落了空。

## 洋干部下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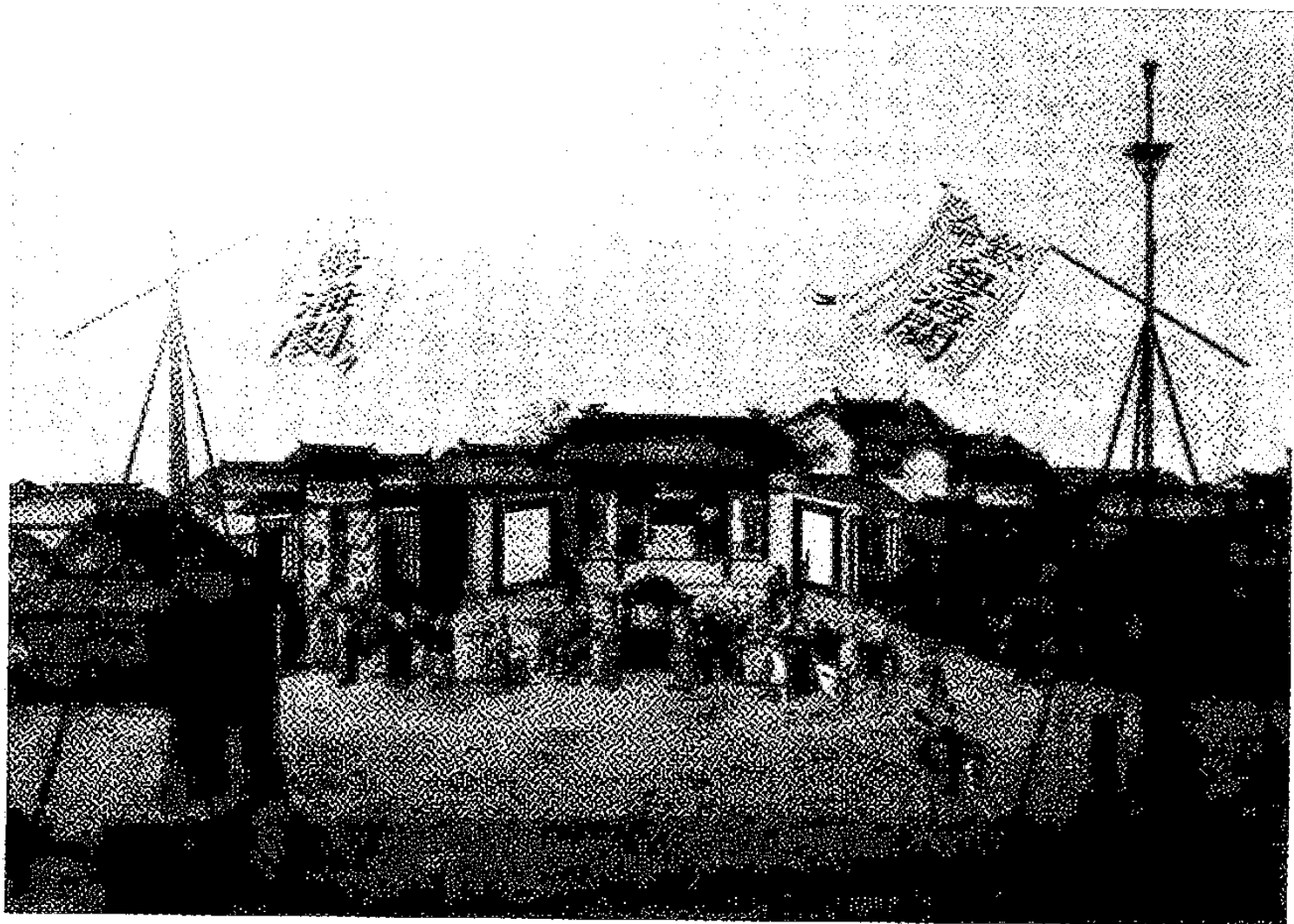
恭亲王为大清国今后任用洋干部设立了规矩，即一方面大胆起用，另一方面严格管理。从此，在遍地腐败的大清官场，洋干部以其专业、敬业、廉洁，在军事、财政、教育等领域建树颇丰，大大延缓了帝国的衰亡。

1863年11月16日，大清国又一名高级领导干部被“双开”。这回轮到了英国籍干部李泰国。

洋干部也能上能下，说换就换，这当然是新鲜事，表明大清中央在干部人事任免乃至外交方面的日渐雄起。

担任了9年的大清国海关关长（“总税务司”），李泰国在大清中央政府中很有些分量：他不仅执掌着海关这一大清国的主要财源，而且在大清国与西方各国，尤其是老大哥英国的双边及多边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清国将自己的第一支新式海军的采购大订单，交给他去执行，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央对他的倚重和信赖。

洋干部治理下的大清海关，一度成为后人指责清政府卖国的证据之一，却忽视了这些洋干部实际上是为大清国打工，而非受雇于其祖国，而且，在他们的管理下，海关成为大清国最廉洁高效的部门。图为清朝的早期海关。



撤换这样的洋干部，牵一发而动全身，能有魄力下这个决心的，只有绵里藏针、外柔内刚的恭亲王奕訢。

## 藏位

导致李泰国与其“老板”奕訢翻脸的导火线，是其在经办“英中联合舰队”时对中国主权的蔑视和践踏。从那时开始，这一事件一直都被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经典案例，也是历经满清、民国直至今日而评价依然的极少数“铁案”之一。

在购置舰队和招募外籍官兵中，恭亲王及中国政府给李泰国的授权仅仅局限在经济方面，他可以在审定的预算额度内自主开支。但李泰国却擅自突破了这一授权，在他与这支“混血”舰队的未来司令阿思本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两人居然约定了阿思本只接受由李转达的中国皇帝的命令，而李泰国还可以对其认为不合适的圣旨不予转达。同时，双方还约定将舰队官兵4年的薪水一次性提前支取。

这当然深深伤害了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政府和人民的感情，他们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将海军大权拱手相让的合同。在李泰国和恭亲王等人的激烈争论中，他坚称中国地方官员过于腐败，因此舰队不能听从前线统帅的调度，而必须直属于皇帝，这又激起曾国藩、李鸿章等前线大员们的激烈反对，并被迅速上升到军队听谁指挥的国家原则高度。



左图：洋干部李泰国

常胜军是清政府联合外国势力组成的一支装备近代武器、用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雇佣军，创始人为美国人华尔（下页左图）。华尔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阵亡后，英国人戈登（下页右图）接任指挥。后来戈登与李鸿章发生矛盾，常胜军最后解散。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局面下，恭亲王只能选择玉碎而非瓦全，舰队最后被解散。大清国第一次大张旗鼓的人才、技术双引进项目，宣告破产。

对于涉嫌渎职的李泰国，恭亲王十分恼怒，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用罕见的尖刻语言说“李泰国办事刁诈，以致虚糜巨款，实难姑容”，处分结果是“将其革退，不准经理税务”。恭亲王随即娴熟地、辩证地将这件坏事说成了一件好事：“该夷狡狴异常，中外皆知，屡欲去之而不能，今因办船贻误，正可藉此驱逐”，如果李泰国敢于不遵，则将通过英国公使对此进行惩办。

强悍的李泰国在这样的打击面前终于低下头，之后与恭亲王的几次见面，“词色之间，业已神丧意沮，迥非来时桀骜情状”。但恭亲王依然担心他“野性难驯”，为了防止他回到英国后“颠倒是非，处心积虑，遇事思掣中国之肘，不可不预为设防”，于是将详细的经过，发文告知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及李泰国的好友、中国通威妥玛，以彻底杜绝李泰国“造谣簧惑”的可能。

在这封以外交部副部长（“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名义发出的信中，中国政府详细罗列了李泰国所犯的严重错误。在舰队指挥权这样的原则问题上，除了阿思本舰队的越位签约外，他还居然要求将中国各港口的轮船归其一人调度、将上海的“常胜军”（即华尔、戈登等人率领的外籍雇佣军，此前名为“洋枪队”）归其一人指挥。信中还指控李泰国缺乏职业操守，其既然在中国担任领导职务，“食中国之俸，即与



中国属员无异，其职分亦与各省关道相等”，但在此次购置舰队回京后，却以其与英国公使级别相等为理由，不再给恭亲王呈送“请示报告”，而使用平行书信。大清本来给了他优厚的待遇，为他在勾栏胡同购买了居所，有 100 多间房，现在他居然嫌小，指名要换到肃王府去，或至少要将肃王府分给他一半。肃亲王可是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其坐落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王府关系到国家的脸面，此前法国就曾要求将此定为使馆，但被大清政府严拒，肃王府后来在义和团及八国联军动乱中成为战场被毁坏。李泰国要求，如果不给他肃王府，那就要把肃王府边上的詹事府衙门的房子腾给他。其实，李泰国指定的两处新住宅，都紧靠着英国使馆，幕后显然是英国想在北京扩大使馆区。

绝版



左页上图：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肃亲王府被焚毁。门前持枪荷弹的是日本士兵。



左页下图：义和团运动中，由于肃亲王府内住进了三千多名中国教徒，因此它成了义和团和清军攻击的目标。这张照片显示的是肃亲王府内一个被毁的厅堂废墟。

右上图：1861年，淳亲王府成了英国驻京公使馆，但当时王府的特征得以保存，如头宫门外放置的一对石狮和门枕石等。



右中图：位于王府正门北面的主殿，画梁雕栋，十分奢华。

下图左：1900年以后，英国公使馆新建的大门。

下图右：在英国公使馆的大门之内还可以看到原王府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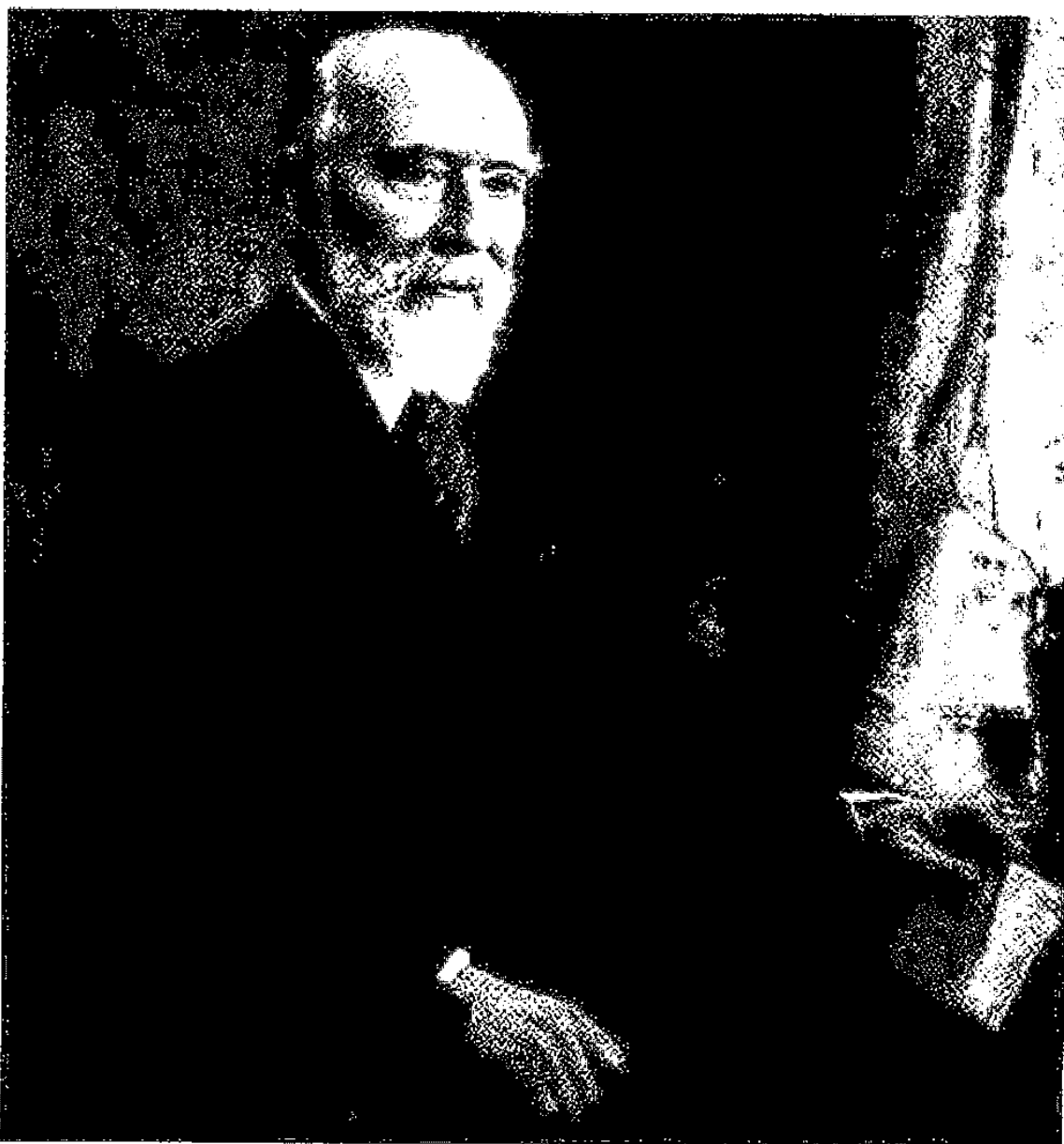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等认为：“李泰国给中国自尊心造成的巨大伤害，不可宽恕。他所要求的权力，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交给一个外籍雇员。他甚至要求取消妨碍他染指海关税收的北洋和南洋大臣，要求一套皇亲国戚才能用的府第；他表现得与总理衙门大臣平起平坐，只有恭亲王才是上司；而在实际工作中，他总是不能及时拿出舰队的开支账目。”

## 野性

在恭亲王看来，李泰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人品上都有大问题。但接替李泰国的英国老乡赫德并不这样认为，他否认李泰国有任何侵夺中国军权的主观愿望，其问题仅仅在于其过于“英国化”的个性，忽视了中国国情，提出了过于激进的改革要求。赫德本人也认为“这种要求很可能推迟而不是加快有益的变革”，而以开明著称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很明确地告诉赫德，中国需要改革，但改革需要时间，不能急躁。

比起祖国英国来，李泰国其实更熟悉中国。他的父亲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由于晚清内政外交改革的需要，一大批外国人开始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赫德自制沉着、圆通，长袖善舞，而又熟悉官场礼节和中国士大夫的习气，深得总理衙门大臣们的赞扬。李泰国被革职后，年仅28岁的赫德，就成为清朝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而且连续任职48年。



1870 年左右的上海海关

Lay) 是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长期在华传教。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老李被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 (Henry Pottinger) 聘为翻译和顾问，此后投身外交界，出任英国驻广州的首任领事，后又转任驻厦门领事。老李在 40 岁那年 (1845 年) 早逝，留下六个孩子，李夫人难以承受经济压力，只好将 15 岁的长子和 13 岁的次子李泰国送到中国，请德国传教士、同为璞鼎查顾问的郭士立 (Charles Gutzlaff) 代为抚养。

逆境中的李泰国十分勤奋，16 岁那年便因地道的中文而被英国驻华使团聘请为翻译，成为“外交童工”。22 岁时，李泰国出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此时，太平军已占南京，位于上海的江海关失控，英、法、美三国遂各派一名税务司“协助”清廷征集关税。李泰国成了英方代表。不久，法美两国相继退出，李泰国独揽大权，遂根据西方模式对海关大举整顿。他建章立制，废除“税额包干”的陋习，所有税款“尽收尽解”，点滴归公，并对腐败的海关官员和从事走私的外商船只进行严厉打击，成为双方的共同“敌人”。在李泰国主持下，已近停顿的江海关在战乱期间居然稳步发展，为清廷战时财政雪中送炭。铁腕的李泰国也因此得到恭亲王的赞赏，在全国海关实行统一管理的重大体制改革中，他被任命为全国总税务司，成为官阶最高、权力最

大的外籍雇员。

然而，作为大清公务员，李泰国在最为关键的国家忠诚问题上面临尴尬。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不顾利益冲突，担任了英方代表额尔金的翻译和顾问，参加天津条约谈判，并为英方起草了大部分条款。父子两代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担任同样角色，在大英帝国看来，自然是忠君报国的典范，而在恭亲王看来，李泰国多少有点“吃里扒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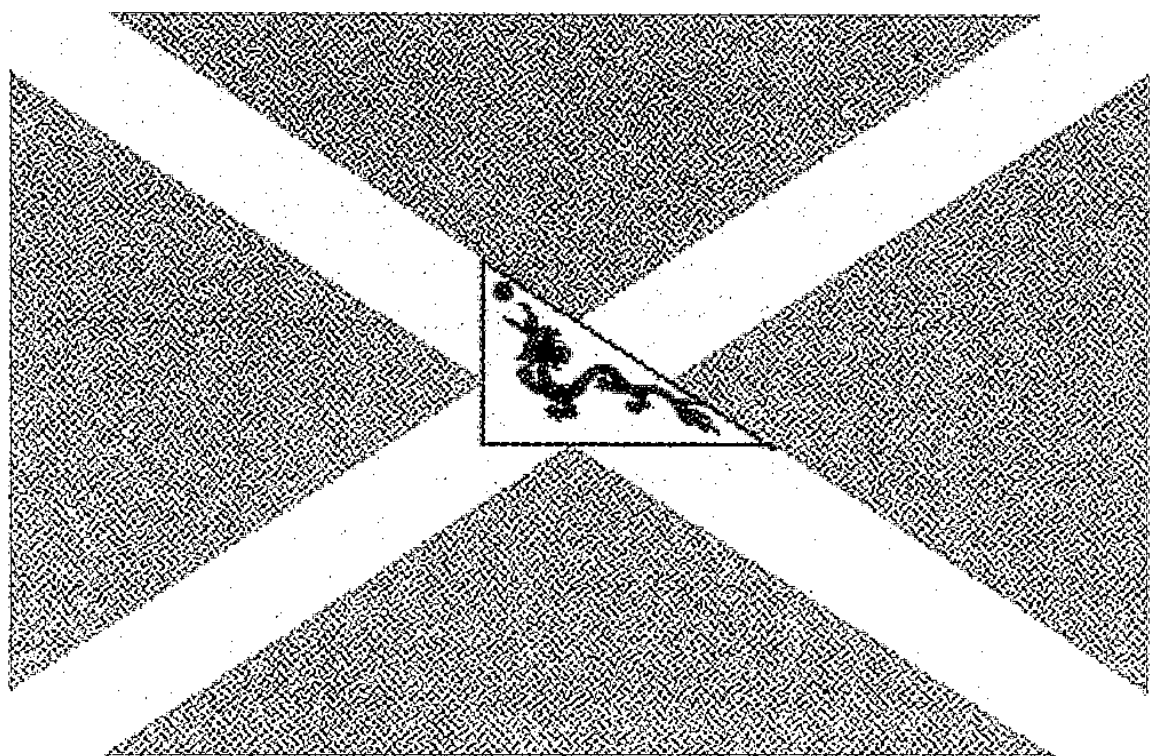
1861年，李泰国回英休假，一方面为购置舰队奔波，这导致了他与恭亲王的最后决裂；另一方面，他也为了抵制领事裁判权侵入中国海关，而向国际法专家广泛咨询，厘清了相关法律界定，客观上维护了中国利权。

因此，赫德认为，李泰国在中国官场的失败，其实是个性使然，他“甚至在自己家里也有对手”，其粗暴言行，令他本可以成为“中国的朋友”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此后的大清洋干部们似乎在耐性方面都大有长进了，赫德本人就十分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大清官场达48年之久，反倒令英国方面怀疑他对祖国的忠诚。

## 军旗

李泰国在中国历史上还留下了另一个深刻的烙印：与恭亲王“合作”设计了第一面军旗。

购置阿思本舰队的工作启动之时，英国政府就要求这支舰队必须悬挂清晰的军旗，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李泰国设计了一面军旗，绿色为底，配以黄色的“X”十字。



上图：大清国的黄龙旗。

左图：中国第一面获得世界认可的军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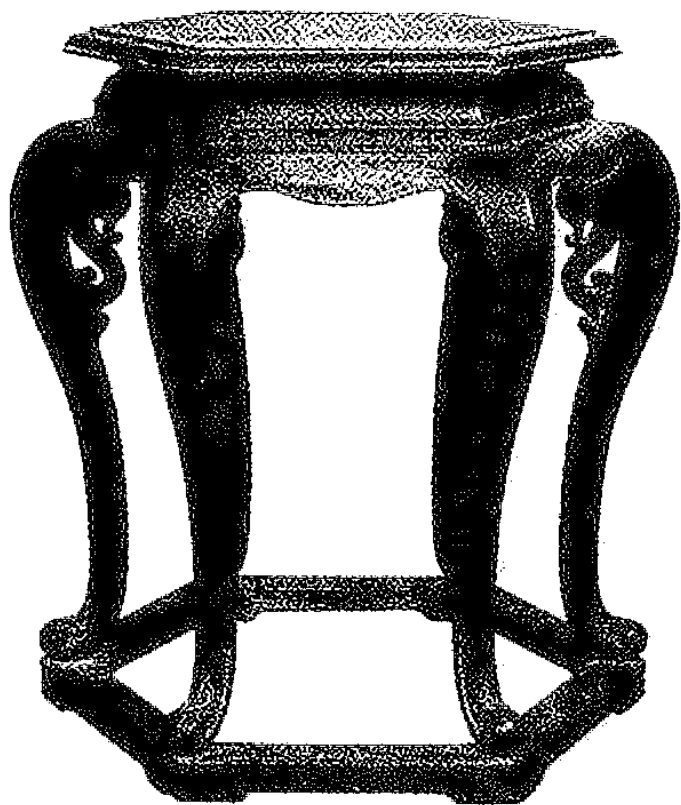
在他与阿思本签订的协议中，对此做了说明，之所以选择绿色，只因为从来没人将此作为海军旗底色，容易辨认（戈登率领的“常胜军”也使用罕见的绿色军旗）。而“X”十字则是大英帝国国旗的基本图形，将“X”十字换成黄色，融合了中英两国的元素，设计者不可谓不煞费苦心。

但这一设计遭到恭亲王反对。他认为，中国的国旗必须是黄色，必须要有龙，龙必须在旗帜的上方，而且此前的中国官旗都是三角形的。李泰国最后综合了意见，新的军旗为绿底黄色“X”十字的长方形，中间是绘有蓝色龙的黄三角。

1863年2月13日，这面军旗在官方的《伦敦政报》（London Gazette）上公布。这是中国第一面获得世界认可的军旗。

1864年1月9日，李泰国由上海起程，黯然返回并不熟悉的祖国英国。恭亲王虽然在政治原则上毫不妥协，但在经济上还是给了他很高的补偿：多发了四个月薪水，另送了6000两银子，总计折合约14000多英镑，这在当时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英国驻印度海军司令的年薪才2300英镑。

经此事件，恭亲王为大清国今后任用洋干部设立了规矩，即一方面大胆起用，另一方面严格管理。从此，在遍地腐败的大清官场，洋干部以其专业、敬业、廉洁，在军事、财政、教育等领域建树颇丰，大大延缓了帝国的衰亡。当然，他们也被后世普遍看做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看做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人证……



恭王府黄花梨楠木面六腿盆座·清 该器做工讲究，且存世量少。（图片选自《恭王府明清家具集萃》）

---

---

## 谁家的走狗

这篇建议简直就是一篇檄文，几乎彻底否定了自从粉碎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以来，大清国在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且将矛头直指大清国的干部队伍，直指大清国自认为举世最为先进的社会制度。

---

---

1866年4月5日，一份特殊的中央文件用快马送往沿江沿海各省督抚。中央要求各省领导们，务必要对这三份文件认真研究，尽快回复，“共体时艰，勿泥成见”。

这三份文件，都来自英国人：

大清国的洋干部、担任总税务司的赫德撰写的《局外旁观论》；

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著名汉学家威妥玛撰写的《新议略论》；

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为提交《新议略论》而发出的一份外交照会。

这三份文件主题鲜明：为大清国的改革开放画圈圈。英国人尖锐地分析了大清政府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后，督促大清政府加大改革力度，胆子再大些，步子再快些。

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掺杂着捍卫主权和面子，席卷大清国的高级干部。

### 绵羊为何作乱

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其实在半年前就提交了（1865年11月6日）。1865年8月份，海关总税务司刚刚从上海搬到北京，正式厕身于在京中央国家机关的行列。

这篇约4000字的建议书，是赫德以客卿的身份第一次向大清政府提交完整的建议，因此自称为“局外旁观”，以图达到“旁观者清”的效果。因为旁观，所以不必在乎大清官场的潜规则，话可以说透，甚至说绝。这篇建议简直就是一篇檄文，几乎彻底否定了自从粉碎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以来，大清国在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且将矛头直指大清国的干部队伍，直指大清国自认为举世最为先进的社会制度。



赫德的指控包括：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律例本极允当，而用法多属因循。制度本极精详，而日久尽为虚器”。

官员腐败——“外省臣工，不能久于其任，以致尽职者少，营私者多。寄耳目于非人，而举劾未当；供贪婪于戚友，而民怨弗闻”。

官场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在京大小臣工，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伤，如是而欲民生安业，岂可得耶”。

干部人事制度务虚不务实——“俸满即应升调，于地方公事，未及深究，胥吏反得久踞衙署以售其奸。年满更换之说，尽属虚语”。

干部队伍彻底糜烂——“文武各事之行，尽属于虚，执法者惟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在上即有所见，亦如无见，远情不能上达，上令不能远行”。

军队也被腐败侵蚀，毫无战斗力——“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平日挑抬营生，未经训练，一旦令其战阵，实驱市人而使斗；以刀矛为耒耜。驻防人等，平时拉弓举石，祇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

在北京办公室工作的赫德 赫德是大清国任职最长（超过40年）、职务最高（相当于海关总署署长兼财政部常务副部长）的外籍干部，他的日记、书信及论文，至今仍是研究近代史的最重要文献。



消遣。贼至未决一死战，而全家自尽请恤矣”。

军队甚至扰民——“对敌之时，贼退始肯前进；贼如不退，兵必先退，带兵官且以胜仗俱报矣。及杀一二平民，或由贼去而未遇未剃发之村农，且以斩馘发逆无算，人告邀功矣”。

知识分子毫不关心民瘼——“通经原为致用，而今之士人，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清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

赫德甚至认为：“法本善而反恶，种种非是，以致万国之内，最驯顺之百姓，竟致处处不服变乱！”在晚清西方人的观察中，几乎都认为中国百姓是世界上最容易管制的百姓，但就是这些要求极低、仅得温饱即会热泪盈眶地歌颂伟大政权的“绵羊”，却不断地爆发群体性事件，乃至公然扯旗放炮。赫德这一指责，几乎一笔抹黑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对于外交关系，赫德指责中国官员“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试图对抗通商、传教自由以及条约体制，而两度陷于战败（指两次鸦片战争），“皆由智浅而欲轻人，

赫德和他的中国同事们



力弱而欲服人”。“外国所请，以力可得”，如果建立条约体制，“某事当行，某事不当行，已有条约可凭，一经背约即有问故之患……兹仍贸贸而行必启外多进一步之衅”，“无不知中外交兵，外有必胜之势”。这话当然刺耳，却是实情，正因为西方“有必胜之势”，条约才是对作为弱者的中国的保护。他认为，中国必须与世界融合，才能逐渐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而改革是唯一的出路，如不实行革新，则“数年之内，必为万国之役”。他提出中国应该信守条约，严格按照条约办事，并且应与列强互派外交官，打开大门，引进外资，建设合资企业。

### 稳定压倒一切

赫德毕竟是客卿，毕竟是高薪聘请的打工者而已，如此尖锐的建议书，恭亲王只得暂时压着，不能报给中央，“未敢上渎宸聪”。但恭亲王对他的认真态度给予了表扬：“于中外情形，尚能留心体察。”恭亲王此举，被后世不少人解释为大清中央对改革缺乏诚信，或解释为大清中央对“帝国主义急先锋”的猖狂进攻十分不满。而其时，恭亲王刚刚因规劝同治皇帝减少娱乐活动，多关注本职工作，而被这位轻狂的少年天子下诏“双开”，后经两宫太后亲自干预才罢休。这对于自信“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恭亲王，打击是十分巨大的。他绝对不想在这个时候再转奏一个老外的狂言，他需要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利用老外们的“危言”，令中央“耸听”，从而得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上图：威妥玛是一位学者，却奇怪地能将学者的温文尔雅与外交官的咄咄逼人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最让大清官方头疼而无可奈何的洋“刺儿头”。



下图：阿礼国

这个机会迅速到来。1866年3月5日，刚“进京三月有余”的英国公使阿礼国，要求威妥玛向总理衙门提交改革建议。这份改革建议以威妥玛个人身份所写，字里行间威妥玛都谦称自己为“弟”，但却通过官方的正式管道递交，阿礼国为此还发出了外交照会。这是一个十分怪异的安排，内中大有乾坤。

尽管称兄道弟，尽管本身学养深厚，威妥玛却与受到大清官场热烈欢迎的赫德完全不同，几乎很少有人喜欢他。大臣崇厚曾经说：“威妥玛的话是不能当真的——一会这个，一会那个——今天说是，明天又说否……暴怒、愤恨、咆哮、任性而发，使我们只好不理他。”

在这份名为《新议略论》的建议中，威妥玛提出了与赫德的《局外旁观论》相似的观点，批评中国的改革步子太慢，“缓不济急”，如果中国无法“借法自强，改革振兴”，那必然将招致列强更大的干预。

赫德在他的建议中，只提出违约启衅将引发中外冲突，威妥玛则干脆指出，中国内部的各种腐败现象本身，就足以对英国利益造成损害：“因中外诸务较之从前颇为胶漆之至，内或受危，外亦不免其害。……中华所有诸病，亦为我国嗣后受害之渐。”“盖中华果至终衰之时，诸国各有要务，见必受险，难免干预保全，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各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

比赫德更为直接而且透彻的是，威妥玛认为“中华日后能否保其自主”的关键，在于大清政府对内政的控制能力，西方本来并不想干预中国，但如果中国内政改革再不展开，则情况就难以乐观。

## 地方激烈反弹

收到了英国的正式照会，恭亲王只能向中央汇报，并将威妥玛与赫德的两份建议同时提交。报告中，恭亲王指责这两份建议“措词激切”、“恫词挟持”，“窥其立意，似目前无可寻衅，特先发此议论，以为日后藉端生事地步”。这等于是否定了这两份建议的任何正面意义，而日后的史家也大多因循恭亲王的口气，将这两份文件看做是“帝国主义急先锋”的杰作。

耐人寻味的是，恭亲王同时认为，既然人家发出了言辞威胁，“若不通盘筹划，事先图维，恐将来设有决裂，仓卒更难筹措”。他建议中央，将这两份充满敏感词的

文件，下发沿江沿海各省的督抚们“供批判用”，令这两份文件的“流毒”大大扩大。

恭亲王确定的讨论主题是，“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有备无患”。吊诡的是，各省的表态一亮相，便截然分成了壁垒清晰的两个阵营：几乎所有的满族干部，都认为这两份报告是列强“求媚于中国”的表现，对此不必抱持敌对心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张“借法自强”，认为英国人“所言类多要求，其所论不无可采”；湖广总督官文则认为，两份建议“若其论中国政事之得失，虽辞多谬妄，而深切事机之处，亦复不少，中外臣工自当随事随时，力图整饬”，对西方“不必处处疑其挟诈怀私”，而可以“推诚相与”……

而几乎所有的汉族干部，包括那些站在改革第一线的实践者，都对这两份充满“危词恫吓”、“傲慢之谈”的建议，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左宗棠痛骂赫德与威妥玛，甚至认为英国根本不值得效仿，他举例说连英国产的来复枪都比不上广东土产的无壳抬枪；

刘坤一认为绝对不能派遣外交官，以免被敌对势力“挟以为质”，铁路、电报也不可行，至于铸钱、造船、军火、练兵等，可以“斟酌仿行”；

翁同龢则在日记中将这两份建议书记载为“英夷又屡有要挟”，而北京知识界“相与谈夷务，悲怀慷慨，莫能伸也”；

曾国藩在致丁日昌函中说：“闻洋人在京陈说多端，词意激切，有所谓局外旁观论者，新议略论者，呈辨寻衅，咄咄逼人。”继而，在提交给中央的心得体会中，曾认为大清应该谢绝这种“劝告”，“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这等于是中央向威妥玛、赫德等发出“反威胁”；曾国藩最亲信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载道：“见示洋人在总理衙门所递议论二篇，均言中国政治之不纲，不日将为万国之役，尽情丑诋，而托为友朋劝谏之语，欲中国改从其国之法，庶可自立，否则至危险之际，彼国各有难弃之事在中国（通商、传教等），只得自己护持，不能由中国作主。又力言欲行轮车电器诸事，中国若不听从，彼当自行……阅之令人发指。窥其意旨，盖以中国捻肆猖獗，兵力不敷，故敢为此恫喝，从之则堕其计中，不从则将来起衅之端，随时皆有。”

赵烈文对恭亲王评价一向很低，这次更是认为恭亲王让地方督抚讨论两个洋人的建议是其惊慌失措的表现，他感慨道：“嗟乎！自强之道，端在政本，疆吏能设法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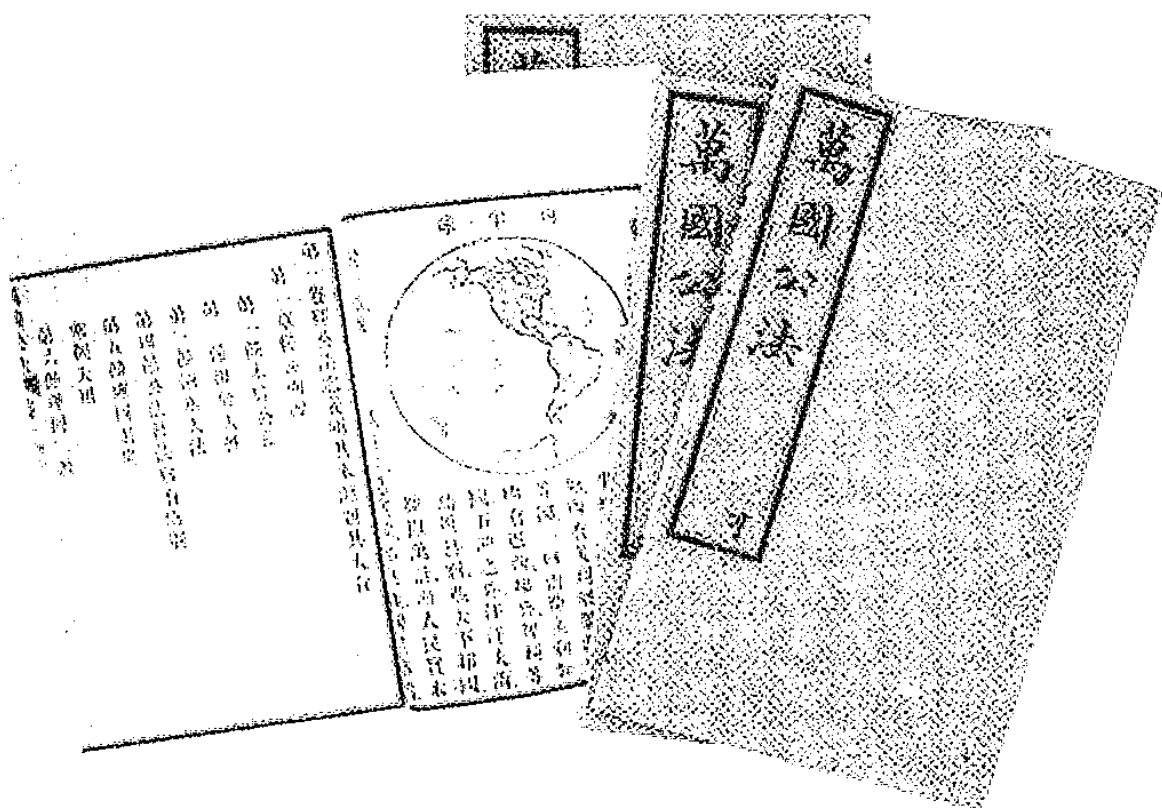
枋国若此，夷言殆必售矣。大江以南必沦异域，其事不远，如何可言！”

在这次小范围、高规格的大讨论中，呈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真正在第一线身体力行进行改革的汉臣们，却在言辞上激烈批评这两份力陈改革的建议书，高调地强调自己对传统和中央的认可；而那些对两份建议主张宽容接纳的满臣们，则多数并非改革的先行者。从日后的历史走势来看，汉臣们对两份建议的“批判”，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表态的需要，这与之后改革过程中，中央的所谓“保守派”往往以汉人居多，言辞也较满人更左、更保守，是一致的。改革是一场利益调整，本就错综复杂，而汉臣们因为血统的关系，往往担心会被扣上一个“以改革的名义反对现政权”的帽子，不得而言行分裂，旗帜高高举向左边，脚步却实实在在地踩在了右边。这种体制内改革者的无奈，却往往难以被时人及后人谅解。

### 一台“双簧”？

洋人们并没看错的一点是：大清国的最大隐忧，的确是中央权威的沦丧和政权的失控。利用威妥玛和赫德的两份建议，组织地方督抚大讨论，也是恭亲王“以夷制藩”的手法：强化危机感，强调改革的紧迫性，在救亡图存的名义下，加强政权的凝聚力建设，确切地说，要争取将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理解、贯彻和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刚刚平定了太平天国动乱的大清国，胜利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一面是列强



左图：《万国公法》为英国人惠顿撰，丁韪良译，1864年（同治三年）京师同文馆刊行。

右图：徐继畲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在文学、历史学、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

要求在刚刚收复的南方加快落实各项条约，另一面是长达十年的内战所造成的地方诸侯的实际割据。在大清国的政治棋盘上，力量过于强大的地方诸侯已经取代了太平天国，形成了列强、中央与地方的新的三角关系，“强枝弱干”成为中央必须首先解决的主要问题。那些手握重兵的诸侯们，并非没有乘时而起、黄袍加身的机会与诱惑。

与此同时，中外关系进一步改善：大清中央正式任命英国人赫德出任海关总税务司；在总理衙门的全力支持下，美国人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一书刊印出版；因鼓吹自由化而被贬官十年的徐继畲，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他那曾经被冷冻的旧作《瀛寰志略》，也获得公费印刷出版，成为省部级官员的学习资料，美国总统还专门给徐继畲送来了国礼。

地方诸侯们却挟胜利之威和传统的天下观，对于中央业已确定的对外条约体系，实行抗拒和抵制，这实际上威胁到了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中央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在赫德与威妥玛建议书中提到的一些具体事件，如广东潮州拒绝洋人进城、贵州教案等，都不仅是“对抗列强”的“爱国”表现，也是“对抗中央”的“离心”表现。

“削藩”实际上已经成为大清中央与列强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当英国公使提交照会后，恭亲王立即心照不宣地、大张旗鼓地强化了这两份建议背后的英国官方色彩，拉响了警报，从而得以在“批判”的外衣下，借英国人“制造”的危机感，发起了一场特殊的改革大讨论和动员。

尽管被挂上了“批判”的标签，赫德和威妥玛建议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还是被融汇进了恭亲王日后的改革措施。而那些高声谴责洋鬼子的汉臣们，则成为改革的中坚。喧天的锣鼓声中，赫德和威妥玛高唱的，究竟是谁家的主旋律呢？



约翰·汤姆森拍摄的恭亲王像

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森于1862~1872年间，游历了新加坡、柬埔寨、中国和其他远东地区。在北京的时候，他通过丁韪良的介绍，进入了总理衙门，为恭亲王奕訢和其他总理衙门大臣拍摄了一系列珍贵的历史照片。在《携带相机走遍中国》（1899年）这本回忆录中，汤姆森提到了他与恭亲王在北京的首次会面：“我有幸在京师经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的引荐，结识了恭亲王和清政府中其他一些著名的官员；而他们也乘我拜访总理衙门的机会，让我给他们拍了一些肖像照片。恭亲王的到来打断了我们的交谈。他很亲切地跟我寒暄了几分钟，询问了我旅行和摄影的情况，并且对能够如此逼真录影的照相过程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他中等身材，体态清瘦；说实在的，他的外貌并没有像在场的其他内阁大臣那样给我留下那么好的印象；然而用颅相学的角度来看，他的天庭确实非常饱满。他目光敏锐，静坐时脸上流露出一种异常坚毅的神情。我望着他，心里在想他是否感觉到自己肩上跟周围那些大臣们分担着指引千百万人民命运的重任，或者他与那些身份显赫的同事们是否对于大清帝国及其人民的现状感到心安理得。”







大戏楼内戏台 这里是恭亲王举办盛大宴会的场所。因为奕訢的生日适逢寒冬，在庆寿活动期间，戏楼的地面下会修造火道，点火驱寒，温暖如春。戏楼内四壁至顶皆彩绘藤萝，紫花盛开，在晶莹剔透的水晶吊灯的映照下，恍如仙境。池座中，达官显贵济济一堂，推杯换盏；包厢中，皇亲国戚屡屡拱手，嘘寒问暖；戏台上，京城名角争相献艺，彩衣飞扬。



以恭亲王 56 岁时举办的庆寿堂会为例，当时在大戏楼里萃集了当时剧艺冠绝的诸大名伶，如号称“同光十三绝”中的 6 位，以及各行当中的顶尖人物都有戏码儿参加，演出剧目达 70 余出，一天一场，连演五、六场之多，堪称当时京城堂会规模空前的盛举。（陈鸿舜收藏，照片拍摄于 1940 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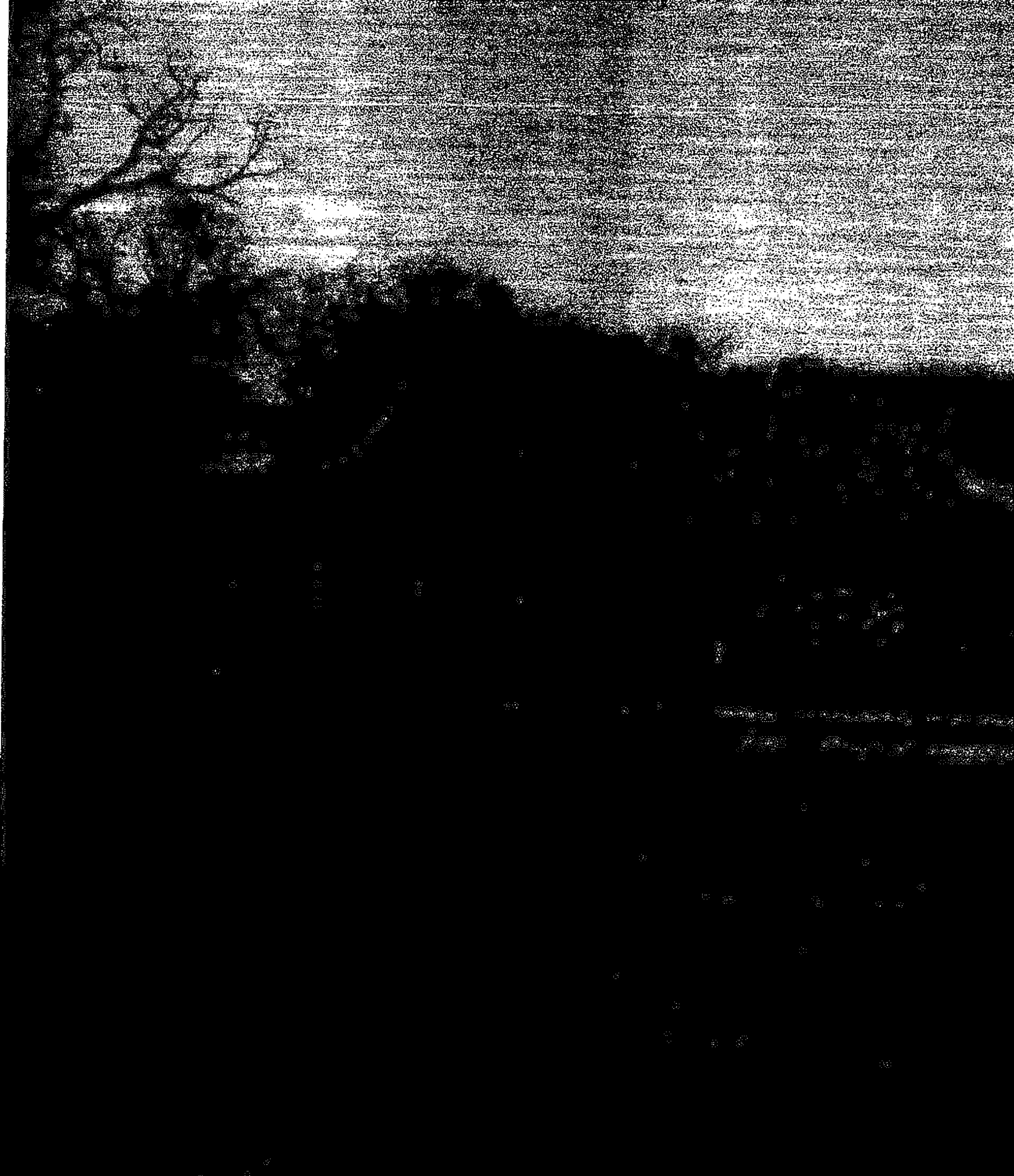
大戏楼室内吊灯 此吊灯为西洋式水晶灯，造型华美，与室内藤萝、花枝纹相映衬，更显大戏楼的富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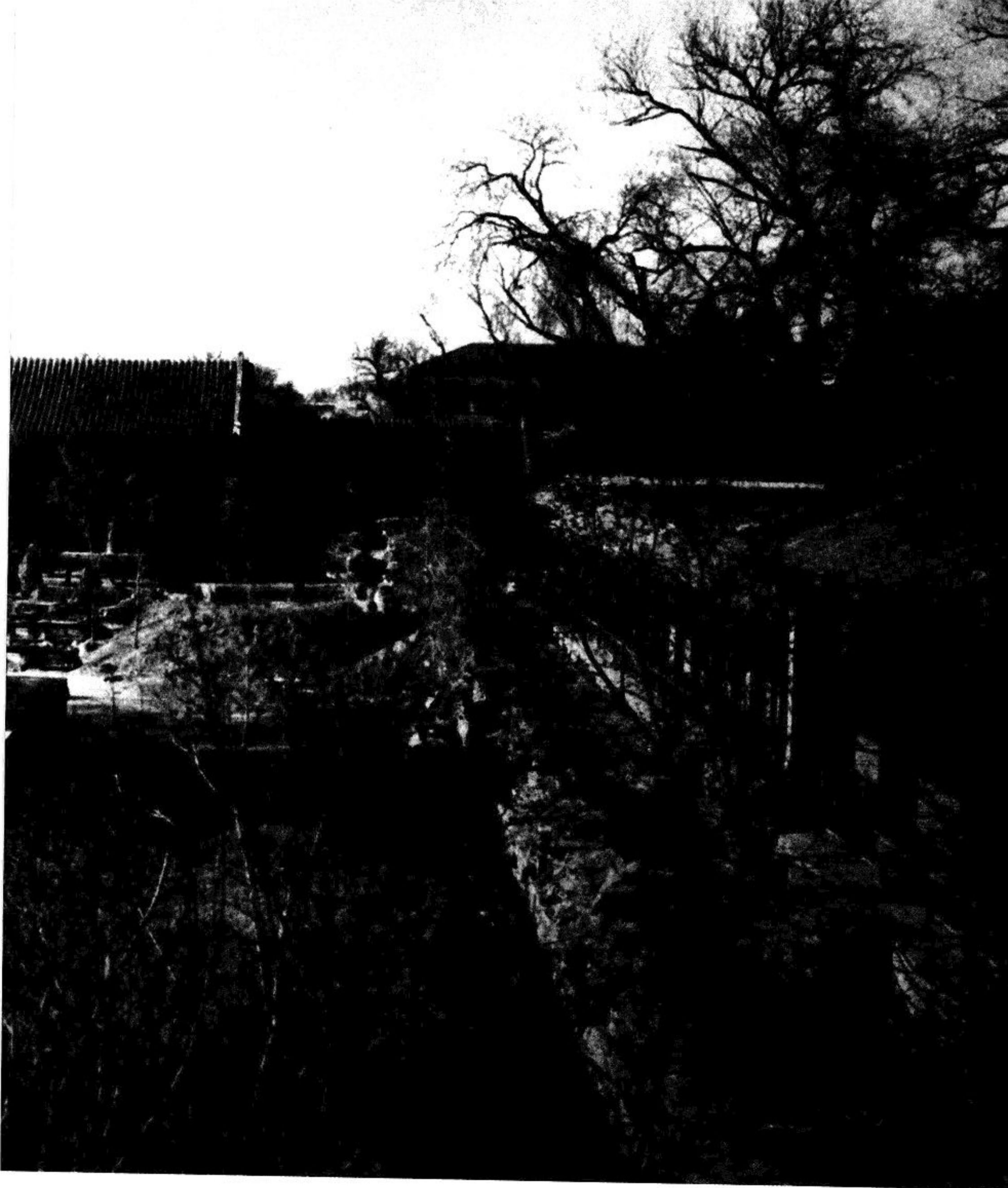
后罩楼东院 照片由东向西拍摄，气势雄伟、壮观。清代王府中，间数如此之多、规模如此之大的后罩楼是绝无仅有的。关于后罩楼的用途，一种说法认为这里是供奉之处，作为“遗念殿”供奉先帝、后穿戴过的衣服和帽冠等物品，并设置佛堂和祠堂；一种说法认为这里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



而根据 20 世纪初期的一些文字记载推测，这里应该是恭亲王的“藏宝楼”，从小恭王手里购买了几乎所有古玩珍宝的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就曾描述，放书画、如意、铜器的房子有几十栋之多。（陈鸿舜收藏，照片拍摄于 1940 年前）



方塘及观鱼台南面 恭王府花园西路有一座占地约两亩的长方形池塘，其中心建筑名为观鱼台，俗称湖心亭，是一座三开间，四面通透，建在方条石砌成的平台上，与岸边不连接。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池塘已干涸，池塘西岸及北岸有不少花木，拍摄季节应为春天。(选自《中国花园》，1949年)





恭王府府邸中路院 银安殿 摄于 200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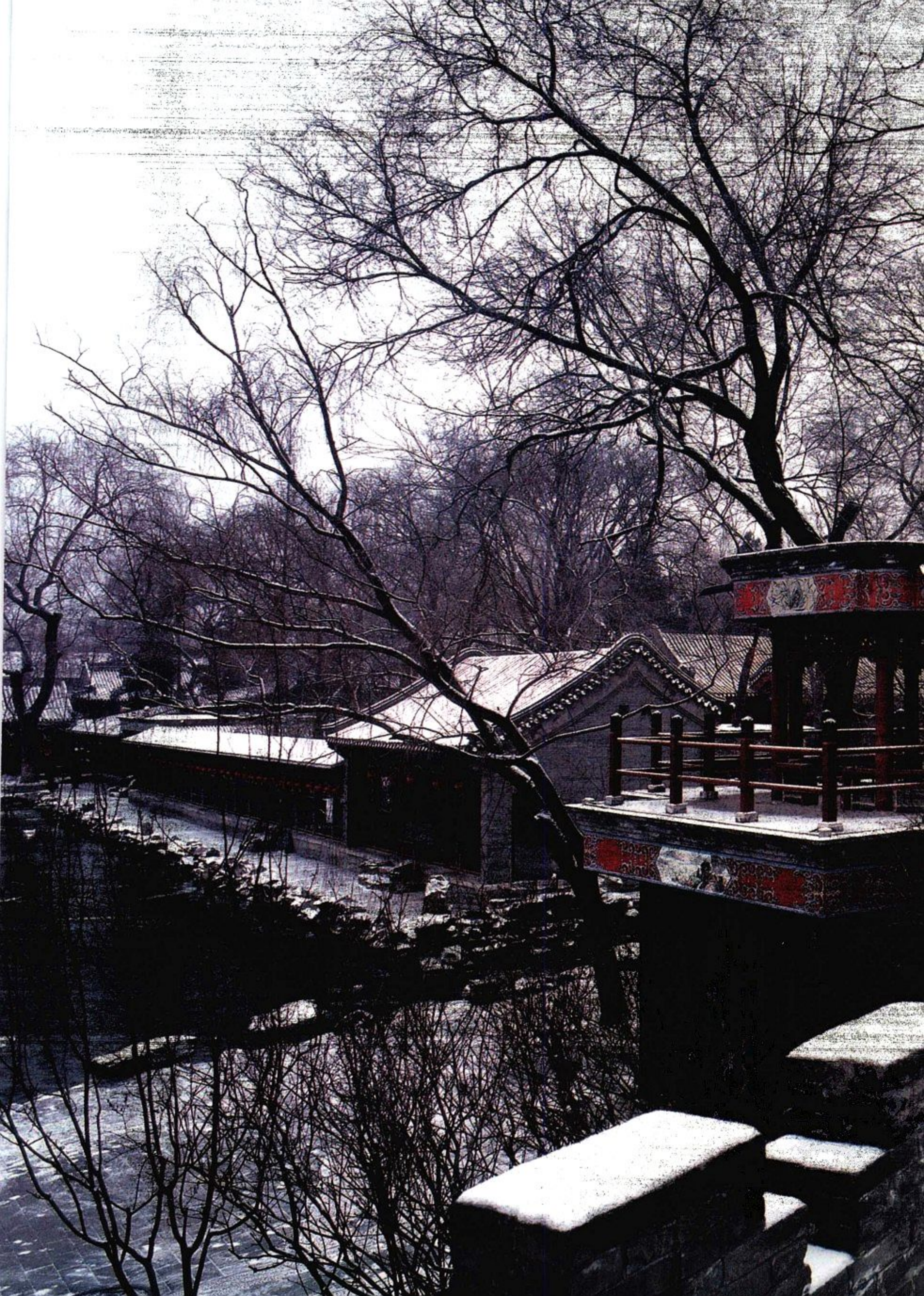
嘉乐堂 位于银安殿之后，是王府中路最后一座绿琉璃瓦的建筑。在恭亲王时期，嘉乐堂称为“神殿”，主要作为王府的祭祀场所，内供有祖先、诸神等的牌位，以萨满教仪式为主。与沈阳故宫的清宁宫、北京故宫的坤宁宫一样，这里是主人举行萨满教祭祀的地方。除此之外，嘉乐堂的东部两间隔断成一大间，府主及其承袭人新婚的第一个月要在这里度过，表示对神的敬重和奉献。

摄于 2009 年





恭王府花园 湖心亭  
摄于 2009 年





恭王府花园 妙香亭与榆关长城  
摄于 2009 年





## 第五章 美国兄弟



西洋门（背面） 恭王府花园的正门是一座西洋建筑风格的汉白玉拱形石门，俗称“西洋门”。该门形制仿圆明园中大法海园门所建，造型舒展流畅。西洋门正面题额为“静含太古”，背面为“秀挹恒春”。（选自《北京的恭王府及其花园》，照片拍摄于1940年）

---

---

## 华盛顿的定情信物

大清“右派”对华盛顿的评价令美国人大为感动：华盛顿率众起义，堪比陈胜、吴广；割据一方，堪比曹操、刘备；等到功成名就时，却“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这种“天下为公”的高风亮节，堪比尧、舜、禹……

---

---

一份定情礼物越过了大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来到了大清首都北京。这是美国国父华盛顿的油画肖像，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Andrew Johnson）指令国务卿西华德，由专人临摹复制著名画家斯图尔特（Gilbert Charles Stuart）的作品，赠送给大清国作为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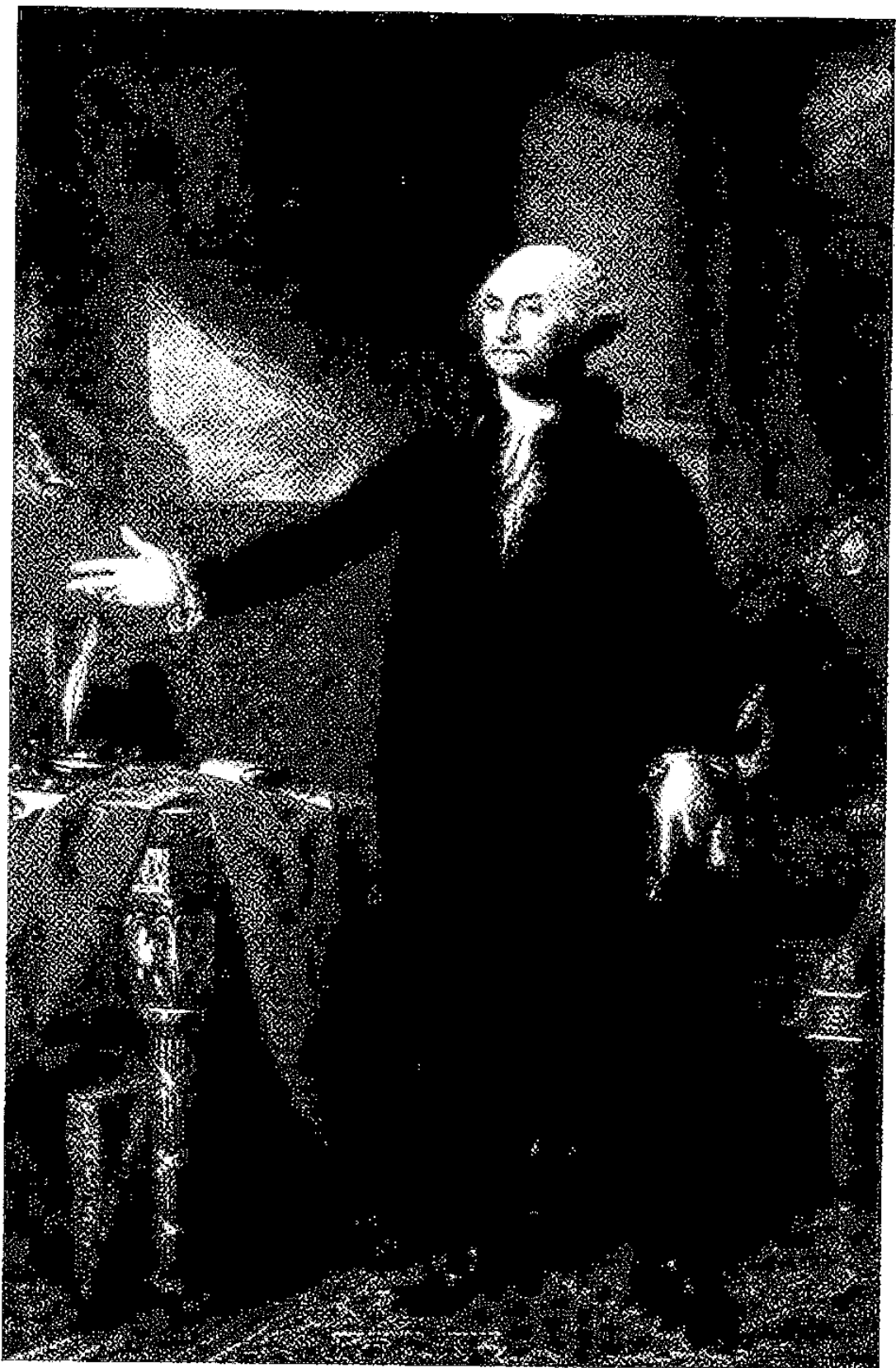
这件礼物的收件人，是大清国外交部排名最后的一位副部长（总理衙门大臣）徐继畲，一位在恭亲王的力保下，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不久的老干部。而这背后，则是美国政府对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领导集体的一种友好姿态。

### 美国尧舜

时年 72 岁的徐继畲，是大清国官场中相当著名的有自由化倾向的大右派。他受到美国人的推崇，主要在于他将美国国父华盛顿描绘成了美利坚的尧舜。

在徐继畲于 1848 年写就的《瀛环志略》一书中，在述及美国时，徐继畲对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将其视为西方最伟大的人物，并将其放到中国历史的参照系中进行对比。他认为，华盛顿率众起义，堪比陈胜、吴广；割据一方，堪比曹操、刘备；等到功成名就时，却“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这种“天下为公”的高风亮节，堪比尧、舜、禹（“翼翼乎三代之遗意”），“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首哉！”

徐继畲的这段话，后来以中文直接镌刻在了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上，至今为人凭吊，1997 年美国总统一克林顿在北京大学发



华盛顿肖像 斯图尔特所做的华盛顿肖像，细节十分考究，据说每个细节都是完美再现当时的情景。此画成为美国最常用的国礼。

时年 72 岁的徐继畲，在 1848 年写就的《瀛环志略》一书中，对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给予高度的评价。徐继畲的这段评价，后来以中文直接镌刻在了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上，至今为人凭吊。当徐继畲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主持大清国“同文馆”后，美国政府特地向他赠送了这幅华盛顿画像。

表演讲时，还引用此文。

徐继畲对华盛顿的评价之高，大大超过了美国人的想象，美国公使蒲安臣专门向美国国务院做了专题汇报。当徐继畲复出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尤其是主持大清国第一所干部学校“同文馆”后，美国政府决定向他赠送华盛顿的画像。

这幅华盛顿画像的原作者斯图尔特，是美国著名的肖像画家，他一生创作了无数华盛顿的肖像，其中最为著名的一幅题为《图书室》，该画中的华盛顿头像被印在一美元钞票上，广为流传，其复制品在当年成为美国政府及议会向国际友人赠送的国礼。徐继畲所收到的，应该就是这幅画的摹本。

徐继畲写作《瀛环志略》，是因为深受鸦片战争的刺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在福建任官，直接见证了这场战争。此后，他一直在福建，累迁到了巡抚，并且代理闽浙总督。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作了《瀛环志略》，全面介绍了世界地理、风物人情、军工器物乃至政治制度。

作为体制内的开明官员，徐继畲的自由化言论令自己迅速成为靶子。与之前“睁眼看世界”的《海国图志》等著作不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还“睁眼看中国”，第一次不再端着天朝上国的架子，书中也很少出现“夷”之类的蔑称。最为关键的是，徐继畲大大超越魏源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鲜明地提出了全面学习西方，包括其政治体制的观点。

一位省部级高干，居然敢明目张胆地宣扬西方政治体制，贬低有大清特色的先进的社会制度，自然遭到了守旧者及政敌们的广泛打击，他被抨击为“轻信夷书，动涉铺张扬厉。泰西诸夷酋，皆加以雄武贤明之目。佛英两国，后先令辟，辉耀简编，几如圣贤之君六七作……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按照美国学者龙夫威（Fred Drak）的说法：“因为他（徐继畲）对中国之外世界的开明观点，摇撼着中国文化至高无上的传统观念，他变成了守旧的反动派的靶子。”

最为痛苦的是，在最猛烈的攻击他的敌人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林则徐。1850年，因为一名英国医生及一名英国牧师租住了福州城内的神光寺，引起谣传说英国人将来进攻。正在福建老家养病的林则徐，鲁莽地要求徐继畲驱逐英国人，并且备战，在遭到徐继畲的反对后，便告上了北京。咸丰皇帝很重视，派员调查，结果发现整个福州城内仅有5名洋人而已，完全是风声鹤唳。但徐继畲依然被迅速内调，从一个封疆大吏改任“弼马温”（太仆寺少卿，太仆寺主管皇家的马政，类似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汽车管理处），不久便下岗回到山西老家。吊诡的是，徐继畲走后，福州的“爱国者”们便不再限制洋人入住，“神光寺事件”其实成了驱逐徐继畲的一场权争游戏。

徐继畲下岗后，他的《瀛环志略》也是“罕行世，见者亦不之重”，倒是在日本先后两次翻刻，风行一时，这倒与《海国图志》命运相仿——1862年，日本维新人士高杉晋作随同“千岁丸”前往上海，就吃惊地发现在日本畅销的《海国图志》居

然在大清国绝版。

东方风来满眼春。1865年随着英法联军的撤退和太平天国的灭亡，执政的恭亲王决心在推进改革方面，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外交事务需要像徐继畲这样的老右派来推动一下。于是，大清组织部门一纸调令，赋闲了13年、年逾七旬的徐继畲“临老上花轿”，并且从原来的“从四品”一跃到了“正三品”，焕发了政治上第二春。美国传教士、与恭亲王有着密切关系的丁韪良对此评价道：“前福建巡抚徐继畲由于地理知识丰富，得以进入总理衙门任职……他的复出是好的迹象，尽管他的考古学不无错误。举国皆盲人，独眼称大王。”

随后，恭亲王又大力推荐徐继畲出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认为他“老成望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徐继畲到任后，同文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与倭仁等守旧派的激烈冲突中，徐继畲成了恭亲王最为得力的助手。

## 美国国礼

就在恭亲王、徐继畲等为同文馆的改革而与倭仁等相互斗法时，美国人及时地给这位大右派送来了国礼。没有史料证实，美国人是否想以此给中国的改革派增加点砝码，但是，美国人却毫不掩饰地承认，赠画的目的正是希望恭亲王、徐继畲等，能在同文馆这个培养大清国干部的摇篮中，大力宣扬美国精神。

1867年10月21日，简朴而郑重的赠画仪式，在总理衙门内举行。主持赠送仪式的，是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随行的有作为翻译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卫三畏（Wells Williams），此二人都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在中国官场有相当人脉。蒲安臣15岁的儿子沃尔特（Walter Anson Burlingame）也随行观礼。

美国官方十分重视这次赠送仪式，美国国务院专门向蒲安臣发布了详细的指示，对仪式上的措辞等做了细致的安排。相对于官方的干巴巴的记录，小沃尔特在两天后写给爷爷的家信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在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的全过程，并且毫不掩饰那种能见到“控制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统治者”的欣喜。

根据小沃尔特的家信，举行典礼的地方，是总理衙门内一间很小的会议室，只有30平方米左右。显然，总理衙门内家具和装潢之简朴，办事员们穿着之朴素，都大大出乎小沃尔特的预料。他所不知道的是，大清国虽然成立了总理衙门，并且以

恭亲王领衔，却总是心不甘情不愿的，给总理衙门安排的办公室，相当破败，以此表达内心对“夷务”的蔑视。

中国官员们陪同美国人在圆桌旁坐下，蒲安臣身边是徐继畲，花白头发花白胡子，看上去“没几天好活了”；徐继畲边上则是主持总理衙门日常工作的文祥，在小沃尔特看来，文祥相貌堂堂，身材很好，充满智慧，“不像普通中国人”。蒲安臣事后向美国国务院发送的电报中，只是简单地提及总理衙门的成员们都出席了仪式，但从小沃尔特的家信中，可以确认，总理衙门的一把手恭亲王没有出席。似乎并没有人对此大惊小怪，显然，恭亲王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出席类似的礼仪性活动，虽然人们依然能随时感觉到他的存在。

蒲安臣首先发表了致辞。他说，华盛顿不仅是属于美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他的光辉也必将闪耀在中国。他说，华盛顿所实践的，正是中国孔夫子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We should not do to others what we would not that others should do to us.”），中美两国应当互相学习，加快改革和进步。他提到，徐继畲因写书介绍华盛顿及西方国家而被贬十多年，如今被重新重用，并且主持重要的教育机构，这是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希望徐继畲能将华盛顿的思想传递给中国的年轻人们。

徐继畲做了答谢词后，众人就起立，围观那幅华盛顿的画像，并就广泛关心的中美关系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而在大人们讲话的时候，仆人们络绎不绝地端上了各种点心，把小沃尔特高兴坏了。细心的主人还为客人们准备了刀叉，小沃尔特埋头苦吃他盘子里的各种糕点，而主人们也不断地给他添加，最后实在是吃得太饱了。在他的家信中，孩子还写道：“所有这些都让我对中国更加充满好感。必须承认，中国人就是东方的新英格兰人（即美国人）。”

美国各大报纸对此赠画仪式都纷纷作了报道，一时之间，这幅画成为以恭亲王为首的中国改革者们牢牢掌握权力，并且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象征。

## 美国干部

赠画仪式前几天，蒲安臣曾征询总理衙门意见，赠送仪式究竟在总理衙门还是在使馆进行。其实，美国政府很希望中方能同意在使馆内进行，但他得到了毫不含糊的答复：在总理衙门内举行。外交无小事，要在自己的外交部内接受国礼，这

毫无疑问必须经过恭亲王的首肯。

那时的大清上下，对美国都充满了好感。列强之中，似乎只有淳朴的美国牛仔是真心帮助中国的，从“洋枪队”首领华尔到总理衙门的丁韪良等，都表现出了与他国人士不同的品性。甚至连美国派驻大清国的“钦差大臣”蒲安臣，也在国际纠纷中努力帮助中国，在解散阿思本舰队的复杂事件中，如果没有蒲安臣的协助，中英双方刚刚好转的关系将迅速降温，甚至可能爆发冲突。

蒲安臣的友善与能力，受到了恭亲王的大力赞赏。赠画仪式后，蒲安臣再度到总理衙门与恭亲王道别。此时，大清国正准备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西方列国巡回，恭亲王居然创造性地想到了由蒲安臣出任中国的“钦差”。在随后总理衙门为蒲安臣安排的告别宴会上，恭亲王亲自出席，并由丁韪良为他做翻译。在席间，总理衙门的二把手文祥郑重地提出了邀请。不久之后，卸任公使之后的蒲安臣，披挂上了正一品的顶戴花翎，在黄龙旗的护卫下，率领大清代表团走向了世界。而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华盛顿。

中美之间的蜜月开始了，横亘在两国之间的太平洋，也都秋波荡漾起来了……



在恭亲王和美国最高领导层的大力推动下，中美开始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蜜月，共结秦晋之好。图为美国人画的中国式婚礼。

---

---

## 黄龙旗下的美国葬礼

这一在中国被后世的“主旋律”指责为卖国的条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成为各界讴歌和欢呼的对象，认为这是中国与西方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启超，他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

---

---

1870年4月23日，星期六，美国波士顿。

一场隆重的葬礼在这个城市举行，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街头，为一位美国外交家送行。由军人和警察护卫的灵车，覆盖着中美两国国旗：星条旗和黄龙旗，在当地消防队乐团演奏的哀乐声中，缓缓驶过街道。在举行仪式的教堂墙壁上，也交叉悬挂着巨大的星条旗和黄龙旗，USA和China是当天所有人议论的焦点。

遥远的北京，大清国的中央领导核心、恭亲王奕訢，虽然并不知道丧礼的确切议程，却也用自己的方式在哀悼。一个月前，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下诏，赐予死者一品官衔，给予家属1万两白银的优厚抚恤金。因为，这位美国外交官也是大清国的洋干部，并且在为大清国出使俄罗斯时，“捐躯于异国”（使团成员志刚语）。

他的名字叫蒲安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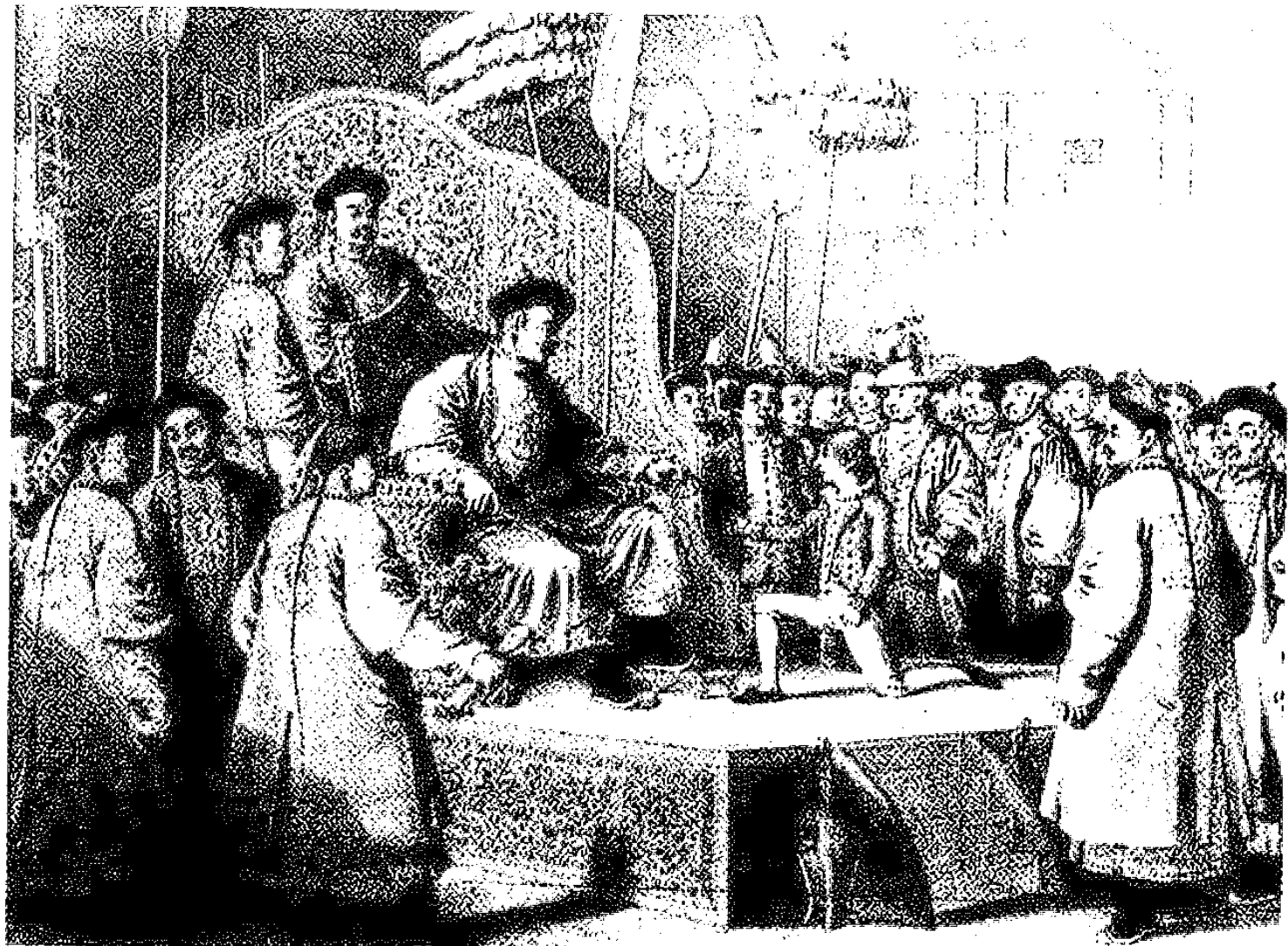
### 伸手摸世界

在披挂上大清国的一品顶戴花翎之前，蒲安臣是美利坚合众国派驻大清国的公使。1867年，蒲安臣完成了他在中国的六年任期，即将回国。此时，恭亲王等正在苦苦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率领大清国代表团遍访各签约国。

这一年，正处在改革开放初级阶段的大清国，内乱与外患都暂时消弭了。除了将精力放在以军事变革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之外，恭亲王率领的本届政府，也着重调整中国的外交格局，与列强之间，不仅要“请进来”（当然列强都是不请自来的），更要走出去，除了“睁眼看世界”外，还要“伸手摸世界”。恭亲王在写给慈禧太后



1793年，以英国外交官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在热河行宫觐见乾隆皇帝。图中英使马戛尔尼和他的侍童小斯都是单膝下跪呈送国书和接受皇帝赠品。



的报告中，提到：“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

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之前与列强们签订的各项条约，又到了要续签修订的时候。根据以往血的教训，可以断定列强们必然会提出种种要求，而中国如果不走出去实地调查，将无法制定应对之策，无法维护、保障和争取中国的利益，甚至都无法定位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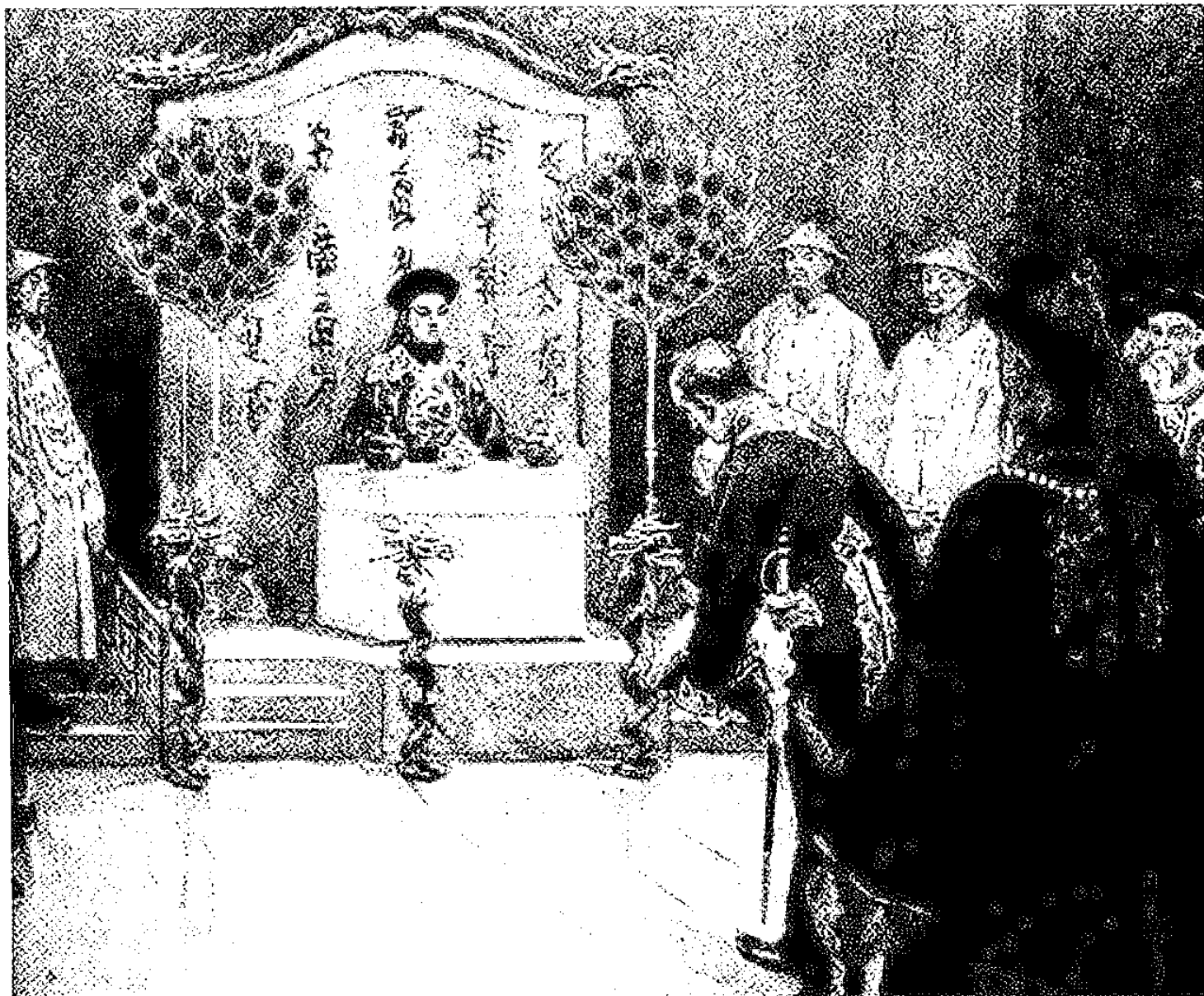
“摸世界”的长期战略动机，与“准备修约”的短期战术动机，促使恭亲王决心派团出访。而现实困难是：以中国之大，居然“使才难觅”，即使要找出些精通外文的翻译人才，都十分困难，何况是讲政治、懂政策、会韬略、通外文的外交人才。恭亲王担心，“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则反而“误我事机”。另一个担忧是，中国一直要求外国使节觐见皇帝和太后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遭到列强的强烈抵制，双方只好暂时搁置争议，列强外交官也因此无法按照国际惯例觐见中国元首，递交国书，而都由总理衙门和恭亲王代劳了。如果派出正式使臣，按国际惯例觐见了外国元首，那对方的使臣就可以要求对等待遇，这“叩头”问题又将成为麻烦。

困难既然如此之多，出使又是势在必行，恭亲王便创造性地想了个新办法：聘请洋干部出访。洋干部们出访西洋，本身没有语言障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已经在

中国生活工作多年，熟悉甚至精通中国的语言和习俗，双向沟通都可以很顺畅。而且，请洋人出面，似乎有望避免列强们以此提出对等要求，他们总不至于也任命华人作为洋使来觐见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吧。这后一点当然很牵强，即使委任洋干部出访，那也依然代表大清，人家一样能要求对等觐见，这在日后果然应验了。这与其说是恭亲王的想法，莫如说是恭亲王以此来忽悠反对者们，摸着石头先下水再说。

与所有不得不稳健从事的改革者一样，恭亲王在这件事上先做了个试点。1866年，大清中央最为信任的洋干部、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请假回英国老家长达半年。他建议恭亲王派些人，与他顺道回去，实地考察西方的风土人情。恭亲王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派了赫德海关衙门里的斌椿。斌椿当时在海关担任秘书工作（“文案”），都64岁了，是个典型的“老秘”。因为出任了大清国这破天荒的“鬼使”，他得到了组织上的破格提拔：一跃成为正三品的省部级官员，这在政治上（其实是官位上）积极追求进步的大清干部们眼中，还是值得的。斌老爷（赫德在日记和书信中对他的戏称）耐着性子开始公费周游世界，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柏林、布鲁塞尔、巴黎，但到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按照美国人丁韪良的说法，斌椿对于

左图：斌椿在伦敦时拍摄的照片 右图：1898年戊戌变法前，光绪皇帝接见外国使臣的仪式。



别人每句赞扬西方的话，都要十倍地予以反驳，总归是看啥都不顺眼。几经请示国内，恭亲王终于同意斌椿在巴黎结束行程，放弃了计划中的美国之行。当斌椿从西方那些“蒸汽和电气带来的惊心动魄”及“失礼与恶劣带来的烦恼”（当时的美国史家马士评价）中解放出来时，恭亲王却并没有放弃进一步走出去的想法，但他似乎更坚定地准备选择一位思想上没有任何包袱的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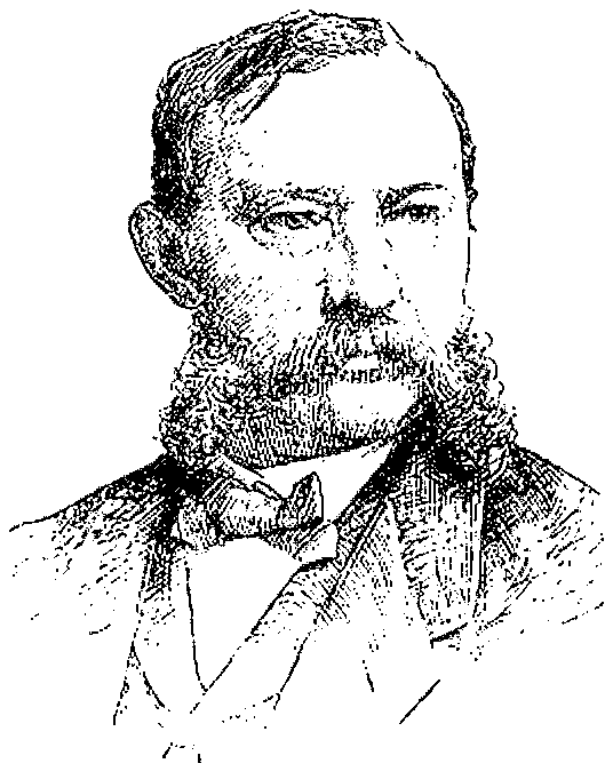
## 外交创举

赫德当然是首选，但赫德忙于海关这个大清国最为重要的税收渠道，无法分身。几经斟酌，恭亲王选中了“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并且即将卸任美国公职的蒲安臣。

蒲安臣 1820 年出生在美国波士顿，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当了没几年律师后进入政坛，积极宣扬反奴隶制度，与后来担任总统的林肯关系密切。35 岁（1855 年）那年，他当选为美国众议院议员，声誉鹊起。林肯就任总统后，于 1861 年任命蒲安臣为驻奥匈帝国公使，但当蒲安臣行至巴黎准备上任时，却传来消息，这一任命遭到奥匈帝国政府的坚决拒绝。原来，蒲安臣十分同情匈牙利的独立运动。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恭亲王代表大清国与列强签订条约，同意列强派遣使节常驻北京，林肯便将这一破天荒的职位给了蒲安臣。

这个在面对国内的黑奴制度和国外的民族压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议员，却在中国成了最受欢迎的弥勒佛。无论其动机如何，在大清国最为痛苦和孤独的时候，他令看惯了列强脸色的恭亲王和大清政府感觉到了温暖。

恭亲王选中蒲安臣，这不仅是对蒲安臣个人的认可，更是对美国的肯定。总理衙门一贯认为“英法美三国以财力雄视西洋，势各相等，其中美国最为安静，性亦平和”，曾国藩也认为“米夷质性淳厚，于中国时思效顺”。而蒲安臣在华的工作方针，就是要“用公平的外交，来代替武力，用公



*Anson Burlingame*

蒲安臣是绝无仅有的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中国使节的一位美国人

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积极推行“合作政策”，协助中国解决了一些棘手的外交问题，深得信赖。

在大清国外交部（总理衙门）为其安排的告别宴会上，恭亲王等试探了他的意向，双方一拍即合，一个外交史上的创举便定了下来。

这一创举，根据当时的海关洋干部、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马士的记载，“震撼了北京外交界”。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说：“这一决定，乍听之下，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公布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一定是经过长期的和缜密的考虑。”

应该说，这是蒲安臣个人事业的顶峰。此时，他年仅47岁。

### 美国“汉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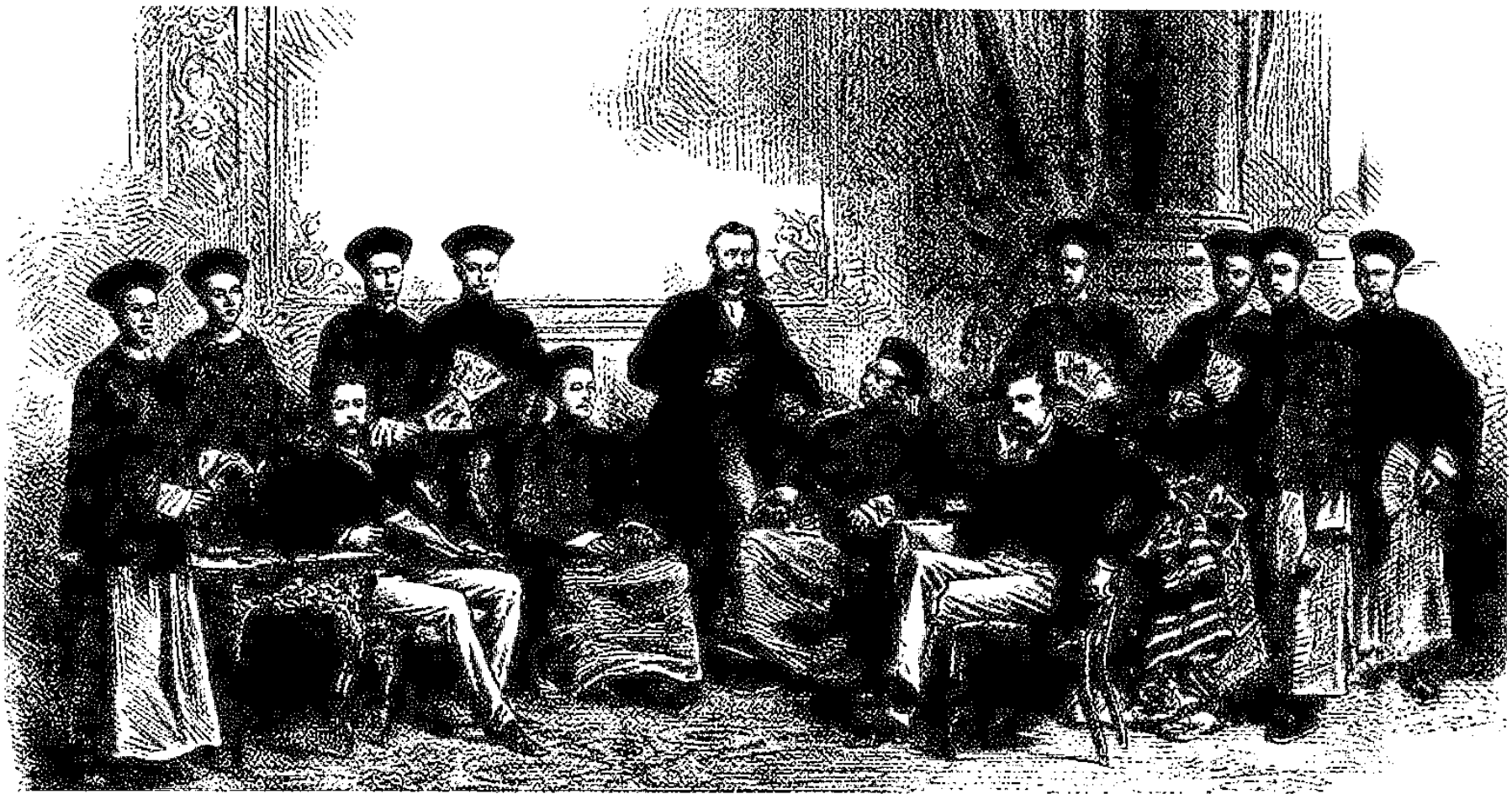
扛着黄龙旗出访的蒲安臣，第一站就是他的祖国美国，最大的成就就是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

这一条约包括了8项条款，主要是：保持中国的完整；中国控制自己的内地贸易；中国在美国各商埠设立领事馆；相互不得进行宗教迫害；鼓励中国劳工向美国移民；相互居住和旅行的权力；相互准许对方学生入学；不干预中国的内部发展。

这一在中国被后世的“主旋律”指责为卖国的条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成为各界讴歌和欢呼的对象，认为这是中国与西方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启超，他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

这些不同的观点，直接关系到后世对蒲安臣的评价：他或者是中国人民的友善朋友，或者就是帝国主义的阴险帮凶。而指责他为帝国主义走狗的主要依据，就是这一条约掀起了华工进入美国的高潮，随即激起了美国国内的反华浪潮，这些华工普遍受到了迫害。

指责走狗的慷慨激昂者，却很少考虑：正是“蒲安臣条约”的存在，令美国各地的排华行动，面临着法律上的巨大障碍，而排华的主力军，正是以爱尔兰裔为主的美国“工人阶级”，他们在勤劳、安分、灵巧的中国工人竞争下，采取了暴力行动。而美国政府在很多场合下，根据条约及美国国内法律，不惜动用警察甚至军队，武装保护华工，与示威者爆发流血冲突。在反华者的巨大压力下，国会数次通过排华



蒲安臣使团走遍欧美各邦交国，是大清国的第一个正式使团。

上图：使团主要成员合影。

中图：西方报刊刊载的蒲安臣使团铜版画。

下图：蒲安臣与使团成员在巴黎。

法案，却最终都搁浅在“蒲安臣条约”上，可以肯定那些排华者必定跳着脚大骂蒲安臣为“汉奸卖国贼”。直到“蒲安臣条约”期限过后，美国的排华才上升到立法层面。

## “殉职”俄罗斯

蒲安臣使团，承担的是遍访列国的任务。从1868年2月成行，直到1870年1月蒲安臣被俄罗斯的严寒击倒，他们一直在各国游说，先后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德国、俄国，会见了各国元首。

根据同行的使臣志刚记载，病中的蒲安臣十分担心与俄国的交涉，俄中毗连陆地数万里，这远远超出了蒲安臣所熟悉的“海洋外交”。他既担心“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又担心“措语未当，貽笑于俄人”，于是“日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终于在2月23日不治而亡。

这是第一个殉职在大清岗位上的洋干部，消息传来，恭亲王立即请示慈禧太后，对蒲安臣给予了高度评价和优厚抚恤。俄罗斯在圣彼得堡为蒲安臣举行了第一个葬礼，然后将他的遗体用专轮运回美国。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纷纷发来唁电，各国报纸也予以报道并配发了大量的评论。

当蒲安臣还在英国时，赫德曾给他写信说：“有一个伟大的角色可以扮演：给中国十足的评价，对整个世界都是有利的，并且如果运用得当的话，对个人的信誉也是有贡献的。”蒲安臣自己也说：“当这个拥有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国家，第一次寻求与西方世界发生关系，并要请这个最年轻国家（指美国）的代表，来作为一种变革的媒介，这个使命并不是能够通过恳求得到或是拒绝得了的。”

可以说，他的哀荣，绝对不是来自于他曾经的美国外交官身份，而是来自于东方那条挣扎着想腾飞的巨龙，以及巨龙阴影下那个低调的运筹帷幄者——37岁的恭亲王。

## 美利坚雪中送炭

在对美国周边地区表现出咄咄逼人、志在必得的同时，国务卿西华德对于中国这个被他看做是有待拯救和改革的帝国，却表现出十足的耐心和友好，甚至对清政府的腐朽、腐败予以容忍。他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成为今后一个世纪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旋律。

星条旗飘扬在并不高耸的美国使馆门檐上，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附近都戒严了，首都卫戍区（步军统领衙门）派出的警卫部队早已封道净街，顺天府的衙役们则在周边的小巷内巡逻。使馆门前，站岗的美国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士兵都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和雪白的手套，持枪肃立，军乐队也已经整装完毕。哨兵的枪刺和军乐队的鼓号，在北京的初冬阳光下，闪闪发亮。

这是1870年11月20日。午后一点，随着鸣锣开道声，几乘绿呢大轿在骑兵和步兵警卫部队的簇拥下，呼啸而来。美军军乐队开始奏响欢快的中国乐曲，这是半个月前美国人前往大清外交部（“总理衙门”）参加宴会时，听了记谱回来排练的。都说外交无小事，美国人为了今日的接待煞费苦心。

来访的正是大清国总理、39岁的恭亲王奕訢。他此行不是为了会见美国驻华公使倭斐迪（Frederick Ferdinand Low，前加州州长），而是为了拜访另一位更为重要的客人——刚刚卸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西华德。

### 雪中送炭

恭亲王一下轿，就走上前去，托住西华德的胳膊肘，拥抱了这位69岁的美国政治家。在旁担任翻译的大清国洋干部、美国人丁韪良向西华德解释说，这是满洲人接待朋友的礼节。随后，双方热烈握手，恭亲王表达了对客人“久仰大名、如雷贯耳”的仰慕之情，客套一番后入座。美国公使倭斐迪的夫人，则陪同女眷们进入内室。

上图：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成为第一个访华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令中国重拾大国感觉。

下图：1871年1月26日《纽约时报》用六行大标题，报道西华德受到恭亲王接见的消息。



## MR. SEWARD IN CHINA

Marked Attentions From the Chinese Officials at Peking.

Formal Reception at the Foreign Office.

A Friendly Call From Prince Kung at the United States Legation.

Interchange of Views on Various Questions of Interest.

Autographs and Pleasant Sentiments Recorded by the Prince and Ministers.

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

PEKIN, Wednesday, Nov. 30, 1870.

The event of the month in this capital has been the visit of Mr. SEWARD. He left on the 20th inst., having spent a fortnight mousing among the dust and decay of this old city, turning up, among things more curious, an occasional Mandarin, and now and then a Prince—not mummies, such as are exhumed from the dust of Egypt, but quite as good representatives of those who ruled China at the time when

这次会见，对大清国来说，意义非比寻常。此时的大清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外交危机和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危险。上一年（1869年），法国传教士在位于天津CBD的三岔河口地区建造教堂，进行了大规模强制性拆迁，大量民房包括地标性建筑崇禧观、望海楼均被夷平，在天津结下了极大的民怨。到了这年的夏天，法国天主教堂内所收容的中国儿童，因瘟疫大批死亡，教堂没有妥善安葬，导致尸骸露野。此时，天津又接连发生拐卖儿童事件，被捕案犯随口供认说是受教堂指使。为此，天津知县刘杰于6月21日押解案犯到望海楼教堂对质，教堂则找来了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 Fontanier）保驾护航。丰大业居然当场向刘杰开枪，打伤了刘的随从，激起众怒，丰大业及其助手被当场打死，暴动民众随后杀死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天津教案”，西方称为





左图：焚烧后的望海楼教堂内部景象 右图：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森于 1871 年拍摄的望海楼教堂废墟

“天津屠杀” (Tientsin Massacre)。

教案发生后，法国联合了英、美、俄、普、比、西等共 7 国公使，联名发出了《致恭亲王及各大臣函》，向大清政府提出“抗议”，法国还派出了 5 艘军舰，在大沽口外进行军事威胁。恭亲王当时尚在病中，抱病参与善后，他主张一手软一手硬，一方面要坚决镇压骚乱，对为首者实行严打，另一方面对法国先礼后兵，法国真要打，中国就奉陪到底。在恭亲王主持下，中央先后派了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前往天津处理此案，最终双方相互妥协，中国处决了 20 多名“暴徒”，向遇难人员赔偿损失，派遣特使到法国道歉。

天津事件解决当天（10 月 18 日），正是西华德到达上海的第一天。他在上海注意到，租界内的西方人极为恐慌，已经组织了民兵，发了武器弹药，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应对中国人的攻击。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他此时北上京城，认为太过危险。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正是西华德的侄子熙华德（George Frederick Seward），在他坚持下，驻扎在上海的美军派出了大队人马，护送西华德北上。《纽约时报》在事后的报道中说，西华德所率的卫队人数，远远超出了条约中公使最多只能携带 20 名随从的规定，“但他并非公使，而是著名的政治家”。显然，在当时特别孤立的情况下，大清政府也不在乎西华德卫队的人数了，只要这位美国政治家能在北京露面，就是对中国最大的支持。



RUNNING THE "MACHINE".

美国内战后的漫画，林肯内阁正在努力转动国家机器。图中正对桌子右二为林肯，右一为西华德。

西华德的出访日记详细记载了在中国的每一次会见的细节，仅他和总理衙门的会谈，就至少有三三次。第一次是11月8日，总理衙门为他举行欢迎宴会，除恭亲王因病、文祥因事之外，总理衙门其他大臣都出席了，这个宴会历时长达4个多小时，令西华德大为感叹中国的办事效率。第二次是总理衙门的二号人物文祥在11月11日到美国使馆拜访。文祥是当时国际公认的大清改革派代表，西华德认为中美能成功签订“蒲安臣条约”，与文祥的开放精神及大力推动是分不开的，因此主动求见。当时文祥正在“丁忧守制”（父母去世，官员必须停职守制27个月），便以私人名义拜访了西华德。第三次就是恭亲王在11月20日的亲自回访。从这三次会谈的记录来看，丝毫没有涉及天津事件，可以说，宾主双方似乎刻意回避了这个敏感而痛苦的话题。对已经焦头烂额的恭亲王来说，美国人十分见机，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这种“体贴”无疑是暖在心头的。

### 美利坚帝国

恭亲王在与西华德的会谈中，感谢他在上一年对到访美国的首个中国代表团（即

蒲安臣使团)给予的热情接待,和在业务上的“精心指导”。其实,中美双方签订的《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正是西华德的杰作。这份条约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与列强所签订的第一份平等条约,并且条约中明确规定了,美国支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等。这份条约及美国政府对使团的高规格接待,为使团此后在欧洲长达一年多的访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是中国在“睁眼看世界”后的第一次“伸手摸世界”,美国的态度令中国发现世界并非都是冰冷与可怕的。。

席间,恭亲王好奇地问起西华德的遇刺情况。作为林肯政府的第一要员,西华德在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当晚,也在家中遇刺,当时因病戴着颌骨夹板,结果逃得一命。被刺客们看做是与林肯同样重要的目标,这完全是因为西华德在林肯政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西华德曾经是党内总统提名的第一人选,但最后败给了林肯。林肯当选后,西华德应邀出任国务卿。

即使在内战的艰难环境中,西华德还是继续在外交方面大展宏图,将自己早在担任联邦参议员时提出的将美国建立成为“太平洋商业帝国”的计划付诸实践。

西华德早在1850年代就提出,美国的竞争对手不在别处,而“在东方那些大陆和海洋上”。“太平洋和它的海岸岛屿以及海外的广大土地”,正是“这个世界更伟大未来的主要舞台”。当时的大清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与现代美国从中国输入纺织品相反,1853年时中国就消费了美国纺织品出口总额的40%,美国当年输出到中国的纺织品,占其对华出口总额的87%。

西华德坚信,“政治霸权随着商业优势而来”,“太平洋上的贸易和商业就是世界的贸易和商业”,因此,美国只有占领亚洲市场,才能“比迄今为止的任何国家都更加伟大”,而“战舰决不是能被派往国外的最成功的使节”,美国应当通过商业扩张来进军太平洋和远东地区。

### 美式黑猫白猫

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之下,西华德实行了一连串基于实用主义的举措,而丝毫不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对美国周边地区表现出咄咄逼人、志在必得的同时,西华德对于中国这个被他看做是有待拯救和改革的帝国,却表现出十足的耐心和友好。他提出的对华“合

作政策”，最终在“蒲安臣条约”中得到体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一次被写入国际公约，这成为西华德与恭亲王在各自国内实现的巨大政绩。西华德的政  
策成为今后一个世纪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旋律。

在对华友好，甚至对清政府的腐朽、腐败予以容忍的同时，西华德对日本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炮舰政策。作为中美之间航线上的重要枢纽，一个闭关保守的日本，是美国绝对无法容忍的。早在1853年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美国舰队打开日本大门的时候，西华德就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他在回答参议院的质询时，慷慨激昂地提出：“应该质询的，不是为什么要派遣远征军，而是为什么迟至现在才开始派遣远征军。”

西华德为他心目中的“美利坚帝国”贡献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在1867年，成功地以720万美元（相当于2005年的9500万美元）从俄罗斯手中收购了152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相当于每英亩2美分。这一举措被反对者们嘲讽为“西华德的蠢事”（Seward's Folly），阿拉斯加则被称为“西华德的冰窟”（Seward's Icebox）或“北极熊花园”（Polar bear garden），阿拉斯加并入美国版图，使美国在太平洋获得和英国在大西洋一样完整的商业和海上霸权。西华德自己认为这是“向亚洲伸出了一只友谊之手”，美国与中日两国成了相距咫尺的邻居。

在同一时期，西华德还主导美国获得了中途岛，从丹麦手里买下了西印度群岛，并积极进军夏威夷，矛头直指西班牙控制的菲律宾（最终通过美西战争获得对菲律宾的控制），而在家门口则从哥伦比亚手中获得建造巴拿马运河的权利，将联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捷径控制在自己手里。

在这一连串开创了美利坚帝国万世基业的行动后，中美关系在西华德的战略中就摆上了议事日程。1869年，当他协助朋友格兰特将军赢得总统大选后，便引退下来，开始了为期14个月的环球旅行（1869年7月~1871年的9月）。尽管这次旅行号称是私人访问，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将此当做了奉行扩张主义之后的一次国际巡回演出，尤其是西华德的中国之行，几乎成为一次准官方访问，美国军队不仅为其提供了政府首脑规格的保护，美国驻华外交机构实际上也成为他的助手。

也正是因此，恭亲王即使抱病在身，也坚持面访西华德。

## 鼓励中国走向世界

在恭亲王与西华德的会谈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应当派遣外交官常驻西方各国。恭亲王明确地表示，他将全力推动派出常任使节，并坚信这将有利于增进中外了解和沟通。而在此前西华德与总理衙门的会谈中，总理衙门的其他大臣对此不敢明确表态。在西华德与文祥的私下会谈中，作为激进改革派的文祥，也无奈地表示：中国的事情不能着急，改革必须稳步推进，否则会适得其反。

对于大清帝国的腐朽，西华德在这次访问中有了切身的体会。10月18日他在上海登陆时，就有幸看到了中国官员的招摇过市，鸣锣开道，随从如云，还奇怪地“举着各种颜色的伞”。西华德当场就对助手们评论道：“这就是帝国腐败的证据……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人，（不可）总是惦记着过去的荣耀，尤其是在已经无能去发扬光大时。”

总理衙门欢迎宴会上，尽管《纽约时报》不厌其烦地报道了鱼翅、燕窝等菜谱，来证明西华德在中国受到的崇高礼遇，但那150道精美菜肴、长达4个多小时的吃喝以及中国官员们使劲干杯拼酒却回避公事的热情，令他头疼不已。

在西华德与恭亲王见面前，他曾经花了数天时间游览长城，在长城脚下，他和美军将领们大发感慨：为什么这么伟大的建筑，最终无法阻止这个天朝帝国的衰亡与堕落？

英国工程师托马斯·查尔德 1876 年前后拍摄的八达岭长城



## 谁可托福

美国总统格兰特告诉李鸿章：“我甚盼中国自强。”他的助手杨格将军也说：“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

纽约河滨路（Riverside Drive）周围都戒严了，8万多人拥挤在道路的两侧。

清晨6点左右，12辆装饰华丽的马车在警察和军队的护卫下，进入了尚未完工的格兰特陵园（Grant's Tomb）。大清国特使李鸿章坐在第二辆马车上，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致意。在曙光的映照下，李鸿章身上的黄马褂格外灿烂。

这是1896年8月30日，星期天。

随着凄婉的军号声响起，8位来自美国陆军第十三师的仪仗队员，向李鸿章和中国贵宾们行持枪礼。李鸿章缓缓地走向巨大的格兰特铁制灵柩，随从们放上了月桂树枝扎成的花圈，李鸿章肃立默哀。然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沉痛地对着棺木



李鸿章出访欧美，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在访美期间，他专程拜谒了格兰特墓，感动了美国朝野。

右图为《纽约时报》刊登的整版采访报道和李鸿章的画像。



## 总统访大清

格兰特访问中国，是在1879年的初夏。当时，他刚结束了第二任总统任期，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世界大环游，从暹罗（泰国）进入了中国境内，先后访问了广东、上海、天津，而后在6月3日到达北京。

这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元首，也是继9年前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访问中国后，到访中国的第二位美国国家领导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清“总理”、48岁的恭亲王奕訢十分重视，在格兰特抵达北京后不到两小时，恭亲王就派人前往其下榻的美国公使馆问候。

次日（6月4日）下午2点半，格兰特总统一行离开了东交民巷的美国公使馆，在中国军队的护卫下，前往总理衙门。这天非常炎热，气温足有101华氏度（38.3摄氏度），中国首都的道路上尘土漫天、垃圾遍地，十分肮脏。

恭亲王早已率领官员们，迎候在衙门口。在欢迎的礼炮声中，恭亲王走向前来，与格兰特寒暄见礼，美国驻华代理公使何天爵担任翻译。宾主相携着走进一间宽敞但十分简朴的会议室，桌上已经布满了精美的冷盘佳肴。

恭亲王请格兰特坐在他左侧的贵宾位置上，两国随从们一一按级别入座。恭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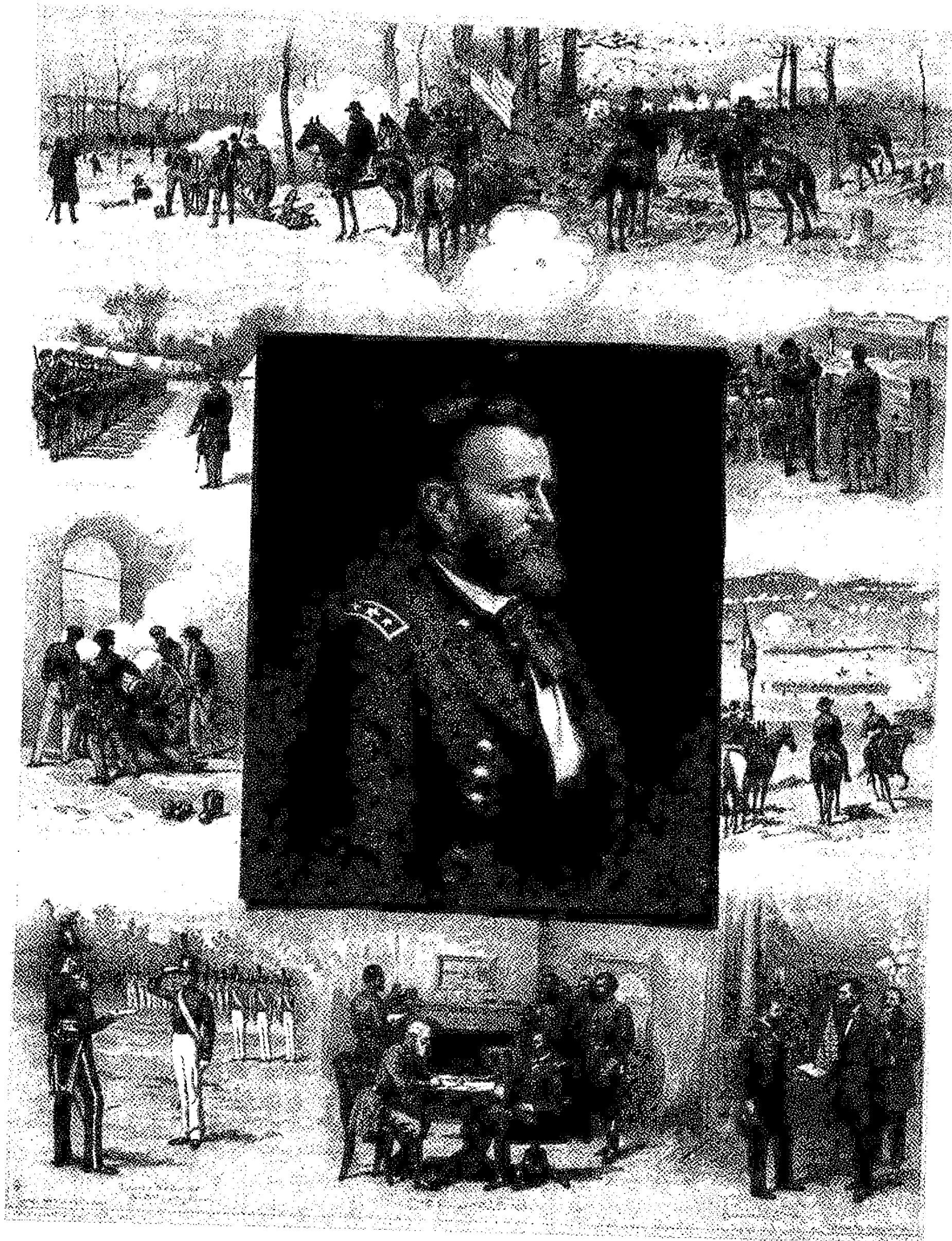
王便开始向美国客人一一分发他的红色大名片，何天爵陪同在旁，向他逐个介绍美国代表团成员，恭亲王与每人都亲切握手。当介绍到身穿军服的格兰特总统之子格兰特上校时，恭亲王停了下来，亲切地询问他的军衔及军装上各种饰品的含义，还问了他的年龄、婚否、有无孩子，当他得知格兰特上校只有一个女儿时，很同情地说：“你好可怜啊。”这令美国人诧异不止，事后补课才知道中国人对男孩的偏爱。

这次会见的主要“议程”，还是中国大餐。仆人们开始端上各种美味佳肴，燕窝、鱼翅、熊掌、烤鸭等，美国人因刚在使馆内用过午餐，谁也不饿，但依然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这一“奢华的娱乐”。



这是随同父亲格兰特总统访华的格兰特上校。恭亲王对他只有一个女儿的“悲惨”生活深表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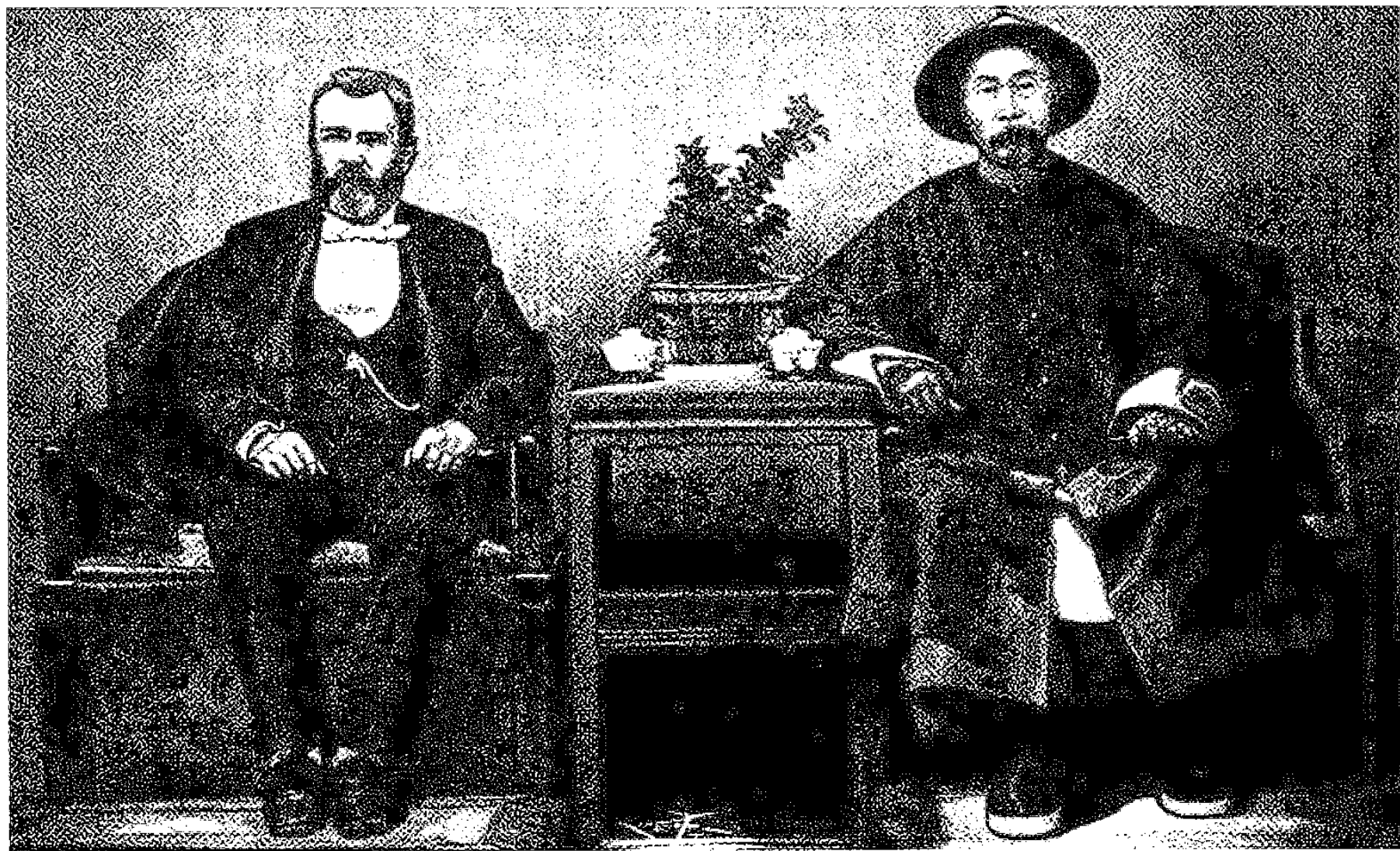


格兰特总统是美国内战的英雄，图为其参加总统竞选时的宣传画，描绘其“光辉”的战斗历程。

他们注意到，与广东、上海和天津的官方接待不同，这次“国宴”还是相对简单的，尤其是没有过多的仆人川流不息。而恭亲王很少动筷子，只略喝几口燕窝，对鱼翅之类的则是碰都没碰。双方都没怎么吃，宴会很快成了“烟会”，美国人吸起了雪茄，而恭亲王则掏出了旱烟枪。

借助着翻译，宾主之间开始交谈，话题很快就转到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当时，作为中国新式最高学府，同文馆的教学已经在美国籍的校长丁韪良的带领下，步入正轨。而在煤矿和铁矿开发上，格兰特表示出明显的兴趣，强烈建议中国应效仿英国，多多开发自然资源，向大国迈进。但对这个话题，恭亲王似乎并不想多谈，或者他似乎有难言之隐，倒是中国财政部长（“户部尚书”）很感兴趣，与美国客人热烈讨论起来。恭亲王在旁听着，一袋袋地抽着他的烟枪，并不时给格兰特的盘子里添菜，那菜“堆得都足以装饰一颗圣诞树了”。

美国人事后总结说，作为中国的权力核心，恭亲王对于西方和世界大势，十分了解，远远超过他的同胞们。但是，与李鸿章不同，他首先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作为政权基础的满清贵族，而这个团体十分保守排外，这就注定了恭亲王“不可能如李鸿章那样走得那么远”。在此次会谈中，但凡涉及中国的改革和进步的话题，他都很



1879年，北洋大臣李鸿章设宴款待美国离任总统、南北战争英雄格兰特将军，两人一见如故。

少说话，而格兰特则侃侃而谈。因此，美国人认为，真正能推动恭亲王、触动中国政府的改革建议，“必须来自于中国内部，来自于中国的人民”。

宴会之后，格兰特总统一行前往同文馆参观。学生们用娴熟的英文致了欢迎词，格兰特则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称赞说：在如此古老的国家里，看到了现代文明的进步以英语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他的世界环游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 琉球、琉球

国宴次日（6月5日），恭亲王轻车简从，前往美国公使馆回访。这一次，恭亲王令美国人看到了他“绵里藏针”的另一面：机敏，睿智，不达目的不罢休。美国人感慨道，恭亲王代表着中国政坛的“勇气”和“能力”。

话题围绕着日本与琉球展开。

就在3个月前（1879年3月），日本利用中俄在新疆军事对峙，中国无暇东顾的机会，下令将其已经实际占领的中国藩属国琉球“撤藩置县”，正式吞并。此举激起大清国朝野的愤怒，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遣军舰，盛陈兵威，表面上是前往琉球质问，实质上要“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与日本反复辩论，或援外国公法（国际法）以相究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恭亲王等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用何如璋提出的下策。在朝廷而言，此时百废待举，在琉球问题上采用敷衍拖延，实在也是有难言之隐。邀请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为中国进行斡旋，就是此次恭亲王回访的目的。

恭亲王向格兰特介绍了琉球情况。美国人记载道：“他的声音是低沉和柔软的，他的手势（丰富得）更像一个意大利人，而不是中国人。在何天爵翻译的时候，恭亲王就靠在椅背上，拿起烟枪抽几口。偶尔，他又想到了什么，就会打断翻译，又急又快地解释。特别在谈到中国将为保卫主权而奋战时，他会显得十分激动，然后他会为插话而抱歉，让翻译继续。有时，他会突然停住长句，说不能太长了，否则何天爵翻译时记不住，大家就哄堂大笑。”

格兰特表示，他目前并没有官方身份，但他很愿意以私人身份向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转达中国的关切。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公平正义，不会容忍日

本对华的侵略。

恭亲王说：美国对中国的深情厚谊，中国不会遗忘。他告诉格兰特，在返程途中经过天津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将就琉球事件的细节与他进一步交换意见。

格兰特接受重托后，恭亲王如释重负，端起香槟，再次向格兰特及美国贵宾们表示感谢，并为格兰特的健康干杯。格兰特则回礼，为恭亲王和中国皇帝陛下的健康干杯。随后，恭亲王告辞，格兰特总统亲自将其送上使馆门口的大轿。

在琉球问题上，中国人令人惊讶地显露出了极高的效率。6月12日清晨，格兰特刚刚到达天津，还在美国总领事馆吃早餐时，就接到通知，李鸿章已前来拜访。格兰特总统立即要求美军士兵列队，并鸣放礼炮迎接这位著名的中国总督。

李鸿章详细地向格兰特介绍了琉球事件的前因后果。比恭亲王更为咄咄逼人的是，李鸿章搬出了此前的中美条约，条约中明确约定：如果第三国对中美任何一国“有不公或轻藐的事，一经知照，必须相助”。格兰特的助手杨格（J. R. Young）将军告诉总统，根据琉球事件的情况，日本的确“轻藐”了中国。因此，协助中国进行调解，不仅是道义责任，也是条约责任。这一来，格兰特的调停，不仅是私人外交行为，更上升为美国的国家外交义务了。

在第一次见面后，李鸿章就和格兰特成了惺惺相惜的朋友。次日，格兰特回访了总督府，李鸿章的欢迎仪式排场远超过恭亲王的，甚至动用了“黄缎衬里的轿子——在中国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轿子”，可以相信，这样的超规格接待，一定得到了恭亲王的同意。几天之后，根据李鸿章的命令，由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Gustav Detring）出面，邀请各国驻天津领事和夫人，为美国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李鸿章破天荒地出席了这个有女士们在场的宴会，令外交官们大为惊喜。

### “中国要自强”

离开中国后，格兰特总统乘坐美国军舰“里士满”（Richmond）号前往日本。日本之行，格兰特已不单单是游览，而且肩负着恭亲王、李鸿章和大清国的重托，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条约义务。

日本人对格兰特的到访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对于琉球事件，在美国人的压力下，日本再度显露了外交方面的灵活手段，提出“分岛改约案”，将琉球由中日两

国分割占领，琉球南部靠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两岛划给中国。

在格兰特建议下，恭亲王和李鸿章一度曾考虑接受，让琉球国王在此二岛上复国，但琉球国派驻北京的使节再三哭诉，此二岛土地贫瘠，无法生存。中国于是提出了反建议，要求三分琉球，北部归日本，南部归中国，中部各岛则归琉球王国，由中日两国确保其独立自主。日本对中国的建议坚决反对，并且搬出了中日两国1874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当时，因台湾土著杀害了漂流到台湾的琉球船民，日本兴兵问罪，中国在签订条约时为了推卸责任，写下了“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属民等妄加残害”，间接认可了琉球人是日本属民，这是恭亲王和李鸿章外交生涯中的最大败笔之一。

美国人一看这条约，也感无奈。而此时，沙俄在新疆加强了军事威胁，种种迹象表明日俄两国可能联手对付中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中国不得不调整策略，同意以日本的提议为基础，进行琉球问题的谈判。

美国的调停失败后，格兰特总统给李鸿章先后写了两封信，通报调停的细节，主题就是与其拜托美利坚，不如拜托自己。格兰特写道：“日本数年来采用西法，始能自立，无论何国再想强迫胁迫立约，彼绝不甘受。日本既能如此，中国亦有此权力。我甚盼中国自强。”

而他的助手杨格更为直接，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说道：“中国若不自强，外人必易生心欺侮。在日本人心中，每视中国懦弱，为所求无不遂者，彼看不起中国，则无事不可做。日本以为不但琉球可并，即台湾暨各属地动兵侵占，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中国如愿真心与日本和好，不在条约而在自强，盖条约可不照办，自强则不敢生心矣！”

他更指出：“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我心甚敬爱中国，实盼望中国用好法，除弊兴利，勉力自强，成为天下第一大国，谁能侮之？”

史料没有记载，恭亲王和李鸿章看到这几封信后的反应，但是，琉球事件后，新式舰队的建设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7年后，排名世界第八的北洋舰队，就在日本长崎港亮剑，震撼日本朝野……

---

---

## 鸟巢鸟感觉

与餐桌上的“鸟巢”相比，老外似乎更关注大清国本身这只巨大的鸟巢。如同电影《阿凡达》(Avata)所揭示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真理只有一个：谁的鸟大谁的巢就大，谁就是老大……

---

---

大凡有地位的老外，到了大清国，都会惊叹这真是个“鸟”国家。在主人们盛情的宴会上，总是有一道令老外们惊诧而不敢动刀动叉的东东：“鸟巢”，即燕窝也。

老外们无法理解，大清国的领导干部，外带先富起来的一批精英人士，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拾“燕”唾余，乃至不惜千金、劳师动众地强行拆迁燕子的蜗居，以将其吞噬。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尽管大多数的“宰相”，并无“撑船”的肚量，但吞噬小燕子的蜗居，还是绰绰有余的。

老外也无法免俗，虽不喜欢“鸟巢”，却喜欢“鸟巢”带来的“鸟”感觉。连堂堂的《纽约时报》，在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前总统格兰特先后访问大清国时，也很八卦、很阿Q地在版面上记录大清国宴请美国贵宾的菜单，当然包括“鸟巢”之类，以显示美国领导人在中国受到了特别待遇。

西华德访华是1870年的冬天，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到访北京的西方首脑级大腕，他受到了大清政府的盛情接待，国宴便设在总理衙门。

说是国宴，其实并没有国家元首出席。太后和皇帝照例是不见外宾的，迎来送往的琐事一般都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清国“总理”恭亲王接待。但不巧，“总理”恭亲王病了，“常务副总理”文祥也病了。国宴遂由总理衙门的其他领导人集体主持。

主人们用“鸟巢”等富有大清特色的美味，同时填充桌面和时间。足足4个多小时的漫长会餐和150道之多的菜肴，几乎令美国人迅速对中华烹饪产生了审美疲劳。主人炫耀性地介绍各种怪异菜品的原料和烹饪方式，以此向客人展现天朝上国的伟大形象，同时频繁地与客人“干杯”，感情深、口口都要闷，令美国人几乎忙闷过去。

美国人郁闷的是，当他们想把话题转到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国内话题时，主



细心的美国人注意到，恭亲王在国宴上吃得很少，只是喝几口“鸟巢”汤而已。这是美国画师现场记录的恭亲王宴请格兰特总统的情景，似乎恭亲王正在劝酒。这是除了那几张正襟危坐的照片或画像外，恭亲王少数极为生动的形象展现。

其实，格兰特随行的私人朋友、著名记者、日后的驻华公使杨约翰回忆道：“恭亲王与之前我所见过的东方王子及政治家们不同，他十分生动。这是一个机敏的男人，直觉敏锐，意志坚定。印度和穆斯林的王公，以及我们在印度斯坦和埃及的朋友们，往往是呆板地坐着，整个谈话中面容呆滞，令你以为是在和石头对话。但是，恭亲王在谈话中，却表情丰富，十分生动。天很热，他边说话边摇着折扇，说到兴起的时候，他就将折扇半合着，指着格兰特将军的胳膊，同时，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将军的脸。”在美国出版的杨约翰回忆录中，画家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美貌若潘安的恭亲王形象。

人们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会场似乎贴着“莫谈国是，只谈鸟巢”的无形禁令。这顿饭令西华德等对中国政府的运作效率有了极深的感受。

九年后（1879年），刚刚卸任的格兰特总统在春夏之交到访北京，成为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国家元首。这次，恭亲王亲自主持了在总理衙门举行的欢迎宴会。

格兰特是从暹罗（泰国）进入中国的，到京之前，已经访问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各地官员们对这位美国“民主”（“民之主”也）给予了热情接待，令格兰特对大清官场的“鸟巢”社交文化略微有底。

当服务人员开始端上各种美味佳肴后，美国人发现，这一“奢华的娱乐”要比广东、上海和天津的接待简单了许多。当然，“鸟巢”依然是不可少的。美国人注意到，恭亲王几乎只是略喝几口“鸟巢”，而几乎不碰鱼翅等其他菜肴。

这次，因为有恭亲王在场，与会中国官员们便畅所欲言，与美国人交流改革开放的经验心得。但是，恭亲王只是劝酒、夹菜，几乎没做任何表态。美国人事后分析，恭亲王因为身份限制，很多事情可做不可说。

不仅西华德与格兰特，从迄今所能发现的西方记录看，多数西方来访者都是从中国政府那奢华的宴会中认识了“鸟巢”，景仰既久，却依然敬而远之。一位有幸参与过此种公款宴请的法国人，认为“鸟巢”之受宠，并非因其多可口，而只是因其昂贵，主人以此炫耀的，只是自己的好客与财富。

与餐桌上的“鸟巢”相比，老外似乎更关注大清国本身这只巨大的鸟巢。如同电影《阿凡达》（Avata）所揭示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真理只有一个：谁的鸟大谁的巢就大，谁就是老大……



## 北京欢迎你

老外们很快就明白，全北京城，乃至全大清国，除了中央最高领导们生活、战斗和娱乐的楼堂馆所之外，这个伟大的国家根本就很难找出比这条“迎宾国道”更为清洁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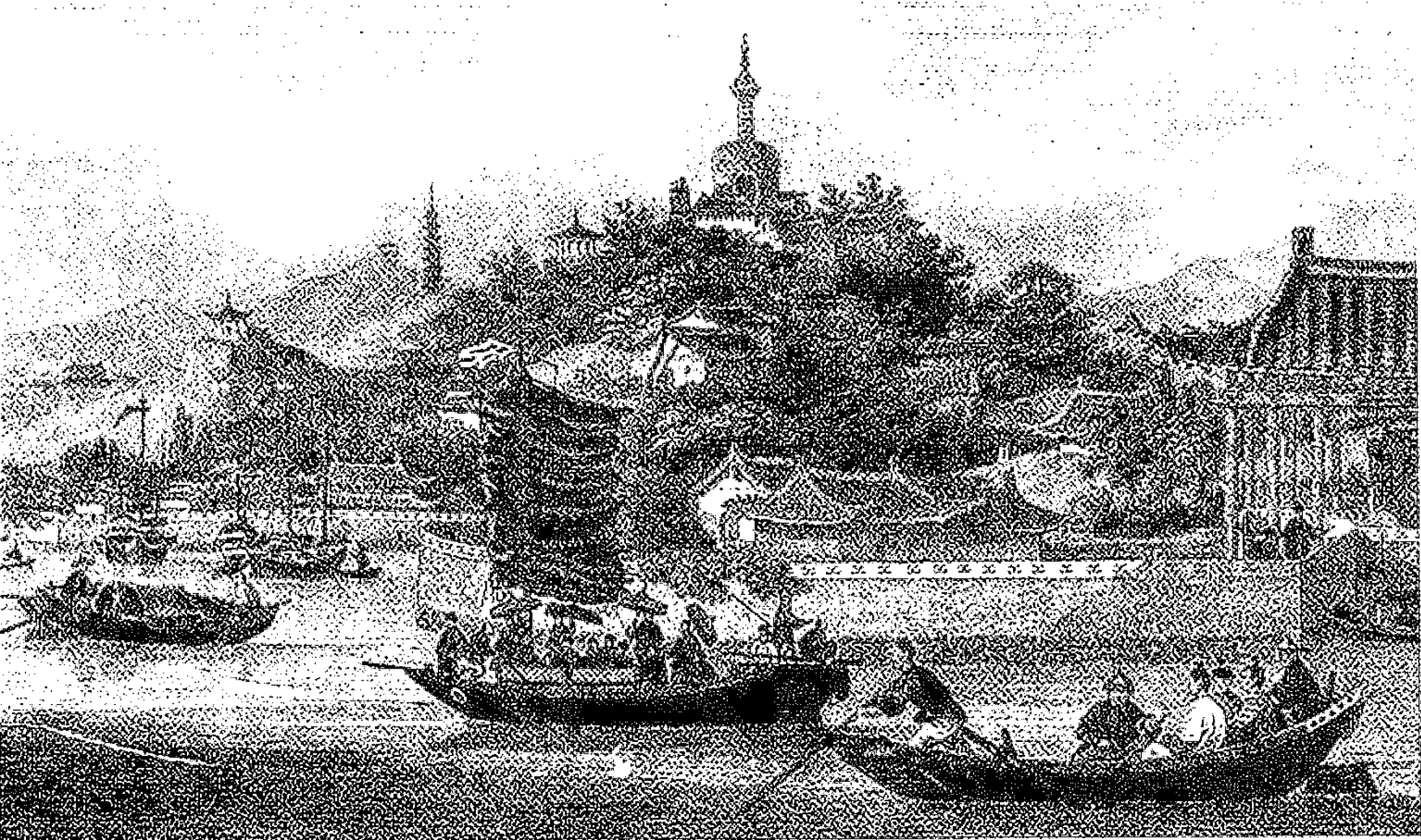
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显然并不喜欢北京，尽管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他发现，这座帝国首都那无比宽广的大街，也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肮脏、混乱、令人作呕”。各种车辆、骡马和行人都闹哄哄地挤在一起，泥土夯成的路上，晴天灰尘满天，雨天泥泞遍地，两旁的住家和店铺都往路中间倾倒垃圾、污水，而几乎所有的河流都成了排污道，臭气熏天。

1870年11月8日，西华德坐在绿呢大轿上，在中国士兵们鸣锣开道及吆喝申斥声中，从满街的摊铺、卖艺者、设赌者中，挤出了一条路来，前往总理衙门，他极其准确地意识到：这可“绝非行走在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街上”。

1860年代北京的街景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北京。对于皇家来说，北京当然是一个休闲、娱乐、工作和战斗的好地方，而对于平民百姓就未必了。图为1796年西方画师记录的北海景象，一个“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美丽湖泊。

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通往位于东堂子胡同（今建国门附近）的大清国总理衙门，这条大清帝国的“迎宾国道”，在几乎所有来访者的记录中，成为世界上最肮脏和最著名的一条道路。

大清政府和人民绝非故意怠慢远方来客。

老外们很快就明白，全北京城，乃至全大清国，除了中央最高领导们生活、战斗和娱乐的楼堂馆所之外，这个伟大的国家根本就很难找出比这条“迎宾国道”更为清洁的道路。

美国社会学家 E. A. 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在辛亥革命前考察了中国，他注意到“城市的街道狭窄、弯曲、凹凸不平、肮脏不堪、臭气熏天……几乎没有维护城市公共交通的任何工具，街道为个体商贩占据，几乎不能通行。店主们在货架前设有柜台，用篮子和篓子组成的货摊排列在街道两边，带着劳动工具的手艺人充塞其中，致使一条六英尺宽的街道拥挤不堪。如不是官方规定必须为来往的轿子留出通道，道路会更加狭窄”。

他也考察了日本，在那里“人们绝对看不到在中国随处可见的成堆的垃圾、粪便、污池、泥坑”。他甚至坚信，在“至少三分之二”的中国国土上，旅行者很难找到一块干净的地方扎下帐篷，更不要说各地旅馆的肮脏、虱子和恶臭。

而在大清国第一个国际大都市上海，租界内“街道整齐，廊檐洁净，一切秽物褻衣无许暴露”，华界内则“臭秽之气，泥泞之途，正不知相去几何耳？”人人“掩鼻而过”。

街道如此，居室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传教士、清华大学的主要推动者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感慨中国人居然都不讲究居室的采光，弄得室内总是十分阴暗。甚至在大清首富盛宣怀的豪宅，西方客人也吃惊地发现在那摆满昂贵的古董家具的客厅里，居然没有足够的窗户，古老的家具反而显得阴森森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高级军官们有幸参与紫禁城一日游，在惊叹其间的富丽堂皇时，他们也感慨这种华而不实的豪宅，实在不是舒适的居所。有趣的是，一位曾经访问美国的大清道台表示，美国的监狱要比中国的衙门舒服多了——不知这位口没遮拦的官员，回国后是否为这句话而被清理出干部队伍。

曾经长期在欧美生活的大清外交官张德彝认为，中国的脏乱差都是因为“在上者鄙此为琐屑之务，不复为之经理，小民更安于卑污，相率因陋就简”，一棍子将庙堂和草民都扫了进去。

上海的人民群众却似乎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告诉日本访客，这要怪洋人带来了工商业，导致本地人都涌到外企（主要是缫丝厂）打工，不再关心农作，可惜了那满街的“肥料”。尽管“肥料”满街，上海只能“掩鼻而过”，但上海大多数人民群众还是一边捂着鼻子，一边骂着洋鬼子，一边艳羡着租界内的整洁。

租界（或使馆区）外飘过来的恶臭，成为许多西方人回忆录中萦绕不去的中国气息。这种热烈欢迎，尽管带着大清口臭，也没有能阻止老外们一边捂着鼻子、一边扎根大清……

1872年的北京外城中轴路（英国人约翰·汤姆森摄）





## 第六章 西域狂沙 东海浪



滴翠岩后景及蝠殿 恭王府花园有一座由许多带有孔穴、成蜂窝状的珍贵太湖石叠加而成的假山，名为滴翠岩，这里是花园的中心和制高点。左页图为蝠殿后台。尽管拍摄照片时，正值冬季，但枝条虬龙盘旋、拱曲下垂的龙爪槐，加之树下的雪地小径及山石，更显示出花园的幽深宁静。（陈鸿舜收藏，照片拍摄于1940年前）

---

---

## 披着羊皮的熊

俄军向伊犁地区发动了攻击，却意外地受到了当地人近乎焦土战术的激烈反抗。为了解除中国的戒心，俄国表示，对伊犁地区的占领是临时的，只待中国政府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摆出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姿态。

---

---

在耶稣基督诞生 1870 年后，他的中国“弟弟”洪秀全在经历了酒、色、财、权长达 10 年的过度消费后，终于在南京城死去。一周后，“天国”的首都成为人间地狱，破城之后的湘军在最高统帅部的默许下，用残酷的大屠杀向北京发出了平叛胜利的“伟大”捷报。

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大清中央，并没有多少值得庆幸与欣慰的。除了依然保持相当实力的太平天国余部之外，遥远的新疆也在此时发生了叛乱，叛军势力星火燎原，整个大西北被彻底震撼。叛乱最为严重的南疆地区，一时兴起了多个割据政权，为了对抗终将到来的清剿，他们向邻近的浩罕国求援。浩罕国虽然不是浩瀚的大国，却有着相当浩瀚的野心，其可汗立即出兵，由阿古柏率领，进入喀什噶尔。随后，阿古柏鸠占鹊巢，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国号“哲德沙尔”（即“七城之国”）。阿古柏开始迅猛地扩张，这立即引起了俄国的警觉。

此时的俄国，正在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飞速发展。不久前废除农奴制，成为这个国家步子最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大大解放了思想，也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俄国的支柱产业是纺织业，原料的主要来源是美国。而美国的南北战争导致棉花难以出口，俄国的纺织业陷入停顿，经济界强烈要求向中亚进军，将中亚变成俄罗斯的棉仓。而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俄国的宿敌英国以印度和波斯湾为基地，成功堵截了俄国南下的通道；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 年）中的失败，也令俄国难以在巴尔干半岛扩张。

1863 年，俄国控制下的波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俄起义，为了镇压起义，俄国不得不动调了陆军总兵力的一半，心力交瘁。在欧洲已经难以采取攻势的俄国人，

于是转头向中亚发展。富饶的南疆迅速成为俄国觊觎的中心，并且试图以此作为桥头堡，从大清帝国攫取更多暴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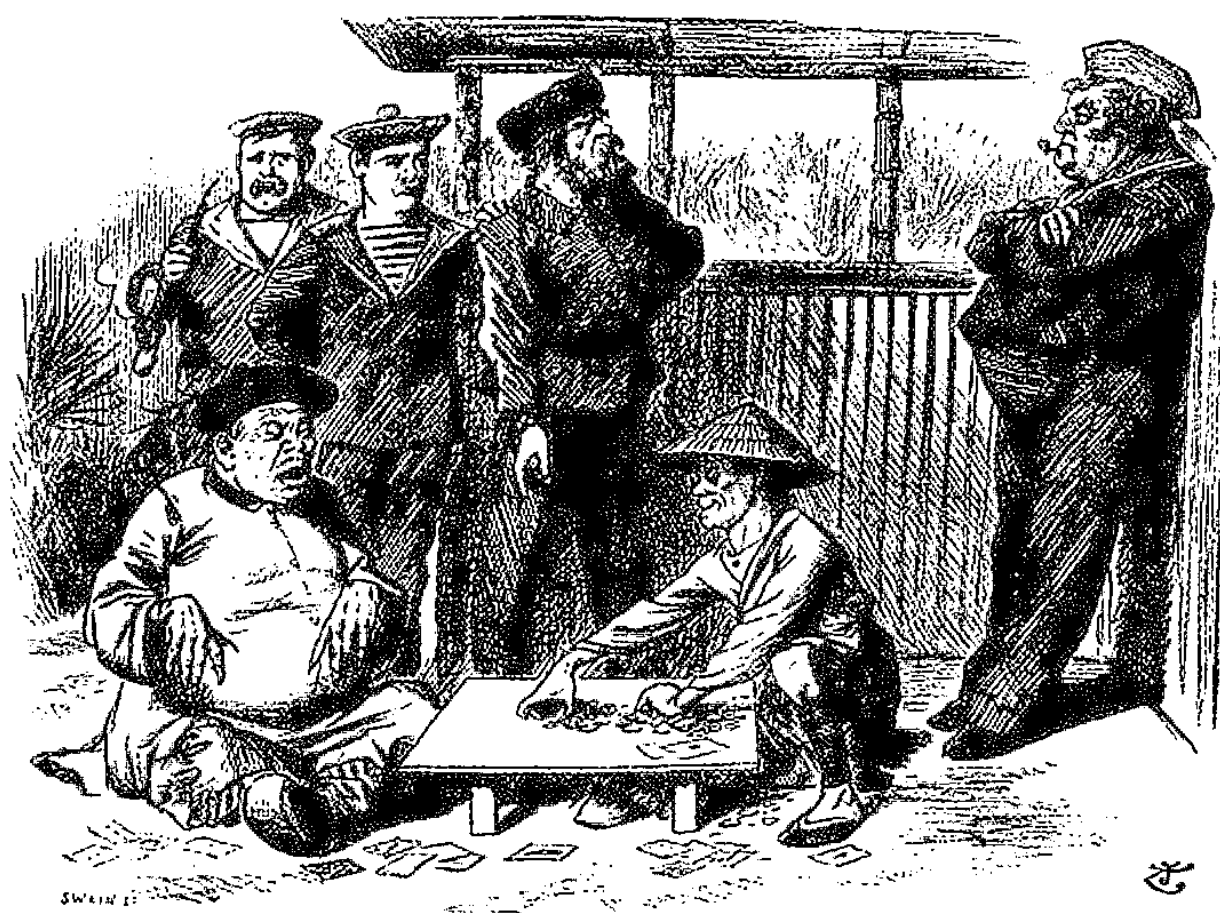
俄国的老对手英国也在新疆展开激烈的角逐。为了保卫作为英国最大殖民地的印度，英国必须在印俄之间建立缓冲区。因此，与俄国的颐指气使不同，英国对阿古柏猛抛媚眼，既支持他对抗俄国，又试图限制他不能过度地刺激中国。

对于俄国的傲慢，阿古柏几乎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策，双方在边界线上剑拔弩张。强龙不压地头蛇，何况，阿古柏还得到了英国的强大军援，并在英国协助下与土耳其建立了特殊关系，承认土耳其对其拥有“宗主权”。面对这样的硬骨头，俄国不敢轻易下口，转而支持中国平叛，试图用中国的力量来削弱阿古柏。这样的国际政治夹缝，为阿古柏提供了足够的施展空间，他借英抗俄以确保自己西线的安全，腾出手来全力向北向东扩张。

左下图：英国在远东的一大战略定位，就是阻击俄国南下。漫画中，日本小个子与中国大胖子在玩牌，日本人赢了不少。俄国人愤愤地问最为强壮的英国人：莫非要把日本的东西都赢走？英国人冷冷地回答说：他们在进行一场公平的游戏，我没看到有任何干预的必要。

右下图：北极熊俄罗斯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飞速发展，但被英美等国堵住了别的发展方向，只能拼命向东方扩张，中国自然就成了它的目标。图为法国搀扶着俄国熊行进。

PENCIL, OR THE LONDON CHARIVARI.—MAY 4, 1895



JOHN STANDS ALOOF.

Russia, "IS HE TO HAVE ALL THIS?"  
John Bull, "WELL—HE'S PLAYED A SQUARE GAME—I DON'T SEE ANY CALL TO INTERFERE!"



1866年3月，阿古柏支持的叛军攻陷了伊犁地区战略重镇惠远城，随后，又相继攻占了库尔勒、吐鲁番盆地和乌鲁木齐等。西陲警报频传，但大清国依然无暇西顾，在“先捻后回”的既定方针下，剿灭卧榻之侧的捻军成为首要任务。俄国却沉不住气了，频繁向中国表示愿意出兵助剿，但中国没有表态。

1871年，心急如焚的俄国人举行了一次专门的御前会议，讨论新疆局势，最后决心先下手为强，出兵抢占伊犁，一则迟滞阿古柏势力坐大，二则占据对华的军事先机。负责新疆事务的俄军将领克鲁泡特金坦率承认：“肥沃的伊犁地区是向东延伸的一个坚固堡垒，并入俄国是相当有利的，不但非常有助于保卫我们的领地，而且还会使中国受到威胁。”

会后，俄军向伊犁地区发动了攻击，却意外地受到了当地人近乎焦土战术的激烈反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攻占面积总共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了解除中国的戒心，俄国表示，对伊犁地区的占领是临时的，只待中国政府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摆出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姿态。

此时，左宗棠已经率领大军移驻兰州，积极准备入疆平叛。随着俄国在伊犁建立军管殖民政权，南疆的局势更为复杂。左宗棠因此确定了“缓进速决”的战略，计划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筹粮筹款、整顿军队等艰巨的准备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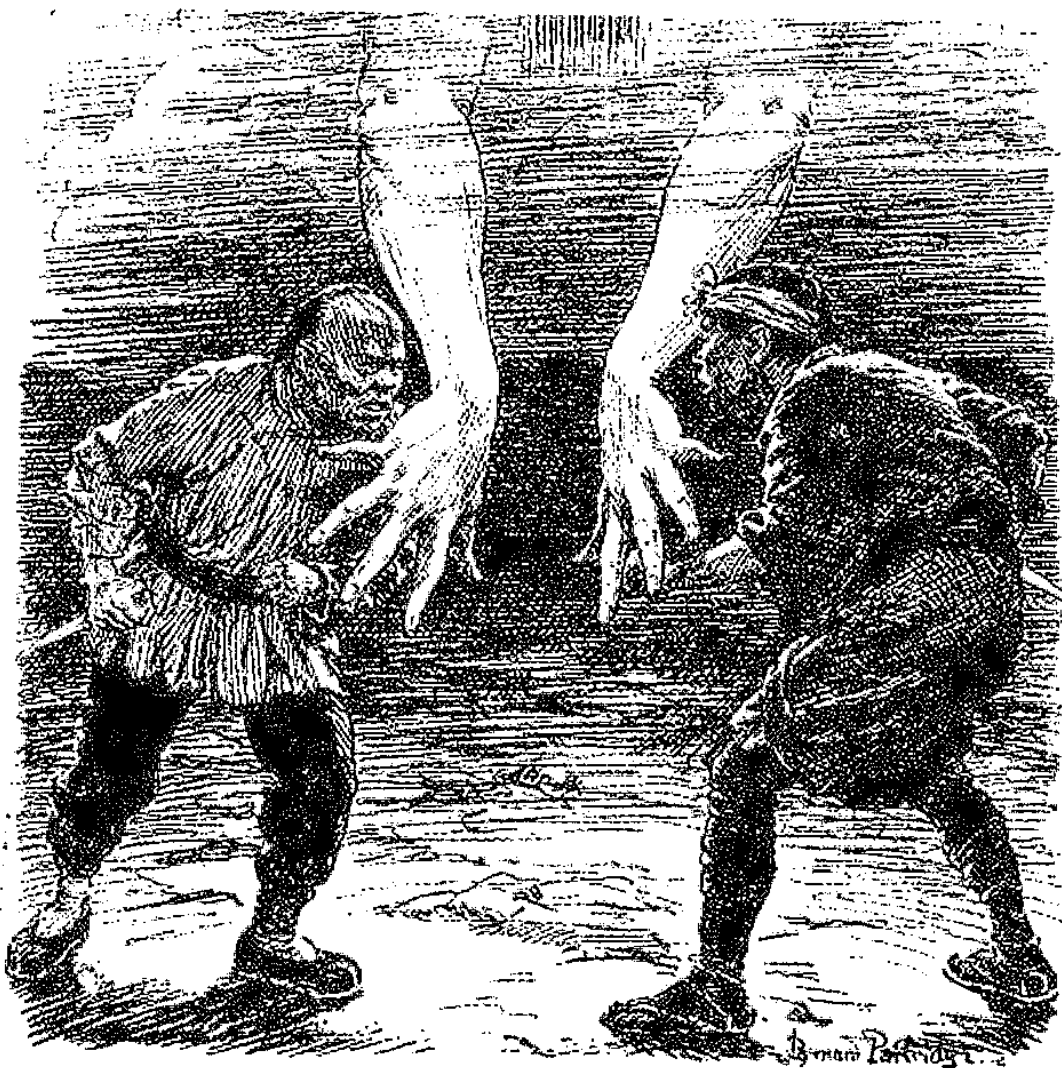
## 东海饿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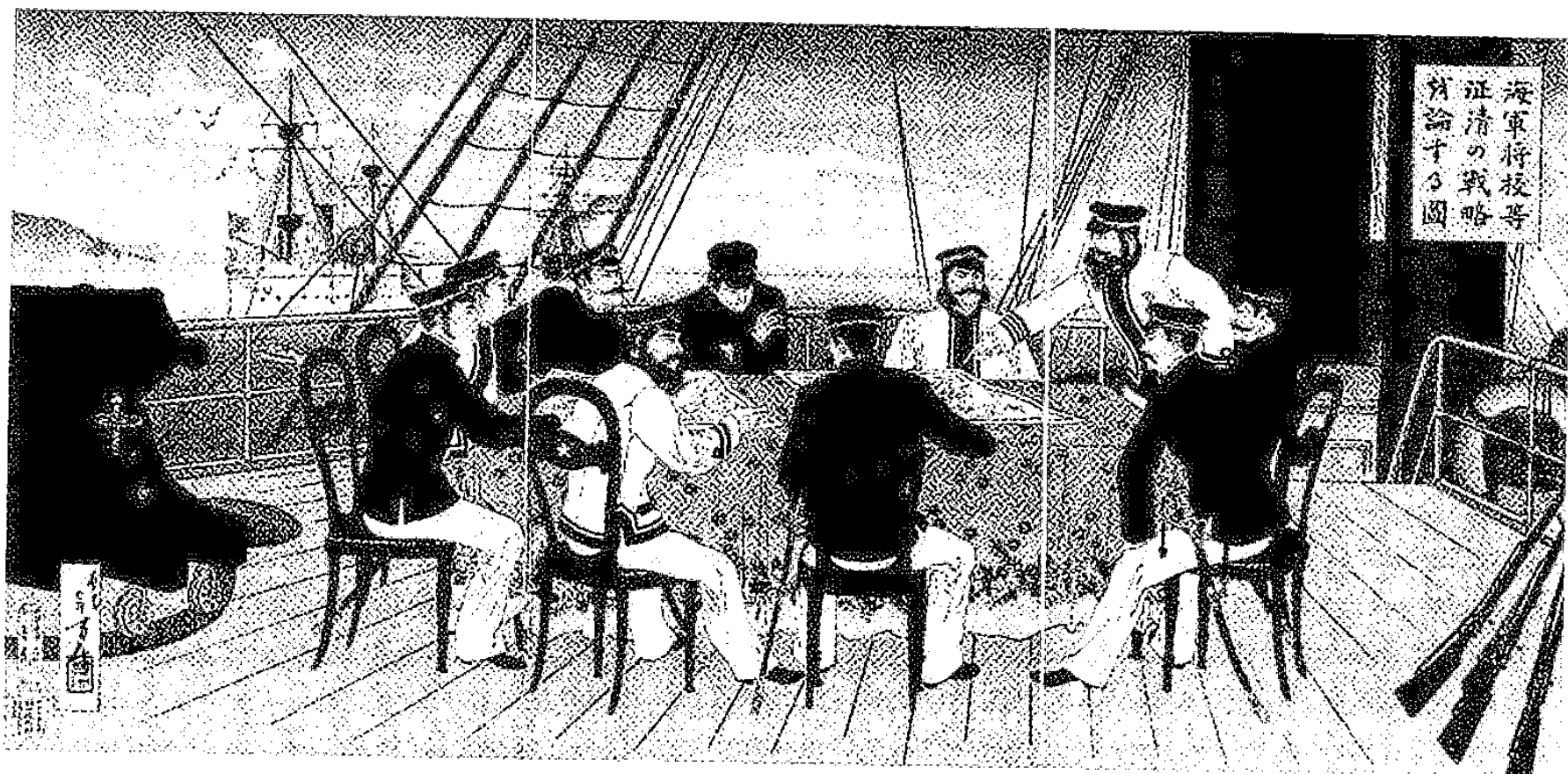
日本的外交试探，胆大而心细，但大清国的外交部门早就养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太监性格，不敢针锋相对地应对，居然推搪道：台湾土著居住的“蕃地”属于“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日本人大喜，认为这至少证明了中国主权并不涵盖台湾全岛。

就在俄罗斯铁骑踏入伊犁的同时，在遥远的台湾，一场飓风吹来了一艘琉球国渔船。船上的渔民随后与当地的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50余名琉球渔民被杀，这就是所谓“琉球漂民事件”。

琉球是一个岛国，位于中日之间，从明代就开始向中国朝贡，成为藩属。日本随后也以武力强迫琉球入贡，形成了所谓的中日“两属”局面。中国对待藩属，历来只重面子不重里子，只要称臣纳贡，一般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与外交。而日本就不同了，为了“布国威于万里波涛”，积极向外拓展，第一目标就是攫取近在咫尺的琉球和台湾。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将中国作为它的战略假想敌。中日之间开始进入长达百年的仇恨期。图为中日两国在相互敌视，连来自上苍的手都无法分开（1930年代美国漫画）。





日本浮世绘：海军军官们研究进攻中国的战略战术

俄军攻占伊犁当年（1871年），明治天皇亲政，一改幕府时代将琉球作为外国对待的基调，重新将其定位为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次年（1872年），日本政府正式设立了琉球藩，以便为最后吞并做准备；第三年（1873年），日本就宣布琉球与日本府县同列，受内务省管辖，租税缴纳大藏省。如同俄国为了解除中国的顾虑而宣称“代为”收复伊犁一样，日本人为了减少国际压力，高调宣布日本政府将完全承认和严格执行此前琉球与列强所签订的所有条约。

在日本吞并琉球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是获得中国的认可，而“琉球漂民事件”正好提供了一个讹诈的机会。得悉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如获至宝，迅速拟定了“琉球处分”计划，决心一箭双雕，在琉球和台湾问题上同时对对中国进行武力侦察。

日本的计划是，以琉球漂民事件为理由，攻击台湾。但当时的大清帝国，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成果斐然，综合国力大有提高，日本自身却羽毛未丰，不得不先进行外交试探。1873年3月，日本政府派遣了6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由外务卿副岛种臣率领，出访大清国。此时，左宗棠在西北的备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日本代表团确定的谈判四原则是：一、如果中国宣称台湾为属地，并且同意惩处肇事者，日本就只要求抚恤金及今后保护漂民的具体措施。显然，这样的前提，还是中国承认琉球为日本藩属，甚至是日本领土，仅此一点，日本就能大有收获。二、如果中国否认台湾为属地，则日本将自行处置。这是日本最希望得到的结果，等于中国自动放弃台湾的主权。三、如果中国既坚持台湾的主权，又以各种方式推脱“琉

球漂民事件”的责任，则日本将“论责处分”台湾，如此，中日之间或将立即爆发武装冲突，日本并无必胜的把握。四、日本代表团根据情况相机采取应变措施。

日本的外交试探，胆大而心细，但大清国的外交部门早就养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太监性格，不敢针锋相对地应对。面对日本的试探，大清外交部（“总理衙门”）居然推搪道：台湾土著居住的“蕃地”属于“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所以，大清国对于“生蕃”杀人事件不能承担任何责任。日本人大喜，认为这至少证明了大清国承认台湾的一部分土地是“无主之地”，大清国主权并不涵盖台湾全岛。



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

日本政府随即调整计划，将攻占台湾“蕃地”列为第一目标，吞并琉球则放到第二位。1874年5月，3000多日军从台湾南部登陆，攻击台湾土著。大清政府一面加强与日本的外交交涉，一面积极整军备战，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出任钦差大臣，率军赶赴台湾，准备武装抗击日军。

日军在台湾的“讨伐”并不顺利，受到了当地土著的坚决抵抗，加上时疫流行，减员严重。在列强调停下，中日两国半年后（1874年10月）签订了《北京条约》，约定日本从台湾撤军，中国向“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支付抚恤银10万两，日军在台湾所修的道路、兵营等，折款40万两由中国方面“愿留自用”。在这一条约的导语部分中，明确说明日本出兵的理由是“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属民等妄加残害”，“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至此，日本虽然在台湾问题上没有斩获，但在琉球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日本代表团顾问、法国法学家巴桑纳表示：“1874年日清两国缔结的条约，最幸运的成果之一，就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岛的权力。”

中日《北京条约》签订后，随着中国的注意力被新疆牵制，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动作。

## 抗俄还是抗日

更为重要的是，新疆的叛乱既混合了种族矛盾，也混合了阶级矛盾，其与太平天国的余部及捻军等都有呼应，当然是心腹大患。几经权衡，中央终于下定决心：在逐渐兴建南北洋海军的同时，国防重点向西北倾斜，全力解决新疆危机！

大清帝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北极熊和东瀛狼，同时在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发难，帮助清廷对抗过太平军的英国军官甚至发出了迁都才能挽危亡的惊呼。

西北方向，沙皇俄国乘新疆叛乱之际，“主动帮助”中国从叛军手中“收复”了伊犁地区，历经10年却并不归还，而是索要高额赎金及大片土地。左宗棠率领西征平叛得胜之师，屯兵六万，厉兵秣马，与俄军对峙，全世界的军事专家都预料中俄战争将难以避免。

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大清政府的老朋友、曾担任过著名的洋枪队统领的戈登，受大清政府的邀请，到访天津与北京。戈登认为中国并不具备抗击俄国的军事实力，



左图：日本和俄国是中国最凶恶的敌人，也成为祸害中国百余年的罪魁。这幅1904年的美国漫画，传神地将日、俄对中国的“调戏”和侮辱表现了出来，而这种“联合调戏”始于1870年代。

右图：日俄当然各有打算。这是俄国在1900年代的宣传画，要将日本小丑消灭。

至少要打5年以上的游击战,才能稳住局面,因此必须做好迁都的心理准备,焚毁北京,坚壁清野。他同时也坚信,一旦迁都,则大清王朝将会立即被汉人起而推翻。

东南方向,正在飞速崛起的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此时更悍然宣布将琉球撤藩立县,改名为冲绳,下一步的野心就是朝鲜和中国台湾。琉球国王派出的秘密使节,向中国政府“泣血”求援,要求中国尽快出兵。抗日情绪同样充满了大清朝野,主战的奏折雪片般地飞进紫禁城。

该雄起!应亮剑!在危机的刺激下,以恭亲王为领导核心的大清,上下都充满了激情的呐喊,但是,激情并非实力,口水绝非拳头,大清国根本没有两线作战的实力,只能在陆地与海洋、“塞防”与“海防”、“固疆”与“保藩”、抗俄与抗日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此时,琉球问题带给大清帝国的刺激,远远高于新疆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连昔日羸弱的日本也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但是,扩建海军的努力迅速被日益严重的新疆问题所阻断。左宗棠的西北备战已经基本就绪,只待一声令下,便可以西征入疆。有限的财政资源和国防经费,究竟应该是满足新疆的平叛,还是先兴建海军?一场有关“海防”、“塞防”的大争论在大清展开。

“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海防建设刻不容缓。而且,自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经营塞防,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如今又要竭尽天下财力西征,不如听从英国的建议,承认阿古柏政权,接受其称臣入贡,将节省下来的塞防费用转而建设海军,对抗日本。



“塞防派”以左宗棠为代表,主张抗俄优于抗日,新疆决不可弃。左宗棠认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放弃新疆,将令整个中国失去西部的国防缓冲地带,只能导致今后的“塞防”成本更为高昂。而且,不战而弃

新疆，对于民心士气及朝廷威严都将是沉重的打击，也不利于加强海防。

“塞防派”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当时的大清精英阶层普遍将俄国看做是战国时的强秦，危害最大。林则徐在伊犁“靠边站”时，就曾严峻地指出：俄国“将来必为大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认为俄国“尤为中华之所患”，提出“防英乎？防法乎？抑防俄乎？曰：防俄宜先”。薛福成则认为：“泰西诸国，畏俄忌俄，如六国之揜秦。据守海道，扼其咽喉。御俄之水师不得纵横四出，俄人亦以久居陆路，未骋厥志，辄思发愤为雄……俄非无事之国，不得于西，将务于东，此必之势也。”

“海防”与“塞防”的选择，对大清中央来说，是痛苦而艰难的。两相比较，“塞防”似乎更为紧迫：

一、日本人的目标还只是琉球，而非台湾，琉球远在波涛之中，即使弃置，也还不伤根本；而新疆与内地山水相连，一旦失守，整个国防西线立即崩溃，无险可守。

二、琉球毕竟只是藩属，关乎“面子”，并不直接牵涉到军事或经济上的实际利益，而新疆则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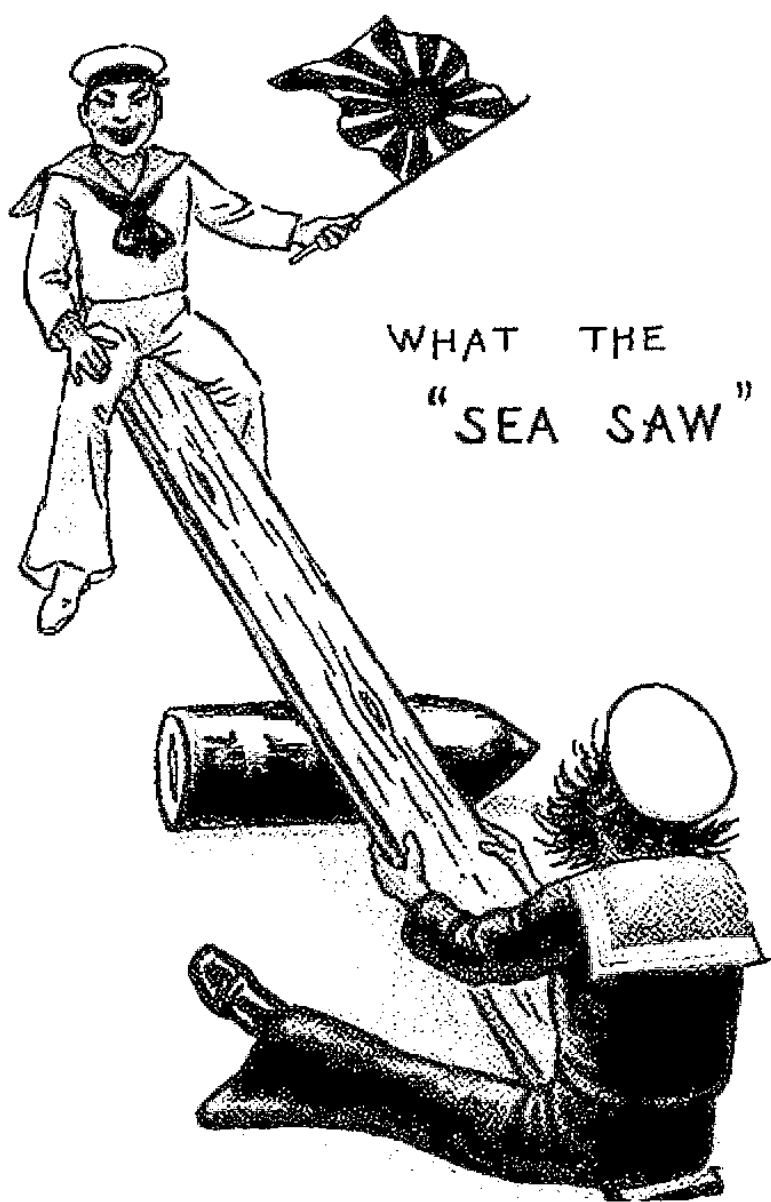
三、俄国与日本相比，威胁更大。俄国既不同文，更不同种，而且力量强大；日本同文同种、一衣带水，而且力量还比较弱小，即使翻脸，也容易善后。

四、危机紧迫程度不同，新疆危机迫在眉睫，稍有延误，则整个西北局势就会糜烂，而琉球乃至台湾危机，还在萌芽发展，对日以防为主。

更为重要的是，新疆的叛乱既混合了种族矛盾，也混合了阶级矛盾，其与太平天国的余部及捻军等都有呼应，当然是心腹大患。

几经权衡，中央终于下定决心：在逐渐兴建南北洋海军的同时，国防重点向西北倾斜，全力解决新疆危机！

日俄在远东玩火，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游戏。



## 天山风雨

中俄关系急降到冰点。感到颜面扫地的俄国，一方面在伊犁地区大举增兵，尤其是增强炮兵，另一方面派出大量军舰，巡弋渤海和黄海，摆出可能攻击华北腹地的架势，战争风云笼罩中国。

1875年，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统帅三军，入疆平叛。左宗棠的方略，核心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全力平叛，暂时不触动对俄的伊犁问题。左宗棠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就是收复乌鲁木齐，这既是俄国人当时答应的归还伊犁的条件，也是稳扎稳打所必需的，“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左宗棠在战场上进展顺利，1876年3月，其总部移驻肃州，不久平定了天山北路，而阿古柏的前沿设在达坂城，双方隔岭对峙。

这时，阿古柏的支持者英国着慌了，其驻华公使出面调停，希望中国能考虑将阿古柏的“哲德沙尔”国作为属国；英国外交部也在伦敦积极牵线搭桥，鼓励前往求援的阿古柏特使与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进行谈判。不久，阿古柏病死，英国再度明确提出，希望中国给予“哲德沙尔”属国待遇，但左宗棠表示坚决拒绝，认为英



时人言：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国无非“图为印度增一屏障，竟公然向我商议，欲于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左宗棠督促军队加紧进攻，顺利收复喀什噶尔，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平叛任务，取得了晚清军事史上罕见的辉煌胜利。

俄国人看傻了眼，此前毕竟许诺过，只要中国军队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伊犁。此时见中国军队平叛如秋风扫落叶，便开始反悔，将伊犁赖着不还了。左宗棠也早有准备，在平叛过程中，有将领就曾建议他趁着俄国与土耳其再次大战的机会，直接攻取伊犁，但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故意留下伊犁孤城不打，而将伊犁周边地区一举收复，在外交上赢得了主动，在军事上也摆出了威慑的阵势。

俄国方面已无法拖延，遂开始与中国谈判归还伊犁的问题。由崇厚率领的大清国代表团于1878年底到达圣彼得堡。俄国要求，如归还伊犁，中国必须补偿俄国军费，在通商方面给予特别优惠，同时还需向俄国割让部分领土。崇厚不待国内批准，就以全权钦差大臣的身份，在俄国提出的《里瓦吉亚条约》(Treaty of Livadia, 又名《中俄条约十八条》)等文件上签字。如果根据这些条约，中国将只能收回一座孤城，而伊犁周边的所有战略要地，都将永久地割让给俄国。

消息传回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张之洞就曾指出：“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是有新疆尚不如无新疆也。”左宗棠说：“伊犁乃我国之领土，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

崇厚(1826~1893)，内务府镶黄旗人，清末大臣。当年清廷见军事工业都掌握在汉官手中，害怕造成“外重内轻”的局面，遂决定由崇厚于1867年筹办天津机器制造局。崇厚不懂洋务，委托英国人密妥士总管，筹备了三四年，耗资不少，但进展不大。后来，李鸿章接管天津机器制造局，辞退密妥士，进行整顿。到1880年代初，天津机器制造局成为北方的“洋务”中心。





俄国宣传画。俄国向东扩展，把黄种人都当做战利品捆绑在腰带上或揣进口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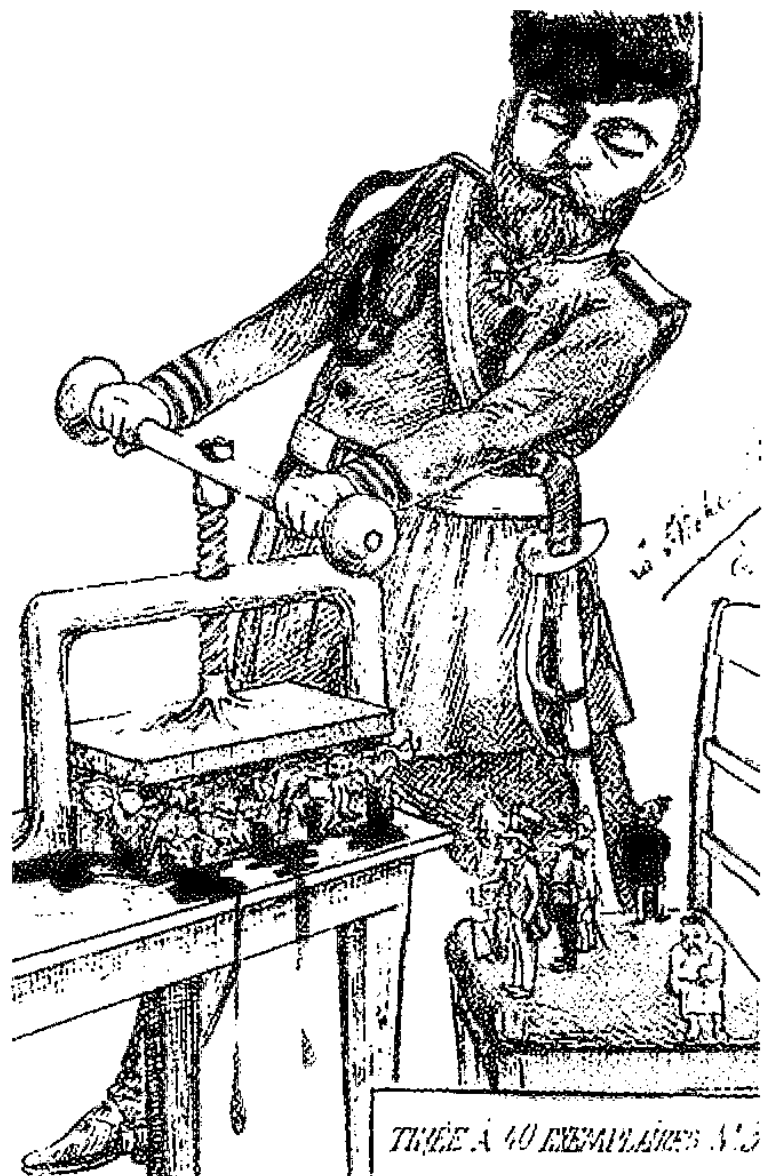


右下图：英国漫画 俄国开动了绞肉器。注意椅子最边上一个在抱肘独处的人，就是中国。

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他提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一方面重新谈判，另一方面积极备战，“诉诸于武力”，并且主动请缨。

全国上下抗俄热情高涨，倒霉的崇厚一回国，就被逮捕，从重判处死缓（斩监候）。中俄关系急降到冰点。感到颜面扫地的俄国，一方面在伊犁地区大举增兵，尤其是增强炮兵，另一方面派出大量军舰，巡弋渤海和黄海，摆出可能攻击华北腹地的架势，战争风云笼罩中国。

大清政府则一方面派遣经验丰富的驻英公使、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俄国，一方面积极备战，左宗棠亲自率军屯驻哈密，随带棺材，以示必死的决心，做好了和战的两手准备。



---

---

## 日本趁火打劫

何如璋认为，与“如无赖之横”的日本是不能谈友谊的，日本人“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然后就是台湾。“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不必担心与日本动武，该出手时就出手。

---

---

中俄局势一触即发之际，东海再度告急：1879年3月，日本明治天皇下令，将琉球撤藩置县，琉球王必须移居东京。琉球问题到了图穷匕首见的地步了。

中日《北京条约》签订（1877年）后，日本就屡屡要求琉球废止“对中国朝贡而派遣使节及庆贺清帝即位等惯例”，废止藩王接受中国册封的惯例，撤销在福建的琉球馆，贸易业务概归厦门的日本领事馆管辖，琉球今后与中国的所有交涉，一律交由日本外务省处分。琉球国王一边与日本软磨硬泡，一边向中国求援。负责对琉球联络的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在转呈琉球国王咨文的奏折中，认为琉球“地瘠民贫，孤悬一岛，本非边塞扼要之地，无捍御边陲之益，有邻邦酿衅之忧”，对中国并没有大的利益，只是考虑到琉球已经“恭顺”了数百年，“何忍弃诸化外”，如果对琉球的求援“拒之过甚”，那么列强可能会认为中国不能庇护属邦，这将引起属邦的离心离德。根据他们的建议，大清中央命令即将上任的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到达东京后立即就琉球问题与日本交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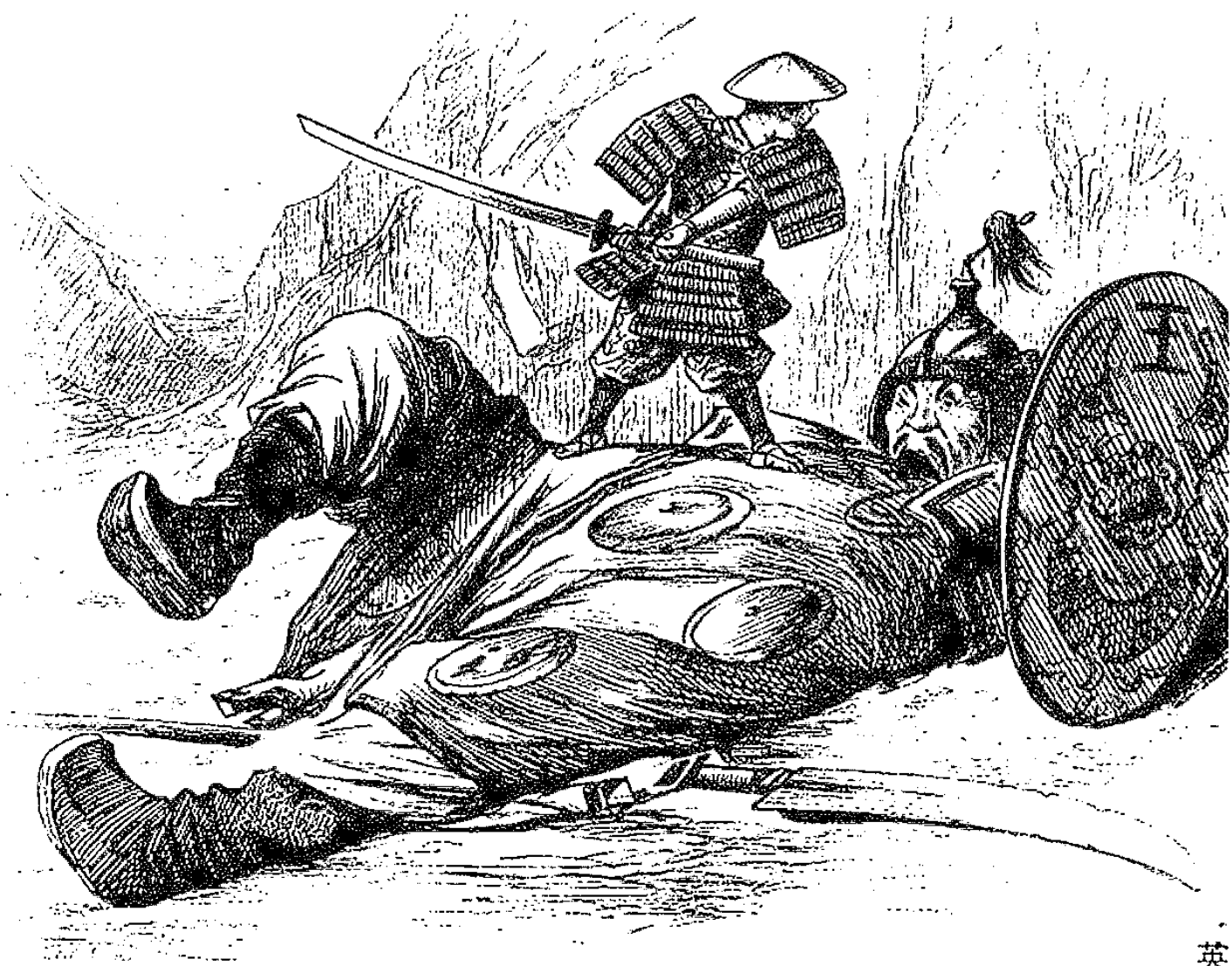
何如璋敏感地意识到日本终将成为中国的大敌，其之所以多年来一直不敢吞并琉球，就是因为忌惮中国的反弹，“欲俟我不与争而后下手”，如果中国不能旗帜鲜明地表态，“日人或惴我为弃琉球，疑我为怯”。而目前日本“国小而贫，自防不暇”，应该趁此机会据理力争，甚至教训一下日本。何如璋认为，与“如无赖之横”的日本是不能谈友谊的，日本人“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而且，琉球靠近台湾，日本如果将琉球改设郡县，就可以成为侵略台湾的前进基地；而琉球人因得不到中国的支援，也可能“甘心从敌”，琉球人本就“习劳苦耐风波”，“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因此，他认为，争夺琉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台湾，“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

也”，不必担心与日本动武，该出手时就出手。

何如璋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遣军舰，盛陈兵威，表面上是前往琉球质问，实质上要“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是与日本反复辩论，或援外国公法（国际法）以相究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李鸿章及中枢机构经过反复权衡，决定采用何如璋提出的下策。在朝廷而言，此时百废待举，在琉球问题上采用敷衍拖延，实在也是有难言之隐。

得到国内的指示后，何如璋即开始对日交涉，但他的态度还是十分强悍，在照会中写道：“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日本政府认为，这样的照会是一种“假定的暴言”，深深地伤害了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的感情，要求何如璋当面道歉，否则不再继续商谈。

事情至此闹僵，谈判转到北京，由日本驻华公使与总理衙门直接商谈。中央的主流意见也认为何如璋在态度上强硬毫无意义，“揣度中国现在局势，跨海远征，实觉力有不逮，若徒张声势而鲜实际，设或为彼觑破，转难了局”。李鸿章在发给总理衙门的《密议何子峨》（何如璋字）密函中，认为何如璋办理外交“历练未深，锋芒



JAP THE GIANT-KILLER.

英国漫画：日本小个子  
打败了中国大个子



大清国首任驻日本国使臣合影

稍重”，并且与其副手也难以和睦相处，“出好兴戎”，过于“冒失”。处于外交第一线的何如璋与外交决策机构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1880年，中俄在伊犁开始武装对峙后，日本趁机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李鸿章请出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在中日之间居间调停。但日本人搬出了中日《北京条约》，证明中国早已承认琉球是日本所属，格兰特也无奈，其华裔随员在发给李鸿章的信中，直陈“中国之大害，在弱之一字”，中国只有“设法自强，诸事可得自主”。

在格兰特调停后，日本再度显露了外交方面的灵活手段，提出将琉球由中日两国分割占领，琉球南部靠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两岛划给中国。而中国则提出了反建议，要求三分琉球，北部归日本，南部归中国，中部各岛则归琉球王国，由中日两国确保其独立自主。日本对中国的建议坚决反对。

多次拉锯之后，新疆问题再度进入关键阶段，种种迹象也表明日俄两国可能联手对付中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中国不得不调整策略，同意以日本的提议为基础，进行琉球问题的谈判。

## 为保新疆失琉球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下，暂时搁置琉球问题亦可算是无奈之举。但随着国势一日不如一日，搁置拖延便转变成了放任，既成事实一旦形成，挽回的余地更是狭小。

1880年7月，曾纪泽到达圣彼得堡，开始了艰难的中俄谈判。大清政府对这次亡羊补牢的谈判准备相当充分：为曾纪泽配备了马格里（Dr. Macartney）、日意格（M. Prosper Giquel）等熟悉中国国情的外籍专家；为保持电讯畅通，中央还特别拨款兴建京沪电报线，原先只通到上海的国际电报终于延伸到天子脚下；左宗棠大军将伊犁地区团团包围，一边大练武，一边搞屯田，逐渐转化为生产建设兵团，左宗棠的亲信胡雪岩则大举采购先进军火。

国际形势也对中国相当有利。第十次俄土战争（1877~1878年）结束，俄国虽然取胜，但元气大伤。除了英国积极反对俄国在新疆的行动外，俄国的盟友法国也表示反对，它希望俄国将对付德国作为重点。在整个欧洲，除了德国想混水摸鱼，鼓动俄国东进外，几乎无人愿意看到俄国在新疆有任何收获。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纪泽的外交斡旋进展顺利。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代表中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领土方面，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曾任驻英、法公使。



俄国向中国归还伊犁，但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土；军费方面，由中国赔偿俄国900万卢布（折合白银500余万两）；贸易方面，俄商在新疆可以暂不纳税；边民国籍方面，伊犁居民可以自由选择保持中国籍或迁居俄国加入俄国籍。

尽管并不完美，但如此成果也已经难能可贵，左宗棠高兴地表示：“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他赞赏曾纪泽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大清海关的洋干部、著名的历史学家马士认为：“外交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帝国已经做好了动武的准备。”英国驻俄国大使德费伦（Lord Dufferin）感慨说：“中国迫使俄国做了它从未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它已经吞进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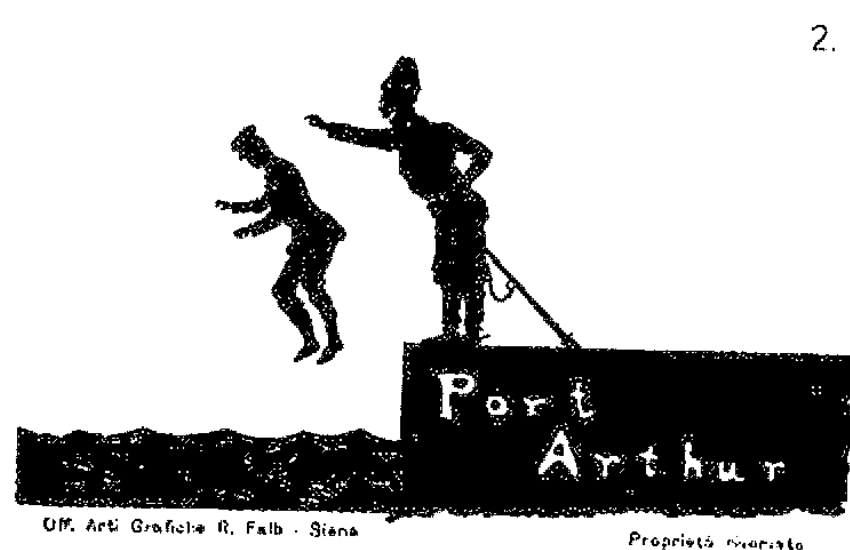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左宗棠再次向中央提议在新疆建省，实行更为有效的管理，新疆终于废止了实行数百年的军府制度，开始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湘军名将刘锦棠出任首任新疆巡抚，自此，中国在新疆的主权维护更为扎实稳固。

在确保新疆问题顺利解决的同时，大清政府在琉球问题上采取了拖延和搁置的策略。

当时，对日俄联手的顾忌是中国的主流意见。陈宝琛等人认为，日本“畏俄如虎，性又贪狡，中国即结以甘言厚赂，一旦中俄有衅，彼必背盟而趋利”。李鸿章则进一步认为，利用中俄冲突谋取自己利益，不仅日本人如此，英、德、西、葡等国莫不如此，因此，“俄事之能了与否，实关全局”，对俄交涉成功，则各国都会暂时死心，对俄



相对于中国而言，日俄两国更是相互间的死敌，但在1870年代，他们却暂时联合起来，将刀口对准了中国。但他们的矛盾随后爆发，图为俄国宣传画：哥萨克巨人在逗弄着日本小爬虫。



这组美国漫画描绘了日俄两国侵略中国的历史。Port Arthur 即大连，俄国将其称为亚瑟港，而后成为通称。

漫画说明：

- 1 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占领了大连；
- 2 俄国人随后通过“三国干涉还辽”，将日本人赶入了大海；
- 3 中俄签订密约，俄国人得以留在大连；
- 4、5、6 日本人卧薪尝胆，悄悄地卷土重来，并在日俄战争中将俄国人赶出大连。

交涉若不成功，则各国都会“萌其诡计”。因此，李鸿章认为，“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激昂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倭”。他主张对日既不必像何如璋那样强硬，也不必答应日本的瓜分琉球要求，而是采取拖延办法：“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敌人，唯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张之洞也认为，对日应该拖延，“姑悬球案，以观事变”，并且应当与日本订立不得助俄之约，等到与俄国交涉完毕，再来从容料理对日交涉。左宗棠对此是赞同的，他认为高喊抗日，甚至要求渡海征日的建议，不仅“先蹈危机”，而且“虚声震撼”，毫无意义。

李鸿章深刻地指出：“中国自强之图，无论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数年之后，船械齐集，声威既壮，纵不必跨海远征，而未使无其具，日本嚣张之气当为稍平，即各国轻侮之端，或亦可渐弭。”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复杂的局势下，暂时搁置琉球问题亦可算是无奈之举。但随着国势一日不如一日，搁置拖延便转变成了放任，既成事实一旦形成，挽回的余地更是狭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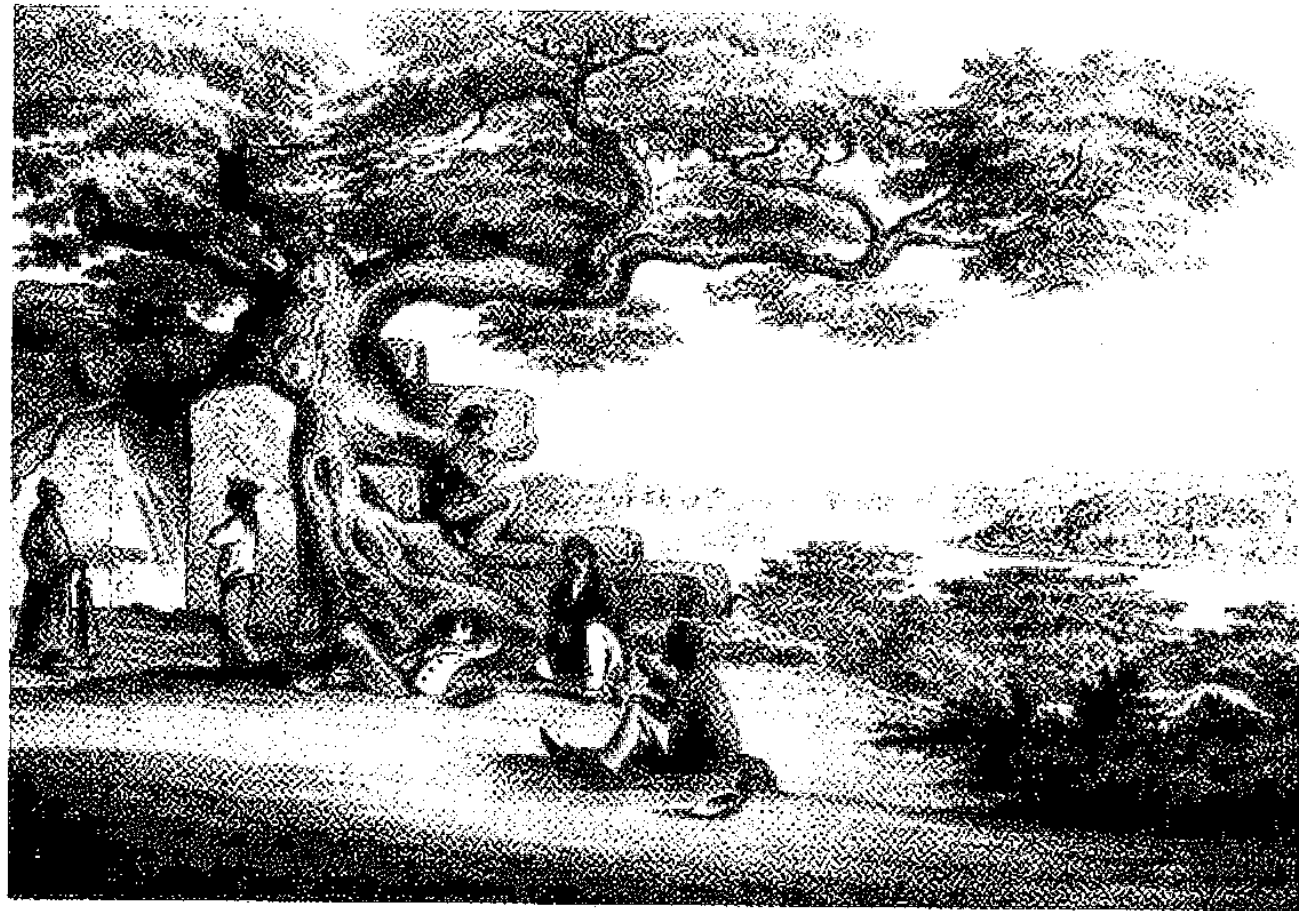
新疆问题解决后，大清国还来不及考虑琉球问题，法国人又染指越南。几经延宕，日本的实力迅速增强，终成尾大不掉之势。越南问题解决之后，朝鲜问题也成为焦点，最终连台湾也沦陷于日本之手。琉球问题被不断地搁置再搁置，中国的宗藩体

系迅速瓦解，战略缓冲地带丧失殆尽。而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新疆大漠上的狂风。俄国与日本，从此双双成为中国最为凶险的敌人，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也会竭力在表面上轮流扮演出中国好邻居的角色……



日本与俄国最后终于爆发大战，史称日俄战争，或“第零次世界大战”。





左图：琉球人 琉球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特别是受到福州人的风俗习惯的影响。看威廉·海涅笔下的琉球人，很像中国大陆人和台湾原住民。图为着中式服装的琉球摄政王。

右图：琉球群岛 威廉·海涅画。当时的琉球已经发展成锁国后的中国海上对外贸易的“总代理”。琉球的船只不仅往来那霸与福州之间，还北上日本、朝鲜，又南下安南（越南）、吕宋（菲律宾）、暹罗（泰国）、亚齐、爪哇（印尼）、马六甲等，遍布整个南洋。

### 【琉球与浩罕】

琉球国，最初是指历史上在琉球群岛建立的山南、中山、山北三个国家的对外统称，后来指统一的琉球国（1429～1879年）。琉球国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台湾和日本之间，曾经向中国的明、清两代和日本的萨摩藩、江户幕府朝贡。琉球国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东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著称，贸易发达，号称“万国津梁”。

1879年3月30日，日本兼并琉球王朝，琉球国灭亡。大部分国土改设为冲绳县，北部诸岛则划入鹿儿岛县。

浩罕汗国，中亚地区的封建国家（1710～1876年）。核心地区在包括浩罕、安集延、马尔吉兰、纳曼干等城的费尔干纳盆地。19世纪上半叶，经济生活和文化建设出现高潮。与附近牧区、中国、俄国等的贸易关系密切。

1876年初俄国吞并浩罕。



## 第七章 改革旗手



妙香亭 恭王府花园西路榆关以北的叠石小山旁，坐落着一座古朴优美、结构新奇的两层海棠式木质结构的方亭，上层为妙香亭，下层名为般若庵。般若庵中有一神龛，上有恭亲王奕訢亲笔题写的“心经”二字。亭前假山石叠缀，错落有致，与园内景致相融合，仿若自然野趣。（陈鸿舜收藏，照片拍摄于1940年前）

## 蝴蝶飞飞曾国藩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那只名叫曾国藩的蝴蝶，面对帝位这一带刺的玫瑰，终于选择了回避，平安降落在历史的荆棘丛中……

快马送来红旗捷报，令恭王府、紫禁城，乃至整个北京城陷入了狂欢的喜悦之中：4天前（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所部湘军终于攻入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历时13年的太平天国燎原大火，基本被扑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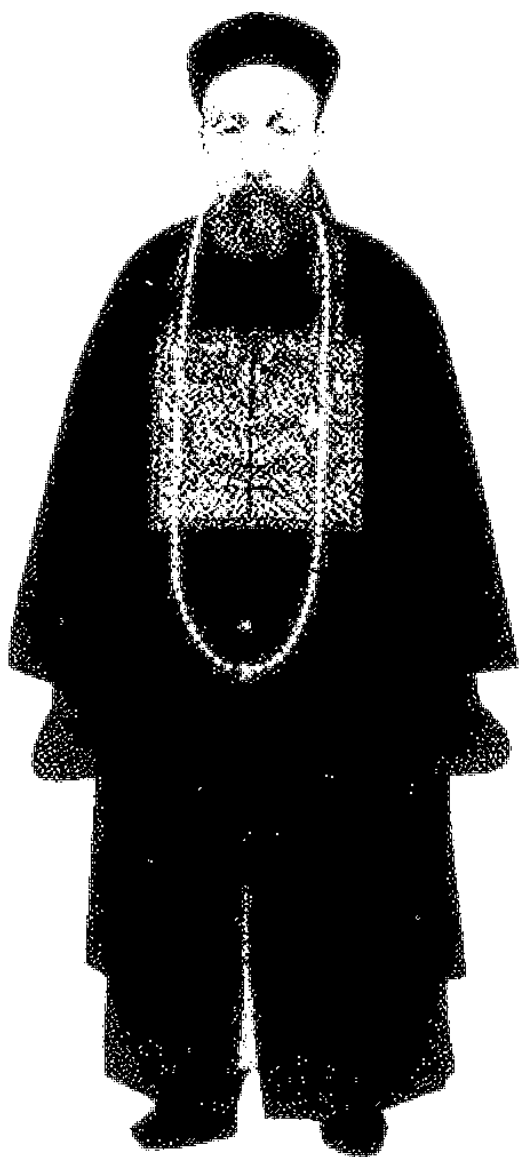
但大清中央核心的“三驾马车”——31岁的恭亲王、29岁的慈禧太后和27岁的慈安太后，似乎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消除另一个更大的隐患：手握湘淮百战雄兵、脚踏东南膏腴之地的53岁的曾国藩。

### 逐鹿问鼎

千里之外，南京大屠杀刚刚退潮。长江航道上拥满了开往湖南的各色船只，据说那都是运载“战利品”的。

曾国藩则忙于处置刚刚于昨天（7月22日）捕获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这位太平军中最天才的将领，随后在大牢中写下了洋洋数万字的“亲历”，痛切地分析了太平天国的兴亡。但恭亲王及世人看到的“亲历”，却是个被曾国藩删改了的“洁本”——据说李秀成在“亲历”中劝曾国藩自己称帝，恢复汉家天下。

权力的本质就是影响力。曾国藩其时已经成为大清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同时也成为吸纳各种资源的天然磁场。除了李秀成之外，还有很多人希望曾国藩“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这些在野史中，无法被证实，也





清末年画《曾国藩庆贺太平宴》 正中榻上坐着李鸿章（左）和曾国藩（右），左边从左至右依次为左宗棠、骆秉章，右边坐着彭玉麟、曾国荃等。

无法被证伪的“劝进”故事，还有好几个版本：

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帐下大将彭玉麟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在迎接曾国藩时，塞了个小纸条：“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阅而变色，急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字）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然后把信团起吞下肚去。

攻陷天京后，曾国荃和湘军其他将领们，欲效仿陈桥兵变，制造第二个赵匡胤，给曾国藩来个黄袍加身。曾国藩听说后，“彷徨无措，踟躇徘徊于室中者通宵达旦”，第二天他告诉老弟说：“人家待我们还好，何忍出此？”

曾家子孙们也有类似的记载。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说，老家湘乡的工匠唱民歌，歌颂她老爸，有两句就是：“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

应曾国荃邀请，为湘军撰写英雄事迹《湘军志》的湖南狂生王闿运，据说也劝曾国藩问鼎中原。曾国藩什么都没说，以手指蘸茶水在茶几上写了多个“谬”字，然后走开，让王闿运自己领会。

王闿运是研究和贩卖帝王术的专家，日后在晚清和民初大名鼎鼎的杨度，就是他的学生。杨同学在一首名为《湖南少年歌》里，如此讴歌他的王老师：“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

先生大笑披衣下。”终王老师一生，其“销售”业绩都不理想，倒是杨同学青出于蓝，成功推出了一个“洪宪皇帝”袁世凯。王老师晚年很郁闷地自挽道：“春秋表仅成，剩有佳儿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留高韵满江山。”

防范曾国藩坐大，这几乎是朝野上下一个公开的秘密。1854年，曾国藩率军攻占武昌，咸丰皇帝欣喜异常，要任命曾国藩担任湖北省代省长（署理巡抚）。委任状刚发出，军机大臣祁隽藻就劝阻道：“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闻之心惊，立即追发一道圣旨，收回了前面的委任状，改授曾国藩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的虚衔。

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曾国藩在前线的处境一度十分艰难和尴尬。“无土无财，无位无民”，“武不能补千把外委之实，文不能辖府厅州县之官”，更为头疼的是，因为没有地方官的头衔，筹粮筹饷十分困难，备受掣肘。后来，干脆借奔丧为名，撂了挑子在老家静观局势。直到局势日益糜烂，中央不得不同意赋予其地方实权，他才出来工作。

### 激流勇退

在曾国藩最有可能问鼎中原、逐鹿天下的巅峰时刻，他踩下了紧急刹车。

8月1日，曾国藩获加“太子太保”衔，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获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伯爵。先后获封的，除了湘军系的人马外，还有恭亲王、文祥等中央大员，李鸿章、官文等其他前线将领，充分体现荣誉属于集体的原则。14天后，曾国藩上奏，请求中央同意裁撤湘军，并且要求停解广东、江西厘金，这等于是自觉交出了兵权和财权。

两个月后（10月4日），年仅40岁的曾国荃“病”了，由其大哥曾国藩代奏，请求提前“病退”。曾国荃的“病”，来得很及时，很讲政治。

曾家兄弟自释兵权之后，中央也给足了他们面子。曾国荃曾经谎报说，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在南京城陷时被杀，实际上突围而走，最后左宗棠将其抓获，中央下令就地处决，不必押赴北京献俘，避免了曾家兄弟的难堪。

曾国藩对政治站队向来敏感，信奉“君子不群”的原则，不主动拉帮结派。早在三年前（1861年），即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发动辛酉政变那一年，曾国藩就很明智地

拒绝了王闿运的游说，躲过一场大难。根据王闿运之子王代功编撰的《湘绮府君年谱》记载，当时，恭亲王、两宫太后与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人帮”，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微妙格局，同在热河的肃顺与两宫太后已经多次发生正面冲突。作为肃顺一手提拔和扶持起来的干部，外人都坚信曾国藩与其关系密切。王闿运当时很为肃顺所欣赏，他写信给曾国藩，建议他领军入朝，联合肃顺与恭亲王，抵制太后的垂帘听政，“亲（指恭亲王）贤（指肃顺）并用，以辅幼主”。曾国藩不想蹚这浑水，“得书不报”。不久，恭亲王与太后们叔嫂联手，打倒肃顺，王闿运失却政治前途，对曾国藩“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在政变后查抄的肃顺文件中，曾国藩除了公文往来外，别无私信沟通，因此被恭亲王认为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得免纳入“肃党”之列，躲过了一次政治大清洗。

恭亲王和两宫太后上台后，实行“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并行。这个年轻的领导核心，在行政方面奉行“不折腾”的稳妥原则，对肃顺执政时推行的大多数政策，包括引起很多满族干部不满的重用汉人，基本维持不动。

令曾国藩大感意外的是，政变后18天，新的中央核心就发布上谕，命令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掌管浙江全省军务，还命令杭州将军瑞昌帮办。以一个汉人总督而节制四省，并且明确驻防将军只能做副手，这一放权力度之大，创下大清国历史纪录。

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新的领导集体评价道：“京师十月以来，新政大有更张。皇太后垂帘听政……中外悚肃。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面对“可悚可畏”的局面，曾国藩十分“识趣”：多次奏请中央派出工作组，到前线监军；多次辞谢中央的奖励，表示不打下南京，无颜受赏；甚至主动表示，组织人事任免大权应仍归于中央统一掌握，地方大员不应越位；等等。

在曾国藩与中央的大量往来公文中，充斥了互相表白、肝胆相照的信息。中国历代的权臣，多数在起初并无不臣之心，但却疏于或懒于沟通，不注意及时向中央、向领袖汇报思想动态，造成信息不对称，难免令人起疑心。上下一旦有了疑惧乃至防范之心，这种隔阂便不断扩大，恶性循环，最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善终者寥寥。

征战十年，曾国藩的湘军成为全国最大的一个派系：在同治二年（1863年），全

国8位总督中，3人是湘军将领；全国15位巡抚中，9人是湘军将领，“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这种势力和实力，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曾国藩的功绩成果，也是曾国藩的“大戾”源头，他在家书中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 带刺的玫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把算盘。对于恭亲王和两宫太后来说，既希望能将曾国藩手里的枪杆子缴械，又希望曾国藩能继续发挥“余热”，至少不能立即退休，以免给人造成中央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不良印象。

自觉裁军后的曾国藩，依然受命带兵围剿捻军，直到四年后调任直隶总督。直隶总督为疆臣之首，位极人臣，如此安排曾国藩，恭亲王一方面明显是为了酬功，另一方面也为了他能在中央身边工作，利用他在第一线所积累的多年经验，为自己正在积极推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出谋划策，保驾护航。

但也该他倒霉，一场“天津教案”，开创了晚清教案的典型，夹杂在愚昧的百姓、蛮横的洋人和颀颀的官员之间，曾国藩处境艰难，“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湖南会馆甚至将他的官爵匾额“悉数击毁”，并开除其“名籍”（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代“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甚至“谤讥纷纷，举国欲杀”。幸亏此时江南出了个“刺马案”（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电影《投名状》之原型），两江总督马新贻被旧友所杀，遍布两江的湘军旧部出现不稳定的迹象。恭亲王赶紧让曾国藩回任，顺带就把李鸿章推上了直隶总督的宝座。

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国年轻领导集体，能将曾国藩这样的权臣驾驭控制住，其政治智慧和手腕不容小觑。但对于恭亲王，曾国藩也在私下场合与其心腹幕僚赵烈文有过有趣的辩论。赵当时在上海看到了恭亲王的照片，他说：“（恭亲王）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

曾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

赵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他认为，恭亲王身处“姬旦之地”（即辅佐幼



帝的周公)，“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只有些小聪明而已，国家的大难还是难以避免。

曾国藩大不以为然，他以恭亲王的“勤政”、“免征”、“免报销”及处理官文几件事为证，认为这些“皆非亡国举动”，不存在“抽心一烂”的问题。

但在重新入朝之后，他告诉赵烈文：“两宫（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恭亲王、文祥、宝鋆）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良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几乎一棍子横扫当时中央的所有人，曾国藩的孤傲内心只有在心腹面前才表露无遗。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其实主要只和两个人互相纠葛：一个是洪秀全，另一个就是恭亲王。这三个人都具备了南面称帝的条件，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洪秀全当了十来年的人间天王，最后去见了他的天父天兄，他的尸体被湘军焚毁，骨灰塞入炮膛，发射到江里，只留下疮痍遍地的大半个中国。

曾国藩挟不赏之功，忧谗畏讥，处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终于实现了平安降落，美国史学家称他是清代第一个得到善终的汉人将领。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大清总理恭亲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在收复南京的第二年（1865年）就差点被打倒，虽然在满洲亲贵们的支持下，重新站了起来，却永远地失去了“议政王”的头衔。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那只名叫曾国藩的蝴蝶，终于没被帝位这一带刺的玫瑰所扎伤，平安降落在历史的荆棘丛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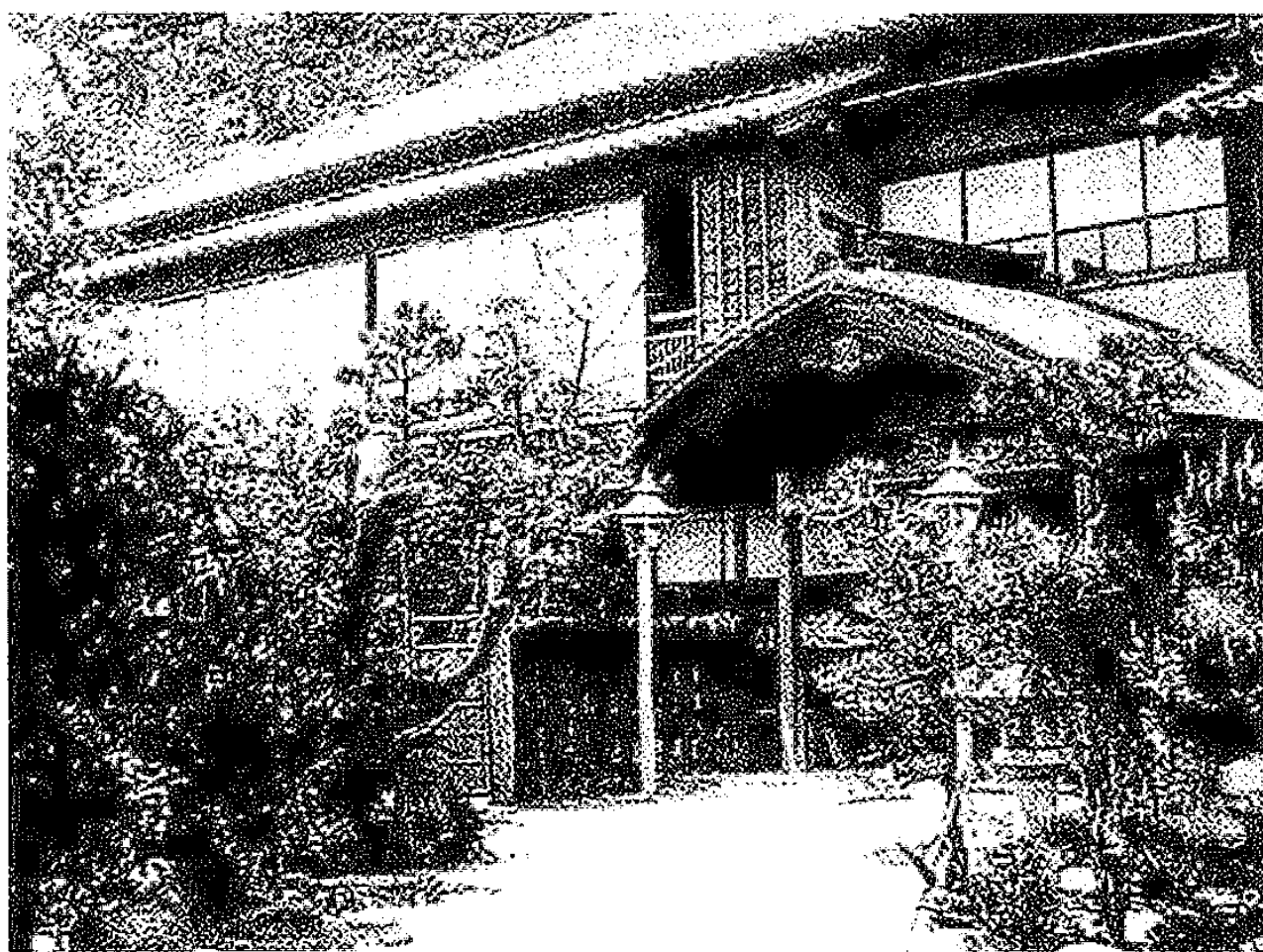
## 春意盎然李鸿章

李鸿章心中的“一段春”，绝不是“百官气”能养出来的，而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定位就是吸引“敌人的火力”，让“百官气”向我开炮，所以才敢放手一搏，不惮成为众矢之的，以掩护恭亲王、掩护慈禧太后、掩护中央，心里有底如此，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自然春意盎然……

东方风来满眼悲。

1895年的春天，对于恭亲王、李鸿章及大清国来说，东风拂面格外冷。74岁的李鸿章，即将起航前往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等进行谈判。日军的凌厉兵锋，直指北京，谈判一旦破灭，北京必将被日军攻占。尽管李鸿章早在十多年前就不断地呼吁军事改革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北洋舰队无法应对新形势下的军事挑战，但总是遭到强有力的反对及强有力的掣肘，比如翁同龢掌管下的户部，就在“大国崛起”的幻觉支

绝版恭亲王



1895年3月20日，李鸿章抵达日本下关与日方进行会谈，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左图为谈判期间李鸿章在下关的留影。右图为《马关条约》的谈判会场——日本下关春帆楼。

持下，基本对北洋舰队采取了“财政封锁”政策。如今北洋舰队已灰飞烟灭，李鸿章成为举国皆曰可杀的罪魁，那些从来袖手旁观，乃至暗地里猛使绊子的新老愤青，爱国唾沫空前横飞，密集程度如同前线的枪林弹雨。

64岁的恭亲王，则托了日本人的福。如果不是这个帝国到了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危险时候，他还将如同这十年一样，继续待在政治冰柜中。国难思良臣，家贫念贤妻，恭亲王终于走出了后海边那座华丽的“牛棚”，被“结合”进了中央核心，参与决策。

冰冻了十年，之前那睿智、敏捷的恭亲王似乎不再保鲜，但在这举国群情汹汹的情况下，他率领军机大臣们，在写给皇帝和太后的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据说，李鸿章为此老泪滂沱，心甘情愿地踏上了轮船，前往日本去完成那不得不完成的艰难的“卖国”任务。

### 泰山顶上一颗“葱”

三十年了，大清国的第一波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最终被日本联合舰队击沉。在这轮改革开放中，无论军事、经济各方面，李鸿章都被后世毫无悬念地当做改革的旗手，而恭亲王则在很长时间内被当做是一枚橡皮图章，随波逐流地卷在浪潮之中。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除了有意识的政治选择外，更在于李鸿章曝光度高，类似于大清改革的新闻发言人和操盘手，而恭亲王总是在幕后，不显山，不露水，甚至还经常表现得有点怯懦、有点摇摆。

似乎美国人看得比中国人还明白，这样的搭档是黄金搭档。或许，中国人即使看明白了，在很多时候也只能假装糊涂，时间久了，或许就真糊涂了。美国史学家西格雷夫就坚信，李鸿章就是恭亲王的“手”，他甚至大胆假设，李鸿章除了作为恭亲王的实践者之外，还帮恭亲王办了些什么“脏活累活”，比如可能的暗杀同治皇帝。

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作为权力金字塔上的老二，恭亲王的地位不允许他表现出任何“积极要求进步”的迹象，位极人臣，功高不赏，你再要求进步，老大就该犯嘀咕了：你什么意思？什么动机？！而李鸿章就没有这种顾忌，

他只要让中央相信，自己虽然拿着枪杆子，但自己更是中央的一杆枪杆子，就基本可以放开手脚，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同样是美国人，格兰特总统在拜访了恭亲王和李鸿章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恭亲王受地位所限，决定了他“不可能如李鸿章那样走得那么远”。

恭亲王执政期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但凡要推出什么改革措施，中央一般都先把问题和困难摆出来，征求地方大员们的意见。如同文馆所涉及的教育体制和干部制度改革、建立阿思本舰队时涉及的军事改革等，都是将政策向地方大员和前线大员们事先交底，官员们则可以畅所欲言，不会出现扣帽子、打棍子的情况。这样一种“官场内部民主”，的确令不同的意见得到了表达的机会，并且形成争鸣；脱离了暗箱操作后，那些显然是敷衍、塞责的意见，在阳光下无可遁形。这令恭亲王的改革，总能比较稳妥地推进，既相当技巧地减少和化解了反对派的阻挠，又从反对派的充分表达中汲取了营养，完善了改革方案，更从不同派系的博弈中，来了解和掌控改革的力度、分寸。在这样的一个沟通过程中，作为舵手，恭亲王尽量地保持了中立的角色，从而可以尽可能多地团结“左”与“右”两方面的干部。尽管恭亲王早已获得了“鬼子六”的雅号，被人们贴上了自由派的标签，但是，除了蔡寿祺之类投

机钻营的举报者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他的人品及政治品格有过怀疑。这种稳健的政治手法，使恭亲王在关键时刻，既能推动改革不断前进，也能掩护激进的改革者从反对的声浪中逃生。

身处风口浪尖，恭亲王只是将自己定位为“泰山顶上一颗葱”，而不是“一棵松”，这使他减少了被狂风扫荡的机会，令泰山脚下的松树

西方人总是很惊诧于李鸿章这样的改革派居然能与中央核心保持一致。图为1901年的英国漫画，描绘李鸿章和慈禧重返故里，即流亡的慈禧回到北京。



们大为心理平衡，同时也不影响自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恭亲王三起三落的政治过山车历程中，没有任何一次下台是因为他奉行了过“左”或过“右”的政策，而都是毫无例外地出于慈禧老大对他的训诫——这种训诫不是因为政见，而只是因为老二离老大的位置过于接近，老大必须时时敲打老二，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恭亲王的这种政治性格，成为总理衙门的部门性格。这个以改革为主要使命的部门，在不断的利益调整中，不得不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敏感神经，同时还得顾及大清特色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承受力，时时左右为难，却时时要做到左右逢源。这就注定了这个部门经常会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夹攻，里外不是人，而这正是中国历来改革者的主要下场。在它被来自“保守势力”的炮火猛烈攻击后，我们从欧美的史料中，几乎很少能见到对它的正面评价：西方人几乎一致批评这个部门在“保守势力”面前的软弱和妥协，其改革慢得像小脚老太一样。

作为泰山顶上一棵“葱”，恭亲王和总理衙门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毕竟还是在三十年的时间内，令一穷二白的大清国，成为经济意义乃至军事意义（北洋舰队世界排行第八）上的世界大国。“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这不只是为李鸿章辩护，而是在为自己辩护，为大清所有身处夹缝中的改革者辩护。

### “养就心中一段春”

李鸿章上调到中央身边工作，出任直隶总督，发生在1870年的天津教案之后。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上的进退失据，令中央相当失望。而原本，恭亲王是想借重曾国藩的大名和经验，作为自己推行改革的主要助手。出于爱护干部和解决问题的双重目的，恭亲王决心起用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一则能令忧谗畏讥、暮气日重的曾国藩平安着陆，二则也要在实践中考验考验这个公开声称要和洋人“打痞子腔”、不能对洋人太过实诚的李鸿章。

李鸿章此前，就显露过远比其老师更为灵活和果断的手腕。在招降了苏州太平军后，李鸿章摆下鸿门宴，剃下了降将们的脑袋，屠杀了大量降兵，据说这就是日后一部名为《投名状》的电影的创造灵感来源。尽管洋人们十分痛恨李鸿章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但中央相信，这的确十分有效地解决了苏州的后顾之忧。而在英国人阿思本率领舰队前来大清打工，还在和大清政府谈判指挥权时，李鸿章已经成

功地从舰队中高薪挖走了一些骨干官兵，充实到自己的部队中，这令英国人大为恼火。

这样一个敢作敢为，同时也善作善为的人，终于成为恭亲王十分默契的政治搭档。自此，但凡中央征求改革意见，李鸿章总是积极响应，而且视野开阔、思路敏捷、态度坚决，将一些恭亲王不方便说、不能说，甚至没想到说的意思，都充分表达出来，既帮助恭亲王吸引了反对者们的炮火，又为恭亲王提供了与反对者们讨价还价的更大砝码。一个悄悄地点火，一个大声地放炮，默契和谐。李鸿章经常提交激进改革措施，并非其不了解中央的实际承受底线，而更是一种“求其上，得其中”的古老策略。

在建立海军的过程中，恭亲王和李鸿章已经确定了要发展远洋攻击型舰队，而非近海防御型舰队，需购买新式巡洋舰、铁甲舰，但却依然由李鸿章出面提出报告，为沿海各省统一采购小型舰艇。这些小型舰艇到位后，并不分配到各省，直接就截留在了李鸿章的北洋舰队之手，这样，不仅扩大了北洋舰队的预算，将各省名下的防务经费变相地纳入北洋，而且悄悄地将各省的海防大权收归中央，避免了海军方面出现与陆军相同的尾大不掉的局面。

1896年李鸿章访问德国备受礼遇





李鸿章的定位就是吸引“敌人的火力”，让“百官气”向我开炮，所以才敢放手一搏，不悛成为众矢之的，以掩护恭亲王、掩护慈禧太后、掩护中央。自然，他也要负责将骂名都背走。图为英国漫画，描绘李鸿章欢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

其他在诸如兴建铁路、开采煤矿、发展电报等各项改革事业中，李鸿章均积极建言献策，动则数千字的长篇奏折，洋洋洒洒，并对保守派们的意见痛加斥责。这些建言，总是在提交给总理衙门后，没有反响。李鸿章自己透露，负责总理衙门日常工作的文祥，每次都是“且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而恭亲王有时也表示无奈，说即使“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后世史家常以此作为李鸿章发牢骚的证据，殊不知，这正是绝妙的政治双簧，没有李鸿章的屡次进言，恭亲王拿什么去敲打那些榆木疙瘩脑袋呢？而没有恭亲王的审时度势、待机而动，李鸿章又凭什么在官场上巍然不动，甚至不断进步呢？这是改革者的无奈之处，也是其在夹缝中求发展的政治技巧。文祥曾经明确告诉热心而着急的美国人，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必须小心谨慎地选择改革的步子、方向，否则，改革者自己将很快被牺牲，而改革则会被导向反面。

在大清的改革战车上，可以说，李鸿章负责踩油门、摁喇叭，而恭亲王负责看地图、踩刹车，不是为了减速，而是为了防止出轨。李鸿章有句名言，“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心中一段春”，这不能简单地理解成他的涵养和胸怀。他心中的“一段春”，绝不是“百官气”能养出来的，而是因为他明白自己的定位就是吸引“敌人的火力”，让“百官气”向我开炮，所以才敢放手一搏，不悛成为众矢之的，以掩护恭亲王、掩护慈禧太后、掩护中央，心里有底如此，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自然春意盎然……





## 第八章 中央“一抬”



后罩楼匾额 后罩楼是位于恭王府府邸三路院落的后面，一幢长 152 米、贯连 108 间的凹字形两层前出廊硬山式建筑。楼上东西两侧分别悬挂有“瞻霁楼”、“宝约楼”的匾额，黑底黄字，无题款。匾额悬挂于此楼的时代不明。（陈鸿舜收藏，照片拍摄于 1940 年前）

---

---

## 号令不出中南海

恭亲王推行改革，目的之一就是重塑中央权威，但改革的结果却是权威涣散，号令不出中南海，威仪只限紫禁城，中央失去了对地方财政、组织人事，乃至军队的控制，这埋下了日后武昌城头一夫作乱而江山变色的祸根……

---

---

天还没亮（“漏三下”），大清国总理、恭亲王奕訢及财政部长（“大学士管户部”）倭仁，带同财政部的官员们，就开始在宫门外递折，请求两宫太后召见。包括倭仁在内，户部官员们都是两眼通红，呵欠连天，他们已是连夜工作至今。

如此郑重其事，两宫太后立即接见。奕訢和倭仁呈上户部拟定的一份报告，太后看后称善，命即颁谕宣示中外。

当这份文件用快马递往远在江南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时，曾国藩派出的信使，也在向北京疾驰：他请求中央裁撤湘军，停解广东、江西厘金，自觉交出兵权和财权。

这是1864年8月14日（农历七月十三），离曾国藩的湘军打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仅一个月。

### 军费报销

办完此事，恭亲王的心中放下了一块大石头，轻松的心情丝毫不亚于一个月前得到光复南京的红旗捷报。根据时人李桓（李瀚堂）的记载，这份中央文件一发布，“都中人士欢声如雷，各部书吏闻而大骇，有相向泣者”，有人甚至将此称为“同治朝旷典也”。

这是一份有关曾国藩军费报销的指示，涉及的费用高达上千万两。

根据大清国的军费报销规定，一切军费开支必须造册报销，详细罗列开支的细节，然后由户部进行审计。但是，战区物价飞涨，尤其是粮食蔬菜等给养，价格往往难以与户部规定的参考价吻合，而士兵战死、失踪、新补频繁，加上各级军官们或者无暇做账、或者猛做假账，军费报销往往难过审计大关，一耗数年，“自帅臣以逮末僚，

凡厕身行间，匀摊追赔，无一漏脱。存者及身，死者子孙，久迫追呼，非呈报家产尽绝，由地方官验明加结具文咨部，不能完案”。因此，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是，带兵统帅在报销时向户部官员们私下进贡一笔“部费”，他们就会对账目进行技术处理，保证能过关。曾国藩的湘军还在南京城头浴血奋战时，户部的书吏们就看到“复城之不远也，报销之难缓也”，“约同兵、工两部蠹吏”，密遣亲信到战区各省，秘密地“与各该省佐杂微员中狙诈狡黠、向与部书串通又能为管库大吏关说者，商议报销部费”，“部费”的盘口也都开出了。

当时担任户部郎中的王文韶，向中央提交了《请免册报私议》，建议中央免除册报，以免各地借报销的名义“徒滋扰累”。兼管户部的倭仁十分赞赏，就拉着王文韶，起草了一份详细的报销方案，将繁琐的“造册报销”改革为简便的“开单报销”，即带兵将帅只要提供一份开支清单即可。主持中央工作的恭亲王对此也深表赞许。

恭亲王所顾虑的，也和倭仁、王文韶及前线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们一致：按照老制度报销军费，不可为、不能为、不敢为。军事行动旷日持久，长达数年，账目难以核查，此为“不可为”；镇压太平天国，中央基本不提供军费，都靠各支部队自行就地解决，从情理上说，如今要他们报账似乎过于刻薄，此为“不能为”；而面对百战余生后的骄兵悍将，要层层追查他们的经济账目，弄不好就会激出兵变，此为“不敢为”。

恭亲王和两宫太后都是明智的，在那份“都中人士欢声如雷”的中央文件中，同意“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办理军务未经报销之案，准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简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

对于简化军费报销程序，曾国藩在家书中说：“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他请求裁军的奏折，与中央宣布新的报销制度同日发出，这种巧合，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和谐和默契。

## 大清肾亏

恭亲王和两宫太后虽然成功地化解了湘军尾大不掉带来的高风险，但是，在战争中已经放手给地方的权力，已经很难收回。站在胜利的废墟之上，大清中央低头自省后发现：自己其实成了庙里的菩萨、宫中的太监，几乎是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大清王朝受到太平天国的最大冲击，就是被迫向地方分权，导致“内轻外重”，中央权威沦丧。图为当时西方报纸上的太平军形象。

在“耶稣的弟弟”（洪秀全）下凡折腾之前，大清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无论军权，还是财权、人事权，都归中央统一调度，一切行动都听从和服从中央的召唤。比如在财政上，就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户部统辖全国的开支，既是财政部，也是国家税务总局，同时还行使着国家审计总署的职能。各省布政使司以及盐运道、粮储道等，都是户部派出的人马，由户部垂直领导，独立于地方督抚，负责监督和落实国家财政、税收等工作。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稳定压倒一切。而当太平天国将半个中国拖入战火，尤其是攻占了税赋重镇江南之后，大清的中央财政，如同其名一般，迅速成了两袖“清”风。面对困境，中央只好动用最后一种资源：权力资源，下放权力“特殊政策”，同意地方截留税收，就地筹款，“按年定数指拨解部”。从此，在欲望勃勃的“地税”挤压下，早已是黄脸婆的“国税”只好偏居偏房。

地方督抚们，尤其是前线将帅兼任地方督抚后，几乎成了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皇帝”。如曾国藩，其麾下大军实际上已成其私家军队，而并非之前的“国军”，“兵归国有”成了“兵为将有”，开创了近代军队“私营化”的先河。曾国藩本人还统管财政、人事乃至辖区内的外交事务，“凡湖广、两粤、闽浙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谕之”，权势之大，直逼清初的吴三桂及年羹尧。在曾国藩的示范效应下，各地督抚纷纷借机扩大手中权力，在他们的不断要求下，甚至连司法上的死刑终审权，都下放给了省里，中央放弃了作为国家机器重要象征的“生杀大权”。唐代末年的藩镇割据局面，日渐成型，中央则逐渐被边缘化，成为一种象征工具而已。

## 雄起艰难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有人游说曾国藩，更上一层楼，乃至干脆夺了江山自己称帝。出于各种考量，曾国藩并没有付诸行动，并且在战后率先交出兵权。

幸运的是，中央与诸侯当时都是人才济济，没有那种一根筋的二杆子，响鼓不用重锤，彼此心照不宣，花花轿子人抬人，才算从危机中平安地实现了软着陆。曾、左、李等“中兴名臣”顺利交出枪杆子和印把子，由此奠定了“同光中兴”的基础，为大清王朝争取到了宝贵的三十年和平发展时间，直到日本发动甲午战争。

大规模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就在战后迅速展开。此时，一个难题摆在以恭亲王、两宫太后为首的中央面前：痛定思痛，不改革肯定不行；但是，中央却两手空空，推进改革只能继续依靠地方力量，而这又会导致地方权力的进一步巩固乃至扩大。唯一稳妥的办法，就是暂缓改革，待中央权威恢复之后再行。但是，大乱虽然已过，小震不断，内忧外患频仍如故。不改革，祸在眼前；依靠地方进行改革，则或许还能突出一条生路。改革其实包含了两个目标，一是拯救政权，二是拯救中央，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尽管战后中央多次想收回之前下放的权力，主要是财政权，比如恢复奏销制度、撤除厘金等，却远不如收回最为敏感的兵权那么得心应手。这固然因为地方督抚抗争，但实质上还是因为中央自身硬不起来，必须依靠地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在轰轰烈烈的首轮工业化进程中，各省先后建立起机器局等。但是，如同当年打仗一样，中央财政空虚，只能放手继续让地方就地筹款。各省不仅截留国税（“京饷”）、挪用军费，甚至直接加捐加税，乃至随意动用国库（藩库）的资金。

在“洋务运动”中大量涌现的数十个新兴企业及事业单位（学校等）中，真正得到中央财政全额拨款的只有天津机器局、吉林机器局等寥寥几家。而诸如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汉阳铁厂等关系国家命脉的重工业企业，都只得到部分拨款，轮船招商局则干脆在名称上就写明白了“招商”二字，其余的主要款项来源都必须依赖地方督抚各显神通、自行解决。这在培养了地方上一大批能人的同时，继续加大了地方的尾大不掉态势。

更严峻的是，改革似乎到处开花，却很少结果。中央调控的缺位，导致中央无法在全局层面上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各地督抚好大喜功，竞相攀比，重复投资，

重复上马；再加上新型企事业单位既脱离了常规的纪检监察体系（尽管监督效率极低）的视线范围，又缺乏一整套的符合契约精神的法规的约束，内部管理混乱，效率极低，导致有限的资源在改革的旗号下被严重浪费。如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每月“薪水工食”一项开支即达3.9万两，而船政局每月定额经费才5万两，高达80%的经费是“吃饭”之用。尽管针对各项改革事业中的腐败行为，举报信、意见书不断，但弱势中央却大多只能望洋兴叹。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在其名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指出：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努力之所以总是失败，原因就在于中央政府太过软弱，而无法制定有效的国家工业化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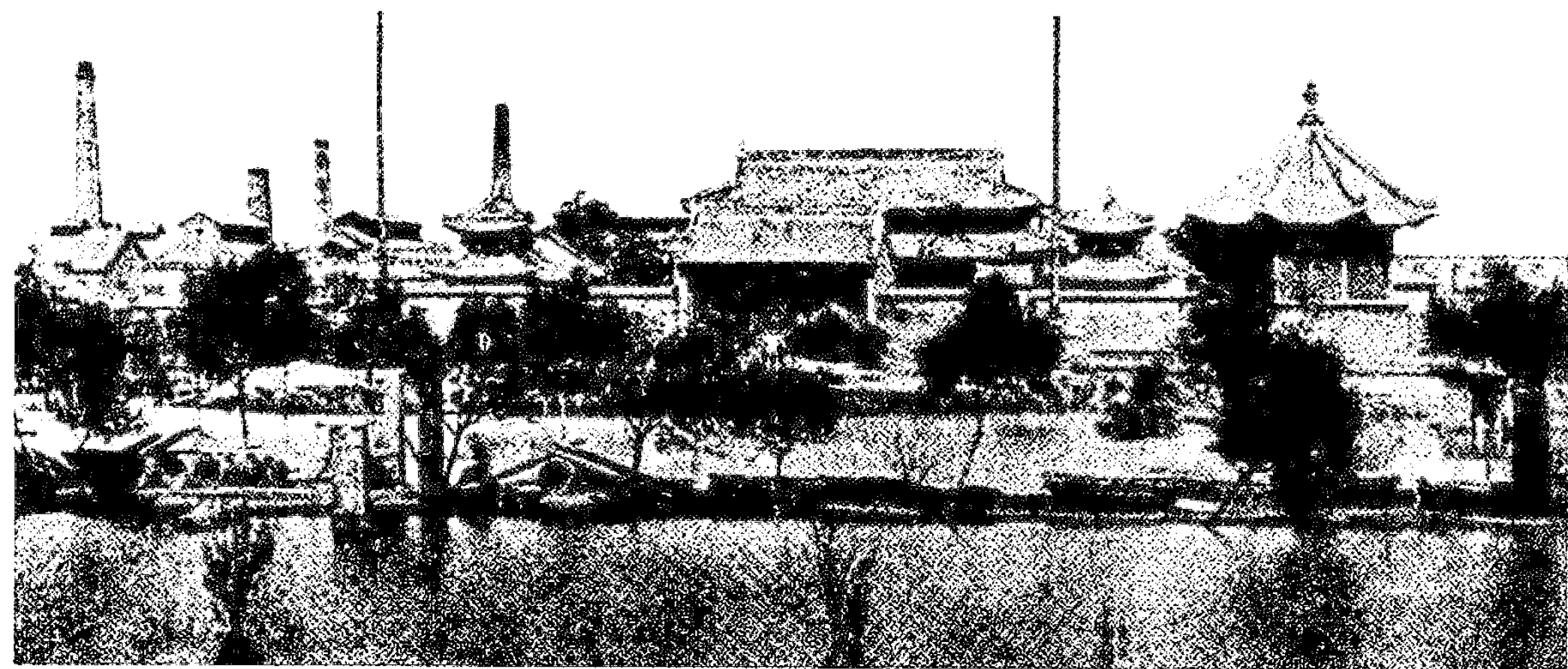
美国学者罗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在《中国的现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中认为，如中国这般的国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有助于力量的协调和资源的征用，从而得以支持现代化的进程。而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认为，只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才能拥有足够的资源动员能力，克服市场机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保证现代化过程中所必需的政治稳定。

恭亲王主导的改革，从地方上先入手，绕开更为艰难的中央改革，先易后难，这自然是一种策略上的考量。但改革实际上的成本，就是牺牲了中央集权的权威资源。

英国驻汉口领事傅磊斯（H. Fraser）曾在1901年写信给《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现在还有谁人将总理衙门盖章的护照看得像某个总督签署的护照那样有效呢？你大概还记得两广总督曾经告诉我，总理衙门只能向他提出要求，而不敢命令他。事实上，除了皇帝外，连军机处也不能对一个总督下命令。在紧急情况下，像我们去年夏天见到的那样，如果皇帝依照错误的奏章发下圣旨，总督也可以不服从。”

军机大臣也公开承认：“今日之督抚，即前代之藩镇。责任固不可不专，事权亦不可过重。”《东方杂志》则描摹了地方坐大后中央的尴尬：“观于吾国政府，朝发一令曰，宜率此而行，外省置之不顾也；夕下一谕曰，宜以此为戒，外省依然如故。查询事件，则延迟不复；提拨款项，则藉词抵抗。而自外省言之，有赜蹶之政策请于政府，不闻为之一筹画也；有困难之交涉于政府，不闻为之一担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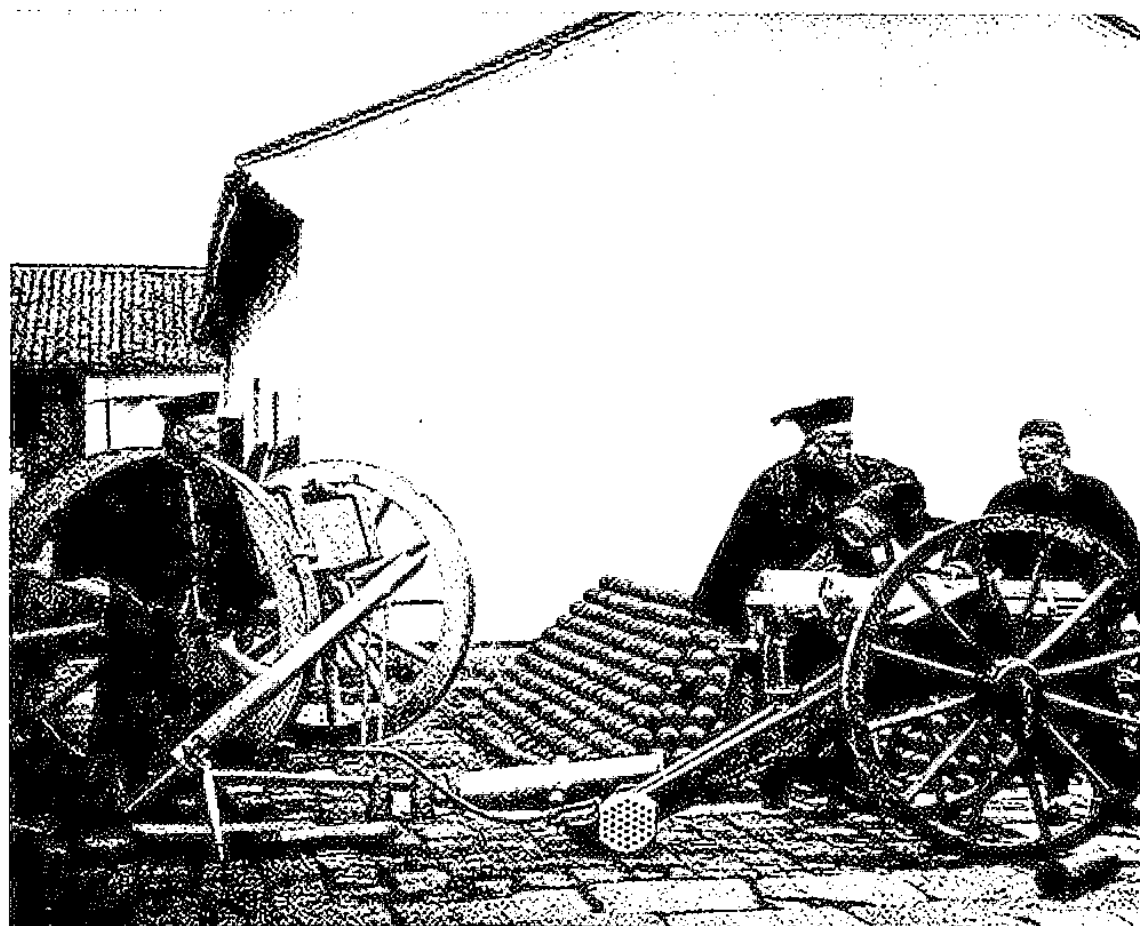
恭亲王推行改革，目的之一就是重塑中央权威，但改革的结果却是权威涣散，号令不出中南海，威仪只限紫禁城，中央失去了对地方的财政、组织人事，乃至军队的控制，这埋下了日后武昌城头一夫作乱而江山变色的祸根……



上图：1866 年天津机械局成立

中图：1870 年的金陵机器制造局场景

下图：英国人约翰·汤姆森拍摄于 1870 年的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由左宗棠于 1866 年在福州马尾创办。



---

---

## 改革的阳谋

专攻裱糊的改革，令韬晦之术成为改革者的必修课，以确保自己成为先驱，而非先烈。恭亲王就是韬光养晦、绵里藏针的个中高手。改革的大幕在东亚升起，恭亲王一己之阳谋及手腕，能敌得过人家一国的阳谋兼阴谋吗？

---

---

一起小小的交通事故，似乎为大清中央的一场路线斗争画上了句号：副总理级别的老干部倭仁从马上摔下来了，而且据说是故意的。

倭仁是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同时还兼着工部尚书衔，一人执掌着大清国中央的宣传、文教、建设等大权。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同治小皇帝的老师。尽管他是蒙古人，却成为（或表现得如同）一名坚定的“传统文化”的卫道者，在内忧外患激发出来的改革声浪中，逆流而上，抵御着从科学技术到制度文明等西方“低俗文化”的入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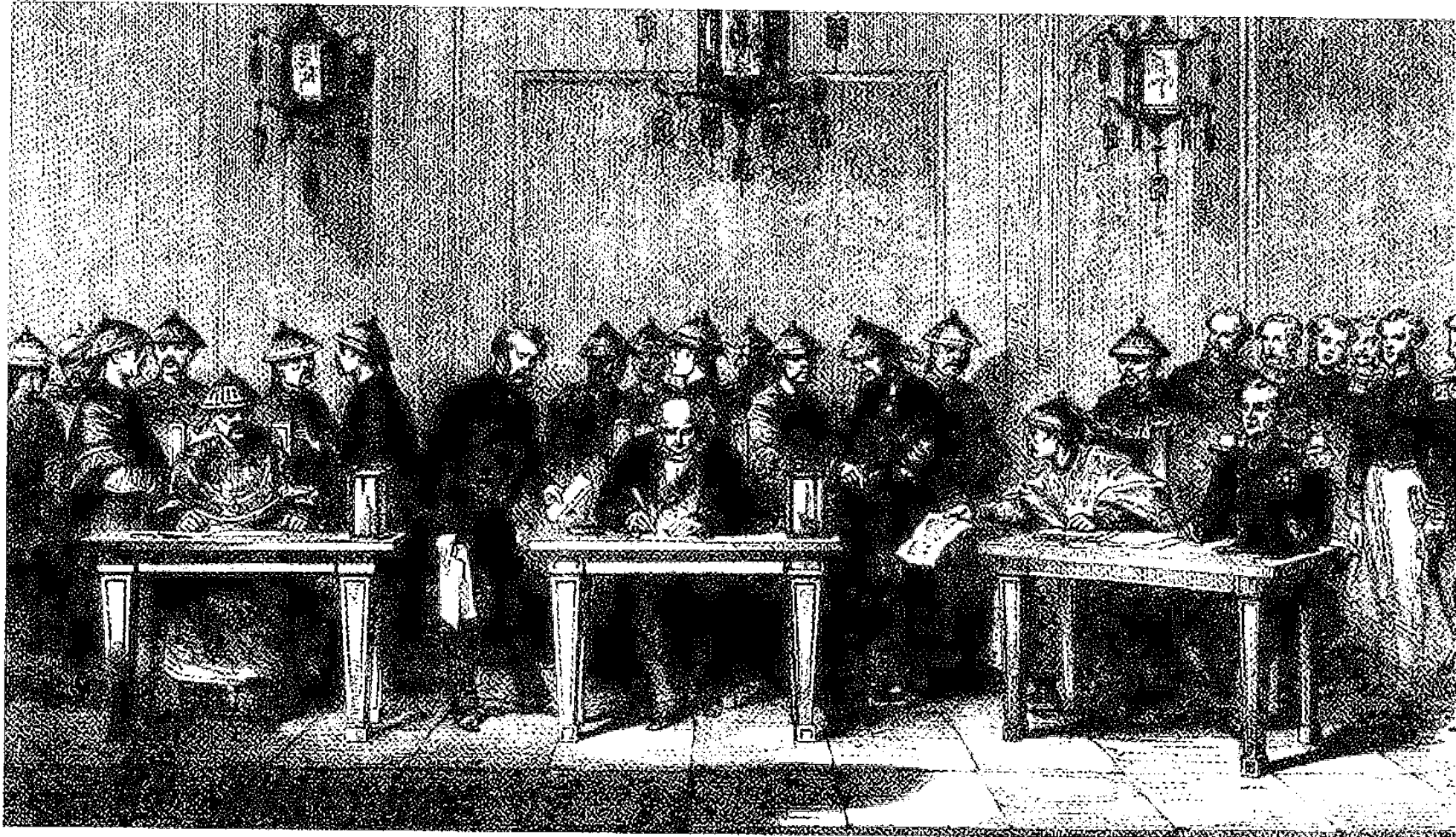
这一年（1867年），倭仁已经64岁，究竟是什么促使这样一位老迈龙钟的高级领导干部，不惜自残呢？

### 西学根源于中国？

这场交通事故的背后，是一场起因于“北京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扩大招生的改革大辩论，就是在这场辩论中，恭亲王提出了一个雷人的论点，大大震慑了保守者们：西学根源于中国，学习西方就是学习古代中国。

几个月前（1866年12月11日），恭亲王上奏，建议同文馆在讲授外文之外，添设一馆，专门讲授天文、算学等西方科学知识，而且扩大招生对象，从以往只在八旗子弟中招募13~14岁的少年，改为面向所有满汉举人及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京外各官。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批准。一个月后，恭亲王再度递交了报告，建议将官方学术机构翰林院中的学者（庶吉士、编修、检讨等）纳入招生对象，因为这些人“学问素优，差使较简，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成功必易”。





《天津条约》规定，今后条约一律以英文版为准，这推动了同文馆的设立，但让恭亲王郁闷的是，倭仁等人在这段时间还总是为同文馆设置重重阻力。图为英国画师所绘“天津条约”签订现场，不知满口圣贤的倭仁是否有能力和胆量去应对如此之场面？

成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大清“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直属机构，也是大清国首家近代化干部学校，待遇十分优厚，远超之后的各级各类军校等。所有学生每月都能领取10两月薪，而且伙食、住宿、书本文具等，一律免费，每月考试合格者奖金就高达32两。学校还专门配了厨师，学生甚至可以随时点菜送到寝室内。更为重要的是，根据规定，对于优秀学员，在干部任用、提拔等方面一律从优。这样的待遇，对于翰林院这个清水衙门中坐冷板凳的穷干部们来说，当然是有吸引力的，而对于那些还未进入仕途的举人们，更是充满了现实诱惑。

但是，这一举措却随即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首先提出反对的是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他高举政治挂帅的大旗，认为“气节”才是“自强之道”，而不是轮船和枪炮，只要有“气节”，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平”。他认为，科举正途人员是政权的接班人、干部的预备队，关键是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道德教育，“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而完全不必去学习天文、算学之类的“机巧”，否则就是“重名利而轻气节”。至于天文、算学，只需将它们划

归钦天监、工部等相关部门管理，招收些能工巧匠即可。

张盛藻奏折一上，立即遭到上谕的批驳。慈禧太后的批示明确指出同文馆就是“正途”，而天文算学“本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此举不过是“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舍圣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

其实，这种反对意见，恭亲王早已料到。在他建议将同文馆招生范围扩大到翰林们的奏折上，就用长篇大论做了伏笔。他鲜明地提出“天下之耻，莫耻于不如人”，随后，提出了“西学”其实就是“中学”的雷人观点，认为“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只是西方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因此，“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学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学习科技并非是学习西方，“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中国傥能驾而上之，则在我既已洞悉根原，遇事不必外求，其利益正非浅鲜”。

恭亲王的这套说法，无疑能相当有效地削弱反对的声浪。1899年，英国人 Harold E. Gorst 在回顾大清三十年改革史时，就认为恭亲王此举，是要了一记漂亮的“外交手法”。

其实，在晚清的改革，乃至历朝历代的改革过程中，我们都能发现，改革者总是策略性地用现有体制的旧衣裳来遮掩不断成长的改革躯体，尽管可能会衣不蔽体，也要竭力强调自己对传统的传承，以期结成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减少阻力。当实际行为已经“右转弯”，口头却依然高呼着“左满舵”的口号时，这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无奈。根基于体制内的“改革”，讲求的是妥协，有理也要让三分；这与源自体制外的，颠覆一切，打倒一切，使用简单直接的暴力手段清除反对力量的“革命”，是有根本区别的，革命讲求的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自己永远伟大、正确，错误永远只属于他人。改革与革命，虽然都涉及根本利益的调整，但在政治烹饪术上，一个是“慢炖”，即使锅有点漏了，修补修补继续熬，能将就则将就，不能将就的创造条件也要将就；而另一个则是“爆炒”，能不将就则不将就，即使能将就的，也要想方设法让它不能将就下去，完全是砸烂旧锅另起炉灶。显然，从实际操盘的难度来看，改革的“技术含量”高多了，这也需要改革者即使在策略方面也要比革命者更为圆润、老到。

## “鬼子六”的“鬼计”

专攻裱糊的改革，令韬晦之术成为改革者的必修课，以确保自己成为先驱，而非先烈。恭亲王就是韬光养晦、绵里藏针的个中高手。1862年，他建议成立总理衙门，为了避嫌及减少可能的反对声浪，他再三强调这只是个临时机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

这一次，当改革遭遇官方“包养”的知识分子的激烈反对时，他也同样表现出了极为柔韧的姿态。在严词驳回张盛藻的奏折后，面对泰斗级的倭仁的反对，恭亲王施展了太极拳手法。

倭仁在他的长篇奏折中，坚决反对“正途出身”的官员进入同文馆。他担心这些国家栋梁拜洋人为师，学习天文算学之类的“一艺之末”，将导致“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而“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往今来没有听说过有依靠着“术数”而能够起衰振弱的。他同时认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倭仁的奏折提交后，慈禧太后也不表态，批转总理衙门答复。恭亲王等随即上奏，痛切批驳倭仁等空谈误国，二三十年来“议和议战，大率空言无补”。他提出，既然倭仁有卧薪尝胆之志，但这是“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他借用左宗棠的话说，大清国办事太难，“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又借用李鸿章的话说，一些崇尚空谈的干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认为，倭仁等如果“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櫓等词，谓可析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并且认为倭仁这一举动，对改革大有伤害，“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

恭亲王的反驳是相当严厉的，但倭仁继续抗争，干脆认为同文馆请外籍教师本身就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并认为国家振兴之际，百废待兴，“应办之事甚多”，何必因这一小事儿“群相解体”。

恭亲王随即开始转换策略，一边继续指控“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报考者”，另一边干脆

来了招“请君入瓮”，抓住倭仁原奏中的大话：“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大喊道：我们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都没找到这样的人才，“倭仁竟有其人，不胜欣幸”，建议请倭仁立即保举，另开一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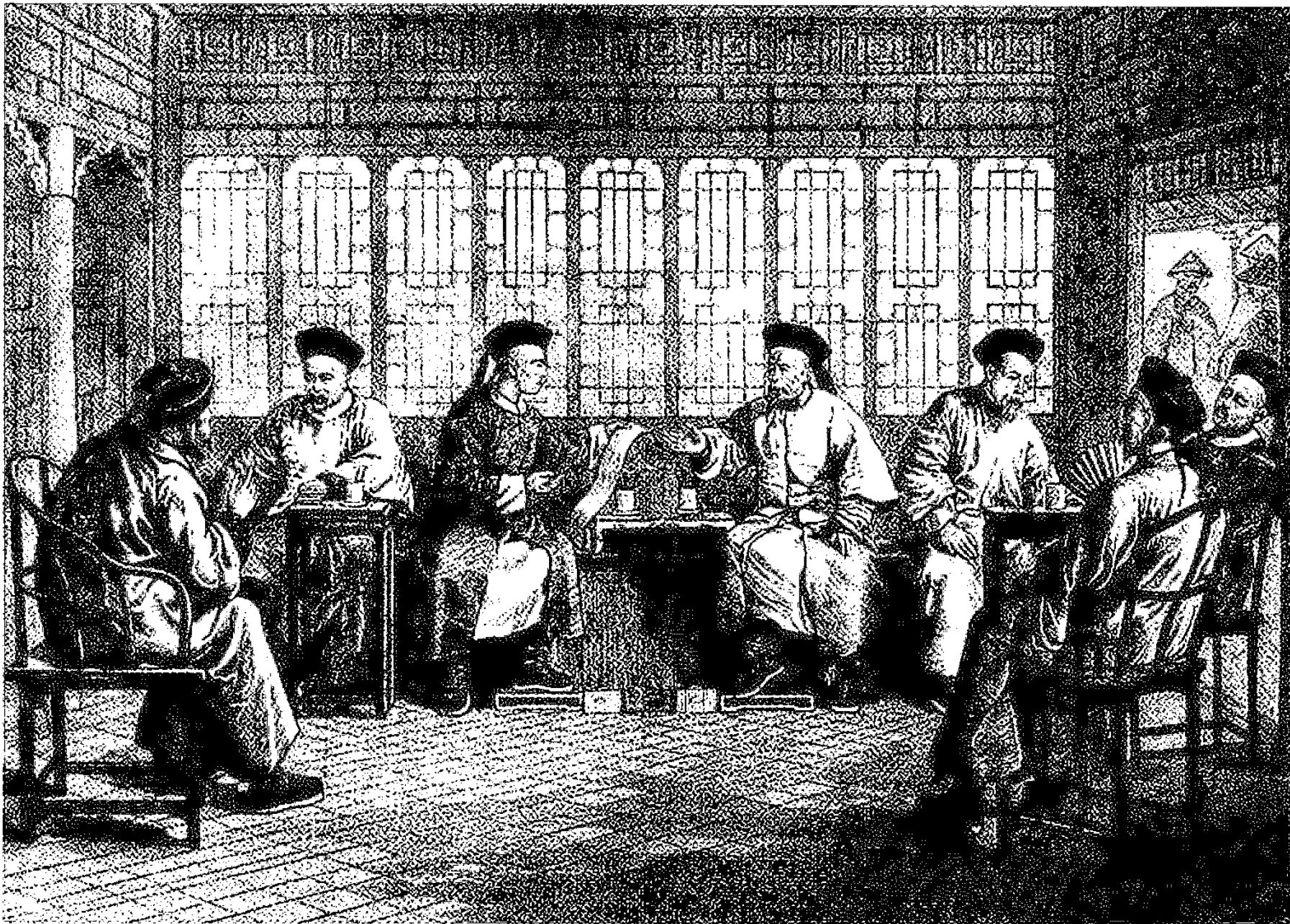
慈禧太后照准，要求倭仁立即保举精通天文算学的人才数名，“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

倭仁这下急了，赶紧解释：“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

中央却依然不放过他，慈禧太后在上谕中要求他随时留心人才，一旦发现此类人才，立即保荐，这等于给他套上了一个箍。接着，朝廷干脆任命倭仁也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长期在同文馆任职的美国人丁韪良，对恭亲王的这招请君入瓮十分欣赏。他认为这是恭亲王为了让倭仁这个“老沙文主义者”能亲自通过跟他所谓的“洋鬼子”打交道来长点见识。

恭亲王在政治上的胸怀，令总理衙门这个临时机构成为真正的国务院，并且在具体而细致的国务活动中，将曾经的不少政敌们争取了过来，成为改革的同路人。图为总理衙门大臣们在召开会议。从左到右依次为：宝鋆，毛昶熙，恭亲王奕訢，文祥，董恂，成林，沈桂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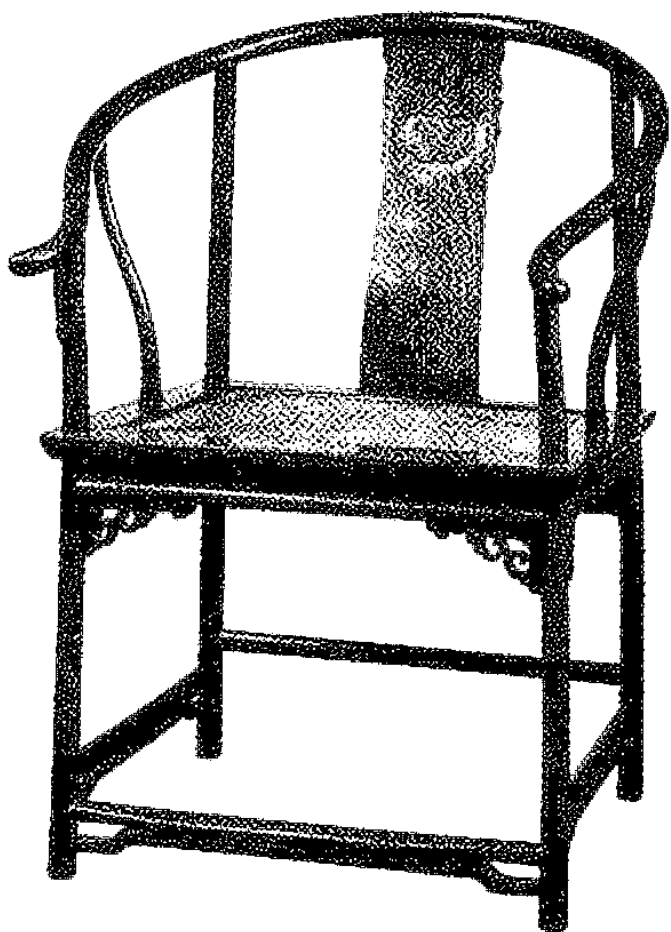
恭亲王的阳谋，倭仁当然能看清，他绝不愿意出任这一“鬼使”，再三请辞，却再三被驳，无奈，只好中途落马——对于倭仁是否堕马回避，学界尚有争论，史料也有冲突，但可以肯定的是，倭仁的确是以病假的方式得以保持了“体面”。

对此，丁韪良惋惜地说，如果倭仁“不拒绝训练，谁晓得这个老翰林会不会同样彻底地转变过来呢？”他同时总结出，总理衙门对付保守派的做法，就是“以内部摩擦避免外部反对”。总理衙门成员成林曾经向他解释：“你知道，由于外来反对，总理衙门的筹划有时搁浅。聪明的御史或有势力的总督向皇帝进谗言，从而破坏我们最明智的计划。这种情况下，恭亲王虽感应对困难，但仍自有办法。他奏请皇帝给他的反对者在衙门中安排位置。亲王知道，反对者一旦进入了衙门，不久就会发现，亲王的政策才是应对外国的惟一可行办法。毛昶熙和沈桂芬就是这样进入衙门的。”曾经是保守派一员的毛、沈进入总理衙门，真正挑起这千斤重担后，几乎立即实现了改变，不仅成为恭亲王的忠实同僚，而且成为坚定的改革者和“总理衙门里最好打交道的人”。

在这次辩论中，倭仁虽然处于下风，但却“死不悔改”，而这轮折腾的效果立即显现：即使待遇十分诱人，同文馆的天文算学专业最后只勉强招收到了30人，而其中的20人在第二年就被淘汰。而此时，日本已经派出了第一批学生前往西方。梁启超日后感慨道，设立天文算学馆的计划如果顺利推进，则今后“中学与西学不至划

为两途，而正途出身之士大夫，莫不研心此间以待用”，假以时日，必将有所成就，从而“用以更新，力图富强，西方大国犹将畏之，而况于区区之日本乎？”

改革的大幕在东亚升起，恭亲王一己之阳谋及手腕，能敌得过人家一国的阳谋兼阴谋吗？



恭王府黄花梨圈椅·明 造型简练舒展，形神兼备，堪称明代标准器。原为德国学者艾克先生收藏，2006年由其夫人曾佑和女士捐赠给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图片选自《恭王府明清家具集萃》）



## 第九章 裸泳的年代



“香雪坞”院落北墙门 香雪坞是恭亲王福晋和侧福晋游园观戏的小憩之处。据载，嫡福晋偏爱绿竹飘逸雅致，故门前翠竹摇曳。照片上是香雪坞院落通向大戏楼的墙门。方形门洞上方的透空砖雕球路纹装饰，尽显复杂精美。（陈鸿舜收藏，照片拍摄于1940年前）

---

---

## 猫儿闹大清

当抓住老鼠成为检验猫儿能力的唯一标准时，猫儿们自然要解放思想，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牢笼。一部晚清经济史，就是一场超级猫儿的海选 PK，一场在潜规则甚至无规则下上演的大戏。

---

---

大清国毕竟是泱泱大国，在内忧外乱夹击下，再怎么落败，还是老鼠遍地走，而且肥硕得很，甚至越落败，老鼠就越肥。

又多又肥的老鼠，当然吸引了无数只猫儿，不管黑猫、白猫，不管土猫、洋猫，也不管是公猫、私猫，都铆着劲、变着法，想成为那只能抓住老鼠的好猫。

当抓住老鼠成为检验猫儿能力的唯一标准时，猫儿们自然要解放思想，打破一切条条框框的牢笼。他们深切地认识到，大清国的改革，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改革就是利益重组，有时甚至就是赤裸裸的巧取与豪夺。

一部晚清经济史，就是一场超级猫儿的海选 PK，一场在潜规则甚至无规则下上演的大戏。

### 猫儿嘉年华

最为活跃的当然是“公猫”们。大清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最早走的就是“一大二公”的道路，国库出资，官员坐庄，在奠定了中国最早的工业基础的同时，也令一部分官员及其亲属迅速跻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大清国财政两袖“清”风，没有能力为不同官员不同花样的改革支付学费，但靠山吃山，政府最大的资源并不是白花花的现银，而是政策。脑门一拍，大笔一挥，推行“官督商办”，政府画圈，老板掏钱，改革开放照样做得红红火火。能进入这个圈子内的商人，自然也都非等闲之辈，个个能量都可直通“海里”。其中的佼佼者胡雪岩，其政府公关能力之强，与官场结合之紧密，至今仍是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官办的纯国企和官督商办的半国企，一



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切官僚化。史料记载，盛宣怀每次到机器织造局检查工作，厂里就要组织员工夹道欢迎和欢送，一如官场规矩，只是不知道是否会有节奏地呼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公猫”们虽然公开捕鼠的功夫并不怎么样，但私下为自己偷腥的本事却都不小。财务混乱，公私不分，是当时国企和半国企的最大问题。一边高喊实业救国，一边则将公款尽可能多地挪到自己兜里。著名思想家、机器织造局的郑观应，就挪用公款为自己炒股炒房，导致开工都被严重延误。至于效率不高，浪费严重，更是普遍现象。“模范总督”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从立项开始到投产，都是凭空想象的“政绩工程”，证明了晚清改革的主旋律就是不断折腾。更有甚者，“公猫”之公，还真是体现在了性别意义上。机器织造局的文件显示，在相当一些企业干部眼里，工厂就是一座免费的丽春院，女工们俨然成了廉价的应招女郎，权力果然成了最好的春药！

私猫们当然没有公猫这么高调和张扬。在晚清时期，大凡混得好的私猫一般都必须有些公猫朋友，或者干脆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纯粹的私猫，是基本没有生存空间的。先天血统上的不足，令私猫们在包装功夫上相当细腻。比如导致晚清崩盘的保路运动，表面看，是各地商办铁路公司的私猫们在民族大义激发下，不忍心看到洋人们以雄厚资本“侵占”了我们的交通开发机会，所以对政府将铁路建设权收归国有表示反对，而骨子里，无非就是嫌政府收购商股的开价太低。其中闹得最来劲的四川铁路，则干脆是因为商人们希望政府来承担原先主办者挪用公款炒股而造成的损失，但政府不买账，商人们便只好祭出爱国护路的大旗，“推动”“革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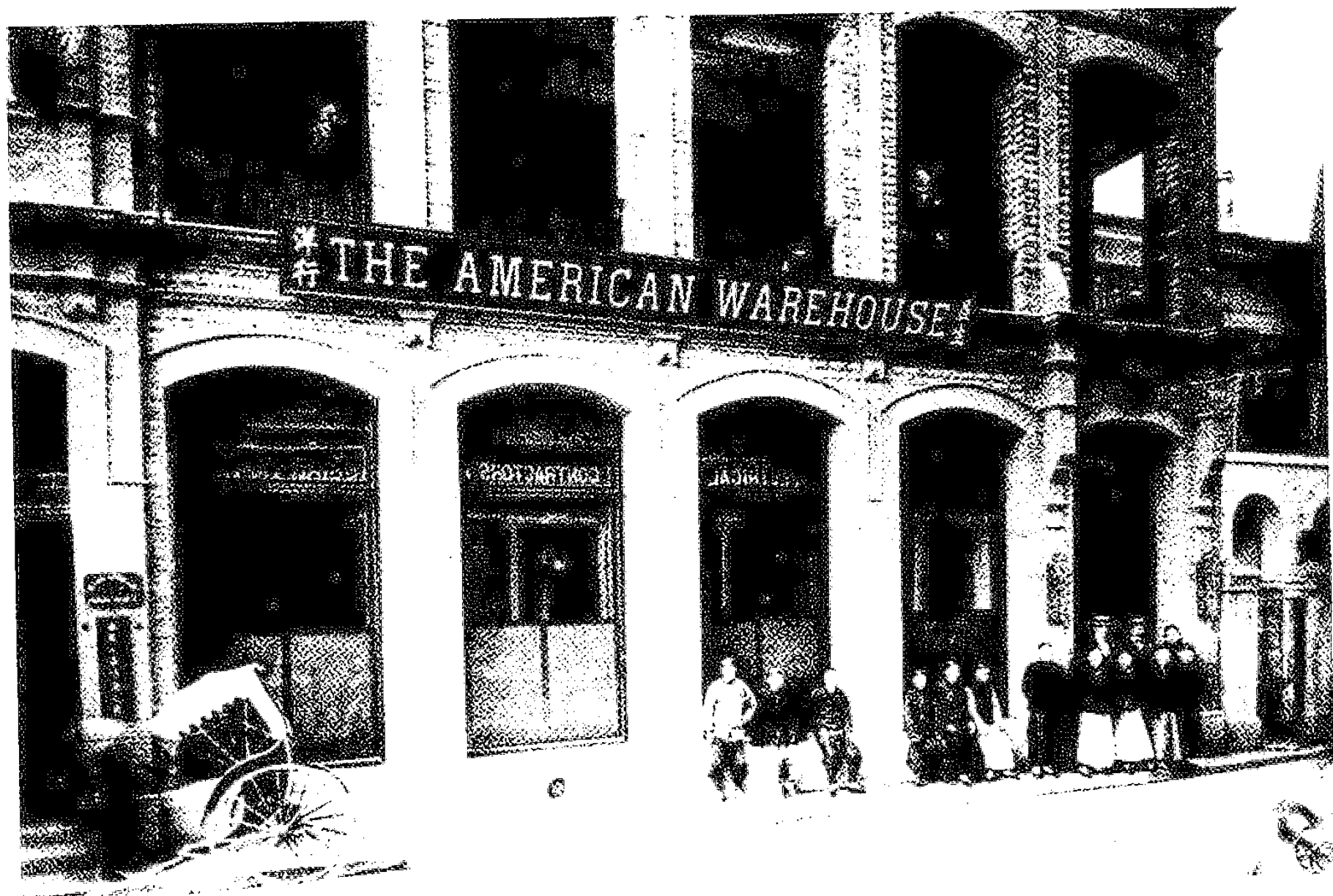
与土猫们相比，洋猫们的吃相要优雅得多，开口法制，闭口契约。但面对着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洋猫也一样是逐利的动物，在坚船利炮的“豪夺”已经不再时尚后，吸引中国官员占干股等“巧取”方式，就成了他们的主要游戏。美国总统胡佛，早年是一名矿业工程师，他的第一桶金，就来自帮助英商“巧取”中国的国有开平煤矿。他们设计将开平的老总张翼拉下水后，不花分文，就获得了丰厚的开平资产。胡总统的这桶金，日后成为其政治上的一大麻烦，时不时被反对党拎出来示众。而另一家更为著名的“福公司”，披“洋”皮，挂“洋”头，骨子里则是中外官商合营：马建忠（招商局总办）倡议，刘鹗（《老残游记》的作者）跑腿，李鸿章护航，意大利首相的儿子挂名，成功地绕过了外资不准进入矿业的禁令，以一个空壳皮包公司而获得山西、河南的煤矿开发权，然后将股份出售给西方大财团，经手人均获利丰厚。

在这场猫儿嘉年华中，“撬边模子”（沪语，类似京腔的“托儿”）也没闲着。著名的媒体《申报》，在大清国股市黑幕中，紧密配合庄家，以忽悠起来的理论武装人，以包装出来的舆论引导人，不露声色地当了回股市“黑嘴”，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良心守望者”的市场化。

无论当权者，还是在野者；无论保皇者，还是造反者；无论遗老遗少，还是潮流青年，大清国晚年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了“一切向钱看”的特点，金银成为一切领域通行的硬通货，“金本位”、“银本位”成为全社会的本位。即使身负“道德城管”重任的纪检监察系统（谏台），也毫不犹豫地投身到“猫儿捕鼠”的运动中来，那些义正词严的弹劾及雷厉风行的查办，也都无非是更为稀缺、更为昂贵的商品而已，待价而沽。

做猫还是做老鼠？这在晚清并不是哈姆雷特式的选择题。做不了猫，就只能做被猫吞噬的老鼠，这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唯一道路。因此，更为准确地说，那并不是一个猫儿的乐园，而更像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外资企业作为“洋猫”，在这种猫赛中成为主力选手之一。



---

---

## 华商不爱黄龙旗

大清王朝根本无法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只有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民营工商业才能得到喘息和发展。买办们之所以能积累起巨额财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不受国内腐败官僚控制的商人。

---

---

1877年3月2日，一个令大清国人民备感振奋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大清国资企业轮船招商局于昨日正式兼并了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旗昌轮船公司所属的7艘海轮，9艘江轮，大量的趸船、驳船，共27艘，及码头、栈房、船坞、铁厂等，都降下了星条旗，升起了鲜艳的黄龙旗。

这是在以恭亲王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大清国——不，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吞掉了一家大型外资企业。一贯喜欢嘲讽政府的《申报》，在这一天一反常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从此中国涉江浮海之火船，半皆招商局旗帜。”

最早提请中央考虑兼并旗昌轮船公司的太常寺卿陈兰彬（之后他出任了中国首任驻美公使），甚至将其上升到“中外大局一关键”的高度。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国似乎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扬眉吐气了，举国上下太需要这个“利好”消息的刺激了。但是，却有一群华人似乎并不为黄龙旗迎风飘扬而自豪，他们就是旗昌轮船公司的华人股东们。这些人不仅抗拒回到“祖国怀抱”，而且公然另组一家“宁波轮船公司”（Ningpo Steam Navigation Co.），并注册为美国公司，继续扛起星条旗。他们低调得几乎没在历史上留下多少印迹，弄得好像为了刻意躲避大清愤青们上纲上线的口水战似的。

其实，旗昌轮船公司从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资企业，而只是披着一身“洋皮”的民营企业而已。在公司100万两的开办资本中，华商的股份，居然占到了60万~70万两。

华商在外企中普遍参股，甚至占到大股，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仅在航运业中，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第一批1650股，华商占了935股，其中，唐

廷枢一人就占了 400 股；北清轮船公司，华商股份占到三分之一。大量的华商散户们集资购船后，更是纷纷挂靠在外企名下。滚滚长江东逝水，却只载着两艘船：一艘姓“外”，一艘姓“公”。

有学者统计，当时华商参股的外资企业，至少有 62 家之多，资本金在 4000 万两以上，以保守估计华商占股额 1/4 计算，则这些以披着“洋皮”的中资高达 1000 万两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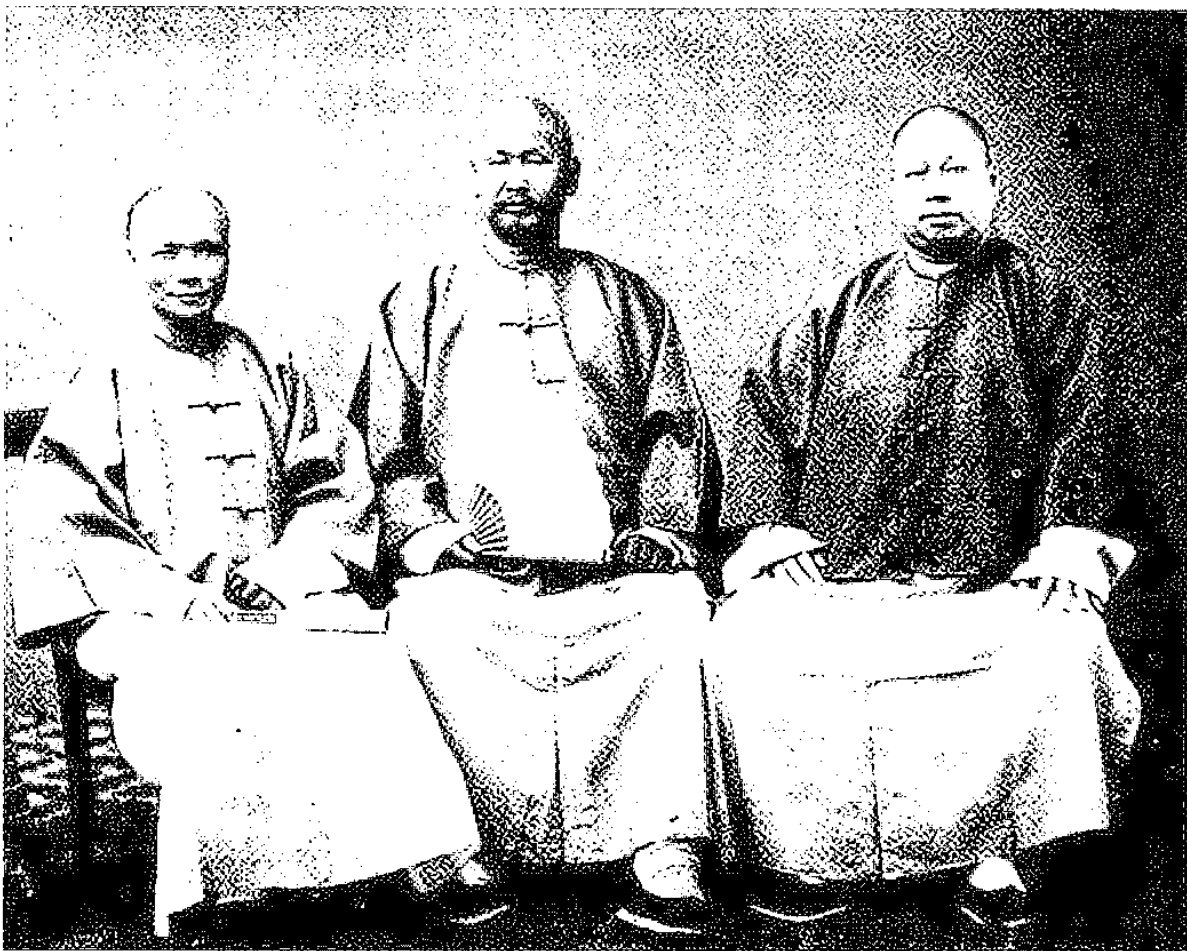
中资大量涌入外企，这当然是资本的趋利因素造成的。

对于外商来说，进入中国市场后，出于拓展业务和占据市场领先地位的考量，对资金总是处于饥渴的地步。而相比从境外募集并引入资金，本地资金更加便捷、廉价。而且，尽管外商在坚船利炮和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在大清国享有超国民待遇，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在日常的经营和管理中，面对商场和官场上充斥着具有大清特色的潜规则、显规则，普遍晕菜，不胜负荷，只能依赖以买办为主的中国合作方，而在股权上结为利益共同体，无疑是增强凝聚力的最好办法。

而对于中资，尤其是刚刚崛起的民营资本来说，穿上一套“西装”，就等于撑起一把维权的“洋伞”：在一个公权对私权无度猎杀的环境下，一身“洋皮”就等于是一层铠甲，可以远离绝大多数的“大盖帽”的盘剥。对于挂靠在自己旗下的中国小弟们，



大清国企轮船招商局并购外资公司，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放了一颗大卫星。图为轮船招商总局大楼。



在那个大多数人还激烈反对外来的一切时，一批脑瓜灵光的中国人开始和外商打起了交道。

左上图：1860年代初拍摄的两个中国商人。

右上图：1860～1862年间在广州拍摄的中国的翻译们。

左下图：1860～1862年间拍摄的广东商人。

右下图：1860～1862年间在汉口拍摄的一名叫英昌（音）的买办。

（以上照片由米尔顿·米勒拍摄）

洋大哥总是很讲义气，甚至不惜动用外交乃至军事压力，维护自己的小弟。大清国那几乎是工商业天敌的公权力，在“洋皮”面前，立即疲软萎谢。

在“避险”的同时，华商也发现，“洋皮”还能获利。大清国给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首先就体现在税收上。面对内地的层层关卡，缴纳了海关税的外企货物，便能一路畅行，而民营企业就必须见庙烧香，逢山拜佛，留下重重买路钱。这样的“政策利差”，令外企们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财源：提供挂靠，然后从民资节省下来的税费中抽成，坐享其成；而且，还能动用这些不请自来的廉价资本实行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研究表明，当时几乎每家外企后头都有一大串挂靠在它们旗下的民企，“强龙”与“地头蛇”郎情妾意、惺惺相惜。

到了1870年代之后，大量涌入中国的小洋行，多是皮包公司，他们几乎完全依赖中国当地的资本，而其自身的唯一资源，就是一身如假包换的“洋皮”而已。衡量各洋行买办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其在本土的融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谓的西方外来经济势力中，其实几乎没有血统纯粹的外资企业，更多的是“中外合资企业”，或者干脆是披着“洋皮”的纯粹民营企业。

有研究者将中日两国同时期的企业发展做了对比，发现日本的企业家似乎更“爱国”，更有长远眼光，也更能忍受一时的损失，而晚清的商人们多急功近利。造成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大清王朝根本无法如明治政府那样，提供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环境；相反，只有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民营工商业才能得到喘息和发展。买办们（中国第一批外企金领）之所以能积累起巨额财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不受国内腐败官僚控制的商人。

原旗昌的华人股东们新组的小小“宁波轮船公司”，在星条旗的庇护下，自然可以继续远离大清国官员们那只看得见的手，但却难以逃脱动用国资进行价格“割喉战”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之前，旗昌轮船公司在与招商局的价格战上惨败，并非资本不厚，经营不善，只是企业实力再雄厚，奈何招商局背靠国家财政，“割喉战”成了“超限战”，最后只好投降了事，见好就撤。

一年之后，“宁波轮船公司”就败下阵来，偃旗息鼓。它悄悄地走，正如它悄悄道来，挥一挥衣袖，连半点水花都没有激起。在以“公”为姓的权力面前，资本的力量就是两个字：可笑……

## 李鸿章吹起大泡泡

一家打着国有旗号的行业垄断者，最后不得不靠与自己公开反对的外敌结为寡头同盟，才得以生存，却依然高喊着“利权”、“中华”等政治口号，纷飞的唾沫溅满了史册，百年未干。

并购了美资企业旗昌轮船公司后，招商局实际上的董事长李鸿章倒有些郁闷了。

这是一场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资本兼并战，定调很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此“为收回利权大计”，“于国计商情两有裨助”。而筹措了大部分收购资金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楨认为：“归并洋行，为千百年来创见之事……是真转弱为强之始。”

一场本该是大涨中国人民志气、大灭帝国主义威风的主旋律演出，剧本上明明写好了“此处有雷鸣般的掌声”，但却出现了一些嘘声，甚至旗昌公司的原华人股东们在这大是大非关头，表现出了极低的政治觉悟和民族感情，纷纷退场，重组一家美资公司。

媒体在喝彩之外，也出现了嘘声：旗昌本是件破旧的衣服，如今却卖了个好价，美国人套现后不是正好可以换件崭新的时装吗？（《清史稿》：“旗昌弃垂敝之裘，得值另制新衣，期于适体”）当时，在招商局等的挤压下，旗昌公司的经营每况愈下，年净利润从1871年的94万两一路下滑到1873年的10.6万两；而其100两面值的股票，也从顶峰的200两猛跌到1875年的60两，奔牛已经成为狗熊。招商局如果拿那笔并购巨款去投资新的轮船，或许能将旗昌这条“落水狗”彻底打趴下。

兼并后不到数月，一份来自中央纪检监察干部（“御史”）董俊翰的报告，就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根据董的报告，收购旗昌其实是招商局的一个败笔，固定资产添置过多过快，运力大跃进，一下子从11854.88吨上升到30526.18吨，看似红火，但不仅前期耗资巨大，而且维护费用惊人，船多货少，收取的运费甚至不够开支，导致每月亏损五六万两。

董俊翰建议中央应该设立专门的大臣主管这一巨大的“国资”，或者干脆停止官



洋人对于中国人当街挑脚泡很惊奇：这居然也能成为一个行当？那捧着饭碗的客户，边吃饭边挑脚泡，似乎很享受。李鸿章放上天的大泡泡，似乎比脚泡要高级许多，绝不会请人挑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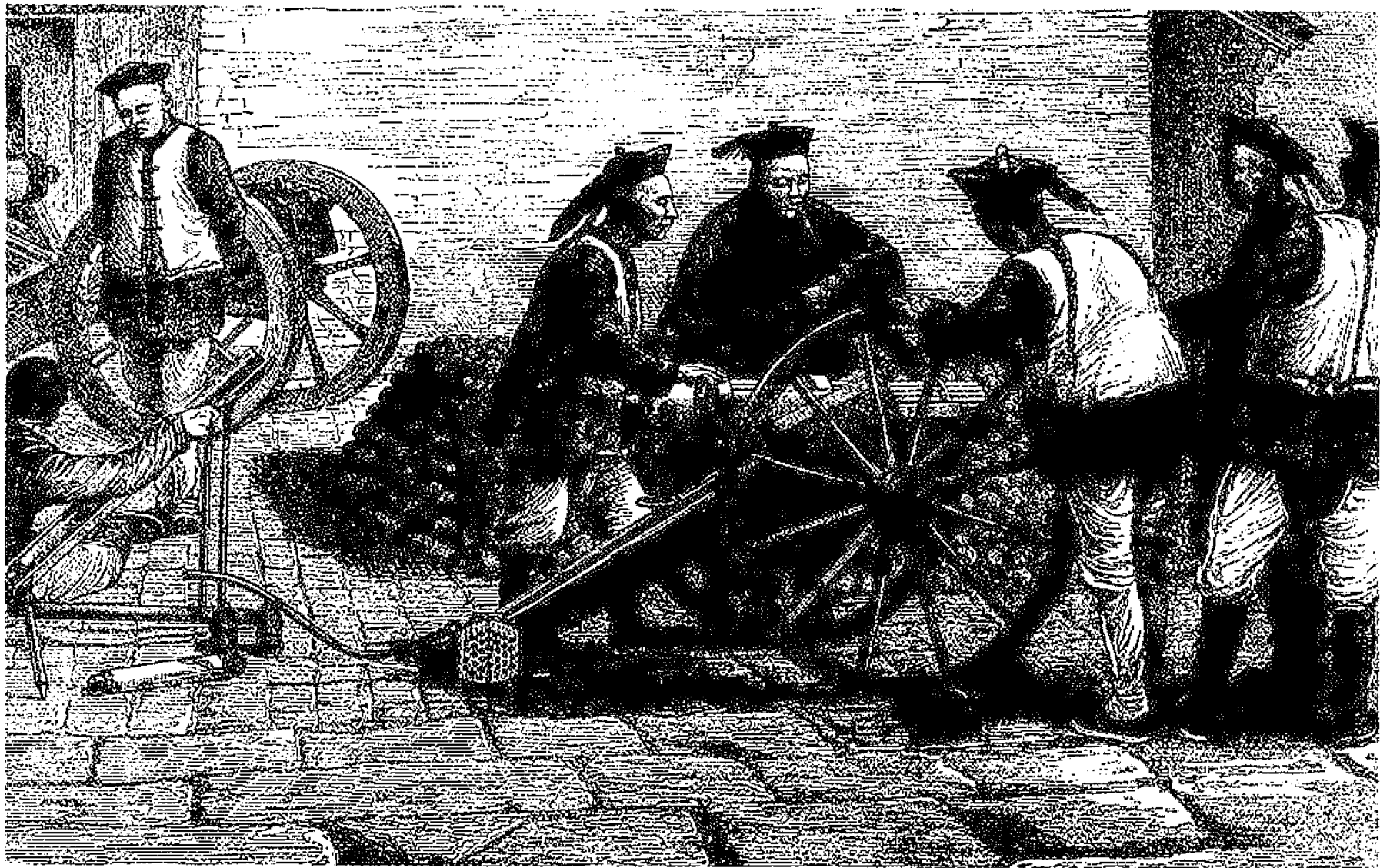
办，完全民营，政府只起监管的作用，从而减轻国家的负担。

李鸿章的回复是傲慢的。他先给中央写了封短信，认为董俊翰是“少见多怪”，“凡创办一事必有议其后者，多端指责”，并且感谢中央对新生事物的保护。之后，李鸿章又上了一个长长的报告，全面否认了董俊翰的几乎所有指责。但从李鸿章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其从旗昌收购而得的是怎样一笔资产：“拟令该局（招商局）逐加挑剔，将旗昌轮船年久朽敝者，或拆料存储以备修配他船，或量为变价归还局本。”但是，变卖船只一定要注意不能给“中外流氓”，以免他们“减价相挤”。李鸿章否认收购旗昌轮船后，导致资产闲置，而将其责任归咎于怡和、太古等外资轮船公司的价格战，“若无外人倾挤，江面生意尚旺，船只不至闲搁”。

李鸿章对招商局的种种维护，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将其上升到国家利权，甚至“关系国体”的高度，从而将对于招商局的批评或攻击统统归入对国家的不负责任之列，他甚至技巧性地回避出现“华商”二字，代之以“中华”。

最早建议中央兼并旗昌轮船公司的太常寺卿陈兰彬，在那份主题为“自强必先求富”的奏折中，第一次列举了招商局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招商局成立前，外资航运业在华年获利 787.7 万余两，招商局成立后，外资航运业在三年才获利





改革之初，一切从无到有，特别容易出政绩。李鸿章麾下的金陵制造局，就常被洋人们当做中国军事工业的象征，关注度极高，当然，似乎并没因此而提“中国威胁论”。图为金陵制造局的炮弹仓库。

813.6万两，简单比较就可以得出：“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1300余万两，将来扩而充之，中国可以自操其利。”

薛福成估计，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将中国航运利权收回了3/5（《筹洋刍议》），而李鸿章日后也说：“创办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此收回利权之大端。”

这些意气风发的激情文字，或许能大长中国人民志气，但未必能大灭帝国主义威风。在洋洋洒洒的慷慨陈词背后，陈兰彬们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个最为基本的前提：作为招商局假想敌的“洋商轮船”，其实，大半还是披着“洋皮”的华商。招商局“为国”截下的那些银两，本就基本不会外流。

其实，在李鸿章请求恭亲王设立招商局的报告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华商资本大量以假外资的名义出现，既导致国家尊严受损，又使华商易受外商要挟。李鸿章说：“近年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份居其大半。闻本利不肯结算，暗受洋人盘折之亏，官司不能过问。”成立轮船招商局，可以“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值得注意的是，

李鸿章并没有分析阐述何以“华商殷实狡黠者多附洋商名下”。也就是说，大清国的衮衮诸公们，其实自始至终都十分清楚，在星条旗和米字旗的护卫下，在金发碧眼的洋人的背后，真正的竞争者却是自己的同胞。

而更为吊诡的是，在这些为国企高唱的赞歌声中，普遍只提营业额，而不提利润，因为在那逐年递增的营业收入背后，是连年的亏损。招商局将自己打扮成推动GDP不断上升的英雄，一转身又从国家的兜里掏走大把银子，去填补利润败血症的无底洞。

在高举起民族主义大旗的时候，招商局从中央拿到了特殊的政策。先是江苏、浙江的漕米，然后扩展到长江中游地区的漕米，随后，“滇之铜斤，蜀之灯木，江、浙之采办官物，直、晋之赈粮，鄂茶、鄂盐”等，均被其垄断运输。而且，李鸿章不断地为招商局向中央伸手，要求提高运费，理由就是在“外商”的价格挤压下，经营亏损。

财政部（“户部”）最后被逼急了，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指责“招商局十余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臧哉？”报告认为，招商局的问题在于“不得其人，出入之经，不能讲求撙节”，却将亏损归咎于诸如“海上用兵”（海战）之类的外部原因。报告要求，招商局“既拨有官款，又津贴以漕运水脚，减免于货税，其岁入岁出之款，即应官为稽察”，应责成南北洋大臣，将“现存江海轮若干只，码头几处，委员商董衔名，及运脚支销，分别造报”，这是清产核资；“此后总办如非其人，原保大臣应即议处”，这是希望从国企企业干部任命的源头抓起。但是，这份报告连一星水花都没溅起。

招商局的经营，直到与外资的怡和、太古两家航运公司“订利益均享之约，始免互相倾挤，而其利渐著”。

一家打着国有旗号的行业垄断者，最后不得不靠与自己公开反对的外敌结为寡头同盟，才得以生存，却依然高喊着“利权”、“中华”等政治口号，纷飞的唾沫溅满了史册，百年未干……

## 谁动了恭亲王的奶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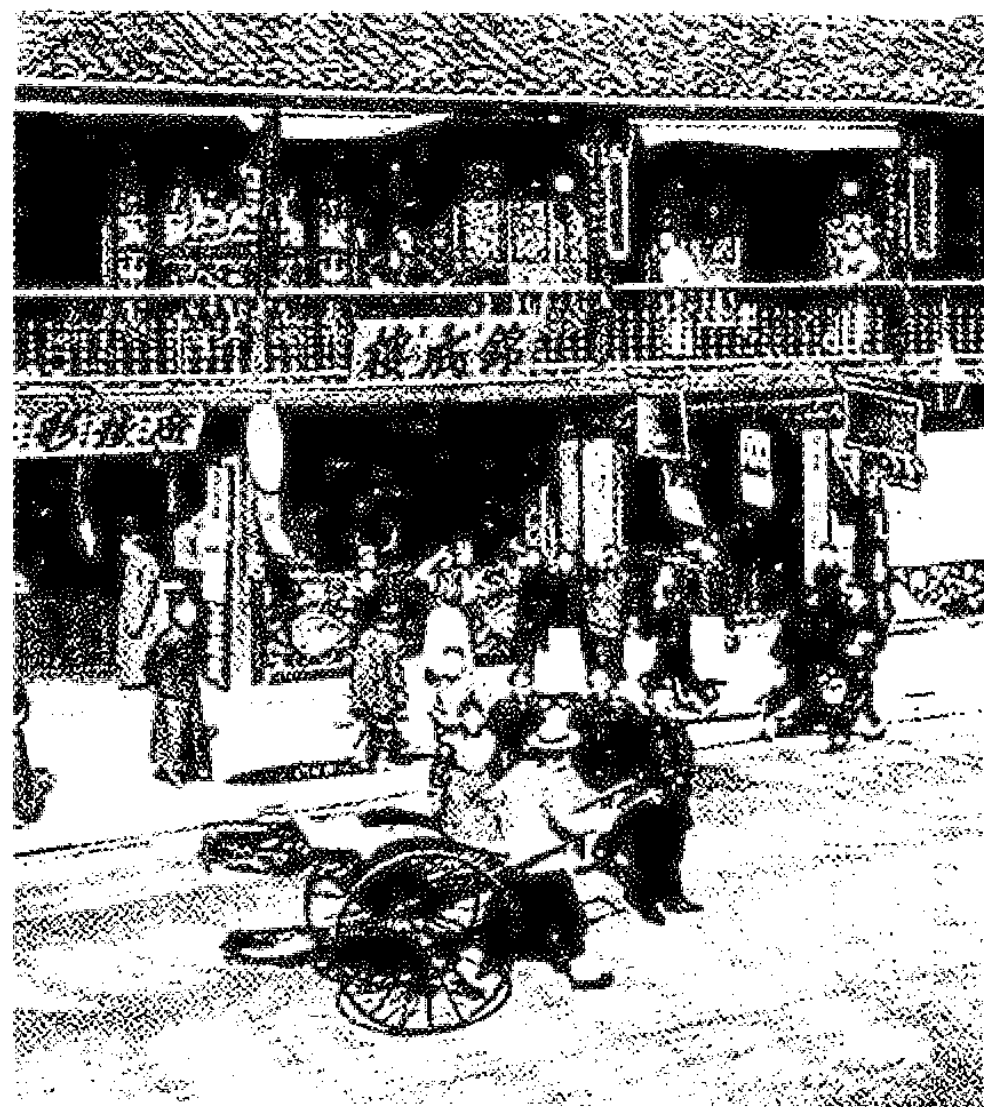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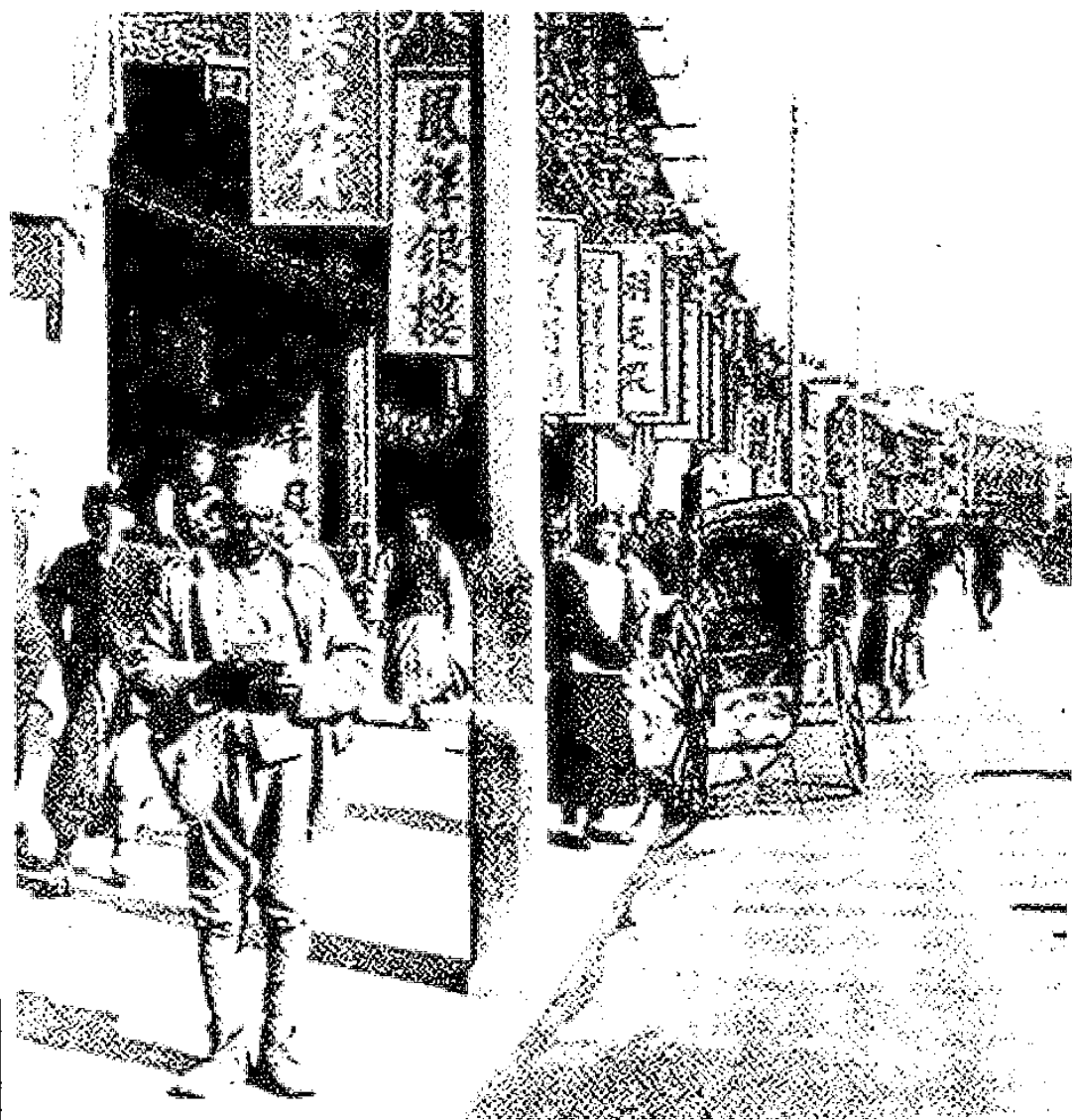
在四平八稳、讲究和谐的大清官场，中央财政部（户部）却推出了一篇振聋发聩的报告，痛斥那些整天高喊“利权”、将自己打扮成天使的大型国企，“利权”其实“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于中饱之员绅”。

国企轮船招商局并购了外企旗昌轮船公司之后不久，两份来自纪检监察部门的报告，在大清中央国家机关内部引起巨大的反响。

先是“御史”董俊翰发难。中央对招商局实行特殊扶持政策，独家承运国家战略储备粮（“漕米”），这令招商局在国企的身份之外，又多了层事业单位的性质。董俊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借机大肆安插私人，推荐信在招商局的办公桌上“函牒盈尺”，造成大量冗员，“求其能谙练办公者，十不获一”，甚至官员中也有人在公司内兼职，不干活只拿钱。此外，招商局内开支浩大，浪费严重。



1860年代的上海外滩 从恭亲王时代开始，上海就不仅成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也成为中国冒险家的乐园——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其实，对于体制内的轮船招商局来说，根本就没有冒险二字可言，一切都是可以“搞定”的。



1900年代的上海南京路

不久，翰林院侍讲王先谦发起了更为猛烈的一击。他在《招商局关系紧要议加整顿折》中，尖锐指出：并购旗昌轮船公司，并非什么国企收购外企的成功商战，而只是招商局高管层欺上瞒下，损公肥私的一个阴谋。根据王的报告，这个阴谋是由以下几个环节组成的：

一、并购动议提交之前，招商局总经理（“总办”）唐廷枢，以弥补亏损为由，从北洋申请到了50万两财政补助，全部用于收购旗昌股票。这是典型的内幕交易，唐廷枢等因此大捞一票。

二、招商局的主管上级、北洋大臣李鸿章对并购并不积极，因为其手头可调动的资金十分有限。此时，招商局常务副总（“会办”）兼党委书记（上级选派下来作为“官督”代表）盛宣怀亲自出面，游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楨，“诡词怂恿”，说得天花乱坠，居然从沈那里拿到公款百万作为并购资金。

三、在并购过程中，招商局高层则从美方获得大量回扣（“中金”）。

王先谦同时指控，招商局早已出现资不抵债的严峻局面，账面上的资本金及借款已达500万两，但各项资产实际价值只有250万两。当务之急，必须严肃查处招商局的领导干部，“唐廷枢、盛宣怀蠹帑病公，多历年所，现在仍复暗中勾串，任意妄为。若任其逍遥事外，是无国法也”。

王先谦指出，李鸿章近期已经上奏中央，计划将投资在招商局的国有资金190



在招商局人事纷争的背后，是身为南、北洋大臣的刘坤一、李鸿章对招商局控制权的争夺。最终，在此次对决中，李鸿章凭借其在洋务领域无可动摇的地位笑到了最后。

左上图：盛宣怀

右上图：刘坤一

左下图：徐润

右下图：唐廷枢



多万两，分5年提还，然后招商局将彻底改制为私营企业，“归商而不归官”。王先谦警告，这将使招商局这一最大的国企更为失控，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这一指控，有理有据，上纲上线，立即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恭亲王、慈禧太后亲自批转新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严肃查处。其实，王先谦的背后，闪动着的就是刘坤一的阴影，这是他与李鸿章斗法的一招杀手。而王先谦提出的解决方案，其核心就是停止招商局的私有化进程，并且将其由北洋转到南洋监管，从李鸿章之手转到刘坤一之手。

刘坤一的调查，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的分化策略，对商人出身、有望收归自己麾下的唐廷枢，他多方开脱，并评价为“招商局必不可少之人”，但对于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则采取了痛打落水狗的姿态，请旨将盛宣怀即予革职，并不准其干预招商局务。

李鸿章则对王先谦的指控，几乎全部否定，并且一口咬定王先谦是被人收买了当枪使，“明系有人贿属”。刘坤一在处理过程中对李鸿章主动拉拢，表示调查最好

是由南北洋共同进行，但李鸿章毫不领情。他在交给中央的报告中，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明确说招商局“所用多生意场中人，流品稍杂，原不敢谓办理处处尽善。但此事由商经理，只求不亏官帑，不拂商情，即于中外大局有益”，这等于是摆出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而且，他将王先谦的攻击，上纲上线，认为这将严重影响改革开放的形象，令改革者寒心：如此“掇拾浮议，辄据无稽之词，妄相牵掣，必致商情涣散，更无人起而善其后矣”。

这一事件，看似围绕着招商局反腐败斗争展开，其实无非是以反腐为武器的权力斗争。李鸿章在大清改革开放中的地位，毕竟是无人能够替代的，经过几番回合，此事最后以盛宣怀调任别处而了结，其中所涉及的挪用公款进行股票内幕交易、蒙蔽沈葆楨出资及收受巨额“中金”等，都不了了之。

盛宣怀出局后，招商局在唐廷枢和徐润等商人的管理下，推行所谓的企业化管理。当唐、徐二人在管理的借口下，要求完全商办时，曾经积极主张商办的李鸿章却大为起疑，并迅速将盛宣怀“以创始蒙谤之身，奉维持整顿之命”派回招商局清理清查。这一查，果然查出了大问题：唐、徐二人大量挪用公款，用于私人炒股、炒房地产。

李鸿章亲笔批示：“……唐、徐二道，因开平、承德矿务，擅自挪移局本、息款八十余万，几致掣动全局，实有应得之咎。即添造金利源码头及南洋轮船两事，用款一百二三十万之多，亦属铺张太过，毫无成算，直是锐意罔利贪得，自贻伊戚，危险之至。”指责他们铺张浪费，挥霍公款。至于徐润在上海炒楼，李鸿章认为他不仅挪用公款，而且利用招商局的信用担保，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高达170多万两之巨，如今不得不抛售套现以归还公款，对公司的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似此罔利贪得不顾其后，殊为可恨……”

盛宣怀则更揭出了可怕的内幕：“不料总办（唐廷枢）之朦混糊涂至于此极也。商本二百万，乃如开平拖欠八十余万，各户往来拖欠七十余万，各局往来拖欠十余万，各局水脚拖欠三十余万，则局本已无着矣。其轮船、码头、栈房实估值本不及四百万，仅足抵老公款九十六万、新公款五十五万、保险存款一百万、客存客汇一百二三十万，人安得不望而寒心。”而根本的原因在于，那两位号称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家”，“雨之（徐润）早已不管局事，终日营私；景星（唐廷枢）亦只管造轮船、挪局款，其开平用项不下二百万，自己亦并不看账，一片糊涂，专说大话”。解决方案就是，请唐廷枢、徐润两人卷铺盖滚蛋，然后由自己进行清理整顿。

财政部（“户部”）在一篇上交给中央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招商局实际上已经成为腐败的渊藪：“局中之侵蚀与局外之倾挤，所有资力颇虞亏耗。”“唐廷枢、朱其昂之被参于前，徐润、张鸿祿之败露于后……招商局十余年来，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债，欠负累累，岂谋之不臧哉？”随后，报告引出了其最为振聋发聩的警句：“稽之案牘，证之人言，知所谓利权，上不在国，下不在商，尽归于中饱之员绅。”但是，这份慷慨激昂的报告连一星水花都没溅起。

以反腐的名义重回招商局的盛宣怀，从此在那里扎下了根，直到1903年离职。这个在招商局并无丝毫原始投入的大清干部，直到去世都是招商局的最大股东，并且因此跻身中国富豪行列，其个人财富高达数千万两，仅在上海租界内的房产，价值就有近2000万两。

“白银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国企的奶牛终于哺育了一部分先富起来者，他们的头上带着耀眼的光环，据说他们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在鞠躬尽瘁……

---

---

## 盛宣怀打“野鸡”

在权力面前，资本最后还是低下了它那高傲的头颅。而只要认可权力也是“生产力”，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在“野鸡”们纷纷倒下之时，持有管理层配股的盛宣怀们，成功地跻身大清国先富起来的孔雀行列，频频开屏，向世界炫耀自己那灿烂的尾部……

---

---

盛宣怀要打野鸡了，而且是联合自己死磕了十多年的老对手怡和轮船公司（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英资怡和洋行 Jardine, Matheson & Co. 麾下企业）、太古轮船公司（The China Navigation Company，英资太古洋行 Swire）一起打。

这种变化有点让人眼晕。因为，盛宣怀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高高举起的正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大旗，要从怡和、太古这些外商的手里，以“商战”的方式夺回民族利权。如今，枪口一转，敌人成了盟友。

“野鸡”的说法，是太古轮船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大班”）严吉迪（H. B. Endicott）发明的。他在1891年写信给盛宣怀求和：希望联手“设法驱逐走江海的野鸡船，俾我三家可以独占其利”。

这些“野鸡”，就是独立于招商局、怡和及太古之外的轮船。这些大多是“洋鸡”，比如美最时洋行（Melchers）的“宝华”号，麦边洋行（McBain）的“萃利”、“华利”号，马立师行（Morris, Lewis & Co.）的“金陵”号等。因为这些“野鸡”的洋身份，盛宣怀打野鸡的行为，被后世的一些学者视为对外商战的一部分。

其实，这些野鸡大多是“土鸡”。在招商局成立之前，几乎每家外资航运公司中，华商都占了相当大的股份。招商局成立的动机之一，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就是要“使华商不至皆变为洋商，实足尊国体而弭隐患，尤为计之得者”。但是，招商局一亮相，华商们就发现自己被卡在夹板中了：根据政策规定，华商只能入股招商局，而不得自行成立独立的民营企业，而且，中央宣示这一政策将维持50年不变（即至1920年代）。权衡之后，不少华商选择伴狮（外资）同行，而非与狼（国企）共舞。因为，与狮同行，虽被盘剥，但契约受到尊重，并且在外国国旗的庇护下，受到的官方骚扰就



道貌岸然的盛宣怀们，成功地跻身大清国先富起来的孔雀行列，频频开屏，向世界炫耀自己那灿烂的尾部……

很少。而入股招商局这类“官督商办”的企业，不仅要贴银子，还得继续做孙子，伺候那些既不出资本，也不对国家负责的官商通吃的“督办”们，同时还得应对外商的竞争，等于是两线作战。英国人赫德管理下的大清海关，就在报告中指出：“华商渴望自有轮船，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某些挂外国旗的江海轮船，几乎全系华商所有。”

经过三年的幕后讨价还价，混战多年的招商局、怡和、太古三家，终于在1894年达成了“齐价合同”，约定三方“务要同心协力，彼此沾益，倘有别家轮船争衡生意者，三公司务须跌价以驱逐他船为是”。这是他们的第三个价格同盟，与之前那两个短命的同盟相比，这一次，他们的亲密关系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曾经并且仍然高举“外争利权”大旗的国企招商局，终于联手外企，组成寡头同盟，共同猎杀那些披着“洋皮”的“土鸡”。

“猎鸡”勇士盛宣怀，曾经以商战民族斗士的面貌亮相。

十年前（1883年），作为中央专案组的组长，他受命进驻轮船招商局，清理清查总经理（“总办”）唐廷枢、副总经理（“会办”）徐润的渎职及腐败案，决心大，措施猛。最后唐、徐二人被“双开”，招商局被彻底纳入大清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之下，盯得牢，关得住，跟得紧。招商局自此废除“总办”一职，盛宣怀出任党委书记（“督办”），执掌大权。只设“会办”的管理层，成为其实际上的秘书班子。日后盛氏羽翼丰满，提出“国退民进”的建议，试图进行类似MBO的改制，“官办”成为“盛办”，国有则成为“盛有”。

夺回了招商局的领导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让招商局成为会下



GDP 金蛋的金鸡，外树政绩，内得利益，盛宣怀面前的道路还很漫长、很艰巨。来自政府的关怀和支持，自然是最为有效的资源投放。招商局的直接领导、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批示：“当此局势岌岌之际，必须官为维持，乃可日就起色。”

大清政府两袖“清”风，但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生产要素。官方下发一纸红头文件，招商局就住进了“财政输血”这一高干病房，尽管它患的是多种病毒引起的并发症，接受的却是开小灶般的滋补疗法：减税、加价、增资。本就是独家垄断经营的国家战略储备粮（“漕粮”）运输，得到了进一步的税费减免；对招商局轮船运载的茶叶，减征出口税，免缴复进口税；提高漕粮运输的费率，并且不再收取海运局公费；同时，暂缓归还官方投资款余额 77 万两。

这儿招，招招大补，但招商局依然萎而不举，举而不坚。根据招商局自己的说法，那都是因为怡和、太古这两个敌人太强大。三方贴身肉搏得十分惨烈，争相杀价，三败俱伤，而招商局虽然难以雄起，却也撑住了，就因为背靠政府的大树，不仅有 大笔的垄断生意，而且有财政上的巨大支持——大清国虽然没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可供挥霍，但以一国之力去对抗两个公司，那还是能够游刃有余的。厮杀之后的结果，就是三方和谈，相逢一笑泯恩仇，把枪口对准更为弱勢的“野鸡”们。

联合猎杀“野鸡”的行动，成效斐然。怡和与太古看到，在权力面前，资本最后还是低下了它那高傲的头颅。而只要认可权力也是“生产力”，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

而盛宣怀则欣慰地看到，通过猎杀“野鸡”并与外商大鳄结盟，招商局的利润额直线上升。招商局股票也如同服了春药，日益坚挺，从 50 两（1890 年）飙升到 140 两（1893 年），并攀上了 200 两的大关。这既是可以向上级大书特书的政绩，也是可以让子孙受益无穷的财富。在“野鸡”们纷纷倒下之时，持有管理层配股的盛宣怀们，成功地跻身大清国先富起来的孔雀行列，频频开屏，向世界炫耀自己那灿烂的尾部……

---

---

## 裸泳的奴家

在一个人人裸泳的年代，权力作为第一生产力和第一生产要素，就是那决定令谁彻底“走光”的潮神。大清国实在并无企业家，只有“奴家”，而“奴家”只能委身潮神的怀抱，以获取那点傲立潮头的机会。

---

---

潮水在退去，人们惊诧地发现：如胡雪岩、徐润那般道貌岸然，爱作弄潮儿状的伟大企业家们，也露出了水面下的半截身子，居然赤条条空空如也。

1883年，中法在越南对峙。法国军舰开到了黄浦江口，将炮口对准了这座繁华的东方巴黎。这不仅改变了上海的物价结构：除了粮食等生活必需品飙涨之外，各色动产不动产几乎集体跳水自尽；同时也改变了上海的富豪榜排名，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狠。

令胡雪岩、徐润彻底“走光”的，搞得很黄很丢脸的，是一直拿着高倍望远镜和长焦镜头在窥伺机会的盛宣怀。盛本人就是因涉嫌裸泳而灰溜溜地离开了轮船招商局，他根本不相信在大清国还有人会真的按照规则、穿戴整齐再下海。

第一个被放倒的是胡雪岩。

与徐润不同，胡雪岩之于盛宣怀，就是个“外敌”。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而盛总则是李鸿章的小弟。老大之间的矛盾，当然就是小弟之间的仇恨。何况这两人，一个来自杭州，一个来自常州，都是长三角经济圈的地头蛇，都是玩“政治—经济”学的高手，更要为地盘斗上一斗了。

开始的时候，胡总当然强大许多。盛总无非是国企的高级打工仔，胡总却是富豪榜上的著名私营老板，他在西湖边建的豪宅，连同豪宅内圈养的十二房妻妾，都是人们八卦和垂涎的对象。胡总商业帝国的核心，在于阜康钱庄。作为纯粹的民营金融机构，阜康钱庄的核心竞争力却是政府公关，因能大量吸纳公款，这里几乎成了第二财政部，尤其是独家经办为左宗棠西征而借的外债。

承办国家外债，利润似乎并不高，阜康钱庄还得为此向外资债权银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风险着实不小。但这毕竟是大清国的国债，大清国可以常常失信于自己的子民，却绝不愿意（或许是绝不敢？）失信于国际社会。何况，承办这么大笔的国债借

贷，早已深谙中国国情的外商，也在暗地里给了可观的回扣；如果在收、支时间差上再多动动脑筋，就很容易多方截留，从而将公款变成阜康钱庄的现金头寸。更不必说，这本身就是有力的“中央一抬”，给阜康在国际国内市场都做了个大大的广告，无形资产增值不少。总之，银行跑营销出身的胡总，打算盘是基本功，不会算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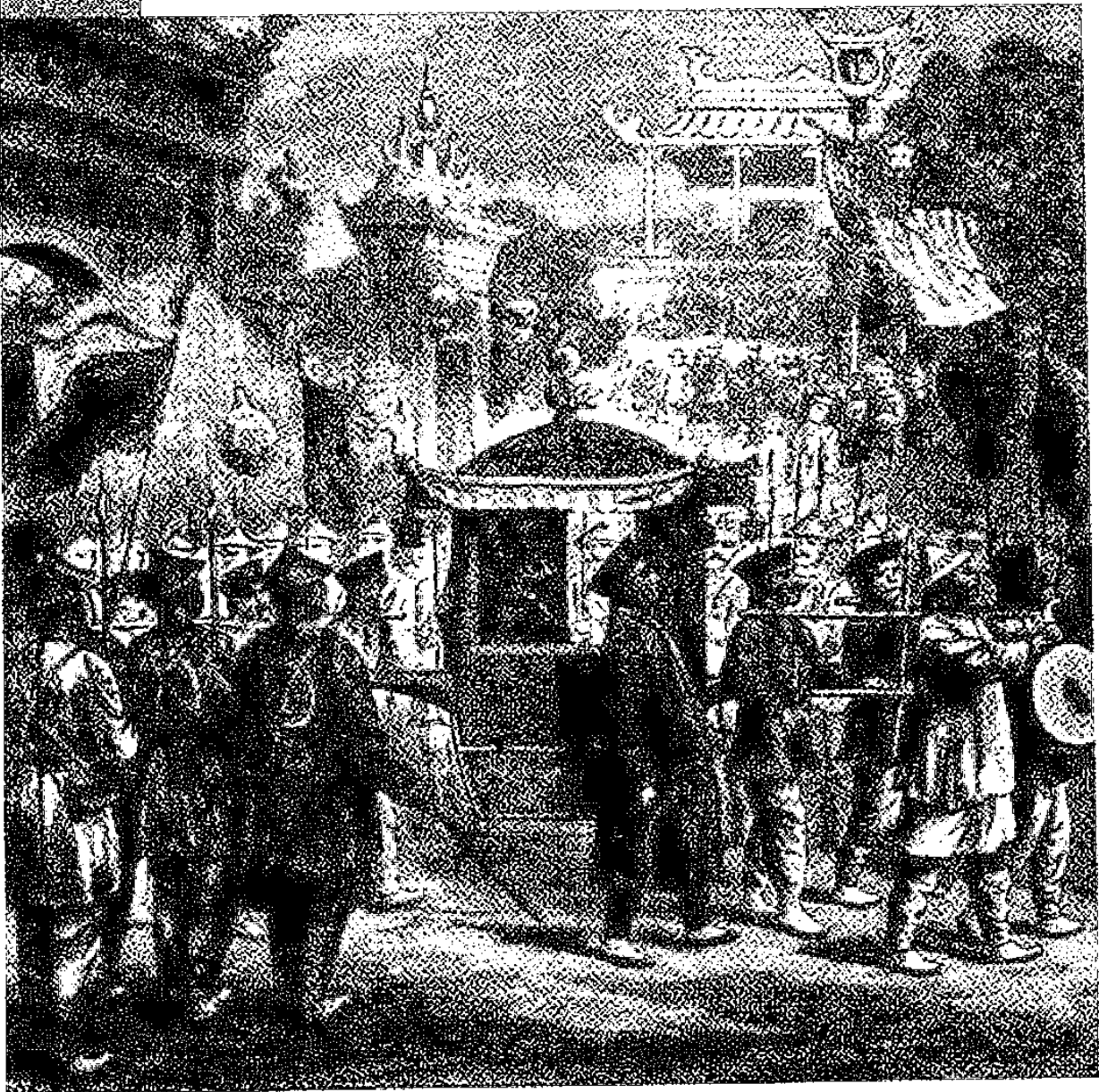
蛇大窟窿大，胡总向来爱玩空手道，如今守着个银行，自然是要大展宏图的。当时的生丝出口有巨大利润空间，胡总于是痛下本金 2000 万两，争购并囤积生丝。据说，他之所以如此放手一搏，一是为了解救被洋人们欺压的蚕农，二是要为民族工商业争口气。实际上，就是要形成市场上的垄断优势。强龙难压地头蛇，在巨额资金的支持下，在黑白两道（胡是青帮的“空子”，差不多相当于其地下党员）的保驾护航下，胡雪岩抢购生丝十分顺手，几乎搜尽了当年的新货和此前的存货。洋商们无货可收，自然慌张，通过种种渠道与胡雪岩进行谈判。老外开出的价码很痛快：加价 1000 万两！

面对洋商的“诱惑”和乞求，胡雪岩并没有松口，理由却非爱民或爱国，而是要求再加价 200 万两。双方于是僵持不下。待到来年，新一轮的春蚕到死丝方尽后，胡总却发现：不仅遥远的意大利生丝大丰收，缓解了西方工厂的原料问题，而且法国

军舰开到了上海洋面耀武扬威，银根全面收紧，手头已难以筹措足够的资金去收购新丝，而囤积的旧丝却已经开始变质。

此时，早在暗中窥测多时的盛宣怀，实施闪电战：启动官场内的关系，将本应解送到阜康钱庄用于支付外债的公款，押后数日，虽然只有 80 万两，但却是外交大事；同时，动员大储户们进行挤兑，在市场上

这是美国代表团画师的记录：一位中国官员的辉煌出行行列，令美国人叹为观止，并进而探究为何中国的官员要如此炫耀毫无实际意义的排场。权力如此强势，这也意味着别的一切在它面前只能俯首……



传播阜康不稳的消息，结果硬生生憋死了并非资不抵债的胡财神：仅生丝一项，胡雪岩就损失高达1800万两，并随即被“双开”加“双规”，革职，抄家，彻底打翻在地。

扳倒地头蛇胡雪岩之后，盛宣怀转过身来收拾过江龙徐润，尽管徐润是盛宣怀在招商局时的老同事、老同志。

徐总先前就比盛总、胡总家阔多了。他14岁进了外企打工，在英商宝顺洋行（Dent & Co.，也称颠地洋行）当学徒，后升为买办，自己还涉足航运业、地产业、丝茶业、保险业、出版业等，搞得十分红火。1863年，徐润就已经在上海拥有“地二千九百六十余亩，造屋二千另六十四间”，而且在天津、塘沽、广州、镇江等地有大量房地产。当时，他年仅26岁，比他大15岁的胡雪岩，此时还在忙着事业的开拓；比他大14岁的盛宣怀，则还在乡下仰望星空，想着如何到大城市出人头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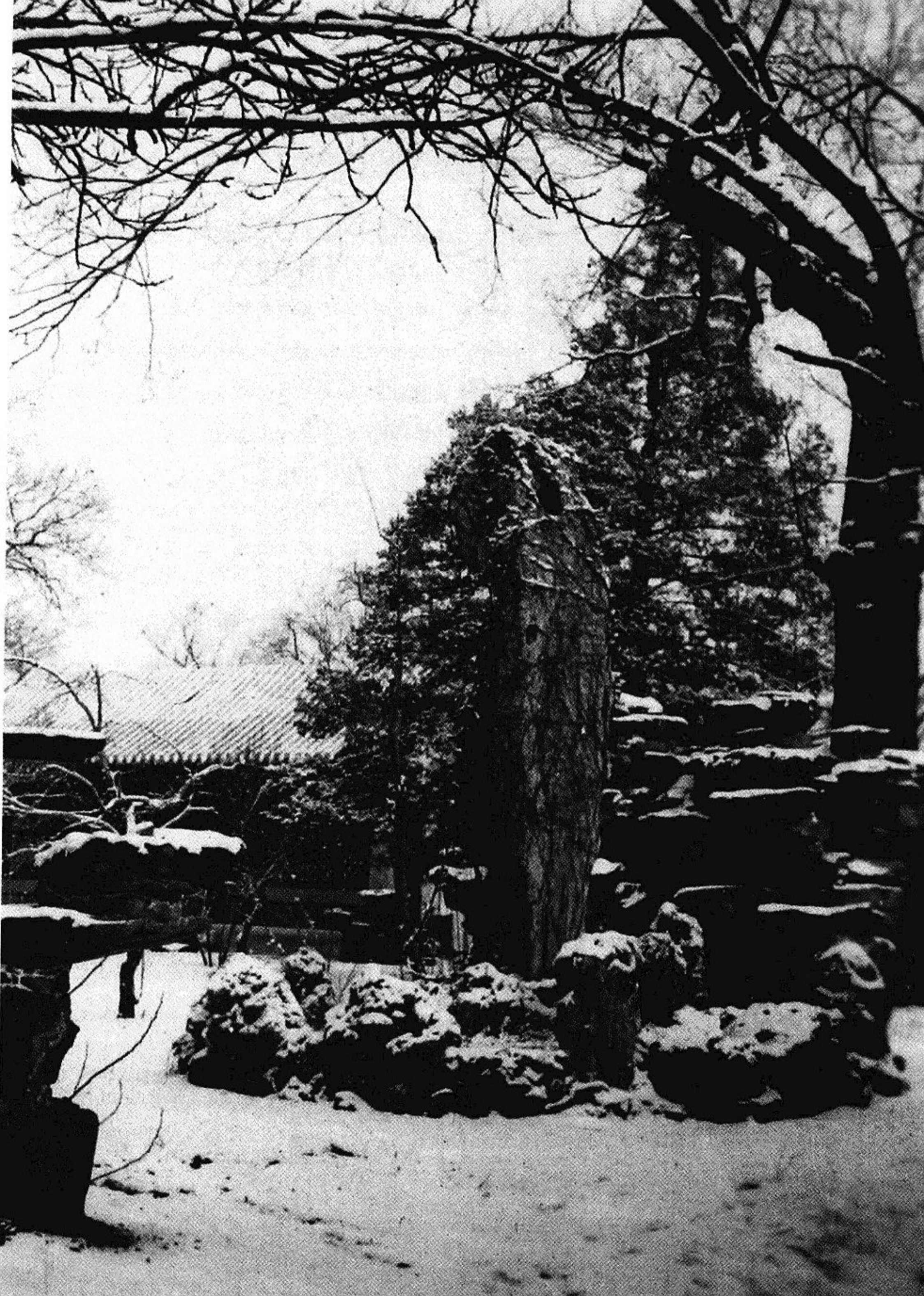
房地产是个资金密集型行业，徐润四处融资，从国内的钱庄到外资的银行，大量贷款，以新债还旧债，进行滚动开发。这种现金链高度紧绷的游戏，被法国人的军舰轻易地毁灭了。上海房地产狂跌时，徐润名下的房地产虽然市值高达340多万两，但仅仅来自22家国内钱庄的贷款总额就高达250多万两，负债率超过73%。债权钱庄公选出6名代表，徐润也派出6名高管，双方组成的“联合工作组”研究来研究去，决心还是拉新股东入伙。不过鬼使神差般地，他们居然找上了日夜谋划着重归招商局、踢走徐润的盛宣怀，真是与虎谋皮，也可见买办出身的徐润的确不会讲政治、看风向。

盛宣怀四两拨千斤，一出手就抓住了徐润的命根子：徐润炒房时，挪用了招商局公款16万两，数目虽小，但性质严重。随即又牵连出徐润以招商局信用担保自己的贷款，涉及贷款金额居然高达160多万两，这等于将国有资产也牵扯进了房地产泡沫之中。

在盛宣怀义正词严的逼迫下，徐润被迫将镇江及上海永业里、乍浦路等处的房产以低价抵偿招商局欠款。徐润被开除出招商局，同时革除开平矿务局会办之职，贱价出售手头房地产，以归还所有涉及招商局信用担保的贷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近90万两白银。

最为郁闷的是，法国人一走，他那些被迫“割肉清仓”以筹资的房地产，旋即升值十倍，高达2000万两白银。

在一个人人裸泳的年代，权力作为第一生产力和第一生产要素，就是那决定令谁彻底“走光”的潮神。大清国实在并无企业家，只有“奴家”。“奴家”只能委身潮神的怀抱，以获取那点傲立潮头的机会……



## 第十章 帝国的出轨



独乐峰 在位于西洋门北中轴线上，有一块高约5米的太湖石，岷然高起，透漏生姿，起着入门的影壁作用，有不使园内美色尽览之功效。“独乐”二字似乎蕴含了恭亲王奕訢与慈禧太后的政争之苦，以及文人雅士推崇的修身养性之境界。（陈鸿舜收藏，照片拍摄于1940年前）

---

---

## 骑着毛驴上北京

在那些看似无稽的“风水”等遁词背后，恭亲王、李鸿章们的主要顾虑，是国家的经济主权不能轻易让与外人，铁路要尽量保留到中国自身经济恢复之后，自行建造……

---

---

威妥玛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这令他十分郁闷。

“大叔”其实并不大，在出任大英帝国驻大清帝国代理全权公使时（1864年），才46岁，只因为长着一部英国人爱留的大胡子，显出一幅“大叔”样儿。

威妥玛之前到过北京，但那时骑着战马，或坐着英军的军用马车。战争结束了，作为外交官，他只能和其他西方人一样，骑着毛驴上北京。尽管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实在不是件体面的事情，但别无选择——毛驴是通往大清国伟大首都的唯一交通工具。

在美国使馆举行的某次晚宴中，他向美国传教士、后来出任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首任校长的丁韪良发出了抱怨。丁韪良宽慰他说：“希望你一直担任女王陛下的公使，直到能乘着火车离开。”

威妥玛很高兴地说：“让我们为此干杯吧。”

威妥玛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学家，著名的“威妥玛拼音”就是他的科研成果，大大提升了外国人乃至中国一般大众学习中文的效率。但从他对毛驴的不满来看，他似乎并没听说过“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说法，骑着毛驴那差不多等于乘龙前进呢。他似乎更不明白，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喜爱毛驴，其性情温驯、刻苦耐劳、繁殖力强等特点，不正是主人们性格的写照吗？

要想富，先修路；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是包括威妥玛在内，生活、工作乃至战斗在大清国这“同一个世界”的洋人们的“同一个梦想”。

威妥玛上任前一年（1863年），年轻的恭亲王已经开始主持大清中央的日常工作，大清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徐徐展开。而英国这时也已经从穷凶极恶的洋鬼子，成了大清政府的好朋友，并将帮助大清国改革、开放，乃至协助镇压太平天国暴乱，当做了自己的国际义务。



英国人向大清中央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铁路计划：以汉口为中心，南达广州；东达上海；西经四川、云南等省，直达印度；北由镇江到京津。其实，怡和洋行早在1844年就设想将铁路从印度的加尔各答（Kolkata）修到中国广州。尽管关系密切得如同同志加兄弟，恭亲王依然坚定地拒绝了这一请求。

同一年，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及27家在沪的外资企业，集体觐见李鸿章。李鸿章当时还没调到中央混上“中堂”，只是个地方干部，担任江苏省省长（“巡抚”）。外商们要求修建一条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也遭到李鸿章的严词拒绝。

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在大清国的红灯面前，洋人们也学会了绕着走。威妥玛骑驴上任后一年（1865年），北京城终于出现了铁路。英国人杜兰德在宣武门外护城河边，铺了一段约500多米的小铁路，其上一台蒸汽机车“迅疾如飞”。那与其说是交通工具，不如说是嘉年华里的大玩具。当然，这绝非英国人吃饱了撑的行为艺术，而是一次广告促销。满以为“迅疾如飞”的火车一亮相，北京城内千树万树的榆木疙瘩们就能突然绽开，但没想到弄巧成拙。对这一新生事物，“京人诧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至大变”，严重威胁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首都公安机关（“步军统领衙门”）雷厉风行，重拳出击，紧急拆除了这段铁路，及时地消除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在后世的主流史家眼里，彼时以恭亲王、李鸿章为代表的大清政府，在铁路建设上如同小脚老太太一般，胆子不够大，步子不够快，正是其颞顶、愚昧的表现。但在那些看似无稽的“风水”等遁词后，恭亲王、李鸿章们的主要顾虑，还是在于国家的经济主权。铁路这一利权不能轻易让与外人，要尽量保留到中国自身经济恢复之后，自行建造。其实，同一时期大清国已经展现了对新生事物的热烈追求和对主权的坚定维护。恭亲王批准在英国一掷千金，购买了一整支新式舰队（“阿思本舰队”），后来又不惜赔本变卖，也不让英国人控制枪杆子，以维护大清中央对这支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军舰的舰队的绝对指挥权。

毛驴似乎战胜了铁路。但当时洋人中的敏锐观察者，却并未附和着轻率攻击大清国的颞顶、愚昧，他们已经嗅到了“风水”等荒诞外衣包裹下的大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内刚。

一位长期观察大清政治的英国人高思特（Harold Edward Gorst）在1899年出版的《中国的进步》（China in Progress）中，搬出了英国铁路初建时的种种颞顶行为，为中国辩护，实在值得那些轻率非议先人的国人一读：

“六十多年前在英国，当人们建议筑造第一条铁路时，全国吵闹反对。如果那些喜欢嘲笑中国人害怕蒸汽机工厂和铁路运营的人们，能回忆及此，不是没有好处的。”

“那时英国人所提出的反对，比今天中国人所表示的厌恶，可笑得多了。中国人不喜欢他们的墓地受到侵害，或是他们风水的规条受到破坏。但是在英国，一个著名的律师居然说，狂风时，蒸汽机将无法运转，即使‘搅拨火炉，甚至增加蒸汽的压力到锅炉要爆炸的地步’，也是毫无用处的。医学家说，隧道的暗淡与潮湿，汽笛的尖叫，机器的飞转，都将给公共卫生带来很大的损害。机车通过时的火花，将引起房屋火灾。乡绅们则担心自己牧场上的牛将受到惊吓而不再进食，母鸡则将停止下蛋。许多人甚至担心工厂所吐出的烟雾将使蓝天从此变得暗淡无光（雪珥注：此点倒是蒙对了，符合“环保”理念）。这些荒谬可笑的担忧，要是拿来和中国人所提出的沉静的、十分有理的反对相比较，英国人可得自惭形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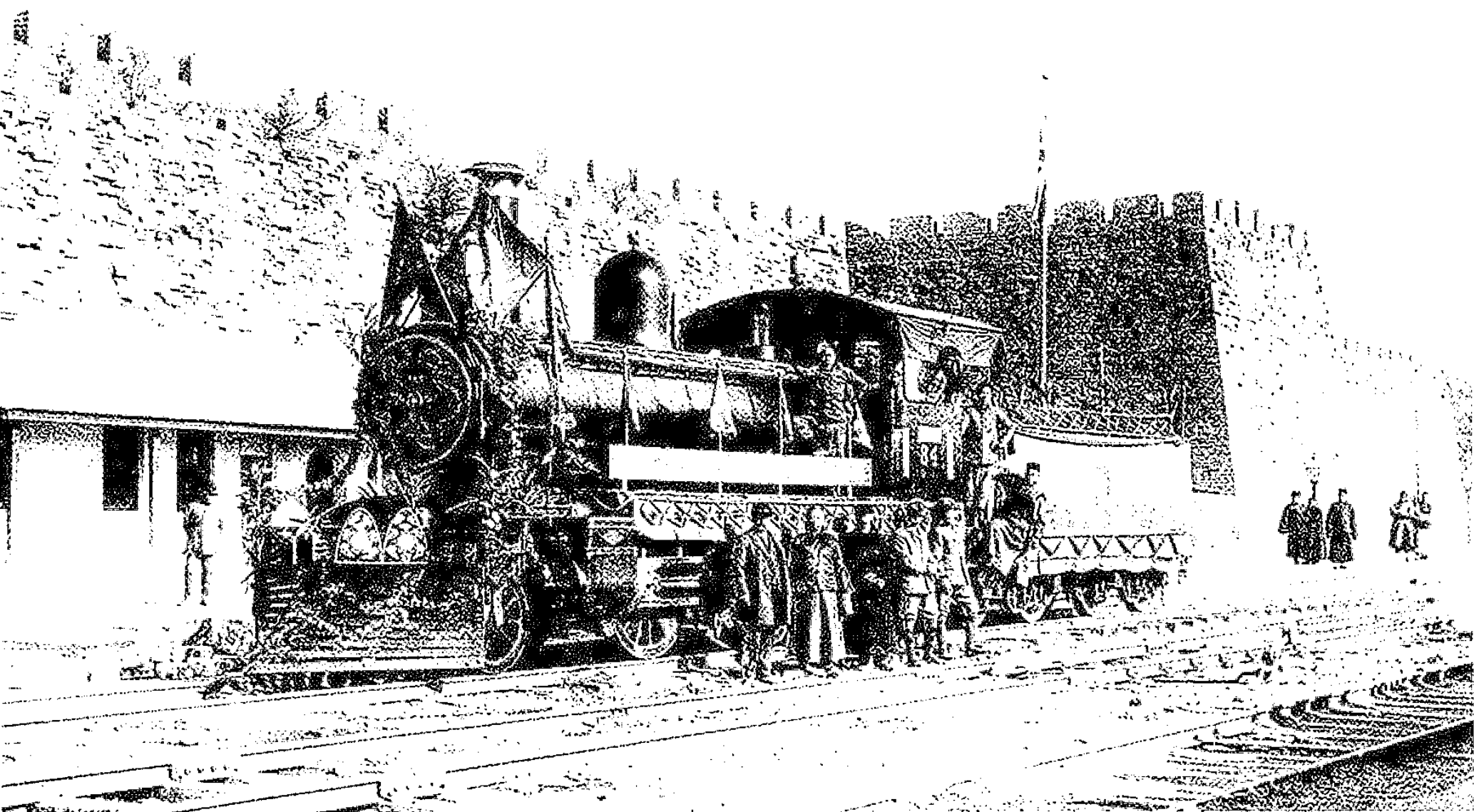
高思特认为，在面对铁路的“威胁”时，“中国一般人民的举动是有理而适度的”，因为“当人们的生计受到威胁的时候，愤怒的示威再加上暴动，是不可避免的”。他建议欧洲人对比一下“和中国人在生活、文化、思想方式上有着巨大差别”，然后就会“对中国从1860年到1895年之间的迅猛的进步，实在不能不感到惊叹！”

而深深介入大清铁路发展的另外一位英国人肯特（Percy Horace Braund Kent），在其1907年出版的《中国铁路企业》（Railway Enterprise in China，中译本改名为《中国铁路发展史》）一书中，大力肯定了恭亲王和李鸿章们的主权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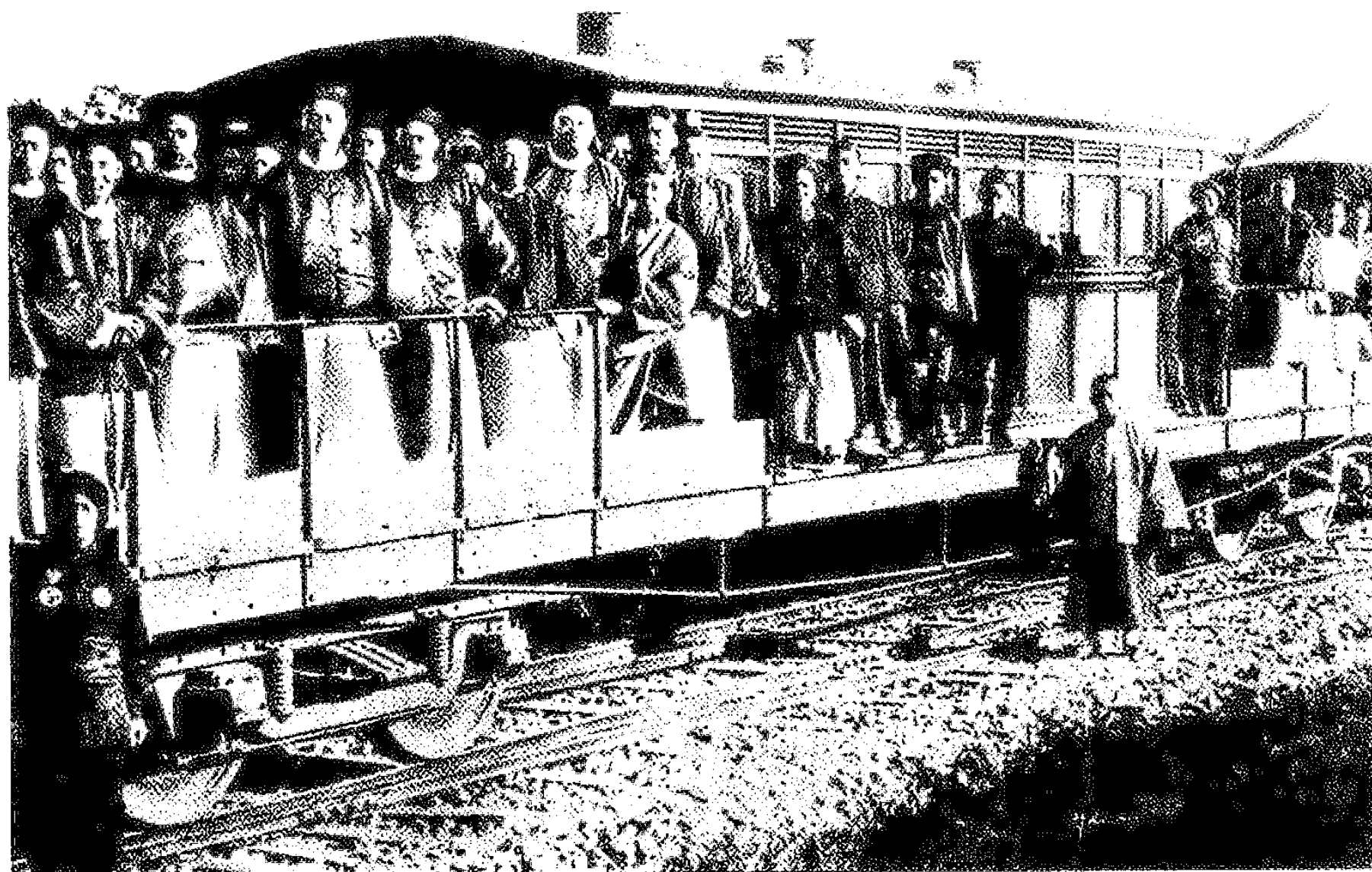
“不幸，这一个计划（雪珥注：指修建上海到苏州的铁路）虽经领事团重要人物的关说，却遭到断然的拒绝。李鸿章明确地通知领事团说，只有中国人自己创办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并且中国人坚决反对在内地雇佣外国人。同时，一旦因筑路而强征中国人民的土地，将会引起极大的反对。他更直率地拒绝居间将任何此类建议奏报朝廷。他甚至表示，他有责任反对外国人追求铁路建设的特许权，这种特许权将使列强在中国取得过分的权利。”

骑驴看唱本，朦胧但坚定的主权意识，成为恭亲王的京韵与李鸿章的徽调中的主旋律。

近二十年过去了，尽管威妥玛在很多个清晨站在高高的城墙上，盼着铁路修到他脚下，但直到1882年他卸任离京，他依然必须骑在马背上——这次终于不是驴了——颠簸着走向几乎完全西化的天津港……



铁路之所以后来成为大清国改革的最大亮点，并得到官员们的全力支持，就是因为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回扣”空间，能使人迅速地跻身先富行列。1900年代，铁路终于畅通地修到了北京城墙脚下。



1882年，李鸿章（前排左起第四人）乘“龙”号机车视察中国人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

## 大清“地铁”

老外们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与大清国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慢摸”不同，老外们使劲在水里倒腾。既然大清国坚决不同意，那自然就只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看见红灯绕着走”了。

城市未必让生活更美好，却绝对让生活更八卦，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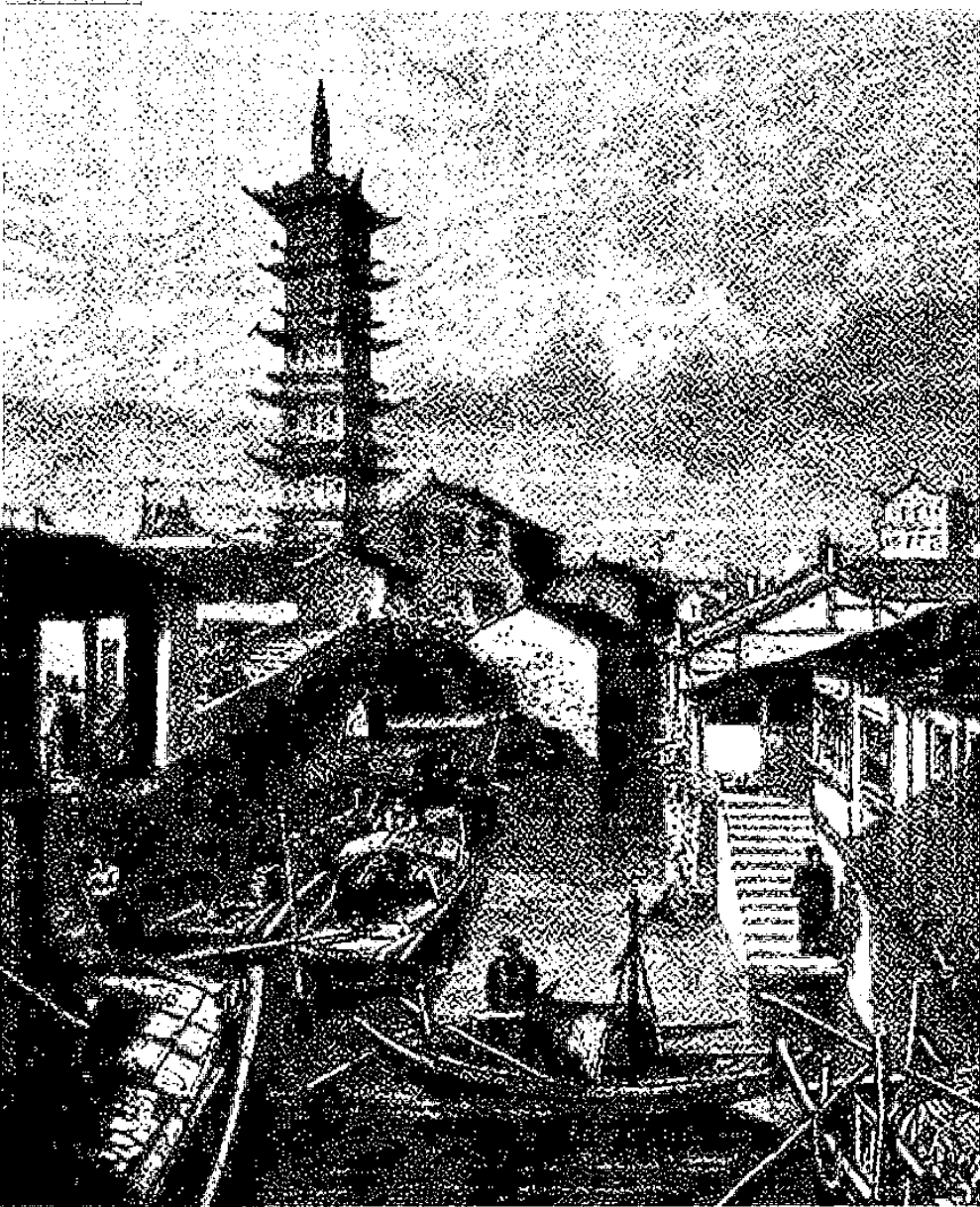
“轧闹猛”（爱看热闹），是围城内的“城里人”和围城外的“乡窝人”的极少数共同点之一。打从洋人到了上海这只“角”，就几乎没有断过西洋景可看。只要是新鲜玩意儿，即使没有组织上统一安排，“阿拉们”照样扎堆欣赏，丝毫不会流露出保守颓废的罔样，难免令人会因此而确信大清改革真乃民心所向。

天后宫附近的苏州河二摆渡北岸（在今河南北路和塘沽路口），矗立起了一座崭新的西式建筑，这就是日后人称“火轮房”的所在。“火轮房”附近，一早就是人山人海了，一辆辆或中式、或西式的马车从城里

透迤而来，车上的乘客们衣着光鲜，辫子梳得油光铮亮，在七月的烈日下散发着头油的怪味。

这是1876年7月4日，“吴淞铁路”试运行的第二天，1000名与外商有生意往来的中国商人，被邀请至此开洋荤。而前一天的试运行，贵宾们则全部是驻沪的老外们。英国著名的《图片报》（The Graphic）画下了当时的盛况：在用秸秆编成的围栏外，乡民们张大了嘴看着这头铁马奔驰，一个孩童躲在大人的背后，却又努力从人群缝隙中观看。

即使对于上海这样的东方大都市来说，铁路在这江南河网地带也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图为上海的河道。



这是大清国第一条营运铁路。这一改革的新生事物，似乎受到了大清人民的热烈欢迎。7月3日，铁路正式向公众营业。《申报》记录道：“到下午一点钟，男女老幼，纷至沓来，大半皆愿坐上中两等之车，顷刻之间，车厢已无虚位，尽有买得上中之票仍坐下等车者。迨车已开行，而来人尚如潮涌至。”

但是，这却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地下铁路”——没有经过大清国政府批准的违章建筑。

上海开埠之后，成为中国联结世界的交通枢纽。但从吴淞口开始，黄浦江河道严重淤积，大型船只无法直航上海港（外滩附近），而疏浚难度大、成本高。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英国，其在中国外贸中所占比重高达70%。英国代理公使威妥玛在1866年向中国政府请求，准许英商修筑淞沪铁路，以提升吴淞港与上海的物流通行能力。但此议未获批准。

三年后（1869年），世界交通格局发生革命性变化。苏伊士运河开通，蒸汽轮船迅速取代飞剪船，投入东西方的航运，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由120天以上缩短到55~60天。上海与吴淞之间的物流交通问题，更为凸显。

而在远比上海落后的横滨，美国人从日本政府那里获得了横滨—东京铁路修筑权，横滨迅速崛起，美国历史学家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指出：“在大清帝国建筑铁路的再次努力，是受横滨—东京建筑铁路的刺激。”但列强的努力，在大清政府的坚决反对下，基本无效。

此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等大清改革的操盘手们，也看到了铁路在国防与经济建设中的战略作用。

1875年初，同治皇帝驾崩，光绪皇帝即位。李鸿章前往北京奔丧，拜见了大清总理恭亲王，“极陈铁路利益”，请先试造清江浦至北京一线，以便南北转运。此前，李鸿章曾经向中央多次“沥陈”：“煤铁矿必须开挖，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应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

李鸿章如此焦虑，是因为外患并未消弭。俄国和日本一熊一狼，同时在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发难。李鸿章提出，只有兴建铁路，才能加强西北和东南的国防：“自开煤铁矿与火车路，万国蹙伏，三军踊跃，竟改驿递为电信，土车为铁路，庶足相持。”“南北洋滨海七省自须联为一气，方能呼应联通。倘如西国办法……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误事。”

李鸿章甚至还提出，铁路是商战的关键所在，“军国之大利也”。他分析道：“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餉也。”

根据李鸿章写给驻英国公使郭嵩焘的信，对于他的大声呼吁，“常务副总理”文祥只是“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而恭亲王虽然“亦以为然”，但是却担心“无人敢主持”。李鸿章还建议恭亲王，可以“乘间为两宫言之”，恭亲王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

文祥的“目笑存之”是赞许和无奈，这位开明、睿智而且极为廉洁的高级干部，太了解官情、国情、社情了。不少西方人都记载下了他的改革思路：中国必须改，但必须稳步改，否则会事与愿违。而恭亲王与两宫太后，更多地也是畏惧于仓促改革可能会再度激动民心，百姓久乱思治，这种涉及征地、拆迁、移坟乃至改变风水的“猛药”，再苦口，再有利，也可能会导致休克。大清国最怕的，就是休克后再也醒不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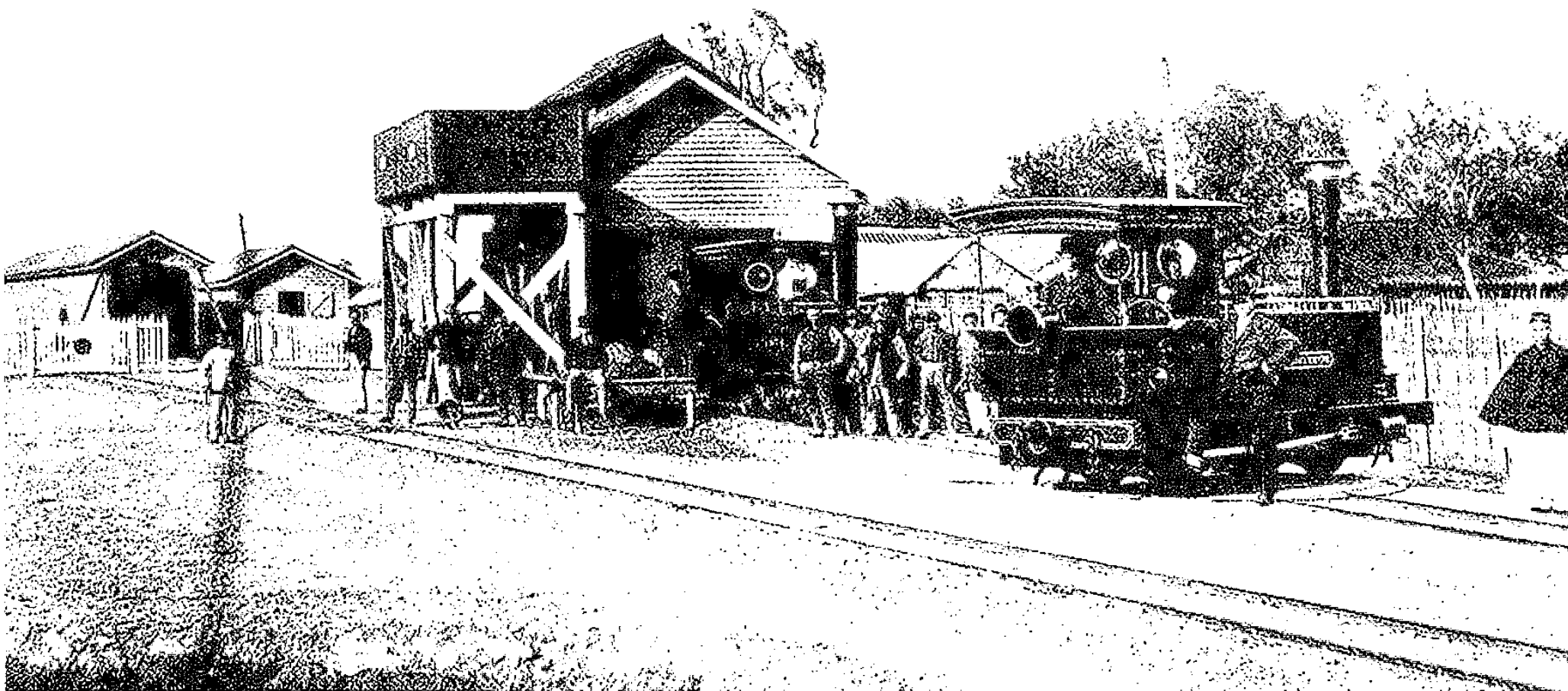
几番讨论的结果，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停一停，看一看，郁闷的李鸿章“从此遂绝口不谈矣”。

老外们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与大清国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慢摸”不同，老外们使劲在水里倒腾。既然大清国坚决不同意，那自然就只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看见红灯绕着走”了。

最早想“绕着走”的是美国人。早在1872年，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布拉特福（O. B. Bradford）就开始“忽悠”大清政府，请求修建从上海到吴淞的一条“马路”（Carriage Road），并在次年成功地拿到了土地批文。毕竟，“马路”一词，并未严格界定其上是否还有两道铁轨，足可以先瞒天过海，造成既成事实逼中国就范。但这一行为，被美国政府阻止，因为在1868年中美两国于华盛顿签署的“蒲安臣条约”，明确规定美国不得干涉中国有关电报、铁路等的建设。

美国的表兄弟英国却并不受这样一种条约义务的制约。美国人于是将这个项目转让给了英商怡和洋行。怡和洋行组建了一个项目公司“吴淞铁路公司”（Woosung Tramway Company），但为了继续蒙蔽中国政府，他们同时注册了一家掩护用的“吴淞道路公司”（Woosung Road Company），将“铁路”一词隐藏起来。

“吴淞道路公司”立即行动，开始修路，大清国的第一条“地铁”即将诞生……



上图：中国第一条铁路：  
车头和车厢工棚。

中图：吴淞铁路的运营  
引起世界的关注。这是  
吴淞铁路全线贯通的当  
月，英国《图片报》(The  
Graphic) 的报道。



下图：上海—吴淞铁路开  
通时拥挤的参观人群。



## 拆迁让谁更美好？

铁路征地之前，农民们都安心于种地的本职工作。但征地开始后，农民们就不再安心种地了，而是琢磨如何通过铁路来快速脱贫致富……

搞基建投资，尤其是搞那种在规划上打擦边球的基建投资，关键是要快。要在政府有所反应——或者说不得不有所反应之前，造成既成事实，才能巩固胜利成果。这是建设具有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的一个诀窍。

英国人精于此道。要在明确拒建铁路的大清国，建设一条上面铺着铁轨的特殊“公路”，英国人知道其关键就是一个字：快。

从美国人手上拿到“吴淞公路”的项目建设权后，英国人首先将这条“马路”所需的已被征用的土地纳入红线，并在两侧挖掘深沟，把地先圈起来。为了争取民意的支持，英国人努力做到“文明拆迁”和“文明施工”，为了不触犯“风水”禁忌，英国人甚至不惜成本，将挡道的大树移栽到附近，而不是一砍了之，据说这也是中国铁路时兴行道树的开端。

英国人明智地将周边的征地拆迁户们，纳入到自己的统一战线中来。他们大量



中国第一条铁路：“先锋号”机车抵达。



雇佣所征地的村民，工资给到了每天 200 文，“乡人皆踊跃从事，毫无怨嫌”。

其实，当美国人最早从大清政府手上拿到项目征地权时，反应灵敏的大清农民们，就对这一重点工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们迅速提升了卖地的价格。推动这一项目的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布拉特福（O.B.Bradford），在写给上海市长（“苏松太兵备道”）沈秉成的信中，就提醒他这个项目正在迅速推高沿线的房地产价格，那些被征土地上的房屋价格“远高于当时的市场价”。有西方研究者认为，这在令沿线民众受益的同时，也同时“腐蚀”了这些曾经淳朴的民众。

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向北京的代理公使威妥玛报告，有一位当地民工告诉他，铁路征地之前，农民们都安心于种地的本职工作，但征地开始后，农民们就不再安心种地了，而是想法通过铁路来如何快速脱贫致富。

一位名叫李昆荣的农民，与当地的村委会干部（“地保”）相勾结，谎称一块公共土地属于他的寡嫂，并以其名义租给了怡和洋行。为了把这个故事编圆了，两位村委会干部还把公共土地的记录做了篡改，将这块“私人土地”的面积从 0.871 亩改为 1.5 亩，三人瓜分了收到的租金。此事后被宝山县发现，知县冯寿镜下令逮捕了李昆荣及两位村委会干部，三人都被处以笞刑，体质最差李昆荣尽管受笞最少，却在受刑后几天死去，成为这场拆迁狂欢中的少数悲剧人物。

除了拆迁涉及的农民之外，吴淞铁路还成为拉动当地旅游业的杠杆。热火朝天的建设现场本身，就成为上海一景，从本埠到百里开外，人们蜂拥而来看热闹。《申报》



等待雇佣的劳工，上海，约 1870 年。

记载道，“观众”每天都能有上千，马车、大轿、东洋车（人力车）生意火爆，而工地周围也围满了水果摊、点心摊，仿佛赶集一般。

至此，吴淞“马路”建设，不仅成为上海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平台，也成为拉动GDP上升的杠杆，更是街谈巷议的热点新闻。吊诡的是，每天千人以上的“大规模群体性”聚集，似乎并未引起向来警惕而敏感的大清官方的关注，更甭提那工地上明晃晃的铁轨，显然与规划批文上的“马路”一词完全不符。

是猎犬们疏忽了，还是被搞定了？大清国的第一条营运铁路，而且是外商独资铁路，就在这种公开的“地下”状态下，在疑似潜规则的保驾护航下，不断向大海方向延伸。

吴淞铁路通车后，不仅上海本地人趋之若鹜，而且，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前来观看这一先进的洋玩意儿。尽管这段仅仅15公里长的路程，费用不菲，头等舱来回要2元，差不多是一石米的市价了，但“游火车”依然成为大清国一种“髦得合时”的休闲方式，至少一半的国内游客选择的是头等舱和二等舱。大清国从来就不缺有钱人。尤其不缺有权而能够弄到钱的人，尽管国家依然千疮百孔，但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们，努力与世界接轨，加入了休闲消费的国际化浪潮。大多数人从上海到吴淞，绝无公务或私事，只是“白相”而已。在欧美作为大众交通工具的铁路，以“奢侈品”的光辉形象进入中国，拉响了叫春的嘹亮汽笛。吴淞铁路迅速盈利，达到了每英里每周盈利27英镑的水平，与伦敦持平。这不仅证明了英国人在打仗和经商方面两手都过硬，更证明了大清国市场的巨大购买力。

大清商人的算盘，一点也不逊色于英国人。吴淞铁路开通后，从上海小东门到被称为“火轮房”的火车站，一些华商迅速投资兴建了“出租车”线路，并且令英国人不得不为中国特色的智慧而叹服：这些马车车厢完全仿照吴淞铁路的火车车厢，而马车夫们则穿着清一色的仿制的铁路制服。

更多的人从铁路开通后的房地产增值中受益。当两江总督沈葆楨考虑将铁路收归国有乃至拆除时，铁路的既得利益者中，有145名有点头脸的人士，联名签字请愿，要求保留铁路。而要求拆除铁路的人士们，也组织了联合签名，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

至今，在中外不同的史书和论文中，相互对立的“民意”依然是支持各自论点的依托，拆迁究竟让谁更美好，依然是个扯不断理还乱的话题……

---

---

## 东方慢车谋杀案

在这起铁路事故中，民意只是个工具而已。那些看似矛盾的“民意”体现，其根源或许与政治觉悟、民族意识、开放精神都无关，而只在于一个词：“切身利益”。

---

---

1876年8月3日，一起铁路事故，令盛夏的上海险些成为中英战争的火药筒。

早在上个月，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就报道说，中国军队已经在吴淞集结。英国公使威妥玛则下令英国舰队司令前往上海，配合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麦华陀。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英国方面偷梁换柱，将规划审批的吴淞“马路”，建设成了吴淞“铁路”。

那年春节之后(2月20日)，中国方面发现，英国人建设的吴淞“马路”上居然铺上了铁轨，上海市长(“道台”)冯焌光提交了严正的抗议，要求立即停止施工。但英国人只停了一个月，就恢复了施工。双方的争吵立即升级，从上海提交到了南京(两江总督驻地)及北京，成为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

英国人强行修建的吴淞铁路，采用滚动开发的模式，边施工边营运。7月1日上海—江湾段正式通车，吴淞铁路进入“半程”营运阶段，7月3日即开始对外营业。

没想到的是，“半程”营运仅一个月，英国火车就撞死了中国行人。

倒霉的火车司机名叫戴维(David Banks)。中英双方的文件都显示，那天他的火车是正常行驶，即时速在24~32公里之间，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绝对是慢车。事发时，他看到前方路轨上有一个人正在行走，就拉响了汽笛，那行人走下了路轨。但就在火车即将通过时，那人又突然走上路轨，戴维刹车不及，火车从那人身上碾了过去，当即身亡。

这是正史所载的中国第一起铁路交通事故。吊诡的是，这位在最微妙的时刻、死在最微妙的吴淞铁路上的受害者，却根本无法查证身份，也无法在当地找到任何亲戚朋友(也就是所谓的“苦主”)。英方舆论普遍怀疑，此人可能受雇于中国政府，以这种“自杀性袭击”的方式，激化矛盾，从而动员民意，阻止吴淞铁路的建设和运营。

事故发生后，在官方的引导下，上海群情激奋。向来不大在乎草民生死的大清官方，此次一反常态地为民做主，坚持认为这是一起“东方慢车谋杀案”，吴淞铁路本身就是“非法建筑”，英方应对此事负全责，并且应将戴维交给中国审判，以谋杀罪“一命偿一命”。英国方面则坚持根据领事裁判权进行审判，并且最终宣告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受害人本身应承担全责，火车司机戴维无罪释放。

上海市长冯焌光立即下令军队进驻吴淞铁路沿线，并责令英国人立即停止铁路修建及已经开始的“半程”营运。英文《北华捷报》则公开指责冯焌光等地方领导，故意在激发民众对铁路的憎恨。英国公使威妥玛也下令，增调两艘军舰开往上海。

形势开始紧张了。

其实，民众对铁路的态度，本身是暧昧的。

无论是英文的《北华捷报》，还是中文的《申报》，都表明这段铁路在征地的初始阶段，当时的上海道台沈秉成就相当积极地配合英方协调业主关系，成功地说服英方以高价收购土地和民房，并且将工程逐段包给当地乡民，皆大欢喜。铁路沿线的民众，因为拿到了丰厚的征地补偿款，并且能够到英国人的铁路公司里打工，收入比起务农来说也算不错，并不反对铁路修建。

英国人则记载道，“附近的各个村子的人民中间，存在严重的反感，甚至于有准备用自杀的方式进行这种反对活动的……种种攻击铁路的方式都被采用着”，“他们掘去轨间路基，把砂砾堆置铁路线上，预期颠覆列车”。此类记载，以往多被主流史家作为“中国人民英勇反抗帝国主义”的证据，但这一结论要站住脚，必须首先排除其中极有可能的利益动因：这种对铁路的“反感”，究竟是出于民族义愤、保守意识，还是只因为想在利益分配上争取更好的筹码？

在撞人事故后两个月（1876年10月11日），据说行驶中的机车（为维持铁路建设，机车本身依然运行以运送筑路物资）飞溅出了火星，点燃了铁路边的茅草屋。数百名村民们围住了火车司机争辩，火车司机准备离开时，村民们上演了一幕令全世界目瞪口呆的“壮举”：“男妇老稚八、九百人前来拦阻，蜂拥而来，冀图拉住（火车）。后觉机器力大不能敌，遂各释手。车遂前行。”（《申报》）常被主流史家们忽视的是，吴淞铁路公司此时已经学会了如何应对中国特色的群体事件，立即启动危机公关，在中国官方介入之前，就支付了赔偿，将事态迅速平息。

与其说吴淞铁路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不如说它加剧了当地社会的分化。

英国领事在报告中就指出：“农业人口和知识界一般对此表示恼怒与嫌弃，而据说广大内地丝、茶市场，例如杭州、湖州和苏州的商贾们，却殷切期望得到这些便利。”

撞人事故当日，“半程通车”正好满月，吴淞铁路的旅客人数就达到了16894人。事故发生后，中英两国陷入了激烈的争吵，英方只好下令火车暂时停运，但建设照旧，并且在1876年12月1日全线通车恢复运营，当月乘客量就恢复到了17527人，其中15873人是购买最低等的三等舱位的华人，而其中又有8000人所持的是双程票。而从这一日至1877年8月25日彻底停运，吴淞铁路共运输旅客16万余人。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国民众在接受铁路这一新生事物方面，并不都是保守而愚昧的。

吊诡的是，“东方慢车谋杀案”所激起的“民愤”，似乎与上海滩盛夏的江风一般，瞬间消逝了。在中英双方的史料中，除了双方谈判人员的讨价还价外，都没有任何有关“民愤”的细节记载，当然也没有那位可怜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如何受到大清政府亲切关怀的细节。

在面对铁路时，那些看似矛盾的“民意”体现，其根源或许与政治觉悟、民族意识、开放精神都无关，而只在于一个词：切身利益。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been making full use of their only railway in sending troops and supplies from Tientsin to Hsin-Ho, Taku, Tong-Ku, and Port Arthur. Luckily the Chinese soldiers are not of a luxurious turn of mind, and appear to be perfectly satisfied with the goods trucks in which they are transported to the seaport of Tong-Ku for shipment.

THE WAR IN THE EAST: TROOPS FOR THE FRONT ON THEIR WAY TO TONG-KU BY THE ONLY RAILWAY IN CHINA

大清国的铁路建设虽然前期波折重重，但到了1890年代之后就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图为甲午战争前清军用铁路运送军队。甲午战争的失败，令中国痛定思痛，铁路建设随即进入了高速发展期。

---

---

## 李鸿章下英国象棋

绵里藏针的李鸿章给老外们下了一个套，大清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一日后被指责为“卖国”的条约，醒过神来的英国政府却迟疑了……

---

---

大清国的主力选手李鸿章，只好又去下国际象棋了，这回对弈的是英国人。

吴淞铁路的一场车祸，令中英双方的关系陡然紧张起来，甚至在上海出现了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这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恭亲王和正在与英国进行交涉的李鸿章十分担忧。

此时的李鸿章，正被云南发生的一起事件弄得焦头烂额。1874年年底，英国陆军上校柏郎（Horace Browne）率领武装探险队深入缅甸，勘测从缅甸、越南进入云南的通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派翻译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经上海、四川进入云南，前往中缅边境与柏郎探险队会合，探险队随即由缅甸八莫进入云南腾冲土司领地曼允。

柏郎探险队的随行英军有150名之多，这支武装队伍在云南当地引起了极大的骚动。1875年2月21日，探险队在云南腾越（今云南腾冲）的曼允，遭到地方驻军、腾越镇左营都司李珍国的阻止，马嘉理出来交涉，在交涉过程中双方发生冲突，马嘉理及其4名中国随员被击毙。英国方面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马嘉理当时已经完成了考察任务，和探险队分手后，他率领自己的4名中国随员返回上海，在经过腾越时被杀。后一种说法应该更为可信，很难相信如果马嘉理还随同探险队行动的话，那150名全副武装的英军会坐视自己的外交官被杀。

五颗血淋淋的首级，被挂上了曼允城墙。在地方官员们为击毙侵略者而高兴时，千里之外的大清中央不得不接过这个史称“马嘉理事件”（Margary Affair）或“滇案”的烫手山芋。

这可不是个好时候：法国陈兵越南，要求开放云南曼允（也即马嘉理被杀之地）；日本炮击朝鲜江华岛，中日冲突在即；在西北平叛的左宗棠也不顺手，要求中央引进外资，用于西北练兵，对抗沙俄。恭亲王内外交困，苦不堪言。

案发后，英中两国均被震动。伦敦训令驻华公使威妥玛向中国方面严正交涉，并且派出了 5000 名士兵，集结在中缅边境上，武装示威。3 月 19 日，威妥玛正式要求彻底调查、赔款、惩凶，并且免除在华英国商人在“正税”及“子口半税”以外的一切内地税。

中英双方的谈判十分艰难。期间，威妥玛多次以断交甚至武装对抗相威胁，离开北京，跑到李鸿章辖下的天津，或者沈葆楨辖下的上海，弄得这两位南北洋大臣不得安宁。

英国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不顾规划批文中的“马路”二字，在上海建起了吴



李鸿章的一生总是和英国人有扯不断的关系，从他起家时，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镇压太平军，一直到他在临终都希望用英国人的力量“以夷制夷”，遏制沙俄的对华野心。图为李鸿章 1896 年访问英国时会晤英国前首相格拉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淞铁路——一条带着铁轨的特殊“马路”。而在铁路兴建的初始，威妥玛就在上海，可以确信，吴淞铁路也是其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

圣诞节前（1875年12月18日），吴淞铁路的第一批铁轨到达上海港。圣诞节之后（1876年1月20日），开始铺下第一根铁轨。到2月中旬时，完成了一英里的铺设。2月20日受到了上海地方官员的抗议。

此时，英国公使威妥玛已从上海回到北京，继续谈判。已经处理好针对法国、日本和沙俄事宜的恭亲王，开始腾出手来专心对付英国人。见中国政府不接受自己的苛刻条件，威妥玛在6月15日下旗离京，再度来到上海，摆出了不惜绝交开战的架势。也正是在这期间，英国人在吴淞铁路问题上，不顾中方反对，强行建设。威妥玛要求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在必要时武装保卫这条非法的“地下”铁路。而吴淞铁路也在这紧张的大势中，开通了上海—江湾段，并投入了“半程”营运。

威妥玛决裂离京，令大清中央十分担心中英之间可能爆发战争。而此时正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大清国，最需要的就是和平的国际环境。经过大清国的洋干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斡旋，中英双方同意在烟台重开谈判，李鸿章在7月28日被任命为全权大臣。

李鸿章和威妥玛都没有想到的是，6天后（1876年8月3日），刚营运了一个月的吴淞铁路，就轧死了一位中国行人，这令中英谈判变得更为复杂。威妥玛坚决要求，将吴淞铁路纳入马嘉理事件的谈判中，一揽子解决。

李鸿章无奈，经请示中央后，他派朱其诏、盛宣怀两人前往上海，协助上海市长（“道台”）冯焌光，与英方代表梅辉立（William Fredrick Mayers，英国公使馆汉文正使）及麦华陀（英国驻沪总领事）就吴淞铁路进行谈判。

4个月前，冯焌光与梅辉立就开始了谈判，但没能谈拢。梅辉立在4月10日前往上海前，曾专程到天津拜访李鸿章，李鸿章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由中国政府“照原值买回，另招华商股份承办”，这样，既可以保障“洋商资本不致无着”，也可以令“中国主权亦无所损，似是两全之法”。但双方在上海的谈判并不顺利，英国方面同意中国购回铁路，但坚持购回后仍应继续由英国的怡和洋行继续承包经营数年，而沈葆楨指示冯焌光，中方购回铁路后必须拥有完全的处置权，这导致了双方谈判在4月28日破裂。

担忧全局的李鸿章写信给冯焌光，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尽快与英国人就收购铁



路达成条件。此时，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手段奏效，美、德、俄、奥等国公使突然集体到烟台“避暑”，令英国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中英双方终于在9月13日签订了《烟台条约》。

吊诡的是，大清中央立即批准了这一日后被指责为“卖国”的条约，而英国政府却迟疑了：因为他们及列强突然发现，条约中有关租界内免收厘金一项，不仅对他们没好处，实际上变相承认了中国政府在租界外对洋货有征收厘金的权利。这条规定加上对鸦片实行关税与厘金并征的条款，实际上是绵里藏针的李鸿章给老外们下的一个套，“将要给英国商业的一个重要部门严重的损害”。英国政府只好请求大清政府重新谈判，李鸿章因此争取到了足足十年的时间，直到1885年7月18日在中法战争压力下，才与英国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而英国政府迟至1886年5月6日才批准。这等于说，在十年时间内，《烟台条约》实际上是一纸空文，既没“卖国”，还将很多棘手的问题长期搁置，令英国人自食其果。

李鸿章在烟台给英国人下套的时候，朱其诏、盛宣怀到达了上海，标志着北洋大臣李鸿章开始直接插手本由南洋大臣沈葆楨负责的吴淞铁路的谈判。《烟台条约》签订后不到一个月（10月5日），中英双方重开谈判。谈判于10月21日移到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的驻地南京进行。在沈葆楨的强硬坚持下，英国人最后放弃了承包经营的要求，双方于10月21日达成协议：中方以28.5万两白银的价格，回购吴淞铁路，在中方支付完所有款项前，铁路由英方继续经营，中方支付完毕后，铁路归中方自主经营。

英国人拼命利用剩下的时间。吴淞铁路于1876年12月1日全线通车，在中国市场的热捧下，进入了经营上的高速增长期，并迅速跻身世界上利润最高的铁路之列。包括李鸿章在内，人们并不知道，在上海跑得越来越欢的“先锋号”（Pioneer）等机车，却在飞速驶向它们的终点……

## 大清铁轨不平行

沈葆楨在拆毀吳淞鐵路的同时，还给其中一台名为“总督号”（Viceroy）的火车头做了整容手术，将车身上的“总督号”三个汉字锉去，这实在是再清晰不过的一种政治防护手段。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实力决定行为，这似乎是颠扑不破的官场真理……

蜿蜒向前的铁轨，时而平行，时而却又不平行，大清改革这条特别的铁路，就是如此具有大清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习惯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恭亲王，驾着大清改革的机车，居然在这样的铁轨上也能调整轮距，照常行驶。

这一段，左边的铁轨，叫做李鸿章；右边的铁轨，叫做沈葆楨。在处理英国人偷偷修建的“地下”铁路吴淞铁路时，作为主要责任人的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沈葆楨，以及后来参与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李鸿章最初并没有介入。上海不属于他的管辖范围，而是沈葆楨的一亩三分地。根据大清国官场的显规则和潜规则，越位插手对方辖区内的事务，都是十分犯忌的。那时，李鸿章只是提些建议，赞同沈葆楨将此条铁路收回，以维护主权。

但随着李鸿章开始主导因“马嘉理事件”而进行的中英谈判，英方要求将吴淞铁路纳入谈判的范围，李鸿章便越来越深地介入此事。

1867年4月17日和23日两天，英方代表梅辉立与中方代表冯焌光，密集举行了6次会谈。但在以保守著称的江苏巡抚吴元炳向冯焌光发出一道书面指示后，冯焌光撤回了所有的让步，谈判破裂。在返京途中，梅辉立在4月30日晚再度拜访李鸿章。李鸿章对于上海谈判的破裂十分失望，他表示赞同由英方承包经营一段时间，还起草了一个建议书交给梅辉立。但他再三强调这只是个人意见，因为他无法干预南洋大臣辖下的上海事务。

就在当晚，冯焌光给李鸿章的密信送到，李鸿章得悉了吴元炳的背后就是两江总督沈葆楨，而沈的态度是收回吴淞铁路后立即拆毀。次日（5月1日），在和梅辉立的再次会见中，李鸿章收回了自己的建议书，并且提醒梅辉立如果自己插手，反

而会令沈葆楨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此事便不了了之，吴淞铁路继续施工，而英国外交官也惊奇地发现，直到7月份，总理衙门都没有再就此事向英方发出任何提议。吴淞铁路上海—江湾段也就在这种静默中，开始了“半程”运营，直到8月3日轧死了一位中国人。

李鸿章全权负责对英谈判后，在英方要求和中央批准下，派出了朱其诏、盛宣怀到达上海，协助冯焌光与梅辉立谈判。在国际压力下，英国人不仅签订了《烟台条约》，解决了“马嘉理事件”，而且在一个月后也就吴淞铁路达成了协议，由中国政府回购，全部款项付清后，英国人完全撤出经营。

毫无疑问，在这列强环视的多事之秋，中英争端的和平解决，令以恭亲王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大舒了一口气。但是，吴淞铁路以巨资收回后，沈葆楨将其一拆了之，却再度引起国际间的轩然大波。洋人们能够理解为了主权而收回铁路，却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将巨款回购的铁路又拆除了。沈葆楨的个人品质受到了普遍质疑，从北京发往伦敦的英国外交报告，讥评他是“驽驴般的自大”（mulish arrogance）和“耍小孩脾气”（childish temper）。甚至在1879年沈葆楨去世后，《北华捷报》（12月18日）还指责他“有许多显著的缺点”，最主要的就是个性狭隘、顽固，令其并不适合作为一名高级干部。

沈葆楨当然不是保守者。

早在担任福州船政大臣的时候，他就以锐意改革的姿态引起广泛关注。他接替左宗棠主持的马尾船厂，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一起成为当时改革开放的标杆企业。而在日本侵台时（1874年），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台湾，军事上积极备战，经济上加快建设，大大加强了台湾的向心力和海峡两岸的凝聚力，在之后抵抗日本的侵略中作用卓著。他的马尾船厂中就有专用的铁轨，而他在台湾更是修筑了运煤的铁路，这些都表明他本人与铁路并无“私仇”。

沈葆楨与李鸿章两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工作上的配合相当默契。1872年，当江南制造局和马尾船厂被指责为浪费国有资产时，李鸿章、沈葆楨在曾国藩的保驾护航下，并肩反击。在1874年对抗日本侵台时，两人又是通力协作。随后，李鸿章积极推荐沈葆楨接任两江总督，正式成为大清国最有实权的领导核心之一。日本侵略台湾与沙俄侵略新疆同时发生，引发了大清官场上“海防”与“塞防”的争论，沈葆楨却出人意料地站在了李鸿章的“海防”派一边，反对其老领导左宗棠为首的“塞

防”派。这期间固然有其防守海疆的本位主义,但也表明其与李鸿章在政见上的相同。即使在吴淞铁路协议达成后三个月(1877年1月),沈葆楨还提供了巨额资金,协助李鸿章辖下的轮船招商局收购美资的旗昌轮船公司,成就了大清国企经营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但在吴淞铁路上,沈李二人却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分歧。沈的态度十分强硬,甚至当英国军舰赶到上海进行武力恫吓时,他还宣称“兵轮何足虑,何日何口无英国兵轮耶?……兵轮恫吓,吾辈勿闻之,不足措意。梅辉立此来必有数次强辩,吾辈能毅然不挠,彼亦自就范围”。这令正在与英国艰难谈判的李鸿章大为不悦,认为沈某人实在太不顾全大局了。

李鸿章虽然尽力避免过多干预这一本归沈葆楨主抓的工作,但也毫不掩饰地希望沈不必过于强硬,“总期两边都过得去,始足见中英和好真心”。当时,大清国的中心工作就是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韬光养晦,加速发展。尤其当法国、日本和俄国都纷纷觊觎中国领土时,吴淞铁路的纷争,就显得相当次要了。

李鸿章虽然也是地方干部,但实际上却起到了“副总理”的作用,“当国”与“当家”显然是不一样的。在吴淞铁路问题上,李鸿章并不介意收回后让英国人承包,然后

中方自营,他希望借英国人的“东风”推动一直受阻的中国铁路建设。而沈葆楨坚持英国人必须完全退出。双方打的旗号都是“主权”二字,但显然,让英国人承包经营并不丧失任何主权。沈并非当国之人,没有李鸿章那般的不可承受之重,他的着眼点更在于“爱惜羽毛”:英国人在他的鼻子底下偷偷修建这条“地

# Le Petit Parisien



LES BOXEURS CHINOIS

围绕着铁路的民意总是扑朔迷离,到了1900年闹义和团的时候,拆毁铁路又成了“扶清灭洋”的主要任务。

下”铁路，令他的行政能力、个人威望等大为受损，他必须以一种戏剧化的夸张的手法，乃至不惜矫枉过正，避免给政敌留下任何的把柄。

此时，改革开放虽然已经成为大清国的中心工作，但却并非主流的话语体系，脚穿新鞋子，口喊旧号子，依然是恭亲王、李鸿章等改革者们的无奈选择。包括铁路在内的新玩意，都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绝不可高声嚷嚷，否则便会成为政治上的把柄，成为大清国最可自豪的先进的社会制度的敌人。沈葆楨没有李鸿章那种敢于“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资本和个性，他能做的，也就是在红灯面前假装“宁左勿右”，先把自己晾干了再说。拆铁路，是他的政治求生本能；拆了后又运到台湾，则是他骨子里改革派的基因推动。另一个往往被史家们忽略的细节是，沈葆楨在拆毁吴淞铁路的同时，还给其中一台名为“总督号”（Viceroy）的火车头做了整容手术，将车身上的“总督号”三个汉字锉去，这实在是再清晰不过的一种防护手段。

吊诡的是，李鸿章似乎对沈葆楨这种无奈之举嗤之以鼻，他在写给郭嵩焘的一封信里说：“幼丹（沈葆楨）识见不广，又甚偏愎。吴淞铁路拆送台湾，已成废物。不受谏阻，徒邀取时俗称誉。”老李的这一评价，实在有点刻薄。沈葆楨无非就是忧谗畏讥的被动防守而已，哪里谈得上是沽名钓誉的主动出击呢？

郭嵩焘曾认为，晚清的几位改革派大佬中“中堂（李鸿章）能见其大，丁禹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丹（沈葆楨）能尽其实”，这是很中肯的。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实力决定行为，这似乎是颠扑不破的官场真理……

## 后记 恭亲王：绝版之外

——雪珥答《中国经营报》记者问

【《中国经营报》记者】“绝版恭亲王”系列告一段落，读者通过恭亲王这一晚清政坛二号人物，得以一窥清廷政局之堂奥以及清末改革中坚人物的坚守与无奈。作为将这一切呈现给读者的人，你为何选定了恭亲王这个人物，他的哪些性格吸引了你去探究？能不能谈谈你从开始关注到研究恭亲王的过程？

【雪珥】二十多年前，我痴迷般地喜欢上了一本书，那就是尼克松的著作《领袖们》。这位美国前总统在书中如此描绘中国总理周恩来：“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尼克松当然不会明白，在中国的舞台上，聚光灯必须也只能照在一个人的身上，其他人则必须谦恭地将自己湮没在巨大的阴影下，明智地躲避着，或者耐心地等待着聚光灯。

那时，我刚刚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求学，在几位师长的帮助下，给自己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读书计划。当我读完几本讲述洋务运动的书后，书中那着墨不多的恭亲王，却令我总是想起尼克松的这段评述。

谦卑，韬晦，在领导面前勇于并且善于自我批评，乃至自我贬低，在时机未到时静如处子，在时机到来时动如脱兔，所有这些，也正是我在那所号称“青年黄埔”

的大学内所接受的官场入门训练。

那位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就成为国家掌舵人，之后又被历史贬低到无限小的恭亲王，是否就是中国特色的从政之路的典型呢？我对此很感兴趣。但这种兴趣，只是一闪而过。从1987年赴北京求学，到1999年移民出国，这12年间，中国大多数人都难以安宁地守着一张书桌了。恭亲王，连同周恩来一道，被忙碌的名利追逐扫出了我的关注范围。直到2002年我重新回国，并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漫长六年间，为了抵御孤独和诱惑，才开始重新提笔写作，并将笔端伸向我最感兴趣的中国改革史时，那个阴影中的人物，才又回到了我的脑海。

在我今年撰写的恭亲王专栏中，我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那些阴影中的人物的共同点：老二性格。恭亲王曾经是有棱角的，在“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的“一国两制”早期，权力的重心在恭亲王手上。但在经历了几次碰撞后，他彻底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帝国的管家，而太后们才是真正的女主人。自此，那个神采飞扬、风度翩翩的恭亲王就不见了，郁郁寡欢，忧谗畏讥，言辞谨慎（“谨言”却未必“慎行”），成天忙于事务，只管埋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消极“抓革命”，积极“促生产”，“老二性格”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令我震撼的是，在参观整修如故的恭王府时，我在百年的宫墙发现了一些四十年前的红色标语，其中就有：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忠实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那一刻，我真感觉头皮发麻，对历史的无情和荒诞充满了敬畏。那个从恭亲王联想到周恩来的离经叛道的念头，又在脑海闪现：为什么在如此多需要他操心的大事小事中，周恩来要将整修恭王府对外开放，作为自己交代给谷牧的三个遗愿之一呢？（请读者自行查阅相关官方报道）为什么周恩来在“抓革命，促生产”的百忙之中，还多次来到恭王府，他真是为了发掘“大观园”的原型，还是在凭吊什么，还是想传递什么信息？

【《中国经营报》记者】作为一个体制内改革派的代表，恭亲王身上似乎充分体现了一个体制内改革者对改革分寸的拿捏，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了其自身的哪些纠结和矛盾？这其中，有哪些是恭亲王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

【雪珥】我们常说的所谓“局限”，其实就是观察者以自己的标准，以当下的标准，乃至以自己在当下的利益诉求为标准，去丈量历史人物所发现的那些不如意的地方。认为历史人物都有“局限”，这本身有一个逻辑前提：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今”必胜于“昔”，“新”必胜于“古”。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今”与“新”往往就是“昔”与“古”的某种翻版而已，绕了几十上百年的圈，抬头一看，可能又回到了起点。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无奈之处，所谓“势禁形格”。所以，我更愿意谈论的是恭亲王的“势禁形格”，而不是他的“局限”。

我曾经很深地介入体制内的运作，几乎零距离地观察了处于改革开放第一线的浙江在整个90年代的全面蜕变。我曾经提出一个很有意思但也很尖锐的观点：浙江的发展，关键是受益于地方政府有意无意的不作为。改革初期一直到90年代末，浙江并非一个官场的亮点和“要缺”。既非冲要之职，则官员们的首要思想便是“平安无事”，为求“平安无事”，便要自己少惹事，首先便是不敢提倡什么敢为天下先的东西，不会涌现出什么明星式官员，吸引舆论的目光和炮火。其次便是没有能力消灭那些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已为天下先”的新生事物，比如温州这样的“资本主义萌芽”，不是不想消灭，而是这样的野草实在太茂盛了，要消灭就必须大动干戈，一大动干戈就要引人关注，就无法“平安无事”。这种官场本身的非主流性，导致在浙江的几个改革发祥地，对草根改革的践踏都很不彻底，敷衍了事，斩草不除根，这就在客观上为小草的繁衍提供了极大的空间。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良性的“钱权交易”模式：权力对资本的维护，起初还谈不上“保护”，而仅仅是“不伤害”而已。

主观上不想折腾，客观上无力折腾，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这其实也是恭亲王发动的体制内改革的基本特征，也是恭亲王能够四两拨千金、举重若轻而且保持自我低调的原因所在。中国近代改革史那些公认的改革实践先驱们（康有为及洪仁玕之类的“口水改革家”不在此列），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背后，其实都站着一个低调的恭亲王，为他们保驾护航。尤其在早期的改革中，他们瞻前顾后，逡



巡不前，恭亲王就在背后推着他们。从中国历史的传统来看，曾、左、李等人都触犯了官场上的最大忌讳：一是功高难赏，没有他们的浴血奋战，即使那位自称是耶稣弟弟的洪教主不能君临天下，大清帝国至少也早已分崩离析，群雄割据了；二是权高盖主，他们手握重兵，在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集军权、财权、人事权于一身；三是“非我族类”，在严厉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清帝国，这是汉人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手握雄兵。换在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曾、左、李等都不可能善终，更不要说参与政权的建设，并分享胜利的成果。实际上，在战后的重建和改革中，曾、左、李几乎无时不受到政敌们的攻击，有的时候，这种攻击是直奔要害而来的，但这些都都在恭亲王及慈禧太后的支持下，被一一化解。

晚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人说是李鸿章，那是不准确的，李鸿章无非是前台的操盘手兼新闻发言人，知名度高而已。真正画圈、掌舵的就是恭亲王。如果要画一幅漫画来解释大清改革，恭亲王就是把着方向舵、带着望远镜的船长，而曾、左、李等则是拿着桨的水手。

改革与革命相比，难度更大。改革最难的，并非目标的确定。现行体制下存在什么问题，只要不是瞎子和傻子，都一目了然，其中大多数的问题其来有自，积重难返。比“要改什么”更重要，也更艰难的，是“如何改”，也就是步伐、节奏、分寸的把握，以及各种利益团体的平衡，特别是对其中的既得利益者的安抚。这些既得利益者拥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改革的极大阻力。这就是恭亲王作为改革当家人的艰难之处。

从民国开始，主流史学界多认为晚清的改革，胆子不够大，步子不够快，并且总是羞羞答答地不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评价就是典型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改革的具体操作，首先必须有人，也就是操盘的团队，还必须有机制去贯彻落实，但这就出现了巨大的矛盾：现有的干部队伍腐败严重，行政体系运行艰难，而短期之内又无法重建一个行之有效的团队和体制。李鸿章晚年自嘲为“裱糊匠”，其实，改革者的定位就是“裱糊匠”，因为他不可能什么都推倒重来，那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何况推倒重建的新屋子，其问题未必会比旧屋子少。这种无奈，也决定了改革是渐进的、缓慢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

其实，一个由体制内主导的改革，其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稳固政权，以达到“大治”，而绝非“大乱”。这种改革的基本前提，就是推动并且维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这也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的基本政治诉求。那种对如火如荼的乱象的期待，其动机无非是浑水摸鱼而已。先砸烂了一切再说，“越乱越好”，“不破不立”，“破”了之后能否再“立”，如何再“立”并不重要，一切等老子手上有权了再说，这正是恭亲王临终前告诫光绪皇帝要多加警惕的。恭亲王尸骨未寒，所谓的“戊戌变法”便闪电般登场，随即又闪电般失败，根本原因就是那些“口水改革派”们所要的只是砸烂旧体制、砸烂大多数人的铁饭碗，却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耐性去建立新体制，所以缺乏民意支持。

恭亲王的身份，当然决定了他的改革出发点、立场及底线，那就是坚持和巩固满清皇族对政权的领导。这是他不可能动摇的基本国策。许多改革措施在他手上无法进行，大到政治体制改革，小到铁路建设，并非因为他颞预、愚昧，而是作为当家人的无奈。操之过急，不仅无法凝聚改革所需的民心士气，而且，只能给野心者提供浑水摸鱼的工具。他的最主要助手、被西方公认为最坚定的改革者的文祥，就不止一次地告诉洋人们，如果操切行事，大清改革将走向反面。这在戊戌年和辛亥年的改革大跃进中，都得到了验证，改革沦为争权夺利的幌子，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我在上本书《国运 1909》中涉及了不少此类细节。

“治大国如烹小鲜”，“小鲜”不是不能翻动，而是不能频繁翻动，更不能任性翻动，否则就烂在锅里了。这个火候的掌握，或许就是对改革者能力和资源的考验。

【《中国经营报》记者】恭亲王的改革努力并未让大清避免覆灭的结局，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你觉得恭亲王的改革为何没能拯救大清，而以他为代表的体制内改革者在历史上是否有带领改革走向成功的机会？

【雪珥】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改革只能治病，却未必能救命。在治疗过程中，在手术之前，尤其是大的手术之前，必须要有预案，保护好心脏和大脑。而心脏和大脑，我认为就是改革者赖以行动的权威资源。我在上本书《国运 1909》中多次谈到，清帝国的覆灭，不是因为其改革不够快、不够猛，而恰恰是因为是改革超速失控。我会在即将开始的有关辛亥革命的专栏中，再细致阐述这些看法。

如果我们以“裱糊匠”来作比方，裱糊匠的工作也是循序渐进的，从上房换瓦开始到更换房梁，有个漫长的过程。“裱糊”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固地基，

随时监测，尤其是不能因“裱糊”工作而掏空了地基。清末新政中，自1906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动作猛，幅度大，其实就是毁坏了地基，最后造成整体的坍塌。

恭亲王这样的体制内改革者，当然是有机会成功的，但需要他们随时注意对自己要害部位的保护。恭亲王在临终前叮嘱光绪皇帝小心康梁等“小人”，其实正是老成谋国之言。那种认为一旦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就需要放开放开再放开，宁右勿左的极端想法，如果不是出于天真，就是出于某种别有用心了。改革从来不应是极端语言的游戏，执行力在其过程中至为关键。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因为政权的最终覆灭，而否定了改革的作用。改革的作用，不仅及于当时的政权，更及于整个民族。发轫于恭亲王的近代改革，超越王朝更替和种族的界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具有深远的意义。自恭亲王之后，只要有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即使是那些草莽出身的统治者，也会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实行类似的改革，张作霖的东北、阎锡山的山西、马家军的甘肃，莫不如此。

**【《中国经营报》记者】**你通过对恭亲王及清末改革成败的回溯，一直在强调权威性是推动改革的前提，但改革本身就是对现有利益权力格局的调整，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改革者的权威性呢？

**【雪珥】**改革是一种牵涉面很广的政治和经济实践，不是坐在书斋中做点沙盘游戏就能做到的，不是在领导讲话中多用几个排比句，在中央文件中多加几个感叹号，就能达成的。它涉及到许多人的利益调整，它既会产生受益人，但也会产生受损人。最郁闷的是，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受益人也都在不断抱怨，无人喝彩，改革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结局。中国历史上从商鞅开始，几乎都是在大多数人群享受着改革的成果时，其倡导者却被押上了改革的刑场，他们的作用要过很多年甚至很多世纪后才能被历史所认可。

改革往往就如同在迷雾中行驶，没有权威性资源作保障，不仅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落实，会被官僚体系在执行中走样，而且在面对激烈的利益冲突时，改革将严重受阻，中途夭折，甚至倒灌。

“治大国如烹小鲜”，改革者最艰难的就是把握火候。戊戌变法之所以成为一场儿戏，就是因为动机不纯，而分寸又太乱。几个年轻干部刚刚摸到权力的边儿，就

贸然地砸了上到中央各部委，下到各省的一大批干部的饭碗，搞得人人自危，把几乎整个干部队伍都推向了自已的对立面。这至少是政治手腕上不够圆润，缺乏技巧，也说明自称“改革者”的那些人对自己的目标定位及达成途径的盲目。恭亲王临终遗言，并非反对改革，而是提醒光绪皇帝要慎重，欲速则不达。戊戌变法失败带来的最大影响，不是那个儿戏般的政治体制改革被喊停，而是光绪皇帝及整个中央的能力和权威受到严重损害。为了保住光绪的皇位，慈禧太后出面和稀泥，并且以册立“大阿哥”的方式，来安抚愤怒的既得利益者们，从而导致了“极左派们”的全面回潮，一路往左飞驰，直到酿成义和团的大动乱。国家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就由戊戌的“极右”转向庚子的“极左”，直到辛酉变法开始才回到正轨上来。但在这一大折腾中，帝国仅存的元气即中央权威资源几乎耗尽，从而点燃了十年后分崩离析的导火线。

如何维持和不断增加权威资源，是对改革者能力、毅力和手腕的考验。这方面，以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为代表的学者们，有不少精彩的阐述，也在中国得到无数人的关注，当然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我不是个政治学学者，没有能力提供药方，我只是个努力回到历史现场的“记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发掘，给大家提供一些细节而已。

**【《中国经营报》记者】**以恭亲王为代表的王朝势力推动的改革一定是一种渐进模式，以清末各种势力的博弈态势为例，在这种渐进改革路径中，如何不断地化解集聚起来的风险呢？

**【雪珥】**有利益调整，就必然有利益冲突。

有的冲突是根本性的，比如干部下岗分流，被分流的人，当然不高兴了，而这恰恰是晚清改革迟迟难以涉及政治体制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是“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不肯放权、让权，而是那些寄生在旧体制上的官僚们难以安置。精简政府机构，这自始至终都是晚清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恭亲王时代不敢涉及，因为国家刚刚从内忧（太平天国动乱）外患（英法联军入侵及中法战争等）中复苏，需要一大批干部，哪怕是贪官污吏或不称职者。思想观念不一致，这比较容易解决，恭亲王就常将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们，直接安排到总理衙门工作，让他们尝尝当家人的感觉，其中大多数人几乎都成了彻头彻尾的改革派。但涉及到利益冲突，那就不是“换

位思考”能解决的。

恭亲王一死，戊戌变法就先拿公务员开刀，结果反弹力量大到差点端掉了光绪的皇位，这可不是什么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就能解决的。直到1906年袁世凯主持干部人事体制改革，他这么强势的人物，最后也只能草草收场。实行宪政改革之前，慈禧太后征询出洋考察的载泽和端方等的意见，他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立即进行，因为它不仅利国、利民，而且利君，因为可以保障皇帝“世袭罔替”，但就是不利官，这是很精辟的见解。

从晚清的实践来看，中央化解改革积累的风险，多采取延迟甚至取消改革的办法。但放弃具体的改革措施，并不意味着旧有的矛盾能得到解决，新旧矛盾越积越多，到最后终于积重难返。这也是选择循序渐进的改革的代价，如果选择剧烈的“休克”疗法，或许能彻底解决一些问题，也有可能就此昏死过去成了植物人。

【《中国经营报》记者】恭亲王与慈禧的关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你如何定位？他们是中国传统的帝权与相权的博弈吗？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又如何影响了清末改革的走向？

【雪珥】恭亲王与慈禧，就是政治搭档的关系，我将此称为“叔嫂共和”，其实就是“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两种并存的特殊体制，一种特殊的“一国两制”。我们历来只强调了“垂帘听政”，却忽视了“亲王辅政”，这很容易导致对晚清政治运行机制的误判，以为慈禧太后可以一手遮天。

恭亲王与慈禧太后之间，当然是有合作、有斗争。摩擦的存在，是古今中外任何一种合作模式必有的伴生品。1884年中法战争时，慈禧太后成功地将恭亲王罢免，但还是必须换上醇亲王负责“亲王辅政”，而不能只搞“垂帘听政”。

清代从多尔衮—孝庄太后的“叔嫂共和”之后，到了末代又出现三段：恭亲王—两宫太后、醇亲王—两宫太后、摄政王—隆裕太后。从权力制衡的角度说，这种“叔嫂共和”是最能有效防止亲贵篡权或外戚专权的制度设计。晚清五十年，三任皇帝几乎都是少不更事的年龄，而且内忧外患严峻，但朝局却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既没有出朱棣，也没有出武则天，纵观中国历史，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叔嫂共和”这种创造性的权力制衡设计，确保了晚清的政局不因“叔嫂”之间的矛盾而发生大的动荡。

【《中国经营报》记者】你的写作，有一个国内学者无法取代的优势，就是对大量海外史料的掌握。通过你对一些海外史料的钩沉，我们发现，清末的国际环境并没有那么险恶，而且西方列强似乎对中国的改革及改革者一直抱有某种期待，这是历史的真实吗？还是你矫枉过正的结果？当时的国际环境怎样影响了清末改革路线？

【雪珥】并非我矫枉过正，而是历史本身已经被后世有意识地误读了。

晚清的国际形势，正如恭亲王等所分析的，只要自己处置得当，就很难出现列强“合而谋我”的局面。在恭亲王的年代，列强中除了俄国和日本，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是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的，当然，他们都在索取各自的利益。

后世总是批评恭亲王和李鸿章等的“以夷制夷”政策，但那些批评者似乎也没有能力回答：作为一个弱国兼大国，除此之外还能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除日俄两国之外，中国的稳定、富裕乃至逐渐强大，与列强的根本利益并没有冲突，甚至还有促进。这也是列强之所以在太平天国动乱时，决心援助大清政府，而非那位自称是耶稣弟弟的洪教主。可以说，恭亲王执政后，中国争取到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就得益于这一时期的和平与均衡。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恭亲王等的改革路线就是要成长为西方那样的强国，同时尽可能地保留自己“最具有先进性”的社会制度和他文化。这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但区别在于，大清国能动用的中央权威资源，被迅速消耗，而日本却通过尊王攘夷等，强化了中央的权威资源，迅速将改革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战斗力。

中国近代史固然充满了屈辱，但我们不能因此抹杀这其中的转机 and 相当程度的复兴。在甲午战争之前，清帝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是在不断上升的，在一些国际冲突中，清帝国似乎比后世的一些政权更具有亮剑的勇气。而即使那些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也几乎都是在清帝国血战之后或兵临城下之时被迫签订的，没有一个是为了内斗的需要而主动投怀送抱。民国开始，为了宣传的需要，执政者总是要把清政府描绘成一团漆黑，以便显示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

【《中国经营报》记者】我们知道，你除了公务员、商人、律师的经历，还曾做过财经作家，今天你又选择了一家财经媒体开设专栏，你是否有某种媒体情结？为

何在财经媒体刊载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

【雪珥】我开始近代史的写作，至今已经五年多了。随着读者群的不断扩大，我也发现在一些场合，包括红墙之内和国土之外，在赞美声或讨伐声中，我的文章和观点有时会被有意无意地误读了。研究历史，资治通鉴是我的主要目的。我把自己的写作模式又定位在“历史现场记者述评”，有意识地强化了现场感和现实感，便于读者自我“代入”，这些都促使我在选择发布渠道上十分慎重，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曾经有海外媒体约请我开设专栏，开出了十分诱人的稿酬，但我谢绝了。不是我想和钱过不去，而是不想被人当枪使。我有自己的生意，可以养家糊口，不必卖文为生，赚取版税和稿酬被严格限定在“卖艺不卖身”。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保证人格上的独立，才能保持思想的贞洁。

我偏爱财经媒体，一是财经媒体比较务实，可以少卷入一些不必要的争论之中；二是财经媒体的受众群多是中产阶级，有相当强烈的社会担待，这一人群不仅是社会稳定的骨干，也是社会发展的主力，这令我可以远离那些装腔作势的八股混混，以及少不更事的愤青们——尽管我并不讨厌他们，但实在没有时间伺候他们。

## 图片说明

本书所用恭王府老照片、彩色照片和部分王府人物老照片，均由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提供，在此谨向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表示感谢！



任何人都都有自己的无奈之处，所谓『势禁形格』。所以，我更愿意谈论的是恭亲王的『势禁形格』，而不是他的『局限』。

主观上不想折腾，客观上无力折腾，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这其实也是恭亲王发动的体制内改革的基本特征，也是恭亲王能够四两拨千金、举重若轻而且保持自我低调的原因所在。中国近代改革史那些公认的改革实践先驱们（康有为及洪仁玕之类的『口水改革家』不在此列），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背后，其实都站着一个低调的恭亲王，为他们保驾护航。尤其在早期的改革中，他们瞻前顾后，逡巡不前，恭亲王就在背后推着他们。换在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曾、左、李等都不可能善终，更不要说参与政权的建设，并分享胜利的成果。实际上，在战后的重建和改革中，曾、左、李几乎无时不受到政敌们的攻击，有的时候，这种攻击是直奔要害而来的，但这些都集中在恭亲王的支持下，被一一化解。

晚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人说是李鸿章，那是不准确的，李鸿章无非是前台的操盘手兼新闻发言人，知名度高而已。真正画圈、掌舵的就是恭亲王。如果要画一幅漫画来解释大清改革，恭亲王就是把着方向舵、带着望远镜的船长，而曾、左、李等则是拿着桨的水手。

改革与革命相比，难度更大。改革最难的，并非目标的确定。现行体制下存在什么问题，只要不是瞎子和傻子，都一目了然，其中大多数的问题其来有自，积重难返。比『要改什么』更重要、也更艰难的，是『如何改』，也就是步伐、节奏、

本书部分图片、文字资料来自于100年前英、美、法等国以下报刊：



The New York Times

ISBN 978-7-5496-0008-3



9 787549 600083 >

定价：39.80元